

宋教仁傳

白 序

這一冊宋教仁先生(1882—1913)的傳記，原題作「宋教仁與中國革命」。今爲使讀者對於宋先生在國史上的地位可以「一目了然」，特採用「宋教仁：中國民主憲政的先驅」一書名。事實上，宋先生確是爲中華民國憲政而流血犧牲的第一人。

這一傳記的出版，正值舉世研究和閱讀中國現代政治與人物之興趣最熱烈的時候，當可適應多數人士的需要。但如果被認爲這是趨時應景之作，則相湘實不敢承；因爲相湘懷抱爲宋先生撰寫傳記的心願已有三十餘年。

回憶童年就讀湖南私立楚怡小學，在其實行道爾頓制設計教學法的環境中，開始對歷史課程發生較多興趣。課餘又嘗至同學蔡端生、黃一寰兩兄家，瞻仰開國元勳蔡（鐸）、黃（興）遺像遺物；端生兄且揚言長大後必爲其父撰一大傳。高山仰止及私心羨慕之餘，亦竊有意爲建國偉人撰一傳記。先嚴漢聲府君（諱其林1878—1937）因訓示：我常德郡宋教仁先生之豐功偉績亦與黃、蔡齊名；並爲言與宋公交往以及同旅日本時之若干照片。

自相湘肄業北庠，學習興趣傾向近代史；復因日人萱野長知致馮自由先生書函（對於黃、宋

等革命史實不宜忽略，見馮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之啓示，乃更加速搜求資料以冀宋先生傳記得早完成。

不幸，對日抗戰發生，長沙大火，常德會戰，兩大城市均成灰燼，先嚴數十年之藏書及手寫日記（其中多有可與宋先生「我之歷史」相證補）與相湘自北平携歸之多種史料，均未能倖免於難。痛心之餘，又見報載宋先生遺屬寡媳一人在桃源轉徙流離孤苦伶仃之訊（宋之獨子歿於抗戰前）；更傷英雄無嗣之淒涼。「從頭做起」搜集資料以爲宋先生撰傳之心念轉而彌堅。

自抗戰勝利，相湘在北平、上海、蘇州、南京等地重作搜求，幸又獲得宋先生關係史料若干種，民國三十八年春挾以渡海來臺，喘息稍定，即往各圖書館繼續查尋。民國四十七年秋，國立臺灣大學與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進行合作研究中國近代史計劃，相湘之「宋教仁先生傳記」被列爲其中專題研究之一。旋且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同意閱讀其黨史史料庫之資料。經過兩年的工作——其中並曾有往美國、日本各大圖書館訪尋史料之機會。這一宋先生的傳記，遂在歷經大劫之後終底於成。對於協助完成這一工作的學校和機關（如上述）實在非常感謝。

全稿完成以後未克即時印行，祇將其中一極小部份「袁世凱謀取臨時大總統經過」，發表於「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一冊，竟很快地引起海內外學人的注意，日本「東洋學報」（第四十四卷第四號，一九六二年三月，東京刊行）且摘要予以介紹，頗多推譽。

民主政治與共產主義之勢不兩立，在今日可說是世人具有的常識，但在四五十年前是極少人理解。宋先生於此却獨具卓見：一方面努力推進民主政治，同時更力言中國絕不能引用共產主義，且明白指出中國如實行共產主義之種種不幸惡果；因而堅決主張國家社會政策。不幸竟由此而被謗爲「革命黨第一罪人」。以致蓋棺而論不定——現在，宋先生所指陳的種種惡果都不幸而言中。面對殘酷的現實，是非功罪從此自可澄清，不容再有爭辯了。

本書內容綜合敘述與分析解釋並重，對若干重要史實均力求提供新紀錄與新解釋；例如引起「二次革命」之宋先生死因，即與過去諸著述完全不同而自信確能得其真相。至於當時環境背景與同時人之言行尤盡可能多予觸及與描述，以助讀者了解全盤政治動態。又爲使文省事增及考訂異同，全書附註詳明，其分量幾可與正文相等。希望讀者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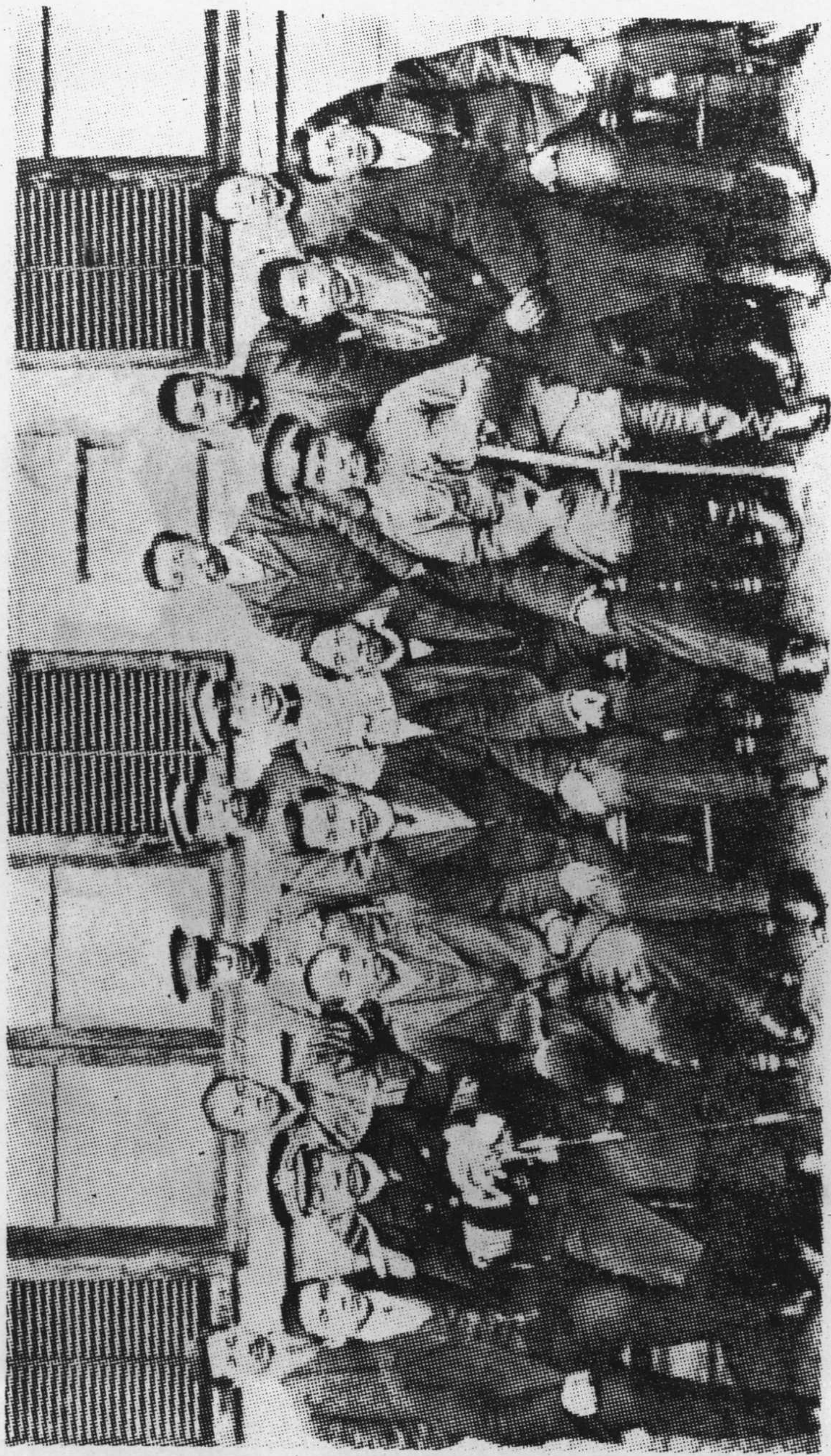
撰寫這一自序將畢，雖有稍稍了却三十餘年心願的輕鬆之感；然而偶一自念才能學識之短缺，實在未能將這一爲民主憲法而犧牲的「勇者畫像」神采描繪於萬一；又不勝惶愧之至。惟有誠懇地希望讀者們的教正。

民國五十三年五月廿四日



一九〇四年流亡東京之華興會會員（左起第一人爲黃興，第四人爲宋教仁。）

（。宋元教仁人五第，二。變宋教



歡迎袁世凱南下就職之南京代表在北京貴胄堂行館攝影（前排左起第一人爲汪精衛，第四人爲宋教仁，第五人爲蔡元培。）



宋教仁先生遺像

目 錄

圖片(四幅)

自序

第一章 求學時代之環境與背景

一 經世致用學風之復興

二 講求時務注意新學

三 湖南自立自保之主張

四 湖南留日學生刊行遊學譯編

五 民族主義之教育與湖南自治論

六 武昌文普通中學堂與革命風潮

七 科學補習所與華興會舉義之失敗

第二章 日本六年

一 二十世紀之支那與醒獅

目 錄

一
一
一
二
四
六
八
二
五
一八
二九
三〇

二	中國革命同盟會之成立	三三
三	革命建設基礎在高深學養	三九
四	遊說馬俠與間島問題	四四
五	同盟會之悲歡離合	四九
第三章	對內政外交的主張	六七
一	對外關係之認識	六八
二	建設真正民權之立憲政治	七三
三	遵奉民生主義 推行社會政策	七七
第四章	大革命暴發前後	五九
一	同盟會中部總會之組織	九七
二	長江上下游的奔走聯絡	一〇二
三	臨時政府之組織	一〇八
四	袁世凱陰謀與宋之對策	一一四
第五章	政黨政治之嘗試	一五五
一	同盟會之團結與改造	一五七

二 不戀權位 只重政見	一六六
第六章 爲民主憲法犧牲	一九五
一 國民黨之組織	一九九
二 孫黃北遊之前後	二〇五
三 國會議員選舉與大政見	二二三
四 蓋棺論不定	二二三
引用史源及重要參考資料	二七九

第一章 求學時代之環境與背景

宋教仁，中國現代史上一偉人也，其人之重要性，不僅由於彼爲中國革命同盟會之主要組成份子、中部同盟會之發起人；更由於彼能以實際之行動，力求促進中國政黨政治之正軌，雖所志未遂，遽以身殉；然其主張，迄今固仍爲中國人奮力追求之目標，國父孫逸仙先生嘗謂：「宋氏乃爲中國憲法而犧牲之第一人」^(一)，誠爲符合歷史之的論。

宋氏出生於湖南省桃源縣。湖南民性自古堅忍慍悍，操之過激，鋌而走險，語云：「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蓋其明證。降及近代，曾國藩即利用此特性創立湘軍，以一省繫天下之安危，轉移舉國之風氣，其事固有足多者，桃源則與陶淵明桃花源記同爲中國人士所熟知，山明水秀，溪廻曲折，優美之自然環境，對於生於斯長於斯之宋氏，自不能無其影響。雖然宋氏嘗有言曰：

「吾則沅湘間產也，地近江浦，猶念曾國藩、左宗棠者起自布衣書生，而能摧陷大敵，人奉爲宗，其是非亡足論，觀其識度，無忝于英雄，其民又樂爲之致死，豈其風烈遂燦於今？」（三）是湖南强悍之民風與曾國藩輩倡導之經世致用之學術環境，對於宋氏思想與事業之感召，顯然更甚於前者。

一 經世致用學風之復興

經世致用之學原爲中國文化之正宗，孔子曰：「士、任重而道遠。」固慨乎其言矣。北宋范仲淹秀才先憂後樂之呼籲，益振醒知識份子之責任感與自尊心。同時司馬光纂輯資治通鑑復爲經世致用學者訂一重要典範。不幸南宋以降，士大夫痛國家之多難，慷慨激昂，轉多虛僞之論。歷經遼金元三朝，中國知識份子遂遭遇空前之迫害，明初復創八股制藝以束縛讀書人之思想，又用廷杖詔獄以凌磨士大夫之尊嚴；致使當時士人唯有逃避現實。逮朱明覆亡，顧亭林諸氏奔走呼號，力倡「行己有恥，博學於文，」痛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始爲經世致用之學開啓一新途徑。

然時值滿清入主中夏，固絕不願見此種學風之滋長，且爲鞏固其統治權，更復變本加厲，以摧殘之、壓迫之，文字獄之繁興，博學鴻儒科之創立，四庫全書館之設置，交相爲用，務使士大

夫無法衝破種種網羅，如不入我彀中，即自屏於政治之外。雍正乾隆時，達官自刻奏議，往往得罪，記清代名臣言行者亦犯大不韙，於是文人著書立說，多不涉當世之務，繁瑣考證之風特盛，固士氣消沈已極之明證。逮嘉慶朝，仁宗天資長厚，略變兩朝箝制之意，歷二十餘年之久，後生新進，顧忌漸忘，稍稍有所撰述，雖未必即時刊行，然能動撰述之興，即其生機已露也。至道光初葉，則時事之接觸，切身之患，不得不言者有鹽務、河工、漕運三大端，議論叢起，賀長齡、魏源竟彙而刻之，命名皇朝經世文編，於道光六年（一八二六）行世（三）。未幾，海警漸動，士大夫急欲周知外事，疆臣又爲之倡導，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魏源纂輯之海國圖誌梓行，是爲中國近代士人綜合中外資料所爲知己知彼之第一部著作；而其先一年，何紹基、張穆創建顧亭林祠於北京廣寧門內之慈仁寺，歲舉祀事。有謂此爲中國近百年世運之關鍵者（四）。以今論之，要非過甚其詞。

蓋學風士習從此丕變，士大夫一反前此空疏逃禪之積弊，而秉持亭林之詔示，振經世之絕學，身體力行，見諸行事；曾國藩則其代表焉。觀乎曾氏服官京師，嘗讀書於顧氏祠側，對於亭林極盡嚮往之誠，創立湘軍又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作號召，用儒生爲統將，募農夫充行伍，士人匹夫均因此毅然有守先待後捨我其誰之壯志，湖南全省之義聲震天下，遂使舉國之人咸知引國事爲己任，民權之得伸，自此始也（五）；而其傳刻王船山遺書，民族大義因之流播益廣，有謂曾氏

言行即爲辛亥革命肇端者(六)。宜乎宋氏譽之英雄，今人謂近百年世運之關鍵有在也。

宋氏出生一八八二年，其時曾國藩已早歿，自不能望見丰采，然流風餘韻固猶盛傳於洞庭衡嶽間，且湘軍仍肩天下之重任，旌旗聲威正遠及天山南北，所謂「無湘不成軍」，尤爲三湘人士常引以自豪者。宋氏自幼即喜聞當時事，尤喜談兵，嘗嬉戲簿諸隣兒名氏，呼集山阿，樹巾爲旗幟，自登磐石上指揮部勒之(七)，是環境影響使之然也。

雖然，世變日亟，國難益殷，對於宋氏之新刺激亦更加甚焉。

二 講求時務注意新學

一八九四年夏，中日戰爭發生，湖南巡撫吳大澂亟募勇成軍，請纓赴前敵，三湘人士踴躍應徵，蓋仍湘軍經世救國之餘烈，足以鼓舞群倫也。不幸時移勢易，黃海一戰，中國既告失利，制海權遂入日人掌握，步卒無所用其技。翌年春，和議將成，時適會試之年，各省舉人集於北京者以萬數千計，深痛城下之盟，籲請遷都再戰，湖南廣東舉人同日先後上書陳詞，各省聞風響應，士氣爲之伸張。康有爲、梁啓超復致書上海汪穰卿，促其鼓動新任湖南學政江標在湘厲行新學，使其於按試時，非曾考經古者，不補弟子員，不取優等；而於經古一場，專取新學，其題目皆按時事：以此爲重心，則祿利之路，三年內，湖南可以不變矣；蓋梁啓超以爲十八省中，湖南人氣

最可用，惟其守舊之堅，亦過他省，若能幡然變之，則天下立變矣（八）。

以今按之，梁啓超之主張，江標實完全付諸行事，既於校經書院內設立輿地、算學、方言學會，刊佈湘學新報，一八九七年冬復梓行沅湘通藝錄八卷，以示風會之所趨；今試舉其書內容如：「問近日俄兵入朝鮮，幽國王，殺大臣，重改國政，中日兩國有何損益？」「歐洲諸國不許俄國出黑海論」「英人有公（自由）保（保守）二黨，中國將來是否有此氣象說？」「擬自造各種機器遏洋貨利權議」「有鐵路始可廣言開墾說」「魏氏海國圖誌近日應改應增條例」「說西洋之華民」「學新法須有次第不可太驟說」；固均梁氏所主張「皆按時事爲重心」者。而其作者如唐才常、畢永年、楊毓麟、鄒代藩、譚延闓、胡元倓等（九），此後均爲中國現代史上之重要份子，是此一新教育計劃影響之巨大可知矣。

方江標之督學湖南也，一八九六年六月，梁啓超、汪穰卿同創時務報（The Chinese Progress）出版於上海，譯述東西各國重要報刊，並著論剖析時事，指導國是；其後章炳麟、曾廣銓亦參與筆政。以是一冊風行，更見洛陽紙貴。湖南岳麓書院院長王先謙與城南求忠兩書院院長，公同商定，撥公款按月購置，並手諭生徒，細心閱讀此一「目前不可不看之書」（一〇）。一八九七年一月，王先謙又具呈湖南巡撫陳寶箴及提學使江標，請即設立時務學堂；當經陳、江允准，積極籌備，同年夏佈告：訂期九月廿四日招考學生——陳氏示諭有云：「海疆互市，內地之講求西

學者，湘人士實導其先，」「今洞庭衡嶽之間，蘊積日深，必有英奇魁傑，繼軌前修，出而任匡救之重，以圖報國家者！」「當此需材孔亟之際，諸生體驗時事，必能相與奮發；」「中國自強之基，諸生自立之道，舉莫先於此矣！」「須知此次迅獲實效，力矯從前虛應故事積習，庶於大局有裨！」（二）其寄望於斯學者如此，而特聘梁啓超主講席，尤足資號召。

三 湖南自立自保之主張

湖南時務學堂既開中國近代學校之嚆矢，梁啓超輩之所講授者尤啓發湘人革命之思想。蓋梁氏應聘赴湘之先曾在滬與康有爲、汪穰卿等集議：僉以中國各省，惟湖南地處腹裏，士氣振奮，苟及早修飭，或可自固；因商訂進行之宗旨，在採急進法，以澈底改革，洞開民智，鼓吹種族革命爲本位；故梁氏蒞校後之講授及批解學生劄記，非徒心醉民權之論，抑且有種族之感，革命之言，未嘗有諱也（三）。

雖然，此不過梁氏努力之一端耳，而其主要目標，固仍在促成湖南之自立自保，故蒞湘伊始，湖湘人士譚嗣同、唐才常輩組織南學會時，梁氏即樂爲之序，力言「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淵藪也，其可以強天下而保中國者莫湘人若也。今諸君子既發大願，先合南部諸省而講之，庶幾官與官接，官與士接，士與民接，省與省接，爲中國熱力之起點，而上下從茲其矩矱，學派從茲

其溝通，而數千年之古國或尙可以自立於天地間也。」（三）

其寄望於三湘人士者如此殷切；而德國進占膠州灣之消息遠播，列強瓜分中國之謠傳益甚，時事更形緊急，梁氏因復專函陳寶箴，痛論湖南自立自保之重要性及其步驟：

「今日非變法萬無可以圖存之理，而欲以變法之事望政府諸賢，南山可移，東海可涸，而法終不可得變……故爲今日計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後中國有一線之生路。

「所謂自立者，謂爲他日窮無復之時計耳，豈曰爲目前之言哉。而無事則整頓人才，興起地利，其於地方之責亦固應爾，而終不必有自立之一日，此豈非如天之福乎。脫有不幸，使乘輿播遷，而六飛有駐足之地；大統淪陷，而種類有倚恃之所，如是焉而已。

「大局之患已如燎眉，不欲湖南之自保則已耳；苟其欲之，則必使六十餘州縣之風氣同時並開，民智同時並啓，人才同時並成，如萬毫齊力，萬馬齊鳴，三年之內，議論悉變，庶幾有濟。」（四）

其時三湘紳民多已聞風興起，瀏陽算學館、湖南龍南致用學會、郴州學會、法律學會、衡州任學會、常德明達學會，先後成立，均以滌向來孤陋之習，儲當時濟變之才，本中國義理之學，參泰西富強之術爲主旨（五）。其中明達學會，距離宋氏鄉里不過百里，風聲所播，耳濡目染，對於宋氏思想之影響，應可想見。

不幸此一新情勢，不過曇花一現，旋因朝局之反覆（戊戌政變）而中斷，譚嗣同且以身殉其「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方有復興之望」之主張。兩年後，唐才常爲繼承死友遺志，推翻頑固守舊勢力，倡組自立軍，創自立新造之國，又不幸餉精缺乏功敗垂成。然先烈之血，主義之花，前仆後繼，屢敗屢戰，乃三湘人士之特性，湖南青年均因此一再之刺激，矢志與腐惡之勢力奮鬥到底（二六）；而清廷於八國聯軍之役以後，爲掩飾失敗，緩和民情，不得不下詔變法，以廢科舉、興學堂、派游學爲新政之起點，青年學子遂得優遊新天地中，觸目隨遇，無非震撼，思想之束縛大告解放，終以形成國民革命之主流。

四 湖南留日學生刊行遊學譯編

選派青年，留學外洋，曾國藩既首倡其事，陳寶箴在湘推行新學亦注意及此，曾擬招考留學戊戌學生一百人。尋以戊戌政變發生，致不果行。其後時務學堂助教學生及其他自費生，陸續東渡者約計六十餘人。而桃源、晃州、麻陽等地學生，且早於一八九八年九月到東京入大同學校，足見新政影響及於湖南邊僻州縣。逮一九〇二年，湖南官紳始選派公費生東渡，並將留日自費生之貧苦者亦悉化爲公費。已而湖北亦派西洋留學生三十名，東洋留學生五十人，其總數視一九〇一年且逾四倍。於是湘鄂兩省之官費學生，連鑣並轡，稱盛於一時，其中黃軫（興）、楊守仁、

楊度、胡元倓、陳潤霖、陳天華、劉揆一等，尤著名者也（二七）。

黃軫（興）、楊度既至東京，時與日本師友接觸，問學研討之餘，深感救國之道，必先有理論，而後有事實，有學術而後有政治；尤須破除過去定於一尊之學風，始能盡除保守濡滯之積習；而介紹東西洋自由之學說，尤爲開啓新機運之前提，因相與集議於一九〇二年十月創刊遊學譯編，其發刊主旨有云：

「我中國者以東洋文明之固有，而得老大之名；以西洋文明之將來，而得幼稚之名；乘此迎新送舊之時，而善用其老大與幼稚，則一變而爲地球上最少年之一國，夫豈難耶？同人之譯是編也，將爲扶持老大培植幼稚之助也。」

「居今日而言救國，其必一國之國民，人人自勵，人人自競，先使一身之學術，無一年無一月無一日無一時而不有其進步！」（二八）

因之，是刊以博採書報擇而譯述介紹新知爲原則，別其內容分爲學術、教育、軍事、實業、理財、內政、外交、歷史、地理、時論、新聞、小說十二類，而其揭示白話小說，足以喚起國民之精神，更可注意。其言曰：

「凡一國之語言文字，歧而爲二者，其國家之教育，人民之進化，必不能普遍於全國上下，而學人以爲經世著書之具，務求爲高雅閎博之詞，則文學反以阻國民之進步，故不獨

詞章家之以雕琢爲詩文，取悅一己而不求人知者之不足，則於一國之文學界也，即有心於當世者，亦以此計其功用之大小，而分其品次之高下焉。俄國學者特而斯特(Leo Nikolaevich Tolstoy)之論藝術也，分廣義與狹義，而小說與詩歌美術等，同在狹義之中；其總論曰：藝術者，使作者之感情傳染於人之最捷之具也，作者之主題當如何，則必以直接或間接向於人類同腔的結合而求其好果。以爲感情之用也，彼斯脫洛(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之爲世界大教育家也；以讀路索之也米兒(J.J. Rousseau: Emile)小說一書而成者也。親蔑翁之以女子稱雄于哲學界也，以有小說十餘種之傳播也，爲其有利於國民，即爲有用之文字，豈以體裁之大小而爲之區別乎？日本笹川種郎之言曰：歐洲及我國歷史，無不有小說戲曲之記載，而支那史獨否，自宋以前，並無完善之書，至元時始有特異之精彩，其前此之寂寥者何哉？蓋以此方思想，純在儒教勢力範圍之中，自儒者觀之，以爲文章者，經國之偉事，小說戲曲，敗壞風俗，何足算也，然如孔云亭之桃花扇，亦何嘗不本三百篇之旨？而斷以春秋之大義哉？由此論之：則我國民之不進化，文字障其亦一大原因也！夫小說文字之所以優者，爲其近於語言而能喚起國民之精神故耳，意大利之詩人當的(Dante Alighieri)編國語以教民族，日本維新之名儒福澤諭吉著書教人，必先令其妻讀之，有不解者，輒復更易，以求人人能讀，此皆小說之意也，豈能以作一字而能爲國民之全體謀公益者，則必不爲之乎？

然今日竟有意大利統一、日本振興之實效，則有謂二君不能列於文學界而稱爲名儒者，其國民能聽之否焉？我中國於前者已矣，自今以往，吾誠不知後事之如何？吾亦不知下回之當作何分解也？國民乎！其有以西遊記活潑不羈之自由主義，水滸傳慷慨義俠之平等主義，而爲三國演義競爭劇烈之獨立主義者乎？吾知他日小說家之爲新中國者，必以爲第一回之人物矣，是我民族之幸也。」（一九）

按一八九九年梁啓超即曾著論指陳政治小說之重要，一九〇二年秋又創刊新小說，力言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撰新中國未來記一篇，藉說部以宣傳其政見。惟其論列不若此之深刻，又未揭出中國語文歧分爲二之弊害，以及著名舊小說之政治意義。新小說內容亦非純粹通俗之白話，故以今論之，遊學譯編此一主張，當時實開先聲。陳天華之猛回頭、獅子吼本此原則而撰寫，用通俗之語句，表深入淺出之涵義，流行長江湘鄂一帶，予軍隊學生以極大影響，非偶然也。

五 民族主義之教育與湖南自治論

抑遊學譯編不僅爲中國各省留日學生團體之首創刊物，且其宣傳種族革命，政治革命之餘，提出革命進行之具體步驟，尤爲當時其他刊物所不備，固更值得注意者。遊學譯編第十冊（一九〇三年六月刊行）刊載之民族主義之教育一文有云：

「凡各國民族之鼓舞興起於革命之事業者，未有不由於教育之影響者也。」

「革命事業之起也，必有中堅。」

「支那民族經營革命之事業者，必以下等社會爲根據地，而以中等社會爲運動場，是故下等社會者，革命事業之中堅也；中等社會者，革命事業之前列也。故今日言革命教育者，必在兩等社會，此兩等社會之教育事業，不在家庭教育，不在學校教育，而在社會教育！是故言革命教育者惟有社會教育之可言也。對於中等社會教育之事業有四：一曰結集特別團體，二曰流通秘密之書報，三曰組織公共之機關，四曰鼓舞進取之風尚。」

「對於下等社會之教育有三：一曰與秘密社會爲伍，轉移其舊思想而注入之以新思想，轉移其舊手段，而注入之以新手段。二曰與勞動社會爲伍，改革其舊知識，而注入之以新知識，變易其舊習慣，而注入之以新習慣。三曰：與軍人社會爲伍，破壞其舊勢力而聳動之以新勢力，排斥其舊事功，而歆羨之以新事功。三者之妙用，存於兩方面：一曰結集通俗講演秘之會場，一曰流通通俗講演之文字。」

「支那之勞動社會，軍人社會，大半出入於秘密社會之間，而以軍人社會，勞動社會與密社會相爲援引，則自成不可拔之根據。」

其於中等社會下等社會革命教育之方案，蓋融合日人之理論及本國之經驗，要可謂鞭撻入裏

之論，宜乎其爲後此華興會革命活動策略之最高指導原則。而譯編第十二冊（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三日）刊載「湖南自治論」則更明顯揭示此一革命活動著手起步之所在。

湖南自治論以爲必須由三湘人士，由個人自治而至於府縣自治，而至於闔省自治；至於闔省自治，則基礎固矣。夫然後可以牛耳各省而與列強周旋於疆場壇坫之間。至所謂個人自治者，非僅爲宋儒之束身寡過已也，必擴充知識，養成進取之氣，而後能列於競爭劇烈之世界而屹然有以自存。

個人自治矣，然後可言府縣自治，所謂府縣自治者，即吾人恢復主人之地位，而不再倒其柄以授人也。此其爲言，非遠法成周秦漢，近師顧亭林郡縣論分疆析吏編，實採最近各國極美之制度。其大端有二：一曰監制官吏之行爲，一曰興革團體之利病。其具體步驟則於府縣分設民自治會，以鄉區之大小，定會員之多寡，選舉會長司事及代議士，執行評議調查之責，輕徭減賦，稽察收支，爲民除害，利莫大焉。然後繼之以全省自治，於省垣建省民自治會，大縣選舉會員三人，中縣選舉會員二人，小縣選舉會員一人組織之。分設六所：一曰學務提議所，二曰農務提議所，三曰工務提議所，四曰商務提議所，五曰營務提議所，六曰警務提議所。統此六端而稱爲提議者，疆臣尙有半主之權也；然提議云者，非僅議而已也，議經提出，則爲南山可移，此案不可易，必行後已；合一省以謀公利，興民權以平官權，自治之精詣，即在於斯。

今按其論列，富積極性及建設性，比之梁啓超自立自保之消極主張，顯有不同。然而當時湖南之環境則又較梁氏倡自立說時爲惡劣。蓋梁氏蒞湘時官紳一氣，頗有革故維新之意向，不幸戊戌政變，新舊兩派頓成水火，嚮者首倡時務學堂之王先謙等，今乃爲頑固守舊之重鎮，而湖南又紳權最大之區也。因之遊學譯編委婉諷勸之後，一九〇三年夏，楊守仁復隱名刊行新湖南一小冊，遍告湖南中等社會，以恥舊湖南人之甘爲奴者。慷慨激昂，痛論「湖南之公敵在官場巨紳，非隆隆炸彈，霍霍刀光，不足以驚其夢。……未來之湖南，猶樹也，溉之以頑官劣紳劬民瘁士之血而後生長焉。」因之力倡必以暴動之方式，破壞之精神臨之，始足以開闢新局面，組織獨立之機關，規劃獨立之地方自治；而欲達此破壞及建設之目的，則組織黨會，固其大前提。其言曰：

「今世立國於地球之上，不能無以黨會爲基礎也。」

「且夫以黨人各占其會黨之一部份，則會黨立；以會黨各占湖南之一部份，則湖南立。不能自占黨人之一部份，而欲新湖南者，猶各省不能占中國之一部份，而欲新中國也。日日而言，夕夕而夢之，豈有及哉？玩時愀日，不如起而自爲之！吾爲旁觀者，他人亦爲旁觀者，則徧數湖南人，而無一非旁觀者也。吾自爲之，他人亦自爲之者，可與他人合爲之，亦可與他人分而爲之，徧湖南人而自爲之，新湖南之成立，夫豈遠而？」

「在公共之中國中，必使各分省自任一部之位置，各分省發見其獨立之親和力，則中國

獨立矣！

「吾黨欲新中國必先新湖南。」

綜上所陳，可見此輩留日學生吸收新知融合國情，用功之勤，故能於革命運動之方案與步驟，綱舉目張，縝密如此。而彼等於刊行雜誌專著之外，又注意編譯中學小學教科書，以外洋新知灌輸鄉邦，對於湘鄂青年學子思想之啓發，尤足稱焉（三）。

六 武昌文普通中學堂與革命風潮

設學堂、派游學，爲一九〇一年以後清廷新政之基本。而湖廣總督張之洞則留心學務最早，辦學亦最認真，一八八九年蒞任之初，即創建兩湖書院，旋復添設自強、武備、將弁、農務、工藝各學堂。逮奉命各省書院改設學堂後，又復悉心將舊有者改併籌定新學堂規模，於一九〇二年十二月次第興辦：小學之上，於武昌分設文武普通中學堂各一所，再上則爲文武高等學堂及兩湖大學堂。開辦之初，張氏尤注意於普通中學堂，蓋小學所以教爲民之道，普通學堂所以教學爲士爲兵者之道，日本教育家苦口詳言，皆以普通學爲文武百事之基，普通學若稍有闕略含糊，則以後各種學術，皆事倍而功半也。當時文普通中學堂學額爲二百四十名，以湖南爲湖廣總督兼轄省分，故特准占額三十名。原訂日課八小時爲率，四年畢業（三）。而開辦之初，考錄諸生大率資

性聰穎，國文通暢，教授科學，領悟甚捷；極得之洞之贊賞（三三）。本書主人翁——宋教仁亦其中一份子焉。

蓋自一八九九年三月，宋氏始入漳江書院肄業，即不務章句而深思夙悟，講求經世致用之學，平日喜刑名法及輿地諸籍，往往別有會心，嘗與諸學友文駿等月夜登院東之漳江閣，縱談中西政治得失，關塞險阨及古今用兵勝敗。嘗謂：「中國苦滿政久矣，有英雄起，雄踞武昌，東扼九江，下江甯，北出武勝關，斷黃河鐵橋，西通蜀，南則取糧於湘，擊鄂督之頭於肘，然後可以得志於天下。」其居恒大言炎炎，好論列天下事類如此。人以是謂之狂生，不與近，然宋氏視之蔑如也（三四）。一九〇二年冬，武昌文普通中學堂招生，宋氏奉母命往考，與試得中。而途經長沙時，上書湖南巡撫：請改岳麓、城南、求忠三書院爲學堂，洋洋數千言，洞中利弊，當道納其議，湖南學堂規模從此奠立（三五），是宋氏初試啼聲，即已不同凡響。

方宋氏之負笈武昌，正值俄國陰謀吞併東三省之消息遠播，國內外學界怒潮澎湃。一九〇三年四月廿九日，留日學生決定組織義勇隊抗俄以爲國民倡。嗣因日本政府之干涉，改爲軍國民教育會，其精神則一毫不改，且公舉代表二人回國，請袁世凱主戰。北京大學堂及上海教育界均覆電贊成，並紛紛集會，擴大宣傳力量（三六）。湖北文高等學堂學生亦上書張之洞痛切陳詞：「請正告政府，弭患未然，將俄人背約之罪，布告萬國，聯和英日，以作後援，學生等願披甲執戈，以

一吐我椎心泣血之隱痛，一雪我四萬萬人同胞之大恥，雖飲俄人之刃，食俄人之彈而不恤也。」
(二七)宋氏肄業之文普通中學堂與此文高等學堂同設於武昌，其影響之深，要可想見。

抑不僅此，鄒容之名著「革命軍」亦於是時出版，一紙風行，青年學子，爭相傳閱；上海蘇報既刊出章炳麟介紹「革命軍」之文，復於社論中公開發吹「殺人主義」(二八)。且連續登載陳天華論文痛言亡種慘禍即在目前，必須人人認清不畏死之意義，矢志革命，方能死中求生，「諸君此際不爲同種人排外族，他日必爲異種人誅同族」(二九)。言詞激烈，各地學生更爲所動，是年六月廿一日，清廷命嚴拿倡言革命之學生，意圖以高壓手段鎮壓風潮，然大勢所趨已不可遏阻，留日學生各種刊物均廢光緒年號，直書黃帝紀元，黃興且早於六月初自日本回國，在湘鄂醞釀新行動矣。

先是，當留日學生，倡組抗俄義勇軍旋改爲軍國民教育會，黃興、陳天華等均參與其事，黃且被推爲歸國實行革命之第一人。故黃回抵武昌，即在文普通學堂演講滿漢畛域及改革國體政體之理由；與頑固守舊者辯論終日，卒使全場一致歎服。事聞於官府，總督張之洞遂傳命拿辦，然黃仍從容不迫，留連武漢八日，將所携鄒容革命軍、陳天華猛回頭二書，零星贈送予軍學各界後，始乘輪回湘(三〇)。

其時黃氏舊侶胡元倓等正創辦明德學堂，張繼、王正廷、蘇玄瑛(曼殊)等均執教其中，黃

至長沙亦應聘主講席，課餘則秘密進行革命活動（三）。至是年十一月華興會遂創立於長沙。

華興會之創立，蓋以湘鄂留日學生及各學堂學生為主體，其醞釀固已甚久，遊學譯編之所論列，即其理論之宣傳，意見之溝通，今則水到渠成，可以見諸行動矣。雖然黃氏處事固素沈毅慎重者，故華興會創立之日，黃被公舉為會長後，即首先提議：今不難取湘省為根據地，然使湘省首義，他省無起而應之者，則是以一隅敵天下，仍難直搗幽燕，驅除韃虜；故望諸同志，對於本省外省各界與有機緣者分途運動，俟有成效，再議發難與應援之策。於是會衆分門別類，各認職務，積極進行（三）。宋教仁旋回武昌，倡組科學補習所，即此種活動之一環。

七 科學補習所與華興會舉義之失敗

自黃興等發刊遊學譯編，介紹新思想新知識，啓發湘鄂青年之革命思想，實非淺鮮劉成禺、李書成、但燾等又在東京繼創湖北學生界雜誌，更擴大革命宣傳之聲勢，流傳湘漢間，軍學各界人士，尤多影響。湖廣總督張之洞曾因此禁止傳遞閱讀，並有電致東京召回湖北學生界之主筆。上海蘇報及東京江蘇雜誌具載其事，並著論說，譏刺張之洞之禁令為「介紹」。蓋因此一禁，銷數驟增數千份，今其後又不知增銷幾千份矣（三）。人心趨向如此。其中論列，遂膾炙人口，深中人心。所謂運動軍隊、鼓動民氣，為革命下手之方，尋且有人見諸行事矣。此即胡瑛、張難先等

親身加入行伍是。

胡瑛者，籍隸桃源，與宋教仁同鄉，嘗肄業湖南明德學堂，爲黃興弟子，因結黨暗殺劣紳王先謙未成，持黃興函走避武昌吳祿貞寓所，旋矢志投入湖北陸軍第八鎮工程營充兵士。其爲人年少英挺，善詞說，入伍後識張難先，兩人從此遂藉飯後休閒講演以激勵士兵。自黃興創立華興會後，乃使胡瑛及宋教仁在鄂計議速立機關準備響應，於是分途連絡軍學兩界同志，發起組織科學補習所，故意標明研究科學，以愚官府耳目，實則此爲武昌有革命運動機關之始。一九〇四年六月，舉行成立大會，公推湖北武高等學堂高才生呂大森爲所長，胡瑛爲總幹事，宋教仁任文書，各軍營各學堂均置幹事，分途運動，其中主要工作之一，即爲介紹新兵入伍。蓋會員劉敬安任職馬隊書記，如張之洞有招兵計劃，劉必先知，即轉胡瑛，用秘電招各地會黨來入伍，而在未正式入伍之先，必受科學補習所之秘約，矢志待機起義革命，光復漢族。因之湖北新軍中大半係科學補習所介紹之黨人。以是，一九一一年湖北新軍之起義革命，固非偶然，而當時辦理此事非常忙碌之劉敬安、胡瑛、宋教仁等功勞尤足多焉(三)。

科學補習所既成立，適值黃興自上海經武昌回湖南，科學補習所開會歡迎，黃提出華興會預定是年十一月十六日乘慈禧太后七十生辰起義計劃，當經一致表示贊同，並約定湖南發難，湖北響應，從此工作進行，益趨積極(三)。

按自一九〇〇年以後，中外報紙多公開著論，不滿慈禧之久攬政權，留學生刊物對之抨擊尤不遺餘力，如是年六月東京刊行之湖北學生界即以「太后糜費」爲題，指斥太后撥用一千萬兩作慶壽費之不當。其文有曰：「嗟呼！財政之虧絀，至中國而極矣，外則纍纍國債，需索日增；內則種種捐輸，民膏竭絕；稍有愛國思想者，必一絲一粟之不敢妄費，胡爲以皇皇巨款，不用之賠款？不用之恤民？徒爲一己行樂之費也！」由是以觀，湘鄂革命志士所以選定慈禧生辰起義，蓋不僅企圖乘文武官吏麤集之時，予以一網打盡，占據省會；抑更含有向中外公開表示：絕不與滿清最高統治者兩立之嚴正意義（三）。

先是，黃興、楊守仁留日時即主張暗殺清廷大吏，奪取要府以爲革命手段，嘗研究爆炸物十餘種。一九〇四年夏，黃回湘，楊即偕一同志由日携炸藥至北京，約張繼自湘至，何海樵自滬至，設機關於天津，謀炸內城宮殿及頤和園以震動天下人耳目，然潛居京城數月，無隙可乘，乃失意南歸，得知華興會在湘起義計劃，楊乃留滬，與章行嚴等密設愛國協會，以爲接濟，並結合留日各省同志，遙爲聲援（三）。

自華興會成立，黃興即思會衆多屬學界份子，恐與下層社會之哥老會黨衆或多隔閡，以劉揆一曾獲交哥老會大龍頭馬福益，因畀以聯絡會黨之責，另設一同仇會以支配之，使哥老會黨徒與華興會總部不相直接，藉防機密偶洩有礙大計也。哥老會衆繼加入同仇會者以萬計，黃氏因仿日

平將佐尉各級軍制編組爲革命軍旅，自任大將兼會長職權，劉揆一任中將掌理陸軍事務，馬福益任少將主會黨事務；旋復商訂乘慈禧壽辰起義計劃，並擬定長沙省城以武備學堂學生聯絡新舊各軍爲主動，會黨健兒副之；各縣方面則分瀏陽、衡陽、常德、岳州、寶慶五路以作響應，會黨健兒充隊伍，軍學界人任指揮，同時並推陳天華等遊說江西防營，周維楨等接洽四川會黨，楊守仁等注重上海南京遙相策應，而宋教仁則籌設武昌支部之餘，並擔任常德一路主持之責任（三）。

各方佈置日漸成熟，是年十月宋乃自武昌經長沙回常德，聚集同志，籌劃進行細目；嗣因餉糈缺乏，宋乃擬變賣家產以濟需用，又苦於急切難成，遂決定趕往長沙另籌款項，十一月五日舟抵長沙，宋氏登岸遍訪各約定處所，皆封門，寂無人跡；至黃興寓則閤者答：已出門十餘日未歸，不知何往？宋氏爲之茫然。以爲必有變故發生，信步街頭，突遇同志曹亞伯，曹君正驚宋氏之來臨也者，亟要宋氏至聖公會堂秘告：華興會舉義計劃不幸先期洩漏，致被官廳破獲，黃興等幸免脫，勸宋速避難他地，宋聞訊後頗鎮靜，初擬即回常德速行破壞，以牽制省中之勢，祇以款項缺乏，終不得不依曹之勸告附舟東下，以追蹤黃興（完）。

方舟行洞庭湖中，宋氏百感交集乃口占長歌一篇，其辭曰：「噫吁嘻！朕沅水流域之一漢人兮，愧手腕不靈；謀自由獨立於湖湘之一隅兮，事竟敗於垂成！虜騎遍於道路兮，購吾頭以千金；效古人欲殺身以成仁兮，恐徒死之無益，且慮繼起之乏人！負衣徒步而走兮，遂去此生斯長

斯歌斯哭斯之國門。嗟神州之久淪兮，盡天荆與地棘，展支那圖以大索兮，無一寸完全乾淨漢族自由之土地！披髮長嘯而四顧兮，悵悵乎如何逝，則欲完我神聖之主義兮，亦惟有重展！」（四〇）其心情與抱負盡活躍於紙上。

十一月十六日，宋氏行抵武昌適值慈禧生辰，市街懸燈結綵，家家戶戶龍旂招展，各營弁兵皆裝束齊整，滿街梭巡，以防華興會起事。宋氏觸景生情，益增感慨，嗣遇胡瑛及文普通學堂同學，始悉科學補習所亦已被查封。宋氏知不可久留，遂乘輪赴上海，十一月二十一日到達。遍訪同志又不得，嗣晤劉揆一、覃振始悉由於萬福華暗殺王之春事件，黃興、張繼、章行嚴等均被牽連入獄，而官府追捕黨羽甚亟，「幾亦不能藏身」。宋氏因之有東渡扶桑之計，經十餘日之籌劃，友人之資助，十二月四日，遂乘輪啓行，適值楊守仁、楊度亦同舟共濟，十二月十二日，安抵東京，昔日同學田桐等，聞訊來迓，殷殷話舊，倍增欣快，宋氏之新生活亦從此開始（四一）。

第一章 附註

- （一）宋漁父第一集插圖「追悼大會寫真」一。陶菊隱六君子傳（一九四七年中華書局印行）頁一〇四。
- （二）章氏叢書檢論卷八第二十二頁「對二宋」。「二十世紀之支那」第一期時評欄載宋氏手撰「嗚呼湖南與端方」有云：「自曾國藩、左宗棠而後，湖南民氣蓋稍稍動焉；近年以來蓋方動焉。」其文成

於宋氏蒞日本之初，早於章氏檢論所記載，合而觀之可見宋氏受會、左影響之深。

(三)孟森清代史第三二二、三二三頁。

(四)中和月刊第二卷第一期第三頁「道光學術」。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P.47

Chang Mu. P. 425 Ku Yen-Wu.

(五)章氏叢書檢論卷九「近思」第二十五頁。

(六)太炎文錄續編卷二上第十頁「書曾刻船山遺書後」。吳相湘「近代史論叢」第一冊「趙烈文能靜居日記之史料價值」引錄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三日(July 24, 1867)曾國藩與趙烈文談話預見一統局面已呈剖分之象。

(七)宋教仁我之歷史第一冊馮為鎰撰傳第一頁。

(八)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上冊第二十七頁。

(九)沅湘通藝錄卷首目錄。

(一〇)時務報第十八冊，光緒二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Feb.22.1897)刊行。

(一一)知新報第四十冊，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Nov. 14, 1897)刊行。

(一二)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四十二—四十四。

(一三)同上書頁四十四、四十五。飲冰室文集(一九三六年中華版)第二冊頁六四——六六。

(二四)覺迷要錄卷四第二十六—二十九頁。

(二五)譚人鳳「牌詞」首頁，自承其思想感觸於時務報者不少，「梁啟超啓惕國人之功非淺，惟惜其未始終一貫」，可見三湘人士對梁之觀感。胡適「藏暉室劄記」卷二第一二二頁，以爲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黃興豈能成功如此之速？亦可見當時留學生之客觀批評。各學會之設立見知新報第四十三冊、第五十六冊，湘學報第二十八冊、第三十冊。

(二六)二十世紀之支那第一期時評宋教仁撰「嗚呼湖南與端方」文有云：「唐才常一役根據地在漢口，而原動力則在湖南，去歲甲辰（一九〇四年）湖南學生與會黨合謀發難以出長江，雖皆不成，要爲湖南人反對滿族之萌芽。」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民立報第六頁刊載黃興九月十六日出席北京湖南同鄉公會致詞有云：「中國革命湖南最先，戊戌之役有譚嗣同，庚子之役有唐才常，其後有馬福益、禹之謨；又如陳天華、楊篤生；所死之情形雖異，所死之目的則無不同，兄弟繼諸先烈後奔走革命，實無他，破壞黑暗專制，躋我五族同胞於平等之地位而已。」又一「中山出世後六十年大事記」（半粟即李劍農編）第七九、八〇頁有云：「戊戌（一八九八年）政變前，以譚嗣同爲湘人，湘人士多受其影響……譚嗣同之被害實予湘中青年一大刺激。庚子（一九〇〇年）唐才常謀起事於漢口不成。唐才常亦湘人，又與湘中青年一大刺激。譚嗣同之仁學尤爲激動湘人之強烈劑，黃興會爲兩湖書院生，受譚唐二人之影響，感於庚子聯軍之恥，悟清廷絕不足與有爲，乃蓄實行革命

之志。」綜此可見，三湘人士反抗滿清革命之淵源。

(七)遊學譯編第二冊「湖南編譯社叙」、第四冊「致湖南青年勸遊學外洋書」。浙江潮第七期，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二十二日蘇報「學界風潮」載湖南多派學生之由及湖南新派出洋遊學生名單。遊學譯編第十冊刊有「湖南同鄉留學日本題名」第十二冊有題名補錄，詳載姓名別號到日本年月官費或自費入何學校已否回國。

(八)據遊學譯編是文乃楊度撰，第二冊末頁刊出各欄譯員表如教育出自黃軫（董塢）即黃興之筆名。

(九)遊學譯編第一冊叙。

(一〇)猛回頭、警世鐘諸書流傳之廣，影響之深遠，可於張文襄公全集卷一〇五第三十六、三十七頁載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初三日(Dec. 9. 1904)通飭各屬查禁逆書札見之；時已在華興會湘鄂起義計劃失敗以後矣。

(一一)據遊學譯編原註：「此篇據日本高材世雄所論而增益之」。惟何者爲日人原意，何者爲譯述者之意未分別註出。

(一二)漢聲（湖北學生界改名）六月份刊載遊學譯編第十二冊廣告及「謹告代派處及閱者」有云：「期年之間銷行頗鉅。」遊學譯編刊載廣告內有「國家學」、「史學原論」書及中小學教科書及小學教員應用書與中學教科問答體小叢書，此種教科書相湘家有藏本幼年曾見之。

(三)張文襄公全集卷五十七「籌定學堂規模次第興辦摺」，清德宗實錄卷五〇七第八頁a。

(四)張文襄公全集卷七十一「請獎各學堂畢業生及管理員教員摺」(光緒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Sept. 5. 1907)。

(五)宋教仁「我之歷史」第一冊文駿朱玉叙馮爲鑒撰傳。

(六)民立報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第十一頁刊載羅潤璋撰「宋母萬太夫人七秩壽叙」。

(七)湖北學生界第四期留學紀錄欄第八—十五頁「學生軍緣起」第五期「軍國民教育會之組織」。江蘇

第二期「軍國民教育會集捐啓」。亦見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青年會與拒俄義勇隊」、「東京軍國

民教育會」條。

(八)一九〇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蘇報第三頁。

(九)一九〇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蘇報。

(一〇)蘇報一九〇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第三頁「敬告湖南人」，又同年五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論湖南官報之腐敗」，又同年六月十四日「覆湖南同學諸君書」。按此數文均不見於今行世之陳天華集。

(一一)劉揆一黃興傳記(一九五二年臺北版)頁一、二。

(一二)錢无咎編纂明德校史(一九四七年長沙刊本)頁一、二，同書附錄第十二頁—十六頁載中國前任駐德大使陳介「明德話舊」，記其親身見聞，黃興在明德秘密製造炸彈情形。相湘爲明德學堂畢業生，

在校時曾親聞胡元倓先生等氏歷歷言其詳情。

(三)黃興傳記第三頁。

(四)蘇報一九〇三年三月三十日第三版時事要聞欄「湖北訊」，又同報同年四月十一日時事要聞欄「電召學生」。浙江潮第六期時評。江蘇第二期第一百四十頁。

(五)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五五。武昌革命真史前編自叙頁二、三。

(六)湖北革命之錄第五頁。

(七)同年九月東京刊行之浙江潮第八期所聞錄「那拉氏之借款慶壽」條，有云：「那拉氏一淫賤老嫗耳，在中國爲公敵，在滿洲爲亡國妖孽，惟自娛之是圖。」痛罵之餘又云：「我不自愛，人豈愛我，我忘其爲我則人將侮我，託家產於人，望其善爲保持而愛護者未有不傾蕩我之家產者也。自有我在，我自理之可也，何必謀之人。」其鼓吹倒滿革命如此激烈，足見清廷壓抑已不可得矣。

(八)革命逸史第二集第一二六頁。文史雜誌（一九四一年一月重慶刊行）第一卷第五期章行嚴「初出湘」詩註。

(九)黃興傳記第四頁。

(十)我之歷史一、二頁。武昌革命真史前編第一章。

(十一)我之歷史二頁。

宋教仁：中國民主憲政的先驅

(四) 我之歷史四——七頁。

第二章 日本六年

宋氏既抵東京，席不暇暖，即有意創刊一雜誌，以爲革命運動之宣傳；蓋彼深知欲挽救國家之危難，非先造成強有力之輿論不可，而雜誌者則促民德民智民力之進步，啓發與引導國民之思想，使由言論進於實行，然後對內足以組織完全之國家，對外足以禦列強之吞噬也。因之，宋氏乃遍訪湘鄂舊友於旅邸，既獲贊同。一九〇五年一月三日即舉行發起人會，宋氏詳陳創刊旨意後，頗有人以爲不如刊行小說報者，經會衆再三辯難，卒決定用雜誌體例，旋且訂名二十世紀之支那。宋氏爲徵求社員、收集股金、約人撰稿、洽商印刷，四處奔走，倍形辛勞；然在再三數月，迄因財力不足，遲遲未能出版；其後陳天華又因意見不合（詳見下節），辭編輯責任，會衆皆爲短氣，甚至有主張立即解散者；幸宋氏堅苦支持，奔走聯絡之外，又自撰文稿多件，至六月

二十四日二十世紀之支那第一期出版發行（二），宋氏復親爲包捲郵寄國內各處或分派書店代售，忙碌異常，然精神上釋一重負則大感愉快。

一 二十世紀之支那與醒獅

二十世紀之支那發刊之趣意，以倡導倫理的愛國觀念國民教育爲宗旨。按其全冊文字幾有四分之一係宋氏所撰，其中最重要者即漢族侵略史一文，蓋爲糾正泰西日本所謂中國民族歷史乃服從、退守、無遠略之弱勢民族歷史而發（三）。因之強調指陳：「一民族所以集合而能立國於天地間者，其原素雖複雜，而其主要則不外乎排外之主義與夫進取之政策而已矣；吾當日祖若宗之性質之狀態，蓋即兼斯二者而生存而傳嬗而競爭而膨脹者也！」「其以視歐人今日之所謂民族帝國主義者何遽不克逮耶？」是以宋氏認爲提倡民族主義與夫復仇主義，如其大聲疾呼空談理論，或旁徵博引外國獨立之歷史，不若檢視本國之歷史，舉吾先民之事實，以祖若宗之流風遺烈示之，較爲親切動人，所以入之者深，而感之者得其道。因之，漢族侵略史專述漢族歷代以兵力征服外族或有其國或略其地或降其人之事實；其有外族來侵入而我族或抵禦之或戰勝之或恢復之者，雖占優勢而與侵略主義無關係均不采入，其體例如此，消極的糾正外國之謬論以外，喚醒與發揚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要爲其積極之意義。而二十世紀之支那發刊之趣意又已再三指陳：「在今

日情勢，排外之心不可無，而排外之暴動不可有。」且極斥拳匪行動之無知。是其意向之所在，固不容人之誤解也。抑漢族侵略史所陳最值得注意者，即宋氏正式公開提出黃帝即位之年爲漢族開國紀元之主張。

緣國內學人早有悟及以帝王稱號紀元之非者，乃相率欲采用新紀元。康有爲輩則因目睹各國沿用耶穌紀元者多，其信仰之虔誠，以及因而產生之偉大力量至足重視，故亟欲崇敬孔子，尊爲國教，且首倡以孔子誕生之歲紀年，藉以振醒國民精神。而革命黨人亦持不用滿清正朔爲第一義，因有以天運甲子紀年者；有採黃帝生年爲紀元者，有以西周共和紀元者，有以皇漢民族亡國幾百年紀年者，紛紛紜紜，莫衷一是。宋氏有鑒及此，深以紀年之事乃當時革命運動之簡明號召，且爲將來革命成功建國授時之準繩，非一學說一思想可以雜陳者比，必當以歷史上最普通最可信者提倡之，因詳細研究當時新創各種紀年說之得失，並綜合參稽國內外學者一般之見解後，以爲用唐堯孔子紀元，與民族主義無大關係，至以黃帝生年爲紀元之說，則太古草昧，卒難確當，且黃帝乃君主，非教主可例，故不如以其即位之年爲紀元。因之鄭重提出此一主張：以西曆一九〇五年爲黃帝即位紀元之四千六百零三年。旋即爲若干人所接受，各省留學生刊物版權頁之出版年月即采其說以紀年（三）。

按二十世紀之支那出版，上距宋氏初蒞日本不過半年。再細按宋氏我之歷史日記其讀書撰文

情形，則若干文字撰成多在蒞日後二三月間。故以今論之，其所表達之思想與觀念，要可謂宋氏在國內求學時代之國學基礎與間接吸收外洋知識之結晶，而宋氏於二十世紀之支那時事欄列舉之中外大事，以加黑色圈者表示確知時日，加白圈者表示不知時日，此爲當時國人主辦其他雜誌所無之創例，尤足表現其謹於求真多聞闕疑之態度。然則有此一冊，宋氏頭腦之縝密、組織之才能，有具體表徵矣。

抑宋氏不僅於民族問題表現如此明決之態度，其於國內政治問題尤顯示確定不移之立場，換言之：即彼堅持澈底破壞排滿革命運動而絲毫無所游移。

前已言之，梁啓超之種族革命言論對於湖湘青年之思想與行動實有啓發作用，然而一九〇三年以後，梁氏竟完全放棄其所倡導之破壞主義與革命排滿主張（四），轉采保皇立憲之說，新民叢報及上海時報等騰揚其文字，與革命派之報刊論戰，對於國人自亦不能無其影響（五）。湖南革命志士逃亡日本，痛起義計劃之挫敗，傷國家之多難，憂憤過甚趨於消沈者頗不乏人，殆熱心過激失望亦愈甚也，例如陳天華即深悔輕於發難之非，以爲利用會黨不足成大事，必須中等社會皆知革命主義，且逐漸普及下等社會，始可着手；否則，「恐未足以救中國而轉以亂中國也」（六）。一九〇五年一月陳氏遂發奇想，散發救亡意見書於留學界，主張專倚賴滿清政府對外對內政策，且謂即將北上呈文清廷，請願實行君主立憲，並乘機潛佈黨人勢力於政界，以期有所活動，別闢途

徑。幸宋氏聞訊，亟與黃興、劉揆一等召集湖南同鄉會「實行干涉主義」，極力反對要求清廷之說，而主張繼續進行各省獨立自治之計劃，會衆一致贊成。宋氏復與黃興同至陳氏處舉行特別談判，指陳有與梁啟超會晤及通訊之事實，責其有改變宗旨受保皇黨運動之嫌疑，辯論良久，至陳應允取消原議而後止(七)。其擇善固執推己及人之精神如此。逮二十世紀之支那創刊，宋氏於所撰時評「雖設學部亦何益耶」一文中，復強調指出學部之設，不過清廷企圖用束縛之手段，以完全之奴隸教育普及於國民已耳；「我國民其尙日望政府之維新變法以自強乎」？同年八月傳聞清相譚延闓準備立憲(八)，宋氏更撰「西太后之憲政談」刊載於高天梅主編之醒獅雜誌(九)，揭露清廷必不能實行立憲，即能行之亦必非真正立憲，不過一時懷柔政策耳：「嗚呼！吾漢人猶有日夜希冀滿政府之和平改革者，其亦不可以已乎」！旗幟鮮明立場堅定若此，宜乎各省革命同志爭與廷(身二〇)，終以形成中國革命同盟會之主幹。

二 中國革命同盟會之成立

中國革命同盟會之成立，乃中國現代各地革命份子——興中會、光復會、華興會會員第一次大團結。由於此一重大行動，遂使中華民國之思想廣播於神州大陸(二一)，終以促進中國國民革命走向成功之坦途。其事之關係重要也如此，然以今論之，則一九〇三年以後中國留日學生之逐漸

覺悟，實爲此一運動肇其端且促其成之主要因素，而打破省界地域觀念之呼籲，更爲此一覺悟之先導。

蓋中國以農業社會之傳統，素重鄉情，京師及各省省垣之各省州縣會館林立，即其具體表現之一。一九〇一年後各省選派學生東遊，此種現象亦出現於日本，旅日各省同鄉會出版刊物，又均以省名，如江蘇、浙江潮、湖北學生界等是。門戶攸分，旗幟鮮明。蓋自省界之說起，而國界種界反退處於若隱若現似有似無之間（三）。

此種現象顯爲極不合理及不正常者，然在重鄉誼之舊傳統與推行地方自治之新號召下，竟愈演愈烈，同鄉會此疆彼界與日俱增，浙江留學生最多而氣最盛，廣西雲南江西人甚寥寥，惴惴顧影，惟孤立是懼。因之消息傳播，頗使國內志士戚焉心憂，咸以「地圖瓜分着色之筆，不操之於六七野心帝國，而操之於留學界諸君矣」。逮一九〇三年四月浙江潮第三期刊出「寓江西陳君致浙江同鄉會書」及「非省界」之社論，始正式面對此一問題，大聲疾呼各省留日學生必須破除省界——但力言破除省界，決不可因噎廢食，並同鄉會而去之，且亦不可以流血斷脰爭也；惟有拔各省同鄉會之精華而建爲「中國本部統一會」，專爲中央統治機關，要求各省省會會員月集一次，或由各會員設立中央雜誌部、本國全體調查部、海外教育部（如豫備學校之類），並製定愛國歌曲，集會日同歌，以提高破除省界注重國界之趣味（三）。

當浙江潮第三期之刊行也，正值留日各省學生集會倡組抗俄義勇隊之際，廣大之民族國家意識自易戰勝窄小之省區地域觀念於一時；而是年五月出版之湖北學生界第五期封面刊名橫額下即有「自六月份改名漢聲」八字。廢狹隘之省區稱號，另取揚大漢天聲之佳名，自是有意義之舉動，且封底頁又出現「大湖南北同盟會」之書刊廣告，要可謂「非省界」之呼聲已有迅速與具體反應（一四）。

抑留日湖北學生雖贊成破除省界之主張，然而並不同意一步即可促成中國本部統一之見解，蓋是年八月出版之漢聲七八月份合刊本論說欄有「論中國合羣當自地方自治始」一文，力言「未有無各部之團體而能有最大統一之團體者」；「由小羣而進爲大羣，此今強國之所以優勝也；比例而觀，則中國之所以致弱，與今日之所以圖強，可以知其道矣」。其意以爲就中國大勢觀察，黃河以北長城以內，黃河以南長江以北，長江以南盡於邊疆，以及川陝連爲高原，均可分別成爲自治區域；「由此而聯爲一最大之團體，而後其地方之根基固，而後其國家之根基固」。由是以言，「大湖南北同盟會」之命名涵義與其動向可知矣。

以今按之，「同盟」一辭早見之於左傳孟子，固國人所熟知。而一九〇〇年九月日本政治界人士爲統一輿論對抗俄國，維持東亞大局，特組織國民同盟會。對於中國人之影響，尤值得注意（一五）。一九〇三年三四月間江蘇常熟等地出現之中國教學同盟分會，以組織學界同盟建立國民同

盟之基礎爲宗旨(二六)，殆爲「同盟會」名稱與組織最早見於國內者。而同年五月三十日及三十一日上海蘇報以留日歸國學生鄒容發起創立中國學生同盟會，要求海內外全體學生入會，特用「論中國學生同盟會之發起」爲題連續著論極力鼓吹，激勵學生奮起同襄盛舉。此與大湖南北同盟會之廣告出現東京書刊，前後相距不過一月，相互之間或有若干關係。蓋按之宋教仁撰「程家樞革命大事略」言：程與劉成禺等在東京「力爲聯合革命之說，日以益振」(二七)。所謂「聯合革命」即組織同盟共同行動之意，而劉成禺則湖北學生界(漢聲)編輯人之一與鄒容之居留日本固在同一時間。

惟極爲不幸者，當此一運動正待展開之初，即召致清廷強大之壓力(二八)，致使各省留日學生回國有所圖謀者均頗難措手，「聯合革命」之方式一時尤不易實行。窮通達變，遵循分地集會殊途同歸之旨，遂爲時勢所必需。光復會、華興會乃由是興起(二九)。兩會之名稱與活動範圍不盡相同，但華興會進行湘鄂起義計劃，曾預先通知光復會約期並舉(三〇)。同時中山先生盱衡大勢，更認定當務之急，乃在聯合海內外學界，以統一之組織、顯明之綱領、共同之行動，方足以成中國革命之大業。由是東西奔走，極力鼓吹，促使四方協同之認識與精神普遍於海內外學界(三一)。

基於此一背景，故自華興會舉義不成，各地志士先後亡命日本，檢討過去，瞻望未來，設立統一會黨以爲革命中堅之主張，更爲多數留學生所體認。而以設會之名奉之中山先生，尤見衆望

之所歸(三)。宋教仁、程家樺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爲當時留日學界唯一具有全國性名稱與內容之刊物。且其後即改名民報，爲同盟會之機關報。故以今論之，謂爲中國革命統一組織之先驅可無愧也。

二十世紀之支那之地位如此，宋氏本身又如上節所指陳隱然爲留學生之重鎮，因之，一九〇五年七月，中山先生自歐東來日本行程確定後，孫之日本友人宮崎寅藏特挽程家樺約晤宋，面告孫氏志業，擬介紹宋與相識，並願陪同宋訪晤日本民黨領袖犬養毅。蓋宮崎深佩宋經世救國之懷抱，亟盼其能交結中日偉人相與合力(三)。

一九〇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宋應中山先生約晤於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社，此爲兩人第一次見面(時孫年四十歲，宋二十四歲)。據宋氏日記是日談話主旨，着重聯合各省人才擔負革命建設工作之重要性(三)。蓋孫氏年來爲此多方奔走鼓吹，頗見效果。歐洲留學生已在孫氏號召下結成統一團體(三)，故亟盼中國留學生最多地區之日本亦迅速出現相同組織。

先是，中山先生蒞日之初，亦曾約晤黃興，正式表示聯合華興會之意願，黃當允考慮。然會衆頗有持異議者。七月二十九日，黃因召集會議正式提出討論，當有三種不同意見：①陳天華主張：華興會與孫聯合。②黃興主張：形式上加盟於孫之組織，而精神上仍保存華興會之特點。③劉揆一反對與孫合作。宋氏則以爲既有入會與不入會兩種意見，先當研究將來入會者與不入會者

之關係如何，而後定計。不幸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最後遂決定一切悉聽個人自由（三六）。宋及黃興、陳天華等早經響應中山先生號召，七月三十日因如約參加中國革命同盟會之籌備會議。旋爲擴大宣傳，八月九日，宋又與二十世紀之支那社同人發起留日學生歡迎中山先生大會，十三日，正式舉行歡迎會，宋氏擔任主席並致歡迎詞，與會學生六七百人，室爲之塞，而後來者猶絡繹不絕，擁擠戶外者又千餘人。宋、孫演說時，會衆皆拍手大喝采，情緒之熱烈由是可見。宮崎寅藏即席致詞謂：「昔年孫君來此，表同情者僅余等數輩耳，中國人士則避之唯恐不速，今見諸君寄同情於孫君如此，實堪爲中國慶慰。」（三七）蓋可見時會之轉移留學生覺悟之實況矣。

八月二十日，中國革命同盟會舉行正式成立大會於東京，加盟者三百餘人，通過總章後即推選總理與執行、評議、司法三部職員：中山先生被推爲總理，宋則被推爲司法部檢事。會衆旋又接受黃興提議將二十世紀之支那作爲機關報（三八）。是宋氏之努力已獲得朋儕之欣賞與信任。

於此應特別指陳者，即中國革命同盟會命名之由來是也。蓋一九〇五年春，中山先生在歐洲號召留學生組織革命團體，祇通稱革命黨三字，並未確定此團體之專名。逮東京集會後，始正式揭示會名曰中國革命同盟會（三九），此中原因安在？

以今論之，大湖南北同盟會之歷史與華興會之聲勢，要爲具有決定性影響之重要力量。蓋按之上述，劉成禺、程家樞等不僅爲「聯合革命」之首倡者，且爲始終推動其事最力者。宋及黃興

則華興會之主要人物又爲當時留日學界之中心，此與留歐學界僅具單純學生身份者大不相同，中山先生蒞日後既着重與宋、黃思想之溝通，並處處尊重其領導地位與意見（三），正所以藉資號召。至同盟會成立之日出席加盟者又以湘鄂兩省人士占大多數（三），此輩左右會議之力量，觀乎同盟會總章第五條與黃興意見幾全相同可知也。因之，實至名歸，錫此佳名，一以顯陣容之雄偉浩大，一以保個體之歷史淵源，固兩全之道也（三）。

三 革命建設基礎在高深學養

同盟會既決定接收二十世紀之支那作爲機關報，八月二十七日，宋氏因將一切文卷正式移交該會庶務幹事黃興。時值該刊第二期出版，正擬交郵分發；日本政府竟以其中時論「日本政客之經營中國談」一文，觸其侵略隱衷，強加以妨害公安罪，派警勒令沒收；宋再三辯駁，終無效果，因擬在香港重印發行，以示不爲威武所屈，各省學生頗多予以支持。但同盟會以甫告成立，不欲持排外主義，啓日人嫌忌，遂決定機關報不用二十世紀之支那原名，一切關係表面概與斷絕。旋經定名民報，仍推宋任庶務幹事兼撰述員，常川駐社經理一切（三）。而於第一號出版時，揭示「本雜誌之主義」：「一、主張中日兩國國民的連合。一、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三）此與二十世紀之支那之倡導愛國主義者大不相同，宜乎宋之日本友人亦謂宋等革命動

機乃理想之國家的愛國運動，中山先生之領導革命則爲國際的，以接受外邦及外人之援助爲正當，故易得世人之了解（三三）。

其時，中國留日學生總數約八千餘人，加入同盟會者不過四百餘人，其餘多隸各省同鄉會，而統屬於中國總會館，故同盟會欲擴大聲勢，展開工作，對留學生之宣傳與領導，顯爲重要之大前提。九月十日，宋氏經湖南西路同鄉會選舉爲中國總會館評議員（三六），遂具有公開領導留學生活動之合法地位。但未及正式就職，即面臨一最緊要之難題，即如何應付日本政府留學生之取締規則。規則則是也。

蓋自樸茨茅斯條約，日人自俄手攫得我東北土地主權消息傳播，我留日學生即奔走呼號喚起國人注意，並電清廷堅持勿許；因之，深中日政府之疑忌，乃日夜謀所以箝制範圍留學生，使之毫無敢動作。於是報紙傳出將有取締清韓學生規則之頒佈，經我留學生向公使館請願質問日外務省，初猶否認，但十一月二日日政府卒正式宣佈關於許中國學生入學之公私立學校規程，明令自翌年一月一日實施。至是中國留學生之情緒遂由悶損而激昂，既憤日人之侵害自由侮辱國體，復不滿意留學生總會館要求公使館轉向日本政府改正或解釋之緩慢措施，遂未經總會館及各省同鄉會，逕由各學校之同窗會發動停課退學，以示抗議之決心。不三日，日本各地學校之中國留學生均一致響應，合八千人而爲一氣，蓋自有留日學生以來，團體之碩大整齊未有如此者。而最值

得大書特書者，即停課後一日，人心洶洶幾陷於無政府之狀態，幸宋氏與胡瑛、楊卓林等運用靈敏之手腕，發起組設一聯合會，並立即發布自治規則，除相戒不許上課以外，並不許入飲食店、公園、勸工場等公共場所，以免意外事端，且置糾察員若干人，分布各區糾察違犯規則者。整齊嚴肅，絕無一毫亂暴現象，雖日人亦爲之起敬(三)。

不幸問題尙未著落，忽有陳天華投海殉國之慘耗，陳遺書自言最初即爲反對停課之人，又有「取締問題可了則了萬勿固執」之語，然全體學生熱情却因此復陡增數倍，時聯合會仍持由公使與日政府交涉取消之政策，而公使自言交涉數次不允取消，且有指定日期令即上課之語，於是人心益加激昂，舍相率歸國無他計矣。未幾，中國留學生總會館新職員(宋亦其中之一人)正式接事，亦集中心力籌劃歸國以後事宜，秋瑾、姚宏業等數百人則首先就道，其餘因輪船艙位有限，不得不有以待之。時日稍久，忍辱負重維持現狀仍留日本之主張乘機抬頭，保皇派健將梁啟超又發表「記東京學界公憤事件並述余之意見」於新民叢報，乃戚戚焉憂激進之將挫敗，而亟亟焉謀退守之可以保全，留學生意志自不免有動搖者。同盟會亟採取對策。蓋運動發生之初，同盟會並未取一致之決議，惟多數傾向宋等激進之主張，對於倡言忍耐維持意見之胡漢民等極致不滿。今則兩派均體認不當以尋常學生之意氣而犧牲革命之利益，致使團體分裂或根本動搖，因舉行各省代表會，多數通過於一九〇六年一月十五日復課(三)。宋等乃於一月十三日宣佈解散聯合會，蓋

「此次風潮前固可主張力爭，但現已無可如何，於情於理於勢，皆不可久持」也。同人尙有不以爲然者，宋不之顧，但旋被公推執筆編纂此次運動之始末（三九），以結束此一大風潮。

以今論之，此次運動，實乃同盟會成立後內部團結是否堅固之首次考驗，亦同盟會與保皇派爭取留學生領導權之第一回合（四〇）；宋氏能始終把握主動，擒縱得宜，遂使幾瀕破裂之局勢仍復圓滿，保皇派亦無所施其技倆，是「其非徒有破壞力且有建設力」也（四一）。

抑此一運動發生前後，宋氏志趣亦有一大轉變，即放棄習陸軍改肄法政是也。緣彼自幼即好爲兵戲，蒞日之初，目睹國人習陸軍者甚衆，程家樞等又嘗與日人平山周等倡議組織速成陸軍，宋氏因此大感興趣，爲鍛鍊體魄預爲準備計，一九〇五年三月十日，特入學日本體育會習徒手操及兵式操，旋復報名學習馬術，四月七日，「始爲有生以來乘馬之第一次」（宋日記語）。六月十日又報名入日本法政大學聽講——雖然，此非執干戈之志業，有何動搖，不過速成陸軍計劃一時未成已耳。逮同盟會成立，所謂革命破壞前之建設，破壞後之建設，均需要高深學養之人才之論調，洋溢人耳，宋氏才氣素爲世重，湖南同鄉會又以湘西官費額予之，使能安心完成高深學業，因之，友人多勸其改變初衷，專習法政，宋初不接納；嗣幾經辯論，始被說服。留學生抗議運動既結束，一九〇六年二月一日乃更名宋鍊正式入學早稻田大學留學生部預科。

當宋氏決心向學也，曾辭卸民報庶務幹事及撰述員，每日刻苦力學，尤注意日文、英文工具

之學。七月二十日，學校舉行卒業式後，又與劉揆一等同習英文，以備投考高等學校而入帝國大學。然以文名太盛，留學界有重要文字，輒以屬之，宋嘗欲婉却而不能。蓋其譯筆之信達雅，久爲同人所推許，其譯述稿酬又足以補革命活動費用一部份也；故日人宮崎寅藏撰孫逸仙傳（即三十三年之落花夢）發行漢譯本，即倩宋爲之增刪潤飾。中山先生亦嘗有口述法國小說，由宋轉爲華言之計劃。楊守仁隨清廷出洋考察憲政大臣至東京，又以譯述各國政治制度要覽委之。每日課餘，宋因此輒埋頭書齋中，涉獵廣泛，運用純熟，人文社會學科與英日語文日趨精進，而以文會友，交遊益廣，尤爲重要之收穫。

餘杭章炳麟，素以恃才傲物聞世者，於人尤少許可；然一九〇六年七月與宋在東京初次晤面，甫通姓名即懇談哲學研究之法，組設國學講習會又聘宋主講宋明理學與文法，宋遜謝不敏，章仍再三致意，從此往復問學或煮酒論英雄（四二），終成莫逆之交。其後章氏於宋之才學頌揚不遺餘力，武昌首義後且公開宣言推許宋氏出任國務總理（四三）。若非宋長才實學，曷克感動章氏如此？他如楊度、章行嚴同屬湘人，然均非同盟會會員，而與宋過從密切，共同之學問興趣，實爲其中聯繫（四四）。即梁啓超亦因見民報刊載宋之文字，託人致意願與相見（四五）。此或爲梁之分化策略，然梁何以不施之他人，而以宋爲目標？蓋亦以有爭取之最高價值也。由是以言，一九〇六年以後之刻苦力學，於宋氏平生志業之關係重要可知。

四 遊說馬俠與間島問題

宋氏志業高遠，雅不願以文名世，局限於筆硯間，故潛心政治法律諸學科外，每日尤注意研讀王陽明、曾國藩、顏元、李塋諸家之書(四)，蓋不僅修身養性而已，實欲身體力行經世之學，以救國建國，尋且創立經世學社以明其志(五)。而親至遼東遊說馬俠參加革命，則力學實踐知行合一之初試。

緣宋氏素嗜歷史地理之學，閱讀書報更有隨時摘記之習慣，東渡日本前後，正值日俄戰爭，中外報紙頗多有關東北紀事，宋氏瀏覽之餘，尤注意馬俠問題。蓋此乃俄人闖入我國境肆行掠殺後，東北居民相與團結屯聚以保衛身家之一種組織也。宋氏以其事甚奇其心甚苦，深表同情，對日俄戰時兩國以金錢分別籠絡駕馭分化馬俠之技倆，尤極憤激。二十世紀之支那創刊時，因特撰「二十世紀之梁山泊」一文，鼓勵馬俠認識自由獨立之意義以抗俄倒滿。逮樸茨茅斯條約以後，日人來往於我東北者甚衆，旅行紀事時見於報刊，一九〇六年五月五日，宋在書肆購得商業界雜誌一冊，歸而讀之，見其中有一「鴨綠江源之獨立國」一篇，記鴨綠江、圖門江、松花江源之處，形成一獨立國曰間島地方與日本之九州島等，其地富於礦產、林產、人參等，十餘年前被山東人韓登舉占據，清兵時來攻之，不克；遂訂約每年納款二十萬金於清盛京官吏。由是，宋氏於馬俠

之外又知有間島及韓登舉，益觸動其好奇心。其後閱讀書報，輒注意搜求，彙集既多，相互比對，傳聞異辭之處不一而足。因決心作進一步研討，且致函各書刊著者詢其究竟（四八）。

一九〇六年秋，黃興自香港南洋等地聯絡各地團體事畢，重來東京，宋既聆悉其經歷情形，深感其冒險心激進心太甚，將來恐有孤注之勢；欲稍勸說之而不果。九月二十五日，因以運動韓登舉之三策進，其意謂：韓之勢力甚鞏固，若往運動之或有效——其效視運動者之目的如何而可分爲三理想：最高則握其權，興教育、整實業、練陸軍、行招徠、講外交，以圖遠大，此須有大才而能持久者方可行之；其次則謀占據其地之實業權，殖產興業以得經濟上之富裕，此亦須有實業家才而能持久者方可行之；其下則直往遊說其貢獻多金以資接濟，此則不須歲月，祇一辯士足矣。黃氏聞之，「亦有動意」，當囑宋作一書以記其事，宋恐爲矯滑之徒所乘，不願公開發表，然自後向日本人士探詢其人地更不遺餘力，蓋已萌親身探查之念，故預作一切準備（四九）。

其時，正值湖南江西邊境革命軍興起，聲勢浩大，同盟會會員多自日本趕往參加，黃興亦再赴香港有所圖謀，宋被推代理同盟會庶務幹事（此一職務權責均甚大，相當於今之秘書長或執行長）與中山先生同居東京策劃一切。不幸其後消息傳來，革命軍功敗垂成。一九〇七年二月十五日，黃興遄返東京，遂決計請宋即赴遼東聯絡馬俠，以爲革命運動開闢一新基地。當經幾度商討，三月六日，宋遂訂月內登程。

大計既定，宋即開始籌措川資，計無所出，擬預支留學月費或以月費簿據向銀行抵押貸款，但奔走數日，毫無結果，適遇二十世紀之支那舊友白楚香手有存款並願同行，一切因得解決。而黃興又告以俄國革命黨亦欲在東三省有所運動，須吾人爲之經營，不日當往橫濱與之商議(五〇)，遂益顯示此行之重要性。

三月廿三日，宋與日人古河(曾在東北馬俠群中甚久)乘火車發東京，二十五日，車抵馬關，即換乘輪舟渡海至門司，會合白楚香同乘船直駛安東，四月一日，安全到達，三日即僱專差送信大孤山馬俠、李逢春等，申述專程前來聯絡共圖大舉之意：

「若統集遼河東西、黑水南北之義軍，合爲一團，共舉大事，豈官軍所能敵者？西渡山海關，則永平不守，南出喜峯口則北京告危，大舉以爲革命之事莫便於此！

「僕等向在南方經營大業，號召黨徒已不下數十萬衆，欲扶義興師久矣。而山川隔絕，去京絕遠，欲爲割據之事則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則難；視公等所處之地，形勢不及遠矣。欲與公等通好，南北交攻，共圖大舉，特遣某某等躬詣戎幕，商議機宜。其訓練士卒編制軍隊皆所諳曉，有足備公等之顧問者。」(五一)

按自第九世紀以降，中國之歷史說明：能控制東北即能問鼎中原，其戰略政略價值如此。同盟會今注意及之，且擬「南北交攻，共圖大舉」，要可謂能把握重點矣。四月八日，大孤山信差

回安東，李逢春邀宋上山面談，適古河友人三好信太郎來訪，大孤山商人也，談及山中近情，宋因與結伴即日啓行。

其後，李逢春均贊成同盟會宗旨，願一致行動。宋即組織同盟會遼東支部，以爲灌輸主義主持革命之中心機構。夏五月，聞廣東惠州舉義之訊，原擬同時發動，先占遼瀋，再逼榆關，以窺北京。不幸礮廠招兵，消息洩漏，白楚香且被捕，全部計劃均被破壞，宋見大勢已去，無法挽回，亟變裝乃走日本(五)。

遼東舉義之計，雖未成功，然宋氏因親履其地，益認識此政略戰略要地之價值，故重至日本後，有暇即往各大圖書館搜求有關著作綜合研究。一九〇七年秋，中日「間島」交涉發生，宋氏遂又得展其長才。

「間島」者，位於圖門江之北，今延吉附近，與朝鮮接壤之中國領土，自清初嚴封禁之令，地廣人稀，遂漸變荒蕪，韓人多有乘隙越國界開墾者，因名其地曰墾土(Kentu)，訛訛爲間島(Kantao)，而清廷迄未措意。一九〇五年冬，日本既淪朝鮮爲其保護國，復謀取得此越界私墾之土地，以便進一步進窺吉林、黑龍江。一九〇七年七月，日本朝鮮統監府，於其地駐兵設立派出所，清廷抗議無效，於是原爲中韓間之問題，乃一變而爲中日間之交涉。

以今論之，間島問題始則胎其源於清廷之放任，終則綜其滙於日本之越俎代庖，要亦利用清

廷於邊地向未注意之弱點也。故交涉初起，清廷與民間雖憤激，然苦無以擊破日本之陰謀（五四），幸宋氏致力東北史地研究有年，且曾在日本帝國圖書館發現朝鮮王室編纂確言間島乃中國領土之書籍數種，睹日人之無理要索，因亟就見聞編纂間島問題一書，綜合中日韓各種資料證明此乃中國領土，論據堅強不可顛破（五五）。書成之後，某日本學者即肆其如簧之舌，勸宋將版權讓售日本政府，藉以所得補革命活動之費用，且力言不應以此書稿郵寄北京，協助不共戴天之清廷解決難題，言詭而辯，頗聳動人心。宋初似陷於進退維谷之境，然卒決然以書稿郵寄直隸總督袁世凱。袁得書後曾電約宋歸國襄助交涉，宋以在日經營事多，未予應允。然其後清廷據此而有所措手，挫折日人之妄計。世凱甚德之，交涉結束後特電駐日使臣酬以日金二千圓，宋不肯受，使臣固強之，宋乃以散之留日困乏者，聲名從此大著，同志中或有猜忌讒誣謂其賣黨交結清吏者，日本官憲更以此視宋若密探，時加迫害，內外夾攻，然宋怡然自得，蓋此舉不僅爲祖國保全土地，且中國革命黨人之愛國自尊心亦因此顯著於世，日本人中之「屬邦觀之援助論」者對我革命之態度亦不得不重加考慮（五六）。

宋氏於「間島問題」指陳：日人之謀間島，實欲占據此北滿洲之後門，以便進一步囊括東北全部：

「使滿洲全土而悉入於日本也，是日本獨占優勝之地位，而破均勢之局也，各國其不能

默爾而息明矣。張牙舞爪，紛至沓來，以共逐中原之鹿，噫！禹域雖大，尙有吾人噉飯之所乎？他日讀誰生厲階至今爲梗之詩，恐不能不追懷間島問題耳。」（五）

吾人若一覆按「九一八事變」之導火線，以及其後各種事實之相沿相生，中國以及舉世均爲之震動，擾攘不安，重讀上文，誠不勝感慨系之也。

五 同盟會之悲歡離合

間島問題既暫告段落，同盟會內部意見之參商則日趨顯著，如何肆應其間，遂又成爲宋氏必須面對之難題。

自同盟會成立，宋氏即以服從多數決議爲前提（六）。一九〇七年一月，出任庶務幹事，處理重要事務，更唯孫總理之馬首是瞻（七）。其後孫與黃興因國旗問題發生意見衝突，黃憤而表示擬退出同盟會，宋亦爲之氣沮，遂堅辭庶務幹事（八），專注於遼東之行。不幸鎩羽而歸，憤鬱之餘，又值章炳麟、譚人鳳等反對中山先生接受日本朝野餽金之風潮（九），遂使宋之意氣更甚。

黃、章、譚等之反對中山先生，淺見者或以爲門戶之見取予之辨，實則此乃雙方思想傾向上之根本差異有以致之。蓋孫先生自幼直接受西洋教育，又數次遊歷歐美，熟習其文化歷史，於法蘭西、美利堅之革命獨立運動深得外力援助之教訓有感於心；其進行國民革命更始終以美利堅爲

理想模範，以是彼於接受外援不僅認爲正當且努力以爭取之。反之，黃興等均於國內接受教育，負笈扶桑爲時甚暫，所發現者則日本之國民精神存於國家民族主義，倡導革命時遂全部接受此一教訓（見第一章第五節），而發動革命之導火線則俄軍之久踞東北也。因之，其最初動機毋寧謂爲排外，至後始以建設完全國家主義爲目標。故孫、黃兩人在思想傾向上自始即有不可越過之鴻溝，一九〇五年同盟會之成立，要爲大敵當前雙方相忍相讓之結果。逮一九〇六年七月章炳麟自上海出獄到日本，接辦民報，鼓吹單純之國粹復古主義，與胡漢民、汪精衛在民報之持論大不相同。於是各個人之思想色彩逐漸鮮明，均希望各向所覺悟之目標邁進，而物合終必分離之現象遂以發生（三）。

抑同盟會之成立，亦知識份子將擔負遠較下層社會分子爲重要責任之一種表徵，然同盟會會員能完全喻其意者不多。一九〇七年春，焦達峯、孫堯卿（即孫武）、張百祥等即倡組一共進會，完全仿照綠林開山立堂辦法，以冀固結一有實力之團體。時黃興正於役越南，及遄返東京，力言不可反文明而復野蠻，堅持反對；然焦等意志已決，卒印刷章程條例奮勵進行於內地，其在南洋者尤極端反對中山先生，由是同盟會呈現裂痕，幾至解體（三）。

宋氏所受教育同於黃、章，思想傾向亦多接近，由間島問題發生後之言行觀之，其與黃、章采取同一行動方向，要爲極自然之事理。惟黃之個性尙寬洪，雖因國旗問題不愜於中山先生，然

於各處義軍之起仍與一致行動，宋則一往直前，無復返顧，故黃、宋之間自此亦多齟齬，賴章炳麟調護之(六四)。

一九〇八年一月，章炳麟、吳敬恒因上海蘇報案宿怨，於東京民報及巴黎新世紀報展開筆戰(六五)。是年八月，民報被日本政府查封，章與陶成章又投稿他報並散發傳單攻擊中山先生。新世紀報更數爲長文以駁斥(六六)。革命黨人相互詬罵如此，各地革命軍又屢起屢仆，迄少成功，遂使親者痛仇者快，意志薄弱者如劉光漢等且多投向清吏以自娛(六七)。

其時黃興目擊心傷，特邀集各省分會會長商議，冀重組一機關展開活動，經與會者同意分攤經費，用勤學舍名義組成一俱樂部性質之機構，於聯絡情感鼓舞人心，頗具效果。然維持不過半年即因各方熱心減退，不願按時繳費，遂告解散(六八)。而汪精衛即於是時由南洋經日本前往北京，決行暗殺之舉，申言振醒黨魂(六九)。

一九一〇年二月，黃興運動廣州新軍失敗。四月，汪精衛在北京謀炸清攝政王不成。消息傳去益令黨人氣短。時宋氏居留東京，意念消極，譚人鳳極力慰勉之。六月十五日，中山先生聞桂太郎入閣訊，潛與黃興到日本，旋趙聲相繼至，譚因把握機會奔走各方，以冀重振黨務，但孫、宋晤談兩次，均不歡而散。孫旋即離日。於是譚等遂決計按同盟會總章國內分五支部之規定，籌組中部同盟會，以長江流域爲活動地點，蓋亦不免憤而獨樹一幟(七〇)。

原則既定，譚遂奔走各方溝通意志。經費缺乏，則宋氏忍痛讓售比較財政學譯本版權於僑商林某以濟之。一九一〇年多，宋、譚先後回至上海（七），實地籌劃，中國革命史上之新頁，遂從此展開。

第二章 附註

（一）據二十世紀之支那第一期封底作「開國紀元四六〇三年（一九〇五）四月二十日印刷，五月一日發行」，但我之歷史第二冊第二十三頁明言六月二十四日出版，今從之。蓋「五月一日」不過付印時預計印刷時所寫記也。有關此一雜誌籌備及宋氏所撰篇名具見我之歷史第二冊一—二十三頁。又據載當時美國舊金山大同日報及日本書報屢有關於此雜誌由宋主辦即將出版之報導，可見當時此舉之引人注意。

（三）十七八世紀時天主教耶穌會會士向歐洲介紹中國文化與歷史地理時着重其優點與精義。此於中西文化交流貢獻至大，自後各國漢學家亦多循此方向繼續發展。十九世紀後半，情形略有轉變，尤以日本學人在其軍閥力求推行大陸政策之前提下，更專事發掘中國弱點，著為書刊。一九三二年以後「滿洲國」與汪精衛政權之出現，殆可謂日人研究清太宗與聖祖之成果。不幸近年以來，美國學人對於中國研究仍利用此種作品。宋氏當時注意及此實非無故。

(三)宋氏除於此提出其主張外，且曾着手編撰「中國之新紀年」一書以申其說，雖因赴遼東運動馬俠，中途輟筆，全稿未成。然就我之歷史觀之，宋氏於此涉獵中日書籍廣泛且與黃節、劉光漢等往復討論，功力湛深。

(四)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一六五、一九一頁。

(五)如譚人鳳牌詞即自承閱讀新民叢報，感觸良多。

(六)陳星台(天華)絕命書中語，全文見民報第二期，或武昌革命真史上冊第二十九頁。

(七)我之歷史第二冊第四一六頁。革命逸史第二集第一三〇頁。陳星台絕命書及宋教仁跋。此跋末署「莠齋」乃宋之筆名，武昌革命真史上冊第三十四頁誤作「強齋」，因之，同書第三十三頁亦誤作黃興，其他各書均沿此誤。日文東洋史研究第十七卷第三號第三四四頁亦然。

(八)一九〇五年八月詔派端方、載澤等五人出洋考察憲政，蓋因革命風潮甚亟，清廷乃僞言立憲，冀愚弄一時耳目，據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上冊第二〇五頁載：梁啓超事先與端方等書札往返頻繁，梁曾代若輩草考察憲政，奏請立憲，請定國是一類奏摺逾二十餘萬言。

(九)醒獅第一期封底原未印有出版年月，祇鈐一紫色戳記作「黃帝紀元四三九七年九月一日發行」。第三期則印刷有「乙巳年十一月五日出生」字樣，即一九〇五年也。原書編輯者作「李曇」。但宋我之歷史第二冊第二十九頁明言高天梅創辦。今從之。(辛亥革命第八冊六四六頁所云失考)。宋文

刊於醒獅第一期第一二五、一二六頁，原未署名，今據我之歷史第二冊第三十頁知爲宋撰。

(二)據我之歷史日記其所交遊者，除湘鄂舊友或同鄉以及二十世紀之支那社員以外，並參加秋瑾（璿卿）女士主持之演說練習會與白話報，擔任撰述歷史地理理論說時論四門，與蔡元培、張繼、馮自由等往返或通訊亦頻繁。

(二)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見總理全書（臺北版）之二，第一七三、一七四頁，又總理全書之七「演講」上册第三二二頁有「中華民國之意義」。

(三)浙江潮第三期第一三—三二頁（一九〇三年四月十七日東京初版）。

(三)浙江潮第三期。

(四)「大湖南北同盟會」之組織，屬秘密性質者，故未見有關詳細記載。其成立當在此處所刊廣告出現之前，即一九〇三年四月以前也。至一九〇三年十二月日本出版書刊尙見其譯著廣告，是其活動時間當甚久且著有成績。又漢聲六月份（湖北學生界改名後第一期）有「漢聲」一文揭示命名之意義，錄之以推見其抱負。文有云：

「亞洲以外，有土地非白人之所領者乎？無有也。中國之內，有位置如武漢之足重者乎？無有也。其所居者爲競爭之中點，故其所任者爲世界之重心，過去歷史之名譽，惟此邦人克保之，未來世界之主人，亦此邦人實尸之。吾得發大聲以警告曰：使世界亡國滅種之風潮，活

靜屏息，波瀾不驚者，乃大漢人種之天職，而使中國久立於被征服者之地位，不早勵奮霆擊以至墜前人之光烈，墮世界之平和者，凡居於江漢之滸之吾人，厥宜首職其咎。」

(二五)日本國民同盟會編纂國民同盟會始末一書，一九〇三年六月(光緒二十九年五月)，有杭州通志學社印行之楊毓麟中譯本，其序有云：「讀是書者，回顧既往，軫念方人，稍有人心，能無浹背。」

(二六)蘇報一九〇三年四月四日刊載「中國教學同盟總章」及「分會聯合擬章」，末註：「再同人擬公舉會員與上海教育會訂立分會專章以期推廣教育，俟有成效再行宣佈。」同報同年四月六日刊載常熟分會章程，會址會期均詳列，可知其已成立。

(二七)宋撰程家樞大事略，國史館館刊第一卷第三號(第七〇頁)迻錄全文，並有馮自由補述注釋。又國史館館刊創刊號(第五五頁)劉成禺：先總理舊德錄載其與程倡議組織留學生事。

(二八)是時國內外抗俄倒滿革命之聲瀾漫，一九〇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清廷命嚴拏倡言革命學生。二十九日，章炳麟在上海被捕，七月一日，鄒容向上海巡捕房自首，七月七日蘇報被查封，愛國學社亦解散。

(二九)光復會成立時期說者不一，但就革命逸史第五集第六二頁推之似在一九〇三年孟春，核之國父批牘墨跡第九四頁汪德淵上孫中山先生函，開宗明義即曰：「當癸卯(一九〇三年)春間，德淵與蔡子民君方立光復會於滬，未幾張溥泉(繼)、鄒慰丹(容)二君自日本來奔。」更可論定。宋撰程家

檀大事略謂：「黃興畢業歸國，爰以上海之軍國民教育分會，改爲愛國學社。說者謂湖南之華興會、安徽之武毅會、浙江之光復會，皆由是而出，其時爲民國紀元前之十年也。」此與革命逸史第五集第六一、六二頁記載軍民教育會會員紛紛歸國，企圖軍事進行，組織機關部者相符。要可證知華興、光復兩會之所由發生。惟宋文謂「民國紀元前十年」，實誤書，蓋黃興歸國在民國紀元前九年（一九〇三年）六月也。又愛國學社應爲愛國協會之誤，宋殆混兩者爲一矣。

（二）革命逸史第五集第五六頁。

（三）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劉成禺先總理舊德錄（國史館館刊創刊號第四七頁、五五頁）。朱和中歐洲同盟會記實（革命文獻第二輯第一一五——一二七頁）。

（三）宋撰程家樸革命大事略（國史館館刊第一卷第三號第七〇頁）。

（三）我之歷史第二冊第二十六頁。國父年譜初稿上册第一四五頁有孫致宮崎寅藏書告到達日本日期，不見於總理全書，乃新自日本發現者。由此可推想宮崎於留日學生情況必常有報告寄孫也。

（四）我之歷史第二冊第二七、二八頁。

（五）國父年譜初稿上册第一四〇——一四三頁。

（六）我之歷史第二冊第二十八頁。

（七）我之歷史第二冊第二十八、二十九頁、三十頁。民報第一號第七十四頁，此爲留學界公開歡迎革命

黨魁之第一次（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第一九六頁）。宋氏擔任主席，其在留學界之地位可以想見。支那革命軍談第一一七、一一八頁記述相同，並謂參加活動者官費學生自費學生均有，所謂「官費革命」為當時流行甚盛之語。

（二六）我之歷史第二冊第三十一頁。按同盟會成立時日及情形，一九二八年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刊行時，未能確言。一九三〇年十月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今改名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始首先指出：「宋教仁的日記（即我之歷史）所載最為可信。」然其後田桐於太平雜誌第一期「革命閒話」又有不同記載。一九四三年二月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刊行時，因要求舊時同志再提出文證。逮一九四八年八月，馮自由於國史館館刊第一卷第三號正式指陳：「經余多年考證，則認為宋漁父（教仁）日記所述為準確。」從此遂論定。惟鄧嗣禹譯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英譯本第二〇三頁，忽畧宋日記原為陽曆，將「八月二十日」折算陽曆為「九月十八日」，誤矣。日文支那最近大事年表第三〇一頁及日本外交年表（昭和三十年外務省編纂）上卷第一五九頁均只泛言「一九〇五年八月，中國同盟會成立。一九六〇年八月相湘在東京日本外務省查閱當時檔案亦未見有關之報告文件，可見此一秘密組織成立於日本，日本朝野固不能確言其事也。至宋教仁被推為司法部檢察，明見於我之歷史第二冊第三十三頁。革命逸史第二集第一五一頁同。鄒魯黨史稿第四十二頁作「檢察長」。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卷第一九六頁作「程家驥、宋教仁等為交際」。中華民國

革命建國史第二卷第十頁亦作「交際」。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第一〇六頁及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冊第二三九頁亦作「交際」。以今考之，「任交際」之說，均誤。又二十世紀之支那改作機關報之決議，在日本政府查扣該刊之前，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第一九六頁記載有誤。

(二)國父年譜初稿上冊第一四一頁。支那革命軍談第一一九、一二〇頁載：同盟會成立後即將所決議印刷分寄十八省及英美法德留學生間以取聯繫，歐洲各地同盟會之組織均惟東京馬首是瞻，前乎此要可謂無此觀念。

(三)我之歷史第二冊第二十八—三十一頁載：一九〇五年七月三十日舉行籌備會時係由黃興「宣告今日開會原所以結會，即請各人簽名云，乃皆簽名於一紙訖。」又八月二十日「是日爲□□□□會成立開會發佈章程之期，二時開會，黃慶午（興）宣讀章程。」均可想見當時情形，而最可注意者即同盟會總章第五條：「凡國人所立各會黨，其宗旨與本會相同，願聯爲一體者，概認爲同盟會會員，但各繳入會捐一元，一律發給會員憑據。」（鄒魯黨史稿第三十七頁，革命文獻第二輯第九十八頁）與黃興主張「形式上入孫逸仙會而精神上仍存吾團體」（我之歷史第二冊第二十八頁），若合符節。

(三)此據革命文獻第二輯（第十八—七七頁）刊載「中國同盟會成立初期（乙巳、丙午兩年）之會員名冊」中乙巳年七八月加盟人數計算，湘鄂兩省人數多於廣東籍者幾一倍。

(三)「同盟會」之意義，以現今通行詞句釋之，即「聯合陣線」，其總章第五條於此指陳極明確。鄒魯黨史稿（第一頁）云：「自同盟會至中國國民黨，每易名稱，均有正式宣佈，而興中會與同盟會遞嬗之間，則闕然，且其精神雖一貫，而形式則同盟會殆為創立者。」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一四六、一四七頁）亦云：「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五年間興中會實無如何之軍事行動可言。」「一九〇五年春夏間尙保全相當勢力者，為湖北之日知會及湖南之華興會、江浙皖之光復會。」綜合以觀，益可知當時同盟會重心之所在。

(三)我之歷史第三冊第一——十頁。據胡漢民自傳（革命文獻第三輯第一六頁）稱民報定名，係中山先生採納胡之意見。又云：「以張繼長於日語，能對日人交涉，故用其名為發行人，張始終未嘗問民報編輯事。」第一號刊行於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廿六日。至一九〇六年七月第六號發行人始易章炳麟。M. B. Jansen: *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 p.119 於其創刊時期及主持人均誤。支那最近大事年表（第三〇一頁）作一九〇六年六月發行者亦誤。

(三)民報第三號有胡漢民撰「民報之六大主義」長文，出版時間在中國留日學生反對日文本部省取締規則之風潮以後，其用意顯在向日本朝野解釋，以免嫌忌而妨害同盟會之秘密活動與民報之公開發行。

(三)北一輝支那革命外史（日文本）第五六一—五七頁。中譯本第三十一頁。

(三)我之歷史第二冊第三十五頁

(三)中國之新民(梁啟超)「記東京學界公憤事並述余之意見」(新民叢報第三年第二十三號)。胡漢民自傳(革命文獻第三輯)。我之歷史第三冊第一—四頁。獨立蒼茫子(楊幼炯言：即湖南仇鰲)：東京學界公憤始末告鄉人父老興學書(辛亥革命第二冊第二一七—二二九頁)。國史館館刊第一卷第三號七四頁。

(六)同上，梁文及胡漢民自傳。獨立蒼茫子文。

(元)我之歷史第三冊第三頁。

(四〇)胡漢民自傳。新民叢報於此事發生後曾數著「論民氣」等文並論陳天華自殺事，頗有分化之用意。

(四二)同上，梁文對聯合會主持人之評語。

(四三)我之歷史第三冊。章氏叢書檢論卷八「對二宋」諸篇。

(四四)民國報第二號(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章太炎宣言：「至於建置內閣，僕則首推宋君教仁，堪爲宰輔，觀其智略有餘，而小心謹慎，能知政事大體，雖未及子房文終，亦伯仲於房杜。昔在東方嘗以江左夷吾相許，今其成效粲然，卒爲功首，猶復勞心綜覈，受善若虛，上宰之任，不患無人矣。」其後章氏自訂年譜於此亦有敘述，可見其對宋才學印象之深。

(四四)我之歷史記與楊、章往返甚頻繁。

(四五)我之歷史第六冊第三頁。

(四六)我之歷史第三、四冊記述其讀書摘記情形甚詳。

(四七)經世學社成立時日不詳，惟據湖北革命知之錄（一七九頁）：「庚戌（一九一〇年）十月，日京同志集經世學社商討回國起兵地點。」是其組織必已甚早。同年宋譯日文財政學，書脊印有經世學社譯，版權頁又作經世學社宋教仁譯。

(四八)我之歷史第三冊第三十頁，第四冊第二十三頁、三十一頁、三十三頁、三十七頁載寄書滿洲地誌著者守田利遠等。

(四九)我之歷史第四冊第三十四頁，第五冊第十三、十四頁載得守田利遠復書，未能滿意，惟有自身旅行，親歷其境。十七、十八頁載與日人萱野長知、平山周、池亨吉諸人談馬賊事。

(五〇)國父年譜初稿上册第一六六—一七〇頁。我之歷史第六冊第一、二、八、九、十一、十三、十四、十五頁。

(五一)我之歷史第六冊第十一—十九頁。我之歷史至此終。

(五二)我之歷史第六冊第十九頁文駿注。革命先烈傳記第四〇頁。

(五三)宋著間島問題於，一九〇八年以宋鍊名由上海某書肆印行。孟森曾書弁言於篇首。（東方雜誌第五年第五期：吳祿貞調查延吉邊務報告書叙言按語）。錢維驥撰延吉邊務報告跋謂：「綬卿（吳之別號）在日本，於朝鮮頗有研究，又新得宋教仁所著間島問題一書，故能源源本本，詳言其故，卒之

折衝樽俎，使日人退讓。」（武昌革命真史中冊第二三七—二四〇頁）。此一上海印本，今未得見。據地學雜誌第五年第四號（一九一四年刊）「間島問題」文首張煥按語謂其「舛駁甚多。迄問題解決，宋氏擬加更正，易名中韓疆界考，志未竟而身先殞，稿紙散逸余書篋中，幾至盈寸，追憶往事，多不幸言中之處，爰按遺文，略爲序次。」本書即據地學雜誌。（其後建國月刊第十五卷第一—四期曾轉載其全文）

（四）關於清廷應付情形，大清德宗實錄光緒三十三年八月丙子以後錄有諛摺甚多。徐世昌：東三省政略四十冊邊務居首，延吉篇又居邊務類之首，足見其重要性。至民間之東方雜誌第五年份及神州日報中國日報多有記載評論。

（五）北一輝支那革命外史第五九—六〇頁。中譯本第三二、三三頁。

（六）同上書，又宋漁父第一集後篇「遺事」第一、二頁。

（七）地學雜誌第七年第三期（一九〇八年）日本民黨領袖犬養毅曾指責「日本之措置，在萬事誤其本末」「若一朝支那闔國與敵，有百間島將奈之何」（東亞月報第一號第五七、五八頁）欲求疏通中日兩國情感。實則犬養毅亦不過肆其分化策略耳。（如獨立周報第三十四期紀事欄載：熊希齡等通電即揭穿犬養毅利用革命肆行分化之陰謀）

（八）如留日學生反對日本取締規則事件，宋之態度初極激進，終主調停即服從同盟會之決議。

(五)我之歷史第六冊第一——九頁載：宋每日與孫晤談，一九〇七年一月十日，梁啟超要求民報與新民叢報互相停止攻擊，章炳麟頗表贊同，宋商之中山先生及胡漢民均不以為然。遂作罷。見我之歷史第六冊第三頁及章炳麟自定年譜光緒三十二年條。惟章譜謂「克強不許」，實誤。蓋黃當時固不在東京也。

(六)我之歷史第六冊第十二頁，孫、黃有關國旗問題爭執，各家記載均謂黃以青天白日旗與日本旭日旗相近，故反對之。胡漢民自傳及章炳麟自定年譜並謂黃欲用井字徽幟，惟馮自由始終以井字大紅旗乃廖恩煦（仲凱）提議（天鐸報：一九一三年四月十四日第五版，革命逸史初集第二十一頁，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續編上卷第二十八頁）。以今考之，馮說為是。蓋廖仲愷為堅信井田制最力之人，且陳炯明於一九一一年舉兵惠州時，即曾採用也。

(六二)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第二〇一、二〇二頁，於此事記述甚詳。

(六三)北一輝支那革命外史第四三——五〇頁，中譯本第二一一——二六頁於此論述甚詳，可謂持平之論。

(六四)革命逸史第二集第二八一頁，第五集第二〇四頁。譚人鳳牌詞。

(六五)章炳麟自定譜光緒三十四年條。

(六六)民報第十九號太炎覆吳敬恒書。

新世紀第四十四號吳敬恒答章炳麟書。

宋教仁：中國民主憲政的先驅

六四

民報第二十一號太炎排滿平議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

新世紀第五十七號燃料（吳敬恒）書排滿平議後，書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後。

民報第二十二號太炎再覆吳敬恒書。

新世紀第六十三號吳敬恒再答章炳麟書。

民報：第二十四號太炎規新世紀。

雙方針鋒相對，恍如民報之與新民叢報，實大可惜事。民國成立後，章氏叢書刊行時收錄右列若干文字，故吳氏於此事亦始終不釋於懷，一九三九年上海研究資料續集有吳撰「回憶蔣竹莊先生之回憶」。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重慶中央日報又開始連載吳氏自述：「蘇報案之前後」。

（馮自由曾據以收入革命逸史第三集）。

（六）新世紀第七十九號「東京報界」，記述民報被查封經過甚詳。一百十五號「勸革命黨」及一百十六號「本報廣告」、一百十七號「黨人」評述章、陶及同盟會內訌事甚詳。總理全書之十函札上冊第一八三——一八八頁孫致吳敬恒函述其對此觀感甚詳。章炳麟自定年譜未有述及此者。

（七）新世紀第一百九號「鱗鱗爪爪」記劉光漢（師培）投靠端方事甚詳。天津大公報（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日）史地周刊第七期有洪煨蓮清末革命史料之發現——劉師培（光漢）與端方書，內有弭亂十策，洩漏同盟會內情甚多。

(六)譚人鳳牌詞。支那革命實見記卷首黃興致池亨吉函照片。

(充)張江裁汪精衛先生年譜：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譚人鳳牌詞。國父年譜初稿上冊第二二七頁。

(七)宋漁父第一集後編「遺事」第二頁。

第三章 對內政外交的主張

近代政治活動中，報紙乃一重要之利器，蓋其傳遞迅速普遍，以之宣播政見表達輿論，融朝野上下之意向，通內國外邦之聲氣，收效速而影響遠也；故歐、美、日本諸國政府及政黨均各擁有著名之報紙爲其喉舌，其主筆之人類皆魁碩名流，疊居政界、報界要地，如林肯、格蘭斯頓、大隈重信輩皆嘗進執政柄退修報業，或曾先主論壇再柄國計，能以政界之經驗發爲文章，亦能以報界之理論播諸事實，往往言議一出，遐邇風靡，故其國家極重視之，宋教仁亡命日本之初，即以創刊雜誌促進民智爲職志，旅日六載，涉獵廣博，經世之念彌亟，於報紙功用體認尤見深切。且嘗親接大隈重信（二），更有大丈夫當如是也之雄圖。一九一〇年自日本回抵上海，民立報禮聘之爲主筆，其政論家政治家之偉抱因得正式展佈於國人之前。

民立報者，三原于右任所創辦，其前身爲民呼報、民吁報，均以宣傳排滿革命爲主旨。一九〇九年五月十五日民呼報創刊於上海，以悲憤壯烈之言論，痛陳國家危難癥結之所在，鼓吹國民革命。不幸印行未逾百日，即被迫停刊(一)。于氏旋於是年十月三日改出民吁報，揭示命名意義曰：「民不敢聲，故僅吁耳。」(二)但仍不見容於末世。逮一九一〇年十月十一日又改名民立報問世(三)，其聲譽影響因此再接再厲不屈不撓之精神而益擴大。宋氏既入主筆政，本其學養論列國際大勢，發人所未道，爲上海報界開新風氣，尤得時人之欽仰(四)。

一 對外關係之認識

敵日・討俄・聯美

一九一一年二月八日，民立報刊出署名漁父之「東亞最近二十年時局論」，即宋氏一鳴驚人之作。蓋其明白指陳，「吾中國既往將來之大敵國，則日本是也。」

爲支持此一論點，宋氏援引種種史實文證以說明：(一)西力東漸不過爲禍中國之一原因，且猶由世界進化大勢使然，蓋有莫之爲而爲者；至真爲東亞禍源唯一之主原因，則爲假同洲同種之誼懷吞噬中原之心日日伺隙謀我之日本。利用天佑俠(二)有計劃以發動甲午戰爭，實其侵華傳統政策之初步，而陷中國於危急存亡困境之厲階。(三)一九〇〇年以還，日本初未嘗有聯英之計劃，實

有聯俄之舉動，而日英同盟之突然宣佈，非真欲保全中韓二國之本意。不過藉以要結英國且以消各國對己之疑慮，緩各國對中國侵略之急激進行，以待己之毛羽豐滿。③日俄之戰乃真侵略派（俄）與假保全派（日）消長倚伏之關鍵。日本從此儼然以保全東亞之主人翁自命。無時無事不用其僞，爭取休養生息時間與力量，以求達成雄飛東亞大陸之方針，其努力結種種同盟協約並以僞善待中國，均在於此。

按自一八七一年，中日建立邦交，中國朝野即有懷同種同洲聯合之想者。中經甲午之戰，此議挫而彌堅。戊戌維新，中日「合邦」之論高張；庚子拳亂發生，日本以行動支持康、梁、王照；日俄戰後中國朝野由憤俄而親日；在在增加日本在華影響力量擴大之機會。同盟會成立，為爭取各國之同情，揭示民報之六大主義，特別標舉「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七)，既不主排日，亦不如親日者之徒企人之我保，「而以爲中國者講求實力，以保其對等之資格，使交際間自無所屈辱，而日本亦當泯厥雄心，推誠相與。」其於中日關係之認識及了解與一般國人顯有不同；所以提示之道路原極正大，不幸日本朝野無喻斯旨，對革命黨人行動時加干涉，民報且被禁止印行；予康、梁輩則優待扶持不遺餘力，朝野輿論且時以護持康、梁回國張大其詞，對中國領土主權之侵略則惟求滿足心慾。間島問題發生，宋氏既發表專著駁斥謬說，遭受日人嫉恨監視，今重履祖國故土，即以揭發日本僞善陰謀喚起國人注意爲首務，足見宋氏旅日目擊心傷感觸

之深切。

自是而後，遠東國際復湧現若干新事件：①四國對華幣制借款（四月十五日），②湖廣（粵漢）鐵道借款（五月二十日），③英日同盟第三次改約（七月十三日），④英美公斷條約（八月三日）以及因此而引起之反應，如日俄對四國幣制借款之抗議，清廷將向日本借款之謠傳等等。宋氏復連續著論指出美國已以積極政策對抗日本獨占東亞之企圖。英美公斷條約即可謂對日本之消極的同盟條約。而日本以尙武好戰喜勝之民族突遭欺弄，失有力之同盟援助，必老羞成怒蓄意以圖孤注之一擲：

「自今而後，吾意美英二國既覺悟日美戰爭之必不能免，必益汲汲焉從事於豫備，美英二國間之求心力愈近，則日美二國間與日英二國間之遠心力愈速，而日俄二國之求心力愈益加大……十年之後，機會一熟，美國以英國爲後援，日本以俄爲左臂，各逞雄略，相見中原，正其時耳。」

宋氏因之認定遠東國際大局已形成經濟侵略派（美英）與武力侵略派（日俄）兩大分野。不出五年，日英同盟及其他各種協約（如日法、英俄、日美協約）將盡解散。不出十年，日本與美國將以干戈相見，而日美不開戰則已，果開戰也則必起於滿洲問題或監督中國財政問題，而滿洲問題爲尤急切，又勢所必有者也。「所難堪者，斯時何國勝利，吾國即屬何國戰利品，其命運即

懸於二國停戰媾和之旬日間耳。噫，言及此，吾真不知涕泣之何從也。」（八）

以今按之，宋氏此言，非徒一時愛國情感之用事，實有「知彼」學養之真知灼見，蓋近四十年之事實已可證明其預料不幸言中。唯其如此，宋氏當時不僅著文警醒世人而已，更欲躬親與役折衝樽俎，化戾氣爲祥和，以避免或防止此一大悲劇之發生。武昌首義，宋即著文要求日本採取正當之態度（九）。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初，宋氏且擬出任駐日代表（一〇），不意竟見拒於日人（一一）。一九一二年冬，俄蒙協約簽訂，宋更認定必須破俄人合從之勢，復擬重遊三島與其朝野共挽狂瀾（一二），不幸未兩月，即被刺身死，賈志以歿。

於此有應特爲指陳者，即當宋氏再三著論揭穿日本偽裝親善陰謀之時，對於俄人跋扈飛揚以宣戰恐嚇要索蒙古、新疆領土主權之言行，更筆伐聲討不遺餘力，其「二百年來之俄患」（一三），「蒙古禍源篇」（一四），「討俄橫議」（一五），即最膾炙人口之偉論，各地報紙多有據民立報轉載之者（一六）。

宋氏指陳，俄人此次（一九一〇年）對於蒙古、新疆之舉動，其蓄意深而規劃甚巨，蓋自日俄第二次協約立，而俄人東下滿洲之策息，自德俄協商成，而俄人南出波斯之計阻；故俄人遺傳之大彼得政策，惟有橫斷蒙古，駛進中原，突貫新疆，席捲西藏、印度、阿富汗，或可易於集事，此其極東政與中東政策，所以必置重於蒙古、新疆之主因。此次之要素，不過其乘機而動之

一端耳。「今而後，吾知黃河以北，皆將有不能高枕之勢，而此次改約之交涉，則正其政策成敗勢力消長之關鍵也」(二七)。

其嚴重性如此，俄人復採用以宣戰要挾之手段以求達到目的。國人不免有惶恐無策者。然宋氏觀其外交形勢，察其軍備政策，審其交通計劃，考其財政預算方針，短期內均無與外國作戰之預想與可能。因此再三著文鄭重指陳：「吾國人其勿以是爲可恐！俄人非真能以是與我戰者。其日日耀兵威於滿蒙新疆，皆彼虛聲恫嚇之狡計，斯拉夫人慣用之長技也。俄人而果欲與我一戰，則長驅其哥薩克之鐵騎南下牧馬可也。何事徒爲大言，使敵設備乎？天下豈有如是之戰略乎？」(二八)條分縷舉詳列盡致，足以破國人之疑惑，壯朝野之氣勢。同時復以政治家偉大之襟抱，雖極不滿清廷，仍爲清廷應付此一交涉籌畫上中下三策：①斷然拒絕俄人之要求，擊破俄人之虛聲恫嚇爲上策。②對等交涉開始後，以酌量允許，餒其盛氣，而後力持改約之主要點（自由貿易與土地所有權），以保蒙古、新疆之經濟主權爲中策。③目下不必與爭。惟聲明仍照原約再行十年，以待國力之充實是爲下策(二九)。

宋氏此種主張蓋洞悉俄人情僞，日俄戰後，創痍未復，固不敢輕啓外讐，其國內人民反專制之革命風潮尤異常激烈，更不容其政府發動對外戰爭，日俄戰時俄國內部之騷動擾亂可爲說明。抑中國俗諺有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一語，俄人如以武力肆行侵略最易激起吾國朝野之敵愾，而日本

以僞善策略又最善用外強中乾之國勢以行政治的貸款政策，以經濟力與武力同時並進，其陰險嚴重固較俄人行徑更甚。

其時，國人怵於大局之危急，有主聯美、聯德以抗日俄之侵略者（三〇），有主保守中立者（三一），宋氏於此亦嘗表示其意見。彼以爲日俄跋扈，求可稍緩其禍者固莫如聯結素無狡謀之美國，此固至當之理勢。惟深恐當中國尙未有主動的外交能力之時，或因是而破壞現狀不可收拾，而吾又無以爲應。蓋遠東國際端賴均勢以維持安定，中國亦惟求不再喪利權而姑維現狀，急起直追修內政整軍備以俟時而發焉。苟有一國焉而占特別之優勢者，各國群起嫉之即足使均勢之局立至動搖，故聯美之說當以不動搖均勢爲限度。宋氏因此私擬一策，謂宜利用美人經濟的侵略政策之國力，盛勸獎兩國國民經濟的共同事業，以相應之條件輸入其橫溢之資金開發吾生產，而不宜以政府爲主名。如是則或可達吾國外交政策經濟政策一部份之目的，而又不致招危難之禍（三二）。

其後，民國建元，民立報認時機成熟，復正式倡議（三三），旋且有中美同盟會之組織（三四）。是宋氏私議固已形成共同之國是矣。

二 建設真正民權之立憲政治

在對外關係上，一再著論揭穿日本之僞善政策，宋氏既已盡其言責。同時，在國內政治上，

努力提示建設真正民權的立憲政治之真諦，暴露清廷假立憲之名以行集權之實（二五），宋氏尤三致意焉。

蓋自戊戌維新以還，日本明治維新之成績，即爲國人所注意。逮日俄戰後，所謂君主立憲政體優於君主專制之論益瀰漫國內，一九〇八年清廷頒佈之憲法大綱大半抄襲東鄰島國，更爲模仿日本論者加強其論據，清廷且希企以此迷惑國人之視聽。宋氏因之鄭重指出，日本政治號稱立憲，實則只可謂半立憲，三十年來始終不脫藩閥之控制，使無其他勢力之發生，日本政治必永爲複雜的武人政治，而非立憲政治；蓋立憲政治以代表國民公意爲準則，而最適於運用此制者則莫如政黨政治，而日本雖已政黨，實皆不能適於行國民公意政治，歷次內閣之更迭，不過爲官僚黨之私相授受，不能以英國兩黨主義政見不同之進退例之（二六）。宋氏且因日本武人之柄政而斷言：「日本之國民的政治運動必不能大發展，而彼國民黨所夢想之政黨政治必不能實現。」（二七）是日本政治之不可爲法，已不待言，況效顰者乎？抑宋氏因一九一一年八月英國國會通過限制上院否決權法案，更認爲世界君主立憲之母國亦變爲民主之實質，世界政治之趨向如此（二八），清廷有何面目引憲法大綱爲抵禦人民之利刃耶？宋氏因此強調指陳，現政府之所謂立憲僞也，不過欲假之以實行專制者也。立憲者決非現政府之所得成者；「吾國民而果欲真正立憲者其速納代價，勿用彼廉賤不值一錢之要求方法矣。」（二九）

其時，北京有若干熱中功名之政客，挾其所簡練揣摩之法政知識，以督促立憲政治之成功相號召，組織所謂政黨，如各省諮議局聯合會會員之組憲友會，資政院議員等之組帝國憲政實進會是，且各宣佈政綱藉相標榜。宋氏詳審各該政黨之組織與政綱，深感國民政治能力之薄弱如此，中國政治前途實令人大可悲。乃本其學養及對政黨政治之熱心，著文剖析開導，謂政黨組織固有賴於種種因素，而最重要且為政黨作用之最大武力者則為政綱，制定政綱之條件至少必須有二：①其方法必為積極的而不可為消極的。②其事項必為未來待行的而非現在已成的。而此兩黨之政綱均不符合此二條件，大抵其精神蓋欲趨重於國民一方，而未嘗注意於國家；趨重於各該會自身，而未嘗注意於政府；趨重於消極而未嘗注意於積極；趨重於研究而未嘗注意於實行；是絕無政黨之常識且不明政治法律學上之基本觀念(三)。

在宋氏暴露清廷朝野對於立憲之作用與認識之同時，另一行動亦在宋氏主持下積極展開，此即組織同盟會中部總會，明白揭示「推覆清政府建設民主的立憲政體為主義」(見第四章第一節)。蓋為進一步將革命同盟會之組織與活動推行內地，以加速國民革命運動也。因之，宋氏每能把握時機針對清廷種種乖謬措施，辭而闕之，警醒國人。針對清廷所謂鐵道國有政策之宣傳，是其最著例。

先是，當同盟會成立之初，廣東即有商民力爭粵漢鐵路民有反對官辦之事件，民報曾著文支

持商民立場(三)，同時鄭重指出：鐵道國有者，按民生主義(社會主義)之主張，爲抑制私營自然獨占事業者之專橫而達社會上目的，以鐵道經營之權歸屬於國家及公共團體之政策也；至其他以軍事上、財政上、經濟上利害而言鐵道國有者，乃官辦鐵道與鐵道國有之性質迥然不同(三)。

一九一一年五月，清廷宣佈所謂鐵道國有政策，舉國大譁，宋氏更本各國鐵道建築歷史成例指出：各國鐵路皆無不先經民業時代而後改歸官業始克得良結果者，吾國鐵路事業方在幼稚時代，民業尤宜獎勵保護使日發達，況粵漢、川漢鐵路爲民有、民業者已久，固亦清廷所特許者，縱或以其路線爲一國樞幹，理宜干涉，亦只應明定法令速其造路之期襄其營業之法已耳。藉口政策而蹂躪人民已得權利，其與殺人越貨者何異？抑實施此國有政策時尤宜審量國家財政力量，苟不得良善之財源則亦不得貿然爲之，況自甲午敗創以來，各國對我者無不以鐵路借款爲侵略之先驅，今復借其巨款築路，是不啻益促成其協以謀我之勢力，而授彼以把握吾經濟實權之地步。所謂收歸國有，實不如直截了當謂「收歸外有」之爲愈也！故此一舉措實「顛倒政治之方針，阻遏人民之企業，使外人益以其經濟力拊吾背、扼吾吭而制吾死命，皆莫此爲甚者」。宋氏因此呼籲國人速起自救。其後四川爭路風潮暴發旋且步步擴大，宋氏更著論指陳，專制之威非平和所能克，群眾之力非壓迫所能制，此一政治現象之原則，又已爲中國人所體認，四川既首開其端，湘、鄂、粵人宜繼起於後。宋氏並殷切期望，更進一步，由消極的爭路運動「進於積極爲四萬萬漢、滿、

蒙、回、藏人民首先請命，以建設真正民權的立憲政治爲期。湘、鄂、粵人及各省人亦同時並發，風起水湧，以與川人同其目的，吾恐數千年充塞東亞天地之專制惡毒或將因此一掃而盡亦未可知，區區借債奪路之虐政云乎哉」(三三)。蓋中部總會已決定乘四川爭路風潮，華中各省訂期同時並起(三四)。宋氏此論，固有以報紙之鼓吹播諸事實之作用也，而其言果驗，殆偶然耶？否耶？

三 遵奉民生主義推行社會政策

近代歐洲社會主義(Socialism)之傳入中國，約在二十世紀之初，乃間接自日本轉輸者。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蘇報封面刊上海支那繙譯會社第一回廣告：繙譯世界第一期，其目錄中有「社會主義——日本村井知至著」(三五)，殆爲中國境內最早介紹此一主義之中文譯著。其後福井准造著近世之社會主義亦於一九〇三年轉譯爲華言。一年之間同類性質之書竟有兩種譯著，其爲滿足讀者之需要當可想見。而讀者之所以需要，則君主專制官吏壓迫社會上貧富現象尖銳對立，多數平民憤憤不平之心理亟求解答，蓋爲主要原因。惟國人徒憑日人之轉販，未深究此種主義之內容，一知半解遂謂其說「吾中國固夙有之」(三六)，似與所謂大同社會理想相近，故頗歡迎之，維新派人士尤喜鼓吹(三七)。一九〇三年五月，梁啟超遊美國，紐約社會主義叢報主筆且曾勸說梁氏自社會主義著手以改革中國(三八)。

抑革命黨人士注意社會問題尤早於維新派，中山先生於一八九五年第一次舉義失敗後遊歷歐美各國，考察政治社會各種狀俗，對於社會問題尤熱心研究。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〇年間在日本與章炳麟、梁啟超、馮自由等晤談，恒論及中國未來之社會問題及土地問題，如三代之井田、王莽之土田與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法、洪秀全之公倉等資料，均在討論之列；而於歐美社會經濟學說則極佩亨利佐治(Henry George)之單稅論。平均地權思想即由此起(三)。一九〇三年秋，孫先生既提出此平均地權四字於入會誓詞，一九〇四年春更正式著之於美洲致公堂新章中(四)。此爲自維新保皇派手中取回致公堂控制權後之重要舉措，殆亦針對梁啟超遊美時之談論社會主義也歟？

其時，國人對於社會主義之心情，可於一九〇四年五月武昌刊行之湖北學報第七期徵之。學報教育欄有「研究社會主義之必要」一文，譯自日本雜誌，乃有感於日本警廳對奉行社會主義之日人有所處置而發，條舉各種社會主義分別說明後，謂國家社會主義乃社會主義之真諦，亦與政治之理經濟之法合，而爲與外國競爭上所必取之道。「倘一聞社會主義即痛心疾首一律駁斥，則於教育之道不能不謂遺憾」(四)。據此可知：當時中國知識份子同情日本奉行社會主義份子之不幸遭遇而外，對於各種社會主義應如何取捨似亦有初步之認識。

於此有應指出者，①即社會主義譯本及湖北學報刊行時，宋教仁正肄業武昌文普通學堂，並

積極進行革命活動中，其於是種書刊曾加涉獵，要爲意中事。因有此背景，故一九〇四年冬宋氏遁跡日本，旋且參與中國革命同盟會奉行中山先生手訂平均地權之四大政綱誓言，非偶然也。②同盟會之成立，民報之發行，以倡導「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爲首務，同時別創民生主義一詞以代沿用日譯之社會主義，尤爲值得注意者。

按歐人所謂 *Sociology*，我國嚴復譯作「群學」，如其譯群學肄言 (*Study of Sociology* by Herbert Spencer) 是也。嚴氏又譯英文 *Politics* 作「社會」，如其譯社會通銓 (*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 by Edward Tenks) 是也(註)。故嚴譯 *Society* 作「人群」，而日本人則譯之曰「社會」(註)。一九〇二年秋章炳麟譯日人岸本能武太原著社會學，特從嚴譯名稱改作群學(註)。然其後留日學生漸衆，多沿用日人習見名詞而不暇查檢國中舊辭，於是日文名詞之沿用反較熟習。*Socialism* 之從日人譯作社會主義即一顯例也。中山先生初亦常用之，嗣以此一名稱未能包括其個人所發明之主意，乃別創民生主義一名詞。蓋倡導社會革命以獲致民生福利，意義簡明，且含有嚴譯舊義足資號召。馮自由謂國家民生主義(原註日人舊譯國家社會主義)之綱領，即平均地權，固易收普遍宣傳之效也。

如上所述，立憲派人固曾鼓吹社會主義者，然而梁啟超既素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遊美東歸後，前所深信之破壞主義與革命排滿主張竟完全放棄(註)，新民叢報再三著論反對民報

之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同時並舉之主張，且謂一二野心家思假社會主義爲煽動之具（四六），政治思想與主張轉變之迅速如此，實可驚人。而民報中討論民生主義社會革命之論著則甚多，可見同盟會員面對現實迎接潮流之一般。宋氏於此蓋亦曾再三致力。

按之我之歷史，宋氏自一九〇五年秋季以還，於社會主義之研究即特具興趣，閱讀日文有關書刊之外，且常與外籍之社會主義者交遊，因宮崎寅藏識其弟民藏（日本之社會主義者），旋又因宮崎民藏而識旅日之俄國革命志士，宋氏與彼輩往返談論要點均詳載日記中（四七），具見其注意之所在。復因鄧家彥等之慫恿與囑託，譯述日文之「一千九百〇五年之露國革命」與「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二文於民報（四八）。綜其意向蓋在藉俄國革命之事例說明：①以俄國君主專制之根深蒂固，其人民尚不畏死不怕難前仆後繼以爭取自由。則「挾有爲之資」如我國同胞者能不聞風興起乎（四九）。②俄國革命經驗提示，向專制政府作「要求」不啻與虎謀皮，惟有暴動與暗殺手段始足以達到目的，中國革命於此最宜注意（五〇）。而其於「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文末特加按語曰：「萬國社會主義進行之勢力，方興未已，如近日法國社會黨兩派，已經復合，別生出社會主義與愛國心之一問題，將來次期萬國大會必爲劇烈之爭點，吾人暫擱筆以拭目候之焉可也。」（五一）其審慎之研究態度於此可見，較之劉光漢、何震夫婦創刊天義報鼓吹破壞固有社會（五二），旋又被清吏收賣轉而破壞革命者（五三），真有天淵之別矣。

於此有值得注意者，即我之歷史中有關與俄國革命家會晤記載之史料價值，蓋此爲現存公開之同盟會會員中有關此事之唯一史料，亦中文方面有關此事之稀見史料也(五)。其文有云：

①一九〇六年三月十日，與(宮崎)民藏至芝區訪俄國革命志士，俄人言：「革命之事，不可從一方面下手，專講政治的革命，必不能獲眞自由，專講社會的革命亦必不能獲眞自由，必二者俱到，然後自由之權利可得而目的可達也。」又云：「已向來係專主張民主主義的；然觀之於美國，民主國也，而其人民仍不自由也。法國亦民主國也，而其人民亦不自由也。其人民於政治上之自由未嘗不獲多少也，然社會上之不自由乃益加甚矣，故余近年所主張較前稍變，實兼政治社會上方面而並欲改良者也。」末後問我等携有相片否(五)。

②一九〇七年三月十二日，黃興言：俄革命黨擬在滿洲有所運動須吾人爲之經營，不日當往橫濱與之商議(五)。

接近四十年迄苦無相關之詳明史料以說明此二則記載，今就近刊之「史學譯叢」(一九五七年第五號)譯載「二十世紀初俄中兩國人民之間的革命聯繫」始略窺真相。據稱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間在日本之俄國僑民環境背景極爲複雜，其中以社會革命黨人——民粹派份子占多數，老民粹派H·K，蘇濟洛夫斯基在俄僑中具有重要作用。彼前曾旅居夏威夷島，當選爲該局參議院議員，參與該地居民反美運動，日俄戰爭爆發後移居日本，改姓爲魯塞爾爲俄國戰俘出版報

紙，戰後在長崎另發行一報，介紹俄國革命情勢與中山先生有書信往返，所討論問題之一，即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應同時並舉也（五）。宋氏日記中所接談者非魯塞爾，或係另一人，當與魯塞爾有聯繫，否則持論主旨將不致相同，此可爲指出者一。又據史學譯叢同文稱，自一九〇五年以來俄國社會民主黨即開始在中東鐵路中國工人及哈爾濱中國居民間進行工作，一九〇七年更圖擴大此項工作。蓋當進行對俄國駐軍與工人僑民之煽動組織時，假手中國人常可獲得若干便利也（六）。據此可知黃興之言所由來矣。抑當時黃、宋正積極準備宋氏東三省之行（見第二章第四節），不論此一意見是否俄人向黃直接提出或由中山先生轉告，而其企圖利用中國革命黨旗幟以達成其組織東三省居民之目的意極顯然，惟宋氏此行曾否與俄人有所接觸則文獻無徵。

一九一一年八月，民立報刊載「社會主義商榷」一文，乃宋氏對於社會主義認識之較後之直接反映，宋氏於文中提出兩大問題：①社會主義派別甚多，果以何者爲標準乎？②行社會主義於中國前途果有何影響乎？

基於第一問題宋氏認爲可分四派：①無政府主義，②共產主義，③社會民主主義，④國家社會主義。前二者可稱之曰真正之社會主義，而後二者只宜稱爲社會的政策，而吾國之唱社會主義者其所揭櫫雖不明確，「吾以爲必是主張無政府主義或共產主義。若不是之務，是猶不解社會主義的真正意義爲何物者也」。

「雖然，凡一主義之推行每視其客體事物之現狀如何以爲結果，今假定行真正之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於中國，則其結果爲何如？唱社會主義者果一計及之乎？」宋氏因試擬一良結果與惡結果而相與比較之：

「使中國行真正社會主義而得良結果也，則必先具備下述之條件：國家之內部、外部皆已康樂和親，達於安寧之域而無待維持，人民之精神物質各方面皆已充實發達臻於幸福之境而無待增進，社會經濟之生產分配皆已圓滿調和適於生活之用，而不必再求滿足之方。若然，則各國社會主義學者所擬之理想的社會而求之不得者，而吾人乃竟一躍而達，其快樂固可知也。」

「若非然者，則是中國社會必尙未躋於行此二主義（無政府、共產主義）之現狀與程度，政治或不足以維持安寧增進幸福，財產或不足以滿足國民生活。國家之內部外部憂患叢生，人民之精神物資方面頹落備至。社會經濟之生產分配耗竭凌亂莫可名狀，國之所以幸存者蓋亦不過賴有此僅存之政治與財產制度以爲維繫，一旦變本加厲並此而去之，人類社會必至全然不得安寧幸福及生活，以成爲毫無秩序之世界，亡國滅種之禍因是促成，乃至欲求政治與財產制度時代之不自由不平等而不可得，畫虎不成反至類狗。吾人試想像此悲慘之狀俗其亦不能不生恐怖之心者矣。」

因此，宋氏鄭重提示：「行社會主義結果之良惡如是。然則唱社會主義者果有如何之觀察，如何之推測而以爲將來必得如何之結果，且於中國前途必有如何之影響乎？」「夫吾人非反對社會主義者，吾人惟以爲凡倡一主義不可不精審其主義自身之性質與作用。並斟酌其客體事物之現狀以推定其將來所受之結果，夫如是乃可以坐言而起行。」

此文刊出後，自命首倡社會主義於中國之江亢虎，對之推崇備至。蓋江自感「倡導以來，日困於四面楚歌聲裡，並世同調，彌復寥寥，見似人者而亦喜矣，況漁父（宋）之卓有見地者哉？惟細繹原文似於社會主義尙不能無疑。」（堯）今按江氏之論是矣。蓋復按上文即可知宋氏之意極爲明顯，即中國固無實現此二主義（無政府、共產主義）之條件與環境，貿然妄行必生惡結果也。抑此文發表後半月，宋氏又發表英國之國會革命一文，指出此爲社會政策將盛行之見端（六〇）。蓋宋氏意在推行國家社會政策而不欲人云亦云如國人之標榜意義不明觀念不清派別複雜之所謂社會主義也（六一）。

第三章 附註

（一）民立報一九一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宋撰短評「日人將縱秦檜矣」文中自言：曾於一九一〇年六月二日見大隈。我之歷史中記聽大隈講演及閱讀其文字之記載不一而足。就宋一生文字觀之，受大隈之影響至深。

(二)據民呼報第一號。一九〇九年八月十四日停刊，詳見革命逸史第三冊第三一四頁。

(三)據民吁報。革命逸史第三冊第三二二頁。

(四)國民黨黨史會藏有民立報，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圖書館亦藏有此報。

(五)陳布雷回憶錄第四十六頁。

(六)「東亞最近二十年時局論」第二節（一九一一年二月九日）有云：「日人久欲以一戰驅逐中國在韓勢力而苦無出兵之口實。乃陰遣武士一隊煽動東學黨作亂……日人有內田良平者，彼中武術之名家而以侵略滿韓爲目的之黑龍會之首領也。（良平自甲午以來爲韓人一進會顧問，日人廢韓皇，結合併條約等皆良平之功居多）。日本欲利用東學黨乃以此任舉付良平，並給以外務省之機密費數萬金，良平乃與其徒結一團體曰天佑俠。榜其旨曰：「扶助人道。」相率至朝鮮，以助朝鮮獨立說東學黨總督全瑋準，瑋準爲所惑，以良平等爲司令參謀之職，良平遂挾東學黨傳檄四方奪城戕官蹂躪南韓一帶。」又文末原注云：「著者在東京某日人爲外交官者處見有一書名曰天佑俠，內記內田良平與其徒清藤幸七郎、末永節等挾東學黨發亂於南韓事始末甚悉，詢其書所自來，則即幸七郎所著者，日政府恐宣明秘密已禁止發賣云。」今其詳情可閱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冊。

(七)民報第三號第十八頁。據張溥泉先生全集第二三五頁回憶錄有云：「發行民報雜誌，余任發行人，爲向倭申請警視廳立案，非載明宗旨不可。民報後頁所附六大要點，乃余爲應付倭警廳計而列。非

本黨決議如此。猶憶警廳問余所謂中日兩國國民的聯合何解？余調告之曰：國家是永久的，政府乃一時的。警廳之人，本無學識，彼亦含糊曰好好。後漢民撰文解釋六大主張，亦應付環境之說，並非真欲中日兩國國民聯合也。現行黨史多認為同盟會有此主張。亦不知真情也。」可資參考。惟據「回憶錄」序着筆於一九四三年十月十日，正對日抗戰之際，此論或不免曲筆也。

（八）民立報一九一一年七月十八日「論日英同盟條約之修改」及同年八月二十五日「論美英公斷條約」。宋氏認定日俄必勾結，日美戰爭將不可免之見解，早在「論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七日）及「後四國借款之紛議」（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三日）文中即已提出。

（九）民立報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九日「敬告日本人」：「湖北革命軍之起也，各國皆守中立，乃獨有日本則不然」，「吾非謂日人之宜袒革命軍也，第以革命軍既已成為有組織有土地人民之團體，則在國際法上宜承認為交戰團體。」

（二〇）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冊圖片有宋任農林部時寄內田良平函件照片，有云：「內先生大鑒：久不奉書，清風朗月。相思曷極。回憶革命時代，我勞將伯之呼，公作他山之助，仰資碩畫卒告成功。今日共和幸福，大半皆友邦君子之賜，吾華四百兆同胞同深感戴，豈惟弟區區一人耶。弟初擬出使貴國，上為國家聯秦晉之歡，下與諸舊游尋雷陳之好，為公為私兩得其便。豈料事與計左，時事變遷，承乏司農，才短任艱，日昃不暇，先生經國大略研求有素，如荷訐謔，尤切銘刻。肅此佈憶，

敬啟道安」。又同書第四七三、四七四頁，似有意表示內田與宋之交往關係者，實則此不過革命黨一種策略運用。善夫北一輝支那革命外史第五六、五七頁之言：「稍稍與革命黨諸氏有所交遊者，人之且以革命黨依賴日本，誤斷其爲欲於日本呼吸下而立國之亡韓的親日黨，於是押賣蠶蠶之援助者比比皆是。」「後者（宋）之愛國的自尊心終於使彼等（日人）結束而不得不使成爲一排宋勢力。」「然而因此對革命黨之知識以至對華政策之輿論幾全爲彼等之集團所作成之今日，不得不使不肖痛嘆日本尙未了解革命運動之真相。革命中上海總領事有吉君見一般以爲親日論者之宋君用漁父之號時之排日論而論中國之反覆無常，向強制抑止失笑之不肖傾其官僚的輕侮觀，由一國之任命權而決定之宋君遣日全權代表，頭山翁勸告孫（中山）以尙不知其於中國之存在的何天炯代之。其對革命爲愛國運動之根本意義如何，無智暴露而如斯。」可稱持平之論。

（二）支那革命外史第一二九頁：「以婦孺皆知譽爲中國革命元老之（白浪）滔天且發排斥宋教仁之電文於各處，」「而遠來援助之頭山滿、犬養毅氏等一亦以宋君之去日本爲結托自己於本國之政敵的長閥，乃訴於鄰國政權中心不問人之如何而非難其正當的行動，不常發言之頭山翁當時亦勸告孫君欲以毫不聞名的何天炯代替宋君。」

（三）詳見第六章第三、四節。

（三）民立報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日—三月四日連載，一九五二年二月臺北輯印單行本。

(四)民立報一九一一年二月十日。

(五)民立報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六)廣西印行之君主立憲派刊物南風報第三期曾轉載「蒙古禍源篇」、「滇西禍源篇」。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七號轉載宋之「論美英公斷條約」，第八號轉載「土意之的利波里紛爭」等文。

(七)二百年來之俄患（一九一一年三月四日民立報）。

(八)討俄橫議；民立報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九)討俄橫議：全上。

(二)宣統政紀卷五十五第二十一—二十三頁載宣統三年六月辛巳（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五日）出使奧國大臣沈瑞麟請速訂聯盟政策以結強援而維危局摺：「爲今之計，宜莫如聯絡德美，以結我援而樹彼敵。」

「德爲新造之國而美則世守孟祿主義，其在中國所得權利遠不逮英、日、俄、法之優，是對於四國嫉之愈深，斯對於我國援之必力，東三省鐵路之中立，美首倡言；哈爾濱市制之施行，德先抗議；非愛中國也，蓋協約未得圓滿之果，則競爭尙無休息之期也。乘此時機與之聯絡約定維特現狀四字爲聯盟宗旨；設再梭巡却顧坐失時機，恐德美亦相率加盟，陷我於孤立之域。」蓋完全自國際形勢立論也。其後袁世凱用唐紹儀聯歡美國，深中日人之嫉。至自內政上立言主模仿德國者更不一而足。如一九〇六年六月十三日貴州學政朱福銑奏學術多歧，士氣不靖，醉心歐化者多應法蘭西之自由

學派，逆節悖理，習爲固然。請定全國學生爲德意志之國家學派（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九第十二頁）。一九〇七年二月八日直督袁世凱密陳大計以遏禍萌奏請宗德國學派申明國家主義，得旨著外務部學部認真辦理（清德宗實錄卷五六八第十九頁）。一九〇九年考察憲政大臣于式枚奏德意志憲法及地方自治章程應采德國主義立法（宣統政紀卷八第十五頁，卷十三第七、二十九頁。）

（三）梁啟超「中國外交方針私議」（飲冰室文集第八冊第一〇〇頁）。

（三）民立報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七日「論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文中「外交方針之乖謬」。

（三）民立報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九日「中美邦交其益篤乎」：「中美邦交素行親睦，而美人對我國較之列國亦頗示其相助之誠，故中國於世界列強中欲求一能利害相維持者厥維美，蓋中美二民族之天性雅愛和平，故無形中不期而自契，當前清之季，吾人自慚爲專制之民，未能一躍而與美比武，然中美同盟之聲已盛倡於一時，雖未克遽告成功，中美感情固自此日進矣。夫中美同盟之不成，知者恒以爲日人利害關係，嘗百出其術思爲之梗有以致之，然日人不足破壞中美同盟之局，其得藉詞以間我者惟華工問題，而吾國人腦海中隱存一芥蒂而不能遽釋者亦惟華工問題。華工問題一日不解決，則中美間之芥蒂一日不可消釋，此吾人所具見而宜亟去此和親之障礙者也。今吾國革命成功，中美已爲東西兩共和國，雖列國對於現政府今尚未正式承認，然使列國承認之後，中國所欲與訂同盟條約者，當以英美爲先，而美尤易成，十四日駐美代表電致外交部，美政府已將華工條約修改，對於華

工往美概不禁制，往日苛例，咸行蠲除，華工問題一朝解決，實不啻將中美感情上之芥蒂一旦打破，永無嫌怨，中美邦交於以益篤，此蓋中美同盟之先聲也，雖有讒人何足施其間哉。」

(四)民國彙報第二期「外交」——中美同盟會記。

(五)清廷假立憲以行集權之實真相，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第七、八章（英譯本第205—235頁）

(六)民立報一九一一年九月五日「日本內閣更迭感言」。

(七)民立報一九一一年九月五日「日本內閣更迭感言」。

(八)民立報一九一一年八月三十日「英國之國會革命」。

(九)民立報一九一一年八月三十日「英國之國會革命」。

(一〇)民立報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六月二十三日「近日各政黨之政綱評」。

(一一)民報第三號時評「粵東商民與岑春煊」，第四號「粵漢鐵路之廣東自辦」。

(一二)民報第四號「從社會主義論鐵道國有及中國鐵道之官辦私辦」。

(一三)民立報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七日「論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交通政策之荒謬」。同年九月十四日

「論川人爭路事」。

(一四)民立報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七日第六頁宋在北京國慶大會演說謂：「遂定乘四川鐵路風潮激烈之秋一舉起義。」

(三)蘇報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十三日第二三八四號。

(六)梁啟超「中國社會主義」(飲冰室合集專集第二冊第一〇二頁)。

(三七)黎澍「論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近代史論叢第二十五頁。

(六)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上冊第一八二頁。

(三)革命逸史卷二第一四四頁，卷三第二〇六頁。

(四)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續篇上卷第一〇七頁。

(四)湖北學報，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本。

(三)王適常嚴幾道年譜第九頁第七〇頁。

(三)浙江潮第二期新名詞釋義。

(四)新民叢報第十七號封裡廣告(一九〇二年十月二日出版)。

(五)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六)梁啟超社會主義論序(飲冰室文集第七冊)。

(四七)我之歷史一九〇六年一月一日、一月十八日、三月八日、三月十日。

(四八)我之歷史一九〇六年一月二十八日、二月二十日、四月八日、五月十日。民報第三號、第五號、

第七號。

(四)民報第二號時評欄宋撰「尼夫阿尼亞之獨立」，又如南風報第四期「俄國內情黑闇之一斑」錄俄國虛無黨之行動而加按語云：「告我同胞須知俄國內政黑暗如是，乃欲窮兵黷武於萬里之外多見其不自量耳。」其意正與宋同，可反映當時國人所以介紹此種事實之初心。

(五)民報第七號「一千九百〇五年露國之革命」之文末宋氏按語

(五)民報第五號第一〇五頁「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

(五)復報第十期附錄刊有「天義報啓」。其文有云：

地球之上，邦國環立，然自有人類以來，無一事合于眞公平，異族之欺陵，君民之懸隔，貧富之差殊，此咸事之屬于不公者也。自民族主義明，然後受制于異族者人人均以為辱；自民約之論昌，然後受制於暴君者人人均為恥；自社會主義明，然後受制于富民者人人均以為羞。由是種族革命政治革命經濟革命遂為人民天賦之權，然環顧世界各邦，其實行種族革命者尙占多數，若政治一端雖實行共和政治者猶不能盡人而平等，經濟一端更無論矣。試推其原因，則以世界固有之社會均屬于階級制度，合無量不公平之習慣相積而成，故無論其遷變之若何，均含有不平之性質，非破壞固有之社會，決不能掃除階級之盡合于公。顧今之論者所言之革命僅以經濟革命為止，不知世界固有之階級，以男女階級為嚴，無論東洋有尊男輕女之風也，即西洋各國號為男女平等者，然服官議政之權均為女子所無，則是女子所有之權並賤民而不若；更反觀之于中國，則夫可多妻，妻不可

多夫，男可再娶，女不可再嫁，服喪則一斬一期，賓祭則此先彼後，即有號有均平者，既嫁之後內夫家而外母家，所生子女用父姓而遺母姓，又安得謂之公平乎？夫男女之間其制度失平且若此，於此而欲破社會固有之階級不亦難乎，故欲破社會固有之階級，必自破男女之階級始。所謂破男女階級者，即無論男女均與以相當之教養，相當之權利，使女子不致下于男，男子不能加于女，男對於女若何即女對於男亦若何，如有女下男而男加女者，則女界共起而誅之，務使相平而後已，失以男女階級之嚴，行之數千載，今也一旦而破之，則凡破壞社會方法均可順次而施行天下，豈有不破之階級哉？夫居今日之世界，非盡破固有之階級不得使之反于公，居今日之中國非男女革命與種族、政治、經濟諸革命並行，亦不得合於真公，震等目擊心傷，故創爲女子復權會，討論斯旨以冀實行其目的，又慮此理之不能共喻也，故刊天義旬報以作本會之機關。惟經營伊始，財政拮据，世有贊成此旨者，尙祈慨解囊金共襄此舉，使公平之真理得以普及于寰區，此則世界之幸也。

其於社會階級之區劃可謂完全不解。

(五三)見第二章附註(六七)。

(五四)民報第四號時評欄有「俄國革命黨之日報」一文記俄人在長崎發行報紙事，但未述及與我革命黨人關係。

(五五)我之歷史第三冊第一九、二〇頁。

(癸)我之歷史第六冊第十四頁。

(壬)史學譯叢(一九五七年十月，第一一〇——一二頁錄有一九〇六年中山先生致魯賽爾博士英文函譯文兩件(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八日及二十六日，原註：原件藏莫斯科國立中央十月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檔案館)其中指陳：「最近時期中國的革命運動具有單純的政治性質而不是經濟的性質，但是它將爲我們未來的經濟發展打下基礎。」並告以「民報」發行情形。惟此二文件不見於總理全集及國父年譜初稿諸書。

(癸)史學譯叢同上文第一〇二——一〇六頁。據稱經過俄革命黨人組訓之中東鐵路中國工人被調到華中工作。在四川爭路風潮發生曾與宜昌革命黨人聯繫，積極活動。東亞先覺志士傳中冊第二十二章有中
俄革命黨員在長崎之動靜，無此文之詳。

(丑)江亢虎洪水集(一九一三年鉛印本)。

(丙)民立報一九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丁)按宋氏此文發表後民立報又陸續發表有關討論文字甚多，民立報始終堅持國家社會主義：「當茲國家存亡之秋，舉國民之全體傾心於國家主義猶恐無以拯救。何能高談去國界之無政府、共產主義耶？」其文雖未署宋名，然以宋在該報前後文字觀之，要可謂即代表其意見。

第四章 大革命暴發前後

中國國民革命運動自始即由於帝國主義侵略壓迫之刺激而發生，日本、俄羅斯與中國毗隣，窺伺中國亦最亟，故中國國民對之尤特具敏感。一八九四年秋，日本發動侵略戰爭，中國革命團體——興中會即於是年創立。一九〇三年四月，俄國違約不撤退東北占領軍，更引發國民革命主義之沖激，於是仇俄排滿，相激相盪，怒潮澎湃，即十餘齡之學童亦有實際行動之表現（一）。其後，日俄戰爭演變成日俄協約，兩國合作共同侵略中國，其他國家亦競先效尤要索權利（二），更使清廷窮於應付，美國爲緩和此一情勢，曾提出滿洲鐵道中立計劃，又被日俄同時拒絕。一九一〇年七月十三日，日俄第二次協約正式公佈（三），益顯示東西同時加力之利鉗必欲制中國於死地而後已。因之，中山先生認定「時勢甚急，岌岌不可終日」，「決意爲破釜沈舟之舉」，再接再

厲，「與虜一搏」(四)，推翻清廷，建立民國，以爲抵禦外侮之基礎。於是中國革命史上最感人心懷之廣州「三二九」之役(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遂以發生，中國國民革命之國際意義亦因此益加顯明。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中山先生與黃興、趙聲、胡漢民等在檳榔嶼舉行會議商討在廣州大舉起義計劃，鑒於過去七次義師，或用民軍或策動防營新軍，均缺乏幹部確實掌握，致均功敗垂成；此次因決定擇同盟會會員同志五百人爲「選鋒」，以領導新軍及民軍發難，計劃廣州得手，即以黃興統一軍出湖南，趨湖北；趙聲統一軍出江西，趨南京。蓋中國興亡在此一舉，故傾全黨人力、財力以赴，高級知識份子身先士卒，尤足見同盟會創立初期之精神(五)。

計劃既定，即於香港設立統籌部，由黃興主持，分途進行籌款募士聯絡工作，以第二步目標在長江流域，故尤注意於湘、鄂、滬、甯各地之聯絡，而此乃譚人鳳、宋教仁年來所特別致力者，黃因電約譚赴香港面商(六)。

譚南行時原邀宋同行，宋以須俟黃電始可定行止，而黃因宋與胡漢民意見不合(七)，頗有難色，趙聲則極力贊成之。然迄譚由港經滬到湘、鄂秘密洽商後再回滬，黃始終未曾致電宋氏。嗣經譚強挽之同行，一九一一年四月中，宋氏遂至香港，旋繼陳炯明任統籌部編制課課長，掌草擬文告約法及中央地方制度。四月二十七日晨，宋復與何天炯等及海外同志乘輪赴廣州，以極大之

信心認定此舉可告成功，故如期趕往，以期臨事有所作爲。然而不幸者，即二十八日舟行抵穗，義軍已告失敗矣。宋傷敗之餘，惟有折回香港，趕辦善後。而衆人雄心未已，趙聲且促宋繼續完成草擬約法工作（八），蓋起義事雖未成，其轟轟烈烈之氣概則已震動全國，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造成，宋氏因此獲得若干啓示與經驗，以加速組織中部同盟會，尤足稱焉。

一 同盟會中部總會之組織

早在一九一〇年秋，宋教仁、譚人鳳、居正等在東京集議加強同盟會工作，即提出「事權統一責任分擔」口號及籌設中部總會計劃，宋、譚旋回上海積極進行，譚人鳳且親履各省分途接洽，深得各方贊同（九）。廣州「三二九」之役不幸失敗，然長江各省基礎則未被破壞（一〇）。宋氏由香港回上海，認定事有可爲，因將東京計劃衍述爲三策，以取衆議：①效法葡、土之中央革命，密聯北方軍隊，更結束三省馬俠爲後援，一舉而占北京，然後號令全國爲上策。②在長江流域各樹潛勢力，一聲令發，同時並舉，創立政府，然後北伐，此策之次者也。③在邊疆要衝密組機關，一朝大舉，進據險塞，徐圖攻取，其地則或東三省，或雲南，或兩廣，此策之又次者也。僉謂上策運動稍難，下策已行之而敗，且足引起干涉釀分裂之禍，共決採用中策（一一）。六月中，譚人鳳因復至漢口與居正、焦達峯、曾傑等調查聯絡湘、鄂、甯、贛同志。旋與曾傑至滬訪宋及陳其

美等報告南京等地同志勇敢堅決情形，宋益感早日組織中心領導之必要（二二）。一九一一年七月卅一日，各方思想溝通，遂假座上海湖州會館舉行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會，各省蒞會同志代表凡三十三人，即席宣讀譚人鳳手擬之宣言及宋氏手草之中部總會章程、總務會暫行章程、分會章程，獲得通過後，選舉職員，宋、譚及陳其美、楊譜笙、潘祖彙當選任總務會幹事，宋復被推分掌總務會文事部，管理參謀立案編輯及其他一切事務。隱然爲全會之中心焉（二三）。

今按中部總會宣言與章程，有可注意者數事：

①中部總會之創議爲加強同盟會之活動，而非分散同盟會之力量。宣言曰：「奉東京本會爲主體，認南部分會爲友邦，而以中部別之，名義上自可無衝突也。」既反覆言之。其首段對於章炳麟、陶成章之「或主分離，或主攻擊」者，更深致不滿；且開宗明義謂戰勝虜廷必須有共同之計劃，切實之組織（二四）。是其心意固在藉同盟會之形式而避大結合之障礙，所謂存其名又得其實也。

②中部總會章程第三條文曰：「本會以推覆清政府建設民主的立憲政體爲主義」（二五），此與同盟會成立時之四大綱領及其後改訂誓詞均有歧異。一般論者或不免謂兩者之間殆有距離，然以今論之則不盡然。蓋四大綱領與改訂誓詞，原爲懸示一大衆追求之最高目標，中部總會既奉東京本會爲主體，固同爲此崇高之理想而奮鬥者，而因時因地制宜，採取現實觀點，略有更張，以適應環境，一九一〇年十月，中山先生特囑南洋各地同盟會員改稱爲中華革命黨員（二六），即一最著

之例。焦達峯等前倡組共進會，爲針對一般國民知識，改「平均地權」爲「平均人權」，在湘、鄂發展甚爲廣泛（二七），亦另一例。今中部總會活動範圍在長江流域，自以能收容此輩，俾能擴大力量，方爲得計；但宋氏了解社會主義及平均地權之意義，對「平均人權」不倫不類之語句，顯又不能同意；然而正式予以否認，觸怒大眾，增加離心力，不僅無此必要且爲時勢所不許。因之，避免提及此一問題，乃爲自然可循之最佳途徑。抑當時清廷已進行預備立憲，梁啟超等君主立憲派聯合各省諮議局代表組織之大政黨——憲友會正積極展開活動（二八）；今章程中以建設民主的立憲政體爲主義，要爲針對國內政情，先其所急藉資號召。

③雖然，中部總會固有可謂獨樹一幟者。蓋按之同盟會總章第十七條「各支部皆須遵守本部總章，其自定規則須經本部議事部決議，總理批准，方得施行。」第十八條「各支部皆設部長一人，由總理指任。」中部總會章程於此規定，殆均未曾顧及，此顯然係受東京本會名存實散之影響，而東京本會內訌之教訓，要已給予宋、譚一極深刻之印象。故宋氏草擬章程時，特別制訂暫不推選會長總理，由總務幹事管理全會事務，此與黃興主持之香港統籌部「純慕文明參議體制」者，可謂大同小異。廣州「三二九」一役之敗，此種組織之未能適應，亦爲重大原因（二九）；中部總會組織時，不因噎廢食，且於宣言中強調「機關制取合議，救偏僻，防專制」也。是其更張，蓋所以懲前毖後，非故意標新立異。

④宣言中既歷舉輕舉妄動拋棄生命之弊，復鄭重提示：「舉義必由總部召集，各分會提議，不得懷抱野心，輕於發難。」此尤爲革命行動之大轉捩點，蓋自廣州「三二九」之役失敗後，各地同志悲傷之餘，大多灰心短氣，更有憂憤致死者（如趙聲）（二〇），或投海自殺者（如楊篤生）（二一）；而由集體行動轉向個人暗殺之策略，更爲重要幹部所主張，黃興且因此與各方斷絕往來立志孤行躬自狙擊以爲死友復仇（二二），即平素反對暗殺之胡漢民亦作一百八十度之轉向，附從黃議（二三）。且東京本會名存實散，南部支會專注力於南洋，中原各地志士久已躍躍欲試而不免群龍無首。一般情勢如此，若非中部總會及時組成，前途演變，寧堪設想？

方中部總會之醞釀成立也，川、湘、鄂、粵四省紳民反對清廷鐵道國有政策之風潮已日趨擴大。中部總會成立之日，清廷正下令嚴拿懲辦爭路川人，民心因之益趨憤激，宋、譚乃把握時機積極進行設立湘、鄂、川、陝、皖各省分會，復精心擘畫舉義方策，以湖北居中國之中宜首倡義；然武昌爲四戰之地，糧餉不濟；故一俟湖北舉事，即令湘、蜀同志響應，以解上游之困，而爲鄂中後援；又以京漢鐵路爲南北交通孔道，清軍易於輸運，故宋氏計劃不欲以武漢爲戰爭區域，以防牽動租界而啓外人之干涉，因擬於武昌既舉之後即派兵駐守武勝關，使清兵不得南下，以保武漢之安寧；並令秦、晉繼起出兵斷京漢路以分敵勢。而又懼湖北一動，下流阻塞，將使運輸不利也，故擬於長江下流同時於南京舉事，並即封閉長江口，使清海軍艦隊孤立，而乘利因便以取之（二四）。

戰略最高指導原則既定，宋氏當以之函商黃興，當得覆函贊同謂「能力爭武漢，老謀深算，雖諸葛復生，不能易也。光復之基，即肇於此，何慶如之。」（二五）是英雄所見正同也。

其時宋氏更深刻認識中國革命之國際意義，故關於政略之運用，尤殫精竭慮，務求不予外人以任何藉口，而是時葡萄牙革命成功之教訓，尤予宋以極大啓示，爲求溝通思想，是年九月二十五日，宋氏特於民立報發表「葡國改革之大成功」社論以喚起同志之注意，其言有曰：

「吾人於是而得大革命之教訓三焉：①革命不得外國之承認，則其目的不得完成。②革命進行時不可不預計對外關係，而出以使外國樂於承認之手段。③革命成功後不必慮及對外關係之困難，而恐其不承認。」

「革命事業其目的既在舉一國之政治從根本上改弦而更張，其手段又不能不用強力破壞舊有之秩序，以爲新建設地步，故當其進行時與之有密切關係之各國，其所受政治上經濟上之影響既重且大，則不能袖手含默者亦意中事。然正惟與各國之關係密切，則各國無不以維持現狀使不甚變動爲得計者，當是時革命國所當執之手段亦當以務使現狀不致大變動而容易恢復爲主旨。約而言之有三：①革命之時宜神速而短（不可久事戰爭）。②革命之地宜集中而狹（宜於中央）。③革命之力宜借舊政府之所恃者（用政府軍隊）使爲己用，而收事半功倍之效。此三者蓋革命成功之原則也，不識足爲有志革命者所宜取法乎？」（二六）

此文立論，於其後半月武昌首義後即成爲宋氏堅持之主張，且力求實行者，故吾人於此宜特加注意。而其所謂利用舊政府軍隊之說，則當時早已積極進行。唯一切活動經費均苦無所出，不得已由譚、宋向旅滬日本商人貸借之（二七）。然運動軍隊、組織幹部、運輸軍火至各地在在需時，且爲策準備周全，故原計一九一三年始行大舉（二八），不意四川爭路風潮演成流血慘劇，局勢益趨緊張，宋氏遂擬把握時機提前行動，乃決定長江上下游及秦、晉迅速整備，即於十、十一月間起義。十月初，宋已訂期西上親往湖北主持，詎行旌未動，漢口機關破露，武昌新軍不得不提前舉義矣（二九）。

二 長江上下游的奔走聯絡

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首義之迅速成功，若干論者頗有意外之感，甚或以爲純出偶然因素者。然以今論之則是種觀感，實未能把握歷史真相，蓋如本書第一、二章所指陳，湖北爲最早興辦有系統新式學堂之地，又爲派遣東西洋游學留學文武青年最多之省區。一九〇三年春、夏，「大湖南北同盟會」之出現，漢聲釋義中所表現之偉抱；一九〇四年六月科學補習所之成立，胡瑛、張難先之投身軍旅聯絡士卒；凡此種種在在說明鄂渚、江漢間革命思想與行動淵源之深遠，故能於同盟會中形成砥柱。一九〇六年二月，日知會正式開始革命活動（三〇），不幸未屆期年，即被清吏查

封。一九〇八年七月革命同志因重結新社，名曰軍隊同盟會，計劃武漢起義，同年十二月改組爲群治學社，是爲湖北新軍革命有具體組織之集團，士氣民心均因此頗受鼓舞，曾擬訂一九一〇年四月發難，嗣因運輸炸藥事洩，計劃頓挫（三三）。一九一〇年九月，群治學社改組爲振武學社，廣續進行，聯絡標營同志，制定標營隊各代表負責公約規程，部勒嚴整，進行益猛。一九一一年一月以「振武」二字引人注意，又改組爲文學社（三四）。蓋此輩知識份子獻身革命事業，投筆從戎，不以蒼頭爲恥，甚或累年不遷，亦安之若素，遇有風潮，則易名再入他營，極少數以從軍爲終南捷徑借黨勢謀飛騰者，所以無營不有知識份子，多冷靜沈默，不輕舉妄動，官廳遂未注意，士兵亦以彼輩可親，等於手足，於是數年之間，革命團體雖有更易，溯其源流則自科學補習所以迄文學社，實一系相承，始終以軍隊爲中心工作，故能於不知不覺中將清廷之軍隊盡變爲革命黨之實力（三五），造成軍人即黨人。故其力量集中而堅強，與他省之以黨人爲主軍隊爲從者固大不相同也。

一九〇九年四月，共進會亦在兩湖積極展開活動，由焦達峯、孫武分別主持（三六）。孫武復與群治學社深相結納，學社社員亦有加入共進會者，於是兩者之間發生密切關係，一九一〇年共進會會長劉公與居正等自東京回鄂密圖武漢起義（三七），聲勢更大。一九一一年二月，譚人鳳銜香港統籌部命至武漢聯絡佈置，工作推進益亟。而文學社、共進會聯合統一問題遂爲兩方識者共同感觸。逮廣州「三二九」舉義不成，四川爭路風潮先後發生，湖北黨人悲憤激昂之餘，益感團結奮

鬪即在武漢起義之必要。八月，兩方舉行聯合會議，決定兩團體統一指揮，公推文學社社長蔣翊武爲湖北革命軍總指揮，孫武爲參謀長。九月二十四日復舉行聯合會邀集軍中代表決定起義計劃（三六）。從此一切活動俱本中部總會事權統一責任分擔之主旨，同心協力，奮勉進行（三七）。意志統一，力量集中，多年之埋頭努力，至武漢起義遂水到渠成。

方湖北黨人之躍躍欲試也，曾於九月十六日推派居正等赴上海報告並催請黃興、宋教仁、譚人鳳等迅速蒞漢主持（三八）。時同盟會中部總會亦早已獲得消息，譚人鳳原擬立即西上聯絡，祇以忽染病症於九月二十一日入醫院，而黃興自香港來電又促其南下同往雲南，蓋黃「回念蜀同志死事之烈，已灰之心復燃」，自信於雲南運動較他處爲有把握，且能速發，於川蜀亦有犄角之勢也（三九）。因之，上海黨人大計未定。九月二十五日，居正到滬，詳細報告湖北近況後，中部總會當決議接受此一計劃，並定南京上海同時發動，派人赴香港催促黃興速來。宋、譚並即摒擋一切準備西行，不意胡瑛在鄂獄密派一岑姓學生至滬訪宋，痛哭流涕極言湖北不能發難。宋與胡久共患難，深佩其毅力，由是對居正報告疑信參半，武漢之行亦頗猶豫而欲留待黃興矣。惟譚確信湖北事亟，因於十月三日，總務會議中復促宋速往，宋當允於六日後登程，及臨期又以于右任不在滬，民立報乏人主持，無法啓行（四〇）。譚憤極乃帶藥餌出院，於十月七日總務會議席上宣稱翌日即往湘、鄂，惟「此行專爲維持團體信用起見，資望才能，皆不及宋，仍乞宋君速裝繼來」，宋當允即繼往（四一）。

於此有應特予指陳者，即此一會議記錄述譚氏語句如此，而緊接於後之另一案由有云：「川亂漸平，湖南、南京皆不可靠，自應只以調和按住爲主，但按住果須至何時，須至何程度而後可？乞公決。議決：視程度爲時機。」（四三）前後綜合以觀，中部總會於長江起義時機未臻成熟，頗主慎重之意固見乎簡端。居正所謂：「滬上諸君於吾鄂同志多年運動之情形與犧牲精神，或猶有所未悉也」（四三），蓋爲實錄。

十月八日，譚人鳳離滬到南京，約各同志告以湖北情形囑響應後，十二日，復與居正同輪赴漢，翌日舟過九江，而武漢起義成功，黎元洪任都督之消息已喧囂耳鼓（四三）。

武漢情勢既已展開，宋氏不及趕赴事機，引爲終生大憾，其後，譚人鳳且因此歸罪之（四四）。然在當時宋氏固在滬努力補罪，一面以文字將革命軍之立場喚起國內外之注意（四五），一面積極策進南京等地響應之工作，以免武漢陷於孤立。十月十五日民立報刊出宋氏手撰「湖北形勢地理說」社論，反覆申言：「今日之形勢，以天下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東南言之，則重在金陵。」蓋可謂宋氏當時努力重點之所在。十月二十四日，黃興自香港到達上海（四六），宋當勸黃即往南京，掌握新軍第九鎮，以徇略江南地；蓋此軍原爲趙聲部下，多屬革命份子，當時統領徐紹楨亦默與南京城內黨員有交通也；但黃不聽其議，且挽宋同行赴漢，中部總會遂議決推黃督師武漢，柏文蔚等經營南京（四七）。

十月二十八日，宋、黃同輪行抵武漢，日友北一輝旋亦趕到，黎元洪以次軍民熱烈歡迎之。然宋實地觀察後，旋急函上海陳其美等謂：「此間戰事吃緊，亟望各處響應；」「以爲牽制北兵之計，否則僅恃鄂兵，與彼硬戰，恐難支也。」（四）蓋其着眼遠大，故念念不忘也。

黃興到達後，即蒞漢口前線督戰，不意清軍竟縱火焚燒漢口市街，致使革命軍無法固守，而亟盼湘軍速來增援。因之，居正、田桐等乃邀約有關人士舉行秘密會議，提議公推黃氏爲湖北湖南大都督，同盟會會員多附和之。惟軍界吳兆麟則力言此議萬不可發表，以免與黎接近之人發生疑慮頓啓內爭，且恐清軍乘機挑撥煽惑，痛切其言，亦頗中肯，但有以江西亦曾更換都督者，兩方遂啓辯論。宋氏急起聲明：「既有利害衝突，即作罷論。」（五）蓋宋初蒞鄂垣，考量大局，即力主先行組織中央臨時軍政府，以爭取交戰團之合法地位，且軍政府之組織步驟，早經同盟會革命方略載明，廣州「三二九」之役以前，宋又曾在香港參酌實況增訂，今既得二省中心，正可付諸施行，秉革命黨之新精神與決心組織中央臨時軍政府，黎元洪以一軍官當然唯有服從，且可因此振作民心士氣也。惟黃興不以爲然，必欲立一戰之功而後爲之（五），遂以擱置。今制度未立，先議人事，宜有反感。情勢如此，宋乃不得不暫置平素主張以適應環境調停其間。

十一月三日，黎元洪築壇拜黃興爲戰時總司令，所有各省來援軍隊均歸節制調遣（五），實則「此時湘鄂之見已萌而號令不能統一矣」（五）。

當清軍之占領漢口也，其遠程大炮且威脅及武昌，彈丸震動都督府之玻璃窗，宋氏覩狀，因決計立即東下圖謀南京之響應。彼嘗語北一輝曰：「所以至此者一如往例，乃黃興不聽余之故。此處已有老譚，無重複再來二人之必要，我欲策率南京新軍奪江南諸省以制天下，黃不聽而拉余於此，終至我黨措於黎之支配下。昨日南京迎余者代表來，我欲設法據彼處，不拘黃之成敗，得南京則漢口亦易恢復。」其心意如此，十一月十日晚，留書致漢陽前線之黃興後，即偕北一輝於驟雨暗佈大江兩軍炮彈交落之水烟中冒險渡江至漢口，適日輪大利丸行將解纜東下，因即附乘焉（五三）。

但良機一失，不可再來，南京已非宋未溯江西上前之景況，第九鎮舉義未成，大受駐防統領張勳之壓迫，多被繳械逐居城外。大利丸駛近南京，宋等一行小立船頭，目睹下關一帶黃龍旗幟飄揚，清軍異常戒嚴，南京派來代表倪鐵僧正震驚機會之失去，大感入城舉事之困難。然宋氏仍鎮靜微笑握北一輝之手曰：「不如一同入城！入城後或可想出他途。」此斷然之一語，大有雖千萬人我欲赴之氣概。北一輝深為感動，遂隨宋氏登岸，冒險乘車入城至南京日本領事館，始悉所有革命機關均被破獲，青年學生軍人遭殺戮者逾千人，腥風滿城，殺氣衝天，實已無從措手，宋等一行只得仍乘輪東下鎮江（五四），於十六日到達（五五）。

其時，幸陳其美等早已光復上海，旋復調滬軍一部與蘇、浙、鎮各軍合組聯軍，推徐紹楨爲

總司令會攻南京，及宋氏到鎮江，聯軍已漸次雲集，惟部將互不相下，宋在鎮江疏通各軍後，即赴滬計議臨時政府事。蓋彼素諳革命破壞後之建設尤爲最亟也（五〇）。

十一月二十七日漢陽被清軍攻陷，武昌亦告動搖。幸十二月二日南京光復，大局乃告穩定。三日晚，宋及于右任等趕到南京，調和徐紹楨及林述慶等意見，並與各部將會商援鄂、北伐及建設臨時政府諸事宜，支持程德全出任江蘇都督、林述慶任北伐軍總司令、徐紹楨任援鄂軍總司令，一切問題均告解決。宋氏乃以手擬之鄂州臨時約法草案交程，使其據以組府。及議推舉都督府各司長時，宋主張軍隊會議，嗣各軍司令申言不欲干涉政治，程因堅請宋任政務司長，宋再三以組織中央臨時政府辭，而徐紹楨等以恐動搖軍心合詞堅請。宋不得已，遂允之。然未展鴻猷，上海發生大元帥選舉問題，宋又離寧赴滬趕往處理（五一）。

三 臨時政府之組織

「革命不得外國之承認則其目的不得完成」（五二），「其被承認之時會大約有三：反亂者已得一定之土地，已建設一定之政治機構，戰爭方法合於一般文明國所行習慣」（五三）；此武昌起義前後，宋氏在民立報所撰之時論也。唯其認識如此，故宋氏與黃興蒞鄂，協助都督府外交部長胡瑛辦理交涉之餘（五四），更努力臨時政府之組織，以求早日達成國際承認之條件。草訂鄂州臨時約

法(六二)，蓋可謂樹初步之基礎。嗣因不願受制於黎系，毅然離鄂東下，圖謀南京，亦所以企劃中央臨時政府之早日組織成立。

當宋氏於役武昌時，十一月九日，即由黎元洪通電各省請派全權委員赴鄂會商組織臨時政府，翌日又再電催(六三)。以戰事關係對外電報遲誤，致十一日蘇、浙、滬三都督請各省公舉代表於上海設立臨時會議機關之通電，反較黎電早獲反應。十五日，各省都督府代表在上海開始集會，初議會所設於上海，嗣因鄂代表到滬堅請赴鄂，大會因決議各省代表即日啓程，惟每省留一人在滬爲通訊機關(六四)。蓋武漢爲首義之地，各國代表又願以湖北軍政府擔負交涉全權(六五)，其地位益趨重要，上海則全國經濟交通及輿論之中心，亦不得不兼籌並顧也。各省代表到達武漢，漢陽已告不守，武昌處於炮火威脅下，代表會雖仍按黎元洪原訂日期集議，然地點則不得不假漢口英租界舉行，各代表心情自亦不同，故開會不過二日，即匆匆通過並公佈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二十一條，並議決如袁世凱反正當公舉爲臨時大總統。逮南京光復之訊西傳，代表會旋即決議以南京爲臨時政府所在地，訂期在南京選舉大總統(六六)。

先是，當代表會未集滬濱，程德全即曾通電請中山先生回國主持組織臨時政府，嗣因事機急迫，未能久待，仍主黎暫攝行(六七)。漢陽失陷，南京苦戰時，浙督湯壽潛亦「深恐臨時政府越急切越有變更，中國將無幸焉」(六八)。逮南京光復，陳其美、宋教仁以武昌尚在危急中，赴鄂代表

未必能達成組織政府目的，而此一中心機構之組織又已不能再事拖延。因即於十二月四日邀集留滬代表集會，公議暫定南京爲臨時政府所在地點，公舉黃興爲假定大元帥，黎元洪爲假定副元帥兼鄂軍都督，俟赴鄂代表返滬，同到南京再行正式發表（六）。但章炳麟對於此一決定，即席表示抗議，在鄂代表聞訊更表示決不承認。黎元洪且於八日通電「請設法聲明取銷，以免淆亂耳目」（七），遂使此一問題趨於複雜。

其時，民立報一再著論以外交危機，呼籲迅速建設臨時政府（七），滬、甯各地代表集會南京後，因時勢之要求，對於上述決議亦勉予承認矣。然蘇、浙軍人則仍擁黎拒黃。十二月十七日，各省代表會因有將大元帥、副元帥倒置之決議，並公決以黃副元帥駐南京代行黎大元帥職權。一時想望政府成立之情狀，蓋有如大旱之望雲霓者。而黃興則始終堅辭不就（七）。於是各方流矢誹語轉集於宋氏。

蓋自漢口會議通過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郵傳到滬，民立報同人即以其內容殊不完備，因於發刊時請宋氏特加按語謂此係草案，他日臨時政府成立時，當以公意修訂之。不意此語一出，反對之聲大起。適章炳麟又在神州日報宣言：「臨時政府首領當稱元帥不當稱大總統，」「下江浮議，有欲待孫（中山）君歸國，始正名號者，此無異兒童之見，」「今日但應由首領委任內閣總理，」「至於建置內閣，僕則首推宋君教仁。」（七）其所立論，與各方主張或成議均不相同，又

頗挾舊日意氣，加以大元帥選舉問題，宋爲幕後策動之主要人（七三），其用心在擁黃以制黎，挽回革命領導權，不得黎系與舊諮議局系人物之歡固意中事，乃其後又不得不遷就之，於是復不見諒於同盟黨人。因之，一時誤會愈多，至疑其平日主張爲意屬個人之私者，遂使其精銳之眼光敏活之手腕均無所用（七四）；武漢倡義以後兩月有半，迄無一中心機構領導全國，要非宋始料所及。

當武漢起義之時，中山先生正在美國開始作募捐旅行，聞訊後深感外交爲當時亟務，因前往英、法訪問其朝野，說明革命軍之立場（七五）。途次巴黎曾電國內冀求早定國基，勿斤斤於權勢利祿之爭（七六）。十二月二十一日抵香港，廣東都督胡漢民等前往迎接，報告國內政情，以選舉黃興事爲例，說明命令正未易行，元首且同虛器，何如留粵？努力整理，鼓行而前，始有勝算。然中山先生則以鄂既稍萌歧趨，寧復有內部紛糾，以之委敵，形勢益失；因決心立即北上主持一切（七七）。而馬君武亦於民立報發表「記孫文之最近運動及其人之價值」專文，以喚起輿論，且斥「挾小嫌宿怨以肆其誣謗者」（七八），則針對章炳麟之宣言而發也。

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山先生安抵上海，各方歡迎極盛，黃興、陳其美尤朝夕不離左右，久懸不決之大元帥、副元帥及組織政府問題亦從此迎刃而解，而張繼隨孫歸來，調和孫、宋歧見，尤具決定性之影響（七九）。故二十六日黃興、陳其美與宋即一致同意舉孫爲大總統。惟宋始終堅持內閣制，中山先生力持不可，黃亦勸宋取消提議，宋不爲所動。翌日，黃、宋同往南京召集各省代

表會，黃提議政府組織取總統制，宋猶持前議，經熱烈討論後，總統制卒獲多數通過（八〇）。至二十九日大總統選舉會時，譚人鳳以湖南省代表出席大會，又倡總統宜舉黎元洪之說。蓋因黎既冒首義功，自應俾其過渡而後可移湖北地位於黨人也。然開票結果十七票中孫文得十六票，黃興得其一，無有及黎者。足見當時全場多數代表之心理固仍尊重同盟會之正統也（八一）。

前已言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公布之初，宋氏即曾議其缺點，今政府既採美國之總統制，而又無美制之副總統，當時又適有符合副總統資格之人而無其位置。又如行政部僅限以五，亦恐組織之不相當，而惴憂大局，於是修改組織大綱之議起。宋氏以湖南省代表，持之尤力，二十八日且曾宴集各省代表，發表修改主張，歷二時之久，其言娓娓動人，然應之者寡。洎二十九日中山先生當選大總統，訂期就職，亦感組織大綱必須修改，特派黃興至南京向代表會陳說，宋教仁、居正因即時提出修正業，經多數通過，其修改重點即增設臨時副總統及臨時大總統得自由制定官制官規，無須經參議院同意。

其時宋謀爲內閣總理之風說仍盛，臨時大總統既得自由制定官制官規，即隨時可以命令設總理，宋亦即隨時可得總理之席位。因之世人多誤會宋之主張修改，亦罔不自爲之地。由是各省代表大半集矢於宋之身，幾百口而莫解。民國元年一月二日蘇、浙、皖、閩、桂五省代表馬君武因復提出再修正案，經激烈爭辯後，卒將日前之修正案推翻（八二）。惟以私人之嫉妒攻訐個人之態度

以打擊責任內閣制之出現，當時代表會之極不健全心理，固不能逃史家之評論也（八三）。

抑宋氏於臨時政府組織之初，更主張須全用革命黨，不用舊官僚。孫大總統則採納黃興意，在當時情勢下，新舊交替，而代表會又堅決反對宋長內務部，計不如總長取名，次長取實，當得各方同意實行，宋則經孫大總統任命爲法制局局長，俾克展佈所長（八四）。

總之，自武昌首義以迄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耗時約八十日，艱難締造，如此不易，然而極不幸者，此一組織維持竟不過九十日，即爲袁世凱巧取豪奪以去，是誠大可惜事。個中原因安在？要爲值得探討之問題，四十年來，局中人及旁觀者於此多有論及，茲錄譚人鳳之言以見一般焉，譚氏綜其原因厥有下列四端（八五）：

①在組織政府時，孫武運動陸軍次長一職，黃興采居正、李書城言未之與（八六），孫武懷挾意見，挽劉成禺、張伯烈、時功玖等充議員，事事立異，即經多數通過者亦藉傀儡之黎元洪爲奧援，出而反對，以致抵款借款兩不能成（八七），巧婦難爲無米炊，是其最大關鍵（八八）。

②同盟會革命方略本定軍政時期三年（八九），宋教仁以主持軍政者非其人，主張由各省選派代表急謀臨時政府之組織，亦未嘗非偉畫蓋籌，然前之爲選舉機關隨時解散者，而乃留作參議院，予以干涉軍事計劃之大權，則所謂築室謀也，安有成功之冀望（九〇）。

③行政各部遷就官僚，稍有時望者觀望徘徊不就，而一二急功近利之輩則又隨勢力以定趨

向，無擁護南京政府之決心（九二）。

④汪精衛、胡漢民，中山先生之張良、陳平也；汪在北京既與袁克定商約調停，許推袁世凱爲大總統，又附和胡漢民、馬君武之意見推中山先生出山何爲？既推選矣，則應極力夾輔，求達最終之目的，乃聞宣統帝退位之詔下達，汪急欲踐前言，胡亦極力勸孫辭職（九三），狐狸狡猾，此又何怪朝秦暮楚之各議員？是尤孫先生始料所不及也。

譚氏此論，可謂翔實而公平，指責同盟會會員忽視革命方略，尤屬鞭撻入裏，實則當時黨人多誤解自由之涵義，舊日官僚乘機倡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之謬論，章炳麟等群起和之（九三），對於南京政府法令多所非議，如改陽曆用民國紀元一事，民立報且公開著論反對（九三）。黨人內部意志既不一致，步驟紊亂，黎元洪復乘隙進一步倡「共和國立，革命軍消」（九四），以休養生息致力建設爲言，尤聳人聽聞，迫使南京政府不能堅定立場，惟有投入袁世凱故設之圈套。

四 袁世凱陰謀與宋之對策

自袁世凱督練新軍（九五），清廷命脈即逐漸入其掌握。狼抗朝列，虎步京師，有識之士早已心憂。一九〇七秋，湖北按察使梁鼎芬上疏劾袁權勢傾人，恐不免步曹操、劉裕後塵（九六）；慈禧未納直言，且傳旨申飭梁「不諒任事之艱苦」（九七），殆勢成騎虎不得不爾也。一九〇八年冬，溥儀即

位，攝政王當國，厲行集權政策，袁被放逐歸田里（九八）。表面聲威稍斂，潛在勢力仍存，北京、彰德間電訊聯絡頻繁（九九），尤足反映其在軍政上之重要影響與關係。而其後不過三年，梁氏之言竟獲事實證明，袁果以機變狡詐之術巧取清室政權，遺毒且及於民國，中山先生謂袁「不特爲民國之蠹，實爲清帝之仇」（一〇〇），尤篤論也。

溯武漢起義警報傳出，清廷初命陸軍大臣蔭昌督師赴鄂「剿辦」，嗣又起復袁世凱爲湖廣總督，且特派楊度及袁子克定前往彰德密商勸駕。旋京師袁系報紙刊出袁之戡亂政策重在安撫，且主早開國會即弛黨禁。從此「付袁全權」、「和平解決」之論述遂日見於北京報紙，且傳播於滬津等地（一一）。蓋袁之兩面策略，握軍政權以制清廷，藉和平安撫以懈革命軍戰志，自是顯露端倪。

上海報紙於袁復出消息，初頗寄以希望（一二），自「講和」傳說甚囂塵上，申報即以爲「袁氏此次之弄巧成拙，實陷中國於以後永無平安之日。」（一三）民立報更連續發表「議和駁謬」、「和平解決之殷鑑」社論，引述法國革命之前轍與清廷之反覆，慷慨陳詞：「和平解決之終了，即野蠻專制之發端；」一「是以如有主張和議者，即爲黃帝之罪人。」（一四）其後，袁之兩面策略跡象顯明，申報又著論揭穿「袁之逐滿，藉此以推廣一人之權利，一人之富貴，於中國何與哉？」更大聲疾呼反對和議：「慎勿墮袁賊彀中而留第二次革命之種子！」（一五）南中輿論激昂

如此，袁則熟視無覩。

蓋袁固一代梟雄，迷信武力，喜弄權術，寧負天下人而不畏清議。爲時不過一月，即輕易將清廷軍政大權完全掌握（二〇六），同時假藉「和平解決」之政治手段以轉移清祚之陰謀亦進行益亟。

綜合今日所得見史料觀之，袁假藉「講和」之手段以推行其陰謀之途徑共計有六，或同時並進，或前後相因，或此仆彼起，蓋不惜運用洋洋巨觀之手法以欺天下人。

袁首先采取之第一途徑，即特派黎元洪之故舊鄉人劉承恩、蔡廷幹往武昌遊說，勸黎適可而止。其首次致書黎在十一月五日，爲黎所拒。八日又再致書。十一日，劉、蔡到武昌，黎當揭穿袁之陰謀，劉、蔡兩人廢然而返。

於此有應指出者，不論中外記載，均謂此一初次會談即涉及選袁爲總統問題，惟究竟何方首先主動提出，則疑莫能明（二〇七）。

在劉、蔡活動之同時，袁所采取之第二途徑，亦在積極進行，其目的在說服北京皇室與資政院，負責此一途徑者，則楊度與新自刑部獄釋放之汪兆銘。十一月十五日，袁內閣正式組織，同日，此一活動亦正式表面化，楊、汪合組之國事共濟會宣告成立，發表意見書，且陳請資政院具奏請旨；即日停戰，舉行臨時國民會議協議政體，清廷及南軍均應服從其決議（二〇八）。蓋「是否

必爲君主」，「雖伊（尹）、呂（尙）復生，不敢自信」也（二〇九）。

袁、楊關係素極密切，十月中旬以來，楊又常往來京、彰道上，故楊直可謂袁之代言人。今其主張如此，實即反映袁本人及其左右解決時局真正意向之所在（二一〇）。十一月二十日，資政院集會，正式討論如何處理此一陳情書案，范源濂等首表贊成國民會議之主張，然多數意見則着重資政院是否有討論此一重大問題之權限，並有人以爲應先請袁內閣總理大臣正式到院說明究竟主剿、主撫之真正意向者。熱烈爭辯之餘，幾致動武。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兩次集會，雙方辯論益激，紛亂情形亦更加甚，其後資政院即因人數不足未再集會（二一一）。同時民立報亦發表社論直斥爲「無聊之共濟會」，謂今當革命將告成功之際，「中國爲君主爲民主，尙欲開議解決耶？」（二一二）南北兩方並力夾攻，袁、楊初計，自不獲逞。面對此一情勢，共濟會唯有宣告解散（二一三）。所謂「項城必欲出諸衆人之口，而衆人皆不肯開口」（二一四），蓋其構想動機及其挫敗原因均足以盡之矣。

資政院紛紛攘攘，未能爲袁所用。但順直諮議局、直隸保安會則早於十一月廿五日致電清攝政王請「朝廷能早行揖讓」。十二月三日又進一步忠告，「朝廷自行謙遜，宣布共和，最足示大公於天下」（二一五）。而在袁世凱入京之初，直隸官紳且密議迎袁至天津獨立，袁曾允之，嗣以計非萬全，不即行（二一六）。

邦畿內輦轂下竟出現此種言行，寧不令人驚詫？實則自清廷假立憲之名，行集權之實，各省

諮議局即大感不滿。順直諮議局態度尤見激昂，請願早開國會反對皇族內閣，同時並聯絡各省諮議局采一致行動。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負舉國清望，各省代表多要求張至北京主持領導。一九一一年六月張北上途經彰德時特走訪袁世凱作竟夕談（二七）。據張自述其印象：謂袁「議論視二十八年前大進，遠在碌碌諸公之上。」（二八）與張同行之劉厚生則謂，此「一夕之談竟發生極大效用，並已決定清廷之命運。」（二九）然則順直諮議局之言行與袁之意旨要爲有計劃之唱和，張謇殆即此一合唱團之實際指導者。而張在江南聲譽尤高，影響更大，南北溝通，責在一人；謂此爲袁「講和」陰謀之第三途徑且爲最重要之途徑，當爲符合歷史真相者。

其時，忽有一人焉，又自動爲袁之講和陰謀開闢第四途徑，此即同盟會會員又與袁克定有舊之朱芾煌。彼聞武昌起義，即自東京回國，冒險北上，往來彰德、北京、天津間，三上書於袁世凱，兼說其子克定。克定介紹之於唐紹儀、梁士詒。朱許袁以總統之位，一面暗結刺客謀炸清皇族，以去阻力；刺客之一即朱舊日中國公學之同學也（三〇）。克定欲得書爲信，朱復返武昌，途經漢口爲馮國璋所執。幸袁克定函電交馳，朱得生還（三一）。而「袁世凱如反正當公舉爲臨時大總統」，即於十二月二日正式見之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漢口會議之紀錄（三二）。

於此應特予指出者，漢口會議此一決議案究係何方主動，今無文獻足徵。惟按之上文陳述，則舉袁之說由來甚早，且此一觀念幾似多方面所同感。黎、劉初次會談於此殆無重大影響，朱芾煌

之南北奔走當具促進之力量；而漢口會議中之江蘇代表雷奮，則曾於是年六月勸張謇同往彰德見袁世凱者（二三）；武昌起義後，張首即體認袁才能大有可爲，派人前往聯絡（三四）。然則謂此議乃張授意雷提出，要屬合理；會議中原屬諮議局系之代表，於張意素所尊重，自無異議；其餘屬革命黨者於此不表反對，朱芾煌溝通思想之外，漢陽失陷，殆尤具重要影響。

蓋袁雖多方推行「講和」之陰謀，江南各地輿論則表反對，武昌態度亦極堅定：故劉承恩初次遊說不成，漢口各國領事倡議「和平了結」，黎仍拒絕，馮國璋亦以「事已至此，萬無和理」（三五）而。英國商人爲本身利益則亟盼早日停戰，英國公使數次見袁復力促之（三六）。基於此種情勢，稍殺革命軍之氣燄，乃爲一切途徑之大前提，十一月二十七日漢陽失陷，大局遂急轉直下。

十一月二十九日，漢口英國領事正式調停兩軍停戰三日（三七），黎元洪以「漢陽一變，武昌戒嚴，南京之役，尙無確訊」；爲爭取喘息時間遂允照辦（三八）。逮十二月二日南京光復，革命軍氣燄復盛，袁世凱更急欲促成和平會議（三九），要求兩軍繼續停戰，同時「講和」陰謀之第五途徑亦即正式公開之途徑遂形展開。此即特派唐紹儀爲代表南下議和是也（四〇）。

十二月五日，袁氏決定遣唐南下，同日，國事共濟會宣佈解散之宣言亦見於北京袁系報紙：「共濟會之所主張，已歸無效，惟天下傷心人共鑒之。」（四一）一似心灰氣沮者，實則唐紹儀仍

挾國民會議解決政體之方案南下。楊度、汪兆銘之活動，不僅未趨消極反轉積極：彼等利用與黃興過去之友誼，函電往返未嘗稍間。十二月九日，黃興覆電汪轉告楊：「中華民國大統領一位，斷舉項城（袁）無疑；」「惟項城舉事宜速，且須令中國為完全民國，不得令孤兒寡婦尙擁虛位，萬一遷延不決，恐全國人皆有恨項城之心。」（三三）蓋革命軍對袁又第二次開示「總統」支票矣。汪、楊旋與唐紹儀先後到達上海，十二月二十日，和會舉行時，唐且言及楊度曾將此電轉陳袁氏，「袁氏謂此事我不能為，應讓黃興為之。是袁氏亦贊成，不過不能出口耳」。故「今所議者，非反對共和宗旨，但求和平達到之辦法而已」（三三）。

唐氏此言實已道出此一「和會」之真相，而其轉述袁言，似謙讓未遑者；實則此不過袁之欺世飾詞。蓋即在同一日同一地（上海）另一舉袁為總統之秘密談判又正在積極進行。

緣袁氏父子早經體認最後問題之解決，必須北洋軍隊完全瞭解其意旨，甘心作其驅除清帝之工具。因之，十二月二日，廖少游、靳雲鵬兩人即開始展開一說服軍隊之運動（三四）。此可謂袁「講和」陰謀之第六途徑。據廖少游記述：袁克定、段祺瑞始終與聞其事，楊度、朱芾煌亦與接觸，惟馮國璋不以為然（三五）。至其着手初步則在取得革命軍必舉袁為總統之確證，而此一工作於十二月二十日達成目的，即持以示段祺瑞（三六）。廖、靳旋即決定三種辦法：①運動親貴由內廷降旨自行宣佈共和。②由各軍隊聯名要求宣布共和。③用武力脅迫要求宣布共和（三七）。初按

第一項辦法進行，而宗社黨頑強，致書袁世凱願與同歸漸滅，且將不利於廖、靳，並有借外兵抵抗之說。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四日遂決行第二策，段祺瑞領銜復單銜通電請清帝迅即退位：「謹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剖陳利害」（二六）。同時宗社黨主角良弼又被炸死。於是局勢一瀉千里，清帝宣告遜位（二七）。

綜合上述，可見當時所謂南北和議之真相。宋教仁自黎、劉初次會談，即始終與聞其事，且贊助其成。國際干涉之危機、財政之艱窘、軍火之匱乏、人心之厭亂，要爲宋氏及各方贊成和平之主要原因；其中葡萄牙革命成功之教訓，亦具影響力量（二八）。至袁懷抱陰謀，別有用心，革命黨人固所熟知，惟均以爲如能因其野心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餘年君主專制之滿清，則善於用兵十萬；縱袁欲繼滿清以爲惡，而其基礎已遠不如，覆之自易。故兩害權其輕，寧願藉袁之力而成一段落（二九）。宋教仁且以爲用責任內閣制足以防袁任大總統之流弊（三〇）。因之，清帝遜位公告之翌日，中山先生即履行諾言向參議院推薦袁爲臨時大總統，當獲參議院一致同意。蓋袁用心推展之各種途徑至是匯合而水到渠成，其巧取豪奪之手段，較之曹操、劉裕固大有過之。

袁世凱之計謀，革命黨人之苦心既如上述，故當中山先生之舉袁以自代也，同時即附有三重要條件：①臨時政府設於南京。②新舉大總統親到南京就職。③新總統必須遵守臨時政府約法，頒布法律章程，均須經參議院通過。蓋均所以預防並約束袁之擅權與專權。

先是，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落落數條，論者早多不滿。民國元年二月，中山先生即決定重新制訂臨時約法，宋教仁任法制局局長原有起草之責任，但當時嫉妬其才能者對法制局之地位職權故作訾議，故宋堅請參議院自行組織起草委員會提出審議（二四）。

雖然，同盟會重要幹部於此根本大法之原則，固曾經詳細討論者。宋之意見主張頗與衆人不同，如中央地方之建制，宋與胡漢民即爭辯頗烈。宋主中央集權，胡主地方分權，宋謂：「起義以來，各省紛紛獨立，而中央等於綴旒，不力矯其弊，將成分裂；且必中央有大權，而國力乃可以復振，日本倒幕，是我前師。」胡謂：「中國地大，而交通不便，滿清末造，惟思以集權中央，挽其頹勢，致當時有中央有權而無責，地方有責而無權之譏，而清亦暴亡，則內重外輕，非必皆得。且中國變君主爲共和，不能以日本爲比。美以十三州聯邦，共和既定，即無反覆。法爲集權，而黠者乘之，再三篡奪。我宜何去何從？況中國革命之破壞，未及於首都，持權者腦中惟有千百年專制之歷史，苟其野心無所防制，則共和立被推翻，何望富強？」宋謂：「君不過懷疑於袁氏耳。改總統制爲內閣制，則總統政治上之權力至微，雖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範，無須以各省監制之。」胡謂：「內閣制純恃國會，中國國會本身基礎，猶甚薄弱，一日受壓迫，將無由抵抗，恐蹈俄國一九〇五年後國會之覆轍；國會且然，何有內閣？今革命之勢力在各省，而專制之餘毒，積於中央。此進則彼退，其勢力消長，即爲專制與共和之倚伏，倘更自爲削弱，噬臍之

悔，後將無及。」宋終不謂然（二四）。

抑不特此也，建都地點問題，宋之意見與孫、胡尤多歧異，緣宋嘗親履東北，深識其戰略略之價值，曉然日、俄窺伺之亟，且俄人嗾使外蒙「獨立」陰謀正積極展開；爲策國防外交，金陵定都恐難措置裕如，故宋反對之，此與章炳麟之一貫主張相同（二五），與北方各省代表意志尤相吻合（二六）。且宋當時已隱然爲同盟會右派之領袖，時論多歸之。二月十四日，參議院遂有臨時政府設北京之決議。中山先生及胡漢民、黃興均不以爲然。孫依法交覆議，黃則頗責同盟會會員於此不應有異議：「吾將以憲兵入院，縛所有同盟會員去。」（二七）雙方之情緒於此可見。翌日，參議院覆議決定政府仍設南京，然章炳麟及各地反對之聲響徹全國（二八）。

二月十八日，中山先生特派蔡元培爲歡迎專使，宋教仁、汪兆銘等爲歡迎員偕唐紹儀北上迎袁至南京就職。其時袁早已電黎元洪表示不能南下（二九）。然於蔡等北上仍熱烈歡迎。二十六日蔡等到京，二十九日北京發生兵變，情勢異常緊急，袁因請宋先行南旋報告一切。三月九日，宋回抵上海（三〇），而其前三日，南京參議院已議決允袁在北京就職矣。

雖然，南京同仁對於宋氏此行固多不諒解，蓋宋氏主張既如上述，當袁在北京通電就職後，同盟會幹部又僉主黃興統兵北上，仍以迎袁爲名，乘便掃蕩北洋軍閥及專制餘毒。會議時，蔡元培持重不語，宋則以爲不可。蓋統兵北上，非同兒戲。革命軍前鋒僅及徐州，直、魯各要地均有

北洋重兵駐守，對革命軍之北上，豈肯輕易放行，必致引起戰爭！宋語未畢，馬君武即大聲叱宋爲袁作說客，出賣南京政府，且以掌擊宋面，幸孫、黃制止之（二五）。

宋、馬意見參商由來已久，不必置論，惟馬因北京兵變後局勢之變化而歸咎宋氏，則可反映當時南京政府內若干人之心理。故欲究其是非，首當明北京兵變之真相。

自來論北京兵變者大多以爲袁氏所主使（二五），甚至有指明此乃用楊度計者（二五）。然以今論之則均不免挾意氣成見之譏。以天下衆惡皆歸之袁，固非歷史真相也。

論者以爲袁氏不願遠離北洋老巢，故用此苦肉計。自表面觀之，此論似言之成理。然稍一深思，則破綻甚多。蓋若如此推理，袁既留戀老巢，則更加鞏固之，比較曠使兵變以破壞之，要爲得計，且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經一九〇〇年拳亂及八國聯軍大破壞，瘡痍滿目元氣迄未恢復，黃台之瓜豈堪再摘？抑袁在民間之信仰，即由於一九〇〇年拳亂時能獨肩維持治安之責任。南北和議之成功，民間對此種信賴心理尤爲重要因素。英國之促成和議亦因體認袁強有力可以控制局勢不致發生擾亂，是則無論對內對外，袁及袁之謀臣於此均不應忽視或違背，若謂小試其技可資藉口即適可而止，則未免視袁若神能放能收；而不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兵猶火也，能輕試乎？

再就當時大局論，袁所急需者爲安定而非動亂。蓋日本正乘機策動國際干涉，並有將中國分而治之之陰謀（二五）。清帝遜位之翌日，袁即據以自稱「全權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首領」，將

清廷原有之各部大臣均暫留辦事，改名各部首領；照會外使，所有中外交涉，遵守條約繼續辦理（二五）。其企望避免任何國際干涉口實之心理更可想見。且一九〇一年北京議定書具在，若謂在京、津喉使兵變，而不致引起國際干涉，乃不可想像者。事實上，兵變後日軍即有行動，袁對日本言行注意最切，於此豈能毫不顧慮？

抑袁素喜玩弄權術，清帝遜位，是其傑作。參議院一致選舉爲大總統，南北各方群頌之若華盛頓，人心歸趨如此，袁氏豈有不加把握迎合之理？至若南京定都之議，參議院雖經覆議，而反對之聲，瀰漫全國，南中且尤甚於北地。黎元洪、章炳麟與上海各報（包括申報、民立報）主張尤具影響力量，針對此種情勢運用政治分化策略，以求達到北都目的，實輕而易舉，比較安全，固不必借重此一玩火自焚之「兵變」手段也。

然則，北京兵變果何爲而發生者？

溯自一九〇一年以後滿清練兵目的，僅在鞏固朝廷威權，防禦人民反抗，對於下級軍官與士兵之精神教育與紀律，從未加以注意，一般社會對軍人地位亦素不尊崇。逮同盟會采運動軍隊策略，君主立憲派亦有策動清軍實行奪取北京政權之計謀（二六）。武昌起義後，煽動軍人之言論且公開見諸北京報紙（二七），對於官兵之心理之影響，不言可喻。而在另一方面則南北威恃軍隊以貫徹其主義，但令效命不事苛求，縱有非行，不加譴責，更有視搶掠爲戰勝酬功之具者。其後袁

段更賴軍人之力巧取政權，遂釀成尾大不掉之患。袁既膺選，軍人自恃功高，滿望得賞，而日久所期難遂（二五）。

抑北洋軍隊自火焚漢口，深受中外輿論之指責，更不免心存疑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廖少游與黃興代表簽訂草約，其中特別著明：「南北滿漢軍出力將士各享其應得之優待，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似有所保證矣。然南中公私團體仍時復以文電挑發抵抗民軍者之罪狀，北軍疑懼終不釋。金陵既堅持袁須南下，歡迎專使又已到達北京，復有解散北軍謠傳，失望與疑懼心理匯合，再加裁兵裁餉之導火線，遂致鋌而走險。況京師坐鎮之都，非究武之地，屯重兵於京而不之戢，雖欲無變可得乎（二六）。

綜上所述，可知兵變乃隨時可發生之意中事。且袁亦早知此輩已不可信賴，故兵變以後立即成立備補軍（二六）。因之當時論者以爲事前不爲之所，又疏於防範，事後不懲禍首，復失於寬縱，恩多威少，袁氏之咎實無可辭（二七），謂爲主使則不盡符事實。

雖然，袁無嗾使兵變以求達到政治上目的之必要與可能，惟此一兵變適以達成其政治上之目的則爲事實。各方反對建都南京之聲原未稍間，今有此兵變，輿論更激昂：如三月五日申報發表之評論即以爲「袁總統尚可南來受任耶？」「臨時政府尚可建設南京耶？」翌日，參議院允袁在北京就職。八日，申報復發表評論嚴詞責備南京臨時政府：「乃以一念虛僞，強執南京爲建都地

點，致臨時政府之組織濡滯兼旬，迄未成立。」「要而言之，新政府之種種失機皆此一念之虛僞誤之也。」由是以觀，北京兵變使輿論因此轉向有利於袁較之袁達成北都之目的，關係民國前途固更重要多多。此則極值得注意者。

兵變以後，亡羊補牢，首在安定民心軍心，而迅速建立有力統一政府尤爲急務，宋教仁在北京時一美國人即曾剴切言之（二六），而日本黑龍會人士於和議告成前後兩次派人訪宋教仁竭力阻止，且追蹤宋至北京遊說（二七），其不欲中國統一，以便日本政府推行分而治之陰謀極爲顯明。宋教仁因此益感迅速促成統一建國之必要，反對內閣率兵北上，正所以避免北地疑忌，引起其他變故（二八），黃興卒從其議，尤可稱焉（二九）。

三月十一日，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正式公佈。十三日，袁任唐紹儀爲國務總理。十六日，參議院通過國務員名單，宋任農林總長。四月二日，參議院決議臨時政府移設北京。

第四章 附註

（一）如胡適即其一例，見四十自述第四七頁。

（二）張忠絃中華、民國外交史第九—十一頁。

（三）日本外交年表上卷第一七八—一八〇頁。

(四)總理全書之十函札上冊第二四四頁。鄒魯廣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第十六頁。

(五)譚人鳳牌詞。

(六)譚人鳳牌詞。

(七)譚人鳳牌詞。宋撰我之歷史及其他文字未有載述與胡不洽事。胡漢民自傳(革命文獻第三冊)第一六、一九、二〇頁記載提議改二十世紀之支那爲民報及留學生風潮發生時兩人主張之水火，要均宋、胡不洽之起因，而孫、胡密切，孫、宋有歧見，或更增兩方之不愉快。

(八)廣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第四〇頁，宋漁父第一集前編「傳略」第三頁。此役經過及失敗原因見黃克強先生書翰墨跡第五七—七五及八八—九五頁。

(九)牌詞。居覺生先生全集上冊「梅川譜偈」第四三、四四頁。下冊四七三頁「辛亥劄記」。

(一〇)章裕昆文學社武昌首義紀實第二三、二四頁言：「三二九」以後，清吏防範益嚴，幸各營由於劉復基之聯絡，精神愈奮，團結愈堅，力量日見充實。

(二)宋漁父第一集前編「傳略」第三、四頁。

(三)曾傑乙戌集(萱野長知：中華民國革命秘笈第九八一—一〇一頁即完全據此書翻譯)第一四二頁載：

「『三二九』以後，譚人鳳意志亦頗動搖。曾反詰其故，譚無詞以對，同至上海訪宋教仁，又偕宋訪陳其美，將南京各同志之勇敢堅決情形報告在滬各同志，而後返自廣州各同志始恢復元氣，越三日，

中部同盟會成立。」

(三)革命文獻叢刊第七期二、三頁。支那革命外史第六四—六七頁、又中譯本第三四—三八頁。中部總會之組織創議於一九一〇年秋，正式組織則在一九一一年「三二九」之役以後，其成立宣言言之甚詳，他書亦多可證。惟何仲簫陳英士（其美）先生紀念全集（線裝本）卷一第五頁，同卷第七頁邵元冲撰陳英士先生革命小史（上海民智書局單行本第五頁亦同），又何仲簫陳英士先生年譜（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第十五頁，均將中部總會組成繫於一九一〇年，實均錯誤。斯則有關史實極大，不能不特予指出糾正。

(四)中部總會宣言見鄒魯黨史稿第一二五、一二六頁。總理全書之六「宣言」第一三四頁。革命文獻叢刊第二頁。總務會暫行章程及分會章程亦見叢刊第二、三頁，臺北新刊「開國文徵」有其墨跡影片。

(五)中部總會章程乃宋教仁親手屬草，影印照片見「開國文徵」第一卷（民國五十二年，臺北）。

(六)總理全書「函札」上册第二二七、二四一頁。

(七)革命逸史第二輯第一四五、二八一頁。

(八)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册第三三五、三三六頁，宋當時在民立報發表「希望立憲者其失望矣」，「近日各政黨之政綱評」均針對此而發，故總會章程中以「民主的立憲政體」爲言，固含積極進取以與君憲派對抗之深意也。

(一九)黃克強先生書翰墨跡第八二—九四頁。

(二〇)胡漢民自傳第四〇頁。革命逸史未見記載趙聲專題。姜泣群朝野新談第三編采趙事蹟最多，並錄有其遺文。

(二一)武昌革命真史上冊第三六六—三七四頁。民立報一九一一年八月十八日有于右任弔楊篤生文，其中引錄楊書信甚多，又革命逸史第二輯第一二七頁有楊事略。

(二二)黃克強先生書翰墨跡第七七—八三頁。總理全書函札上冊第二七九、二八〇頁。

(二三)胡漢民自傳第四〇—四一頁。

(二四)宋漁父第一集前編「傳略」第四、五頁。

(二五)黃克強先生書翰墨跡第七七頁。

(二六)民立報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第二頁。

(二七)黨史會藏譚人鳳函札手稿簿。民國六年一月十五日致段祺瑞。

(二八)牌詞。

(二九)宋漁父第一集前編「傳略」第五頁。

(三〇)日知會正式成立時日，張難先說較勝於馮自由說，此從張之湖北革命知之錄第八一頁，居覺生先生全集下冊第四七九頁同張說。

(三)湖北革命知之錄第一四五—一五〇頁。

(三)同上書第一五二—一五八頁。民國元年十一月八日民立報刊載「武漢革命團體文學社之歷史」爲文學社事實有系統公開之第一次。

(三)湖北革命知之錄第二三四、二三八頁。

(四)同上書第一七九、一九〇頁，一九〇五年冬，留日學生反對取締規則風潮發生時，宋教仁爲學生聯合會外交長，孫武爲糾察長。

(五)劉公爲共進會第三屆會長。湖北革命知之錄第二三四—二三八頁。

(六)胡祖舜武昌開國寶錄。據宋漁父第一集前編「傳略」第四頁「中部總機關既立，先生（宋）精心擘畫，於長江流域遍立分會，準備大舉。譚人鳳赴鄂令居正使湖北共進會與文學社聯合成立湖北分會」，是策動主力來自中部總會也。

(七)湖北革命知之錄第一五九頁。

(六)同上書第二三八頁。

(三)譚人鳳牌詞。黃克強先生書翰墨跡第七八、七九頁。

(四)牌詞。居覺生先生全集下冊第四九八頁。

(四)革命文獻叢刊第七期第三頁刊有中部總會總務會會議錄未記明時日，今據牌詞與紀錄內容考定爲辛

亥八月十六日即一九一一年十月七日之紀錄。

(三)居覺生全集下冊第四九九頁。

(四)牌詞。居覺生全集第五一〇頁。黎元洪被擁爲都督事，總理全書之七「演講」下第六八七頁謂：「黎元洪見事急，匿屋中床下，黨人搜查得之，以其協統也，規之以兵，使權都督篆。」胡漢民自傳第廿五節亦有云：「黎初以革命黨脅迫而出，謂之床下都督，畫諾而已。」即黎當時致薩鎮冰書，亦有匿於內室語宜若可信。惟章炳麟太炎文錄續編卷五上第二、三頁「大總統黎公碑」則曰：「推公爲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大都督……議定三月矣。陰爲文告署檢，稱大都督黎，未以告也。」鄂人亦多沿此說。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第八五—八七頁曾詳載之，並引居正語：「秘密推都督時，『亦有議及黎元洪者』」（居覺生全集第五〇四、五〇五頁），實則「議及」與「議定」乃完全不同之兩事。綜合諸書考證：「議及」容或有之，「議定」則絕無其事。蓋若加章炳麟說，則居正等何必兼程赴滬催促黃、宋西上主持？章氏之語殆不免挾好惡成見故意頌揚，實不足據。

(四)支那革命外史第七五頁又中譯本四二頁。譚人鳳牌詞。譚以黎之取得與鞏固其地位，「皆宋鈍初（教仁）之遷延有以致之也。不然當時內地同志對於海外來者實有一種迷信心理，安有黎元洪？無黎元洪又安有此數年來之慘劇？吾昔日因袁世凱目黃、宋爲英雄，曾有言曰：克強雄而不英，鈍初英而不雄，蓋有慨而言之也。」惟支那革命外史則以宋遷延固有之，然譚到武昌，距起義不過三日，

黎尙猶豫，可輕易取代之。而譚以禪讓之舊道德並未如此，尤負重大責任，旁觀人語，要有可采。

(四)民立報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四日「交戰時之中立論」，十五、十六日「湖北形勢地理說」，十七日「上海市面無意識之恐慌」，十九日「敬告日本人」，二十一日「最後之勝負如何」，十一月一日「荊州滿人慘殺漢人感言」，反覆說明革命之立場：非昔日之草澤英雄，非廣州之事所可比擬，日本不可乘機干涉中國內政。

(五)宋漁父第一集前編「傳略」第五頁。

(六)鄒魯黨史稿第九二四、九二五頁。

(七)革命文獻叢刊第七期第三頁。

(八)武昌革命真史中冊第二一一、二一二頁。

(九)支那革命外史第八七頁。中譯本第四八頁。

(十)居覺生全集下冊第五一八、五一九頁。

(十一)總理全書之二「孫文學說」第八章第一八七、一八八頁。胡漢民自傳第五二頁稱：當時「克強電余云：『鄂軍怯，湘軍驕，敗無疑也。』而鄂人則謂克強有所輕重於其間，漢陽陷，克強主棄武昌不守，賴他同志挾持黎民氏，不得聽克強，繼以議和聲起，北軍亦不更進，武昌幸無恙，鄂人乃以爲讒詬克強之口實。」可爲孫言註釋。梁譜三五二頁。

(三)支那革命外史第九一頁。又中譯本第五〇頁。

(四)同上書第九二、九三頁。又中譯本第五一、五二頁。

(五)林述慶江左用兵記(江蘇革命博物館月刊第十一期第四〇頁)。居覺生全集下冊第五二六頁。申報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要聞欄。

(六)宋漁父第一集後編「遺事」第一二頁。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第二三六頁。

(七)同上書及江左用兵記(江蘇博物館月刊第十四期第九二—九四頁)。鄂州約法及官制草案見民國報第三號。湖北革命知之錄第二八五頁僅載有鄂州約法。

(八)見(三六)。

(九)見(四四)。

(一〇)宋漁父第一集前編「傳略」第五頁。

(一一)湖北革命知之錄第二八五頁，宋漁父「傳略」第六頁。

(一二)武昌革命真史中冊第二六二頁，此議殆宋所策動者。

(一三)中華民國開國史第三三、三四、三五頁。

(一四)黎副總統政書卷一第十一頁。

(一五)開國史第三五、四〇頁。

(六)黎副總統政書卷一第九頁。

(七)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第一六五頁。

(八)黎副總統政書卷一。

(九)章炳麟自定年譜宣統三年條。居覺生先生全集上冊第四五頁、下冊第五二七頁。開國史第四八頁。黎副總統政書卷一。

(十)例如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民立報載陳少白「今日之外交觀」，即痛切言危機即在目前。

(十一)開國史第四八、四九頁。

(十二)宋漁父第一集後篇「遺事」第八頁。是月神州日報今未見。惟民國報第二號第一、二頁載有章太炎

(炳麟)宣言。據章炳麟自定年譜：宣統三年條有云：「遜初(宋)自武昌來，道克強任漢陽總司令，得湖南援可守，時南方獨有江甯未下，規模粗定，諸省皆推武昌爲中央，遜初自許當爲執政，屬余作人物品評，余念同志中惟遜初略讀政書，粗有謀略……時輩既無過遜初者，因爲宣布。」是章太炎宣言固宋德惠者，宋自許爲執政，並推黃爲大總統或大元帥，其意在由革命黨掌握政權，如中央政府成，黎不過一地方長官，唯有聽命，不致太阿倒置矣。

(十三)中華民國開國史第四九頁，又辛亥革命第五冊第三九六頁載北平故宮收藏宣統三年十月十一日（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一日）宋教仁等通電一件，文曰：

「各省諮議局公鑒：漢陽昨失，餉械均先時移置武昌，民軍現仍力守。各省代表早經多數赴鄂，鄂垣軍務正緊，急難開議，現由留滬代表電請折回。組織臨時政府之議，決不因漢陽之失而阻，目下大局安危，不在一時一地之勝負，實在統一機關之成否。同人在滬公行準備，各代表一到便當開會，一切進行，共矢不懈。南京垂下，大勢並不動搖，仍望諸公力持，傑（？）漢陽失敗之因，據內部人來滬報告：乃由於事權軍令之不一，得此懲愆，足使我民軍自知病痛所在，恒受砭擦（？），尚乞諸公有所鑒戒。臨時政府行將成立，過此以往軍事之部署，政權之作用，有待於我全國國民之用命，以求得其最可寶貴之真自由者無窮也。附布心腹，伏乞鑒察。留滬代表宋教仁、林長民、居正、吳景濂等公叩。」

宋當時信心決心之堅定，活躍簡端。以全力促使中央臨時政府剋日成立，俾對內足以號召，對外方可適合國際承認之條件，原為當時時勢所迫切需要，固無個人權利慾存乎其間也。又支那革命外史第一〇三頁（中譯本第五八頁）謂：宋當時深刻認識舊組織舊統一破壞後，新組成之統一與中心機關，其首腦必須同一意識情操共鳴而又為全國普遍認識心意相通之人物。基此，黃興自為適當之人選，惟陽夏之失敗頗予世人不良印象，宋亦體認此或有人將謂不合理者，但較之在鄂代表之擬選袁世凱者又不可同日語。宋本人當仁不讓，自信必可展經世長才撥亂反正，宋曾因此說服江浙各軍主將，不意反對之聲竟首出於章炳麟！要非始料所及。

(五)宋漁父第一集後篇「遺事」第八頁。我之歷史第一冊篇首，蔡元培序有曰：「清季言革命者首推同盟會，會旨雖有建立民國平均地權諸義，而會員大率以驅除韃虜爲惟一目的，其抱有建設之計劃者居少，若抱此計劃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若宋漁父先生其最著者也。」蓋數千年君主專制之高压，士大夫習於逆來順受，而一般社會又多鄉愿，且重謙讓，流弊所及，一時難以改變糾正，故時人對宋以建國大任自許，嫉視譏刺多於支持贊助也。中山先生所謂：「當時黨人知識太低」（孫文學說），固亦爲重要原因。

(五)總理全書「孫文學說」第一八九—一九三頁。

(六)總理全書之九「文電」第六頁。

(七)胡漢民自傳第五三、四五頁。

(八)民立報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第一頁。

(九)支那革命外史第一〇九、一一〇頁（中譯本第二六頁）。

(一〇)居覺生全集下冊第五二九、五三〇頁，胡漢民自傳第五六頁。

(一一)譚人鳳牌詞。居覺生全集下冊第五三〇頁。民國報第四號「紀事」第六頁。

(一二)中華民國開國史第五一—五四頁。

(一三)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第三二三頁。

(八四) 民立報民國元年一月十六日第二頁。居覺生全集下冊五二八、五二九頁。臨時政府公報第三號(民國元年一月三十一日) 法制局局長宋教仁呈擬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草案五十五條。我之歷史篇首蔡元培序：「民國官制，先生(宋)所擬定也。」

(八五) 牌詞。

(八六) 居覺生全集下冊第五三一、五三三頁。章炳麟自定年譜民國元年條：「初克強在漢陽，視武昌諸將蔑如也。及漢陽敗，克強走上海，武昌諸將甚恨之，然未嘗怨孫公也。孫公初返國，不曉情偽。湖北參議員劉成禺、時功久皆同盟會舊人，說孫公宜寵異武昌諸將，勿令怨望，克強與湯化龍尼之。孫堯卿(武)至南京不用……兩府之怨自此起矣。」張溥泉先生全集第三〇頁評論辛亥革命失敗原因：①共患難易，同安樂難。②小事未注意而誤大事，未予孫武任陸軍次長，武漢與南京臨時政府發生意見，竟致黎元洪被袁世凱拉攏，武漢大部份同志，另組民社，使革命蒙受重大影響，可證譚人鳳之言。

(八七) 申報民國元年三月一日載：二月二十七日參議院開議，財長陳錦濤向華俄道勝銀行借款一百五十萬鎊之合同，議長林森以十四人到場開會，八人贊成，即作為通過。二十八日，議員時功玖、劉成禺、張伯烈以力爭不獲，議長當場呵斥，乃電黎及鄂議會請辭。同日民社本部亦通電鄂、蘇參議員辭職，又彈劾司法次長呂志伊，謂其對劉成禺發言違背國憲之不法，原咨云：「即令有之，亦不過出

言偶爾失慎，斷不能指爲違背國憲」云。可想見當時一般情形，證實譚人鳳言之翔實（申報三月二日刊有劉等辭職全文）。

（八）南京臨時政府財政困難情形，財政總長陳錦濤「交代部務並瀝陳困難情形」文中言之甚詳。有云：「乃華俄借約大啓紛爭。指擔保爲抵押，敗事機於垂成，餉竭兵囂，幾釀巨變，追原禍始，厥咎誰尸？」（天鐸報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一日）。胡漢民自傳第二頁。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第一七三—七七頁。均可證實譚言。

（九）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第三二四、三二五頁論忽視革命方略之過失極詳，可詳看（英譯本第二五七、二五八頁。）

（九〇）支那革命外史第一二〇—一二二頁。中譯本六六頁。胡漢民自傳五八、五九頁。

（九一）胡漢民自傳五八—六〇頁。

（九二）胡漢民自傳第六一頁云：當和議時「精衛極力斡旋於伍廷芳、唐紹儀之間，而余則力挽先生（中山）之意於內。余與精衛二人，可云功之首，而又罪之魁，然其內容事實，有迫使不得不爾者，則非局外人所能喻矣。」「當時民衆心理，俱祝福於和議，逆之而行，乃至不易，夫以有熱烈傾向於革命之群衆，而不能使爲堅強擁護革命之群衆，此其責當由革命黨負之，而亦爲當日失敗之重要原因也。」可證譚言。

「孫中山選集」載中山先生於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致蘇俄外交部信（原文爲英文，一九五〇年譯爲俄文公開發表，又自俄文轉譯中文）。有云：「我當時被選爲總統，在我就職後不久，我便辭職，讓位於袁世凱，因爲我所完全信賴的一些朋友們，在當時比我對中國內部關係有更確切的知識，他們以袁世凱得外國列強信任，能統一全國和確保民國的鞏固來說服我。現在我的朋友們都承認我的辭職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按此文不見於總理全書。

（九三）總理全書之七「演講」下冊第六九頁。章炳麟對南京政府改曆定官頗有指責，大中華雜誌第二卷第十二期（民國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文苑欄有民國元年章致孫中山書可參證。民立報民國元年一月七日「改元抗議」，「曆法不能統一之痛言」：「我軍之興即以黃帝紀元，行之且久，則今日斷無改元之事」，「今國民既多不承認新曆，則改曆一事仍宜暫行取消」，可謂當頭一棒。

（九四）黎副總統政書卷六第八、九頁。

（九五）袁練新軍情形，文公直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記述甚詳。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 1895—1912 by Ralph Powell 綜合中西資料彙述，亦可讀。

（九六）上海神州日報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同時香港中國日報亦刊有此文。

（九七）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卷五八〇第五頁。

（九八）大清宣統政紀卷四第二四頁。

(九)丁士源梅楞章京筆記。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四號有袁簑衣垂釣圖，似漁樵足樂，不再聞問政治者，實則其潛在活動正積極也。

(一〇〇)總理全書「文電」第五九、六〇頁。

(一〇一)北京正宗愛國報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七日至十一月三日。申報十月二十八日。

(一〇二)申報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評論：「吾聞袁督近日固周旋於黨人之列，而高尚其志不事王侯焉。」

(一〇三)申報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評論「袁世凱之前途」。

(一〇四)民立報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日、十一月六日。

(一〇五)申報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九日社論：「袁世凱之逐滿策」，十二月四日第四版「清談」。

(一〇六)民立報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日、十一月六日。

(一〇七)申報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九日社論：「袁世凱之逐滿策」，十二月四日第四版「清談」。

(一〇八)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四日清廷任袁為湖廣總督，同月二十七日清廷召蔭昌還，任袁為欽差大臣節制調遣海陸軍，十一月一日，任袁為內閣總理大臣，十九日，資政院公舉袁為內閣總理大臣。

(一〇九)袁首次致黎書時日，據民國報第三號紀事第一頁。又正宗愛國報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一日載：袁遣段芝貴(後護理湖廣總督者)持手書赴漢口與革命黨交涉，謂「如為政治上之革命則無論有若何之要求

必爲奏請」。殆即與民國報所記載之十一月五日（辛亥九月十五日）袁致書黎爲同一事。愛國報記發信日，後者記到漢致書日也。

至初次會談即涉及舉袁爲總統事，民國報第三號「紀事」第一頁及中華民國軍第二集第二章第三頁均載其事，文義相同，民國報作此「紀事」者署名劍農，即李劍農教授，著有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諸書。且李在辛亥革命前後曾參與實際政治，所記當可信。

民國報及中華民國軍於總統問題，均記作黎元洪語：「予爲項城計，即今返旆北征，克復冀汴，將來大功告成，總統當推首選。」（郭孝成中國革命紀事本末第三編第三頁同）惟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山東濟南印行之齊魯公報第三頁譯叢欄（原註：譯自東京日日新聞）載黎與劉蔡會談情形，則與此不同。有云：「兩軍使（劉、蔡）：『君不吝推戴袁爲大統領，袁自投身南軍，不費躊躇。』」宋教仁以嘲笑語之曰：『大統領由人民輿望所歸，公選而後定之，我輩難豫爲定明……若袁以軍隊略河南直隸，爲革命軍盡其死力，以其輿望，齊來都督之地位。彼原爲現代之大政治家，故能進而建立新共和國，大統領之榮職不爭而自歸其掌握。』」是劉主動提議，答語又出於宋口。民國報劍農作「紀事」未載同黎見劉蔡者之姓名，但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第二一四頁及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第三三〇頁均記明與黎同見劉者有宋教仁等。是齊魯公報等所載宋之語言，李固曾寓目也。惜此次會談未有正式官方紀錄公佈足資比證耳。又湯良禮中國革命秘史（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y Tang Liang-Li)第八四、八五頁謂：當時武漢會議在黎元洪主持下，經與汪精衛商量後，設袁能反正，願舉袁爲大總統，但袁回復以君主立憲爲原則云云。按湯良禮與汪關係密切，曾任其發言人，此一記事不知是否得自汪本人。惟考之史實時日，則當時汪尙滯留北京，並不在武漢，即往返電商，亦非時間形勢所許，故其記載不可信。

(二〇八)正宗愛國報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民立報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二〇九)正宗愛國報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三十日，楊度上資政院陳情書，請開國民會議，可謂袁系處理時局之主要途徑，關係重要，各書多未采輯，茲就愛國報所載彙錄於左：

「國事共濟會會員、君主立憲黨員、開缺學部副大臣楊度等爲請朝廷明降諭旨，實行停戰，速開臨時國民會議，議決君主民主問題，以救危亡而維大局，呈請代奏事。竊自武昌革命軍起，全國響應，朝廷號令不出都城，未獨立者僅直隸、河南二省耳。宗社之危，繫於一髮，若欲仍恃兵力以戡內亂，非特生民塗炭，財力困窮，且沿江、沿海遍豎白旗，亦復戰不勝戰，加其專爲戰守之計，何如別求解決之方？用是集合同志創成此會意在要求兩方停戰，速開臨時國民會議，而以君主民主一問題決定之國民公意。議者以爲會議必由多數取決，是否必爲君主，殊無把握。不知此時欲言完全把握，雖伊（尹）呂（尙）復生不敢自信。惟是會議既開之後，則外交內政利害得失，彼此可以互陳，以期歸於一是，比之目前狀況，君主立憲之言僅能言於都下，而各省概置不理者，實猶

彼善於此。即令決議改爲民主。然朝廷既肯以君主民主問題付之公決，則堯舜至公之心已爲海內所共敬，人民對於皇室其必優禮有加，而無絲毫危害之意，可以預決而知。和平解決之方，莫逾於此，擬請明降諭旨，實行停戰，一俟武昌革命軍承諾停戰之後，即將赴鄂軍隊撤回，以示永遠停止戰爭，不以兵力解決之誠意；並召集臨時國民會議，議決君主民主問題。若能將君主民主朝廷皆樂與觀成之意，昭示天下，咸使周知，尤足以生人民之感情，爲平和之保障。至於臨時國民會議之組織與其選舉方法，應由會中擬具草案，仍由兩方承諾，然後據以召集，未便由諭旨遽定辦法，致生窒礙，合併聲明。」

(二〇)據共和關鍵錄載南北代表會議問答速記錄：第二次會議錄（辛亥十一月初一日即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唐（紹儀）言：「自武昌起事之後，我曾擬一摺，請國民大會決定君主民主問題，服從多數之取決，清廷不允。現時我尚持此宗旨，蓋此辦法，對於袁氏非此法不行也。其軍隊必如此乃可解散，開國會之後，必爲民主，而又和平解決，使清廷易於下臺，袁氏易於轉移，軍隊易於收束。竊以和平解決之法，無逾於此也。」又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上冊第一〇〇頁有云：「盛（宣懷）因收路激變，群議譴起，有問先生（梁士詒）挽救之策，先生（梁）但搖首浩嘆，不作一語。及袁氏起用，使人密告先生（梁）曰：『南方軍事尙易結束，北京政治，頭緒紛如，正賴燕孫（梁）居中策劃一切，請與唐少川（紹儀）預爲佈置。』先乃着手爲政治運動。」是唐梁會商，而正式見之楊度

陳情書。故此一國民會議決定政體之主張，可謂爲袁系一致之見解。

(二二) 正宗愛國報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二十六日、二十九日、十二月十日。

(二三) 民立報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二四) 正宗愛國報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五日。

(二五)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冊第三頁。

(二六) 辛亥革命第八冊第一四三、一四四頁。

(二七) 辛壬春秋卷二十七第四頁。

(二八) 劉厚生張謇傳記第一七七、一七九頁。

(二九) 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第一四六頁年譜卷下第六七頁。

(三〇) 張謇傳記第一七九、一八二頁，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第一四六頁。

(三一) 胡適留學日記卷二第一二九、一三〇頁。

(三二) 同上書。辛壬春秋卷第二十七第十頁，新中國武裝解決和平記第四五、五九頁。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第三三〇頁（英譯本第二五九頁），根據日人記載誤書袁克定本人至漢陽，而不悉朱代袁奔走，克定本人固從未親自出面也。袁克定致馮國璋保釋朱芾煌手札原件現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可與其他有關史料相互證補，胡適博士曾應相湘請求，特撰一題跋，見中國現代史叢刊第

一冊（臺北正中版）。

（三三）中華民國開國史第三五頁。

（三三）同上書第三九頁。張謇傳記第一七九、一八〇頁。

（三四）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第一五〇頁。同書一五一頁致袁電謂：「甲日滿退，乙日擁公（袁），東南諸方一切通過，昨由中山、少川先後電達。」所指乃在漢口會議以後一月事，傳記於此繫時錯誤。

（三五）辛亥革命第八冊第一九三、一九四頁。

（三六）英國政府刊佈中國革命藍皮書第八五、八八、九三、九八、一〇〇號等文件。

（三七）辛亥革命第八冊第一九五頁。

（三八）黎副總統政書卷一第一六、一七頁。

（三九）英國藍皮書第九八號。

（四〇）辛亥革命第八冊第二〇〇頁。

（四一）正宗愛國報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五日。

（四二）黃興致汪轉楊電，當時各報均有記載，如申報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北京專電及同日民立報，黃電全文此兩報未載，今見革命文牘類編第五冊電報類第三、四頁。

（四三）辛亥革命第八冊第七七、七八頁。

(二五)新中國武裝解決和平記第八頁，此書未言此議何人發動，辛壬春秋卷二十七第五頁則謂靳雲鵬乃受段祺瑞之命，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上冊第一〇六頁云：「段祺瑞等贊成共和，四十七將領聯名奏請清帝遜位；按此與駐外公使之奏電，皆先生（梁士詒）所策劃也。」是段固仰承袁、梁意旨也。

(二六)馮國璋於袁段行動不表贊同，辛壬春秋卷二十七曾詳言之。張一鶚心太平室集卷四第十七頁：「故代理大總統馮公事狀」有云：「和平談判漸已就緒，段公率諸將要求退位，公（馮）以無位則帝號不存。位爲虛，政爲實，政可讓，位不可去，力爭累日。故禪讓詔書不言退位，而言遜政，然朝旨雖已允行，而滿蒙人心不能帖伏，訛言朋興，其主力實在禁軍，禁軍皆八旗子弟，其人率忠勇強力，訓練三年頗稱勁旅，遜政之詔遲久而不敢發，將待公之安撫而疏通也。……爭優待皇室條件，爭待遇滿、蒙、藏、回條件雖不能盡如所求，而裨益於清室者至鉅。至此乃宣布遜政，而公之心苦矣。」又臨時公報一九二二年二十日載：禁衛軍馮爵統國璋賀袁大總統函云：「願公愛國救民，早膺斯席，保衛皇室，統一中原，大局幸甚，本軍幸甚。」是馮對清室可謂盡其愚忠矣。

(二七)新中國武裝解決和平記第五〇頁，此書篇首刊有黃興手筆及廖少游與黃代表顧忠琛所簽同意書攝影。

(二八)新中國武裝解決和平記第五〇頁。

(二九)同上書第六三、六七頁，辛亥革命第一七一、一七二、一七三、一七四、一七八、一七九頁。

(三〇)和平記第七三、七四頁，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上冊第一〇六頁。

(二四〇)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第一五三頁載張與湯壽潛致電北軍將領有云：「和平解決，已可繼葡萄牙之功，統一維持，尙望作華盛頓之助」。按宋教仁早於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於民立報發表「葡國改革之大成功」一文，影響一般人心理至大。

(二四一)胡漢民自傳第五四頁。

(二四二)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冊第四四七、四四八、四七三、四七四頁。此書搜輯資料甚多，惟編者於中國人名別號常有錯誤，如其書第四〇一頁將「宋教仁」「宋鈍初」作兩人同時並書。章炳麟自定年譜宣統三年條：清遣唐紹儀來議和，精衛力讚袁氏，余適與清故兩廣總督西林岑春萱雲階遇。雲階言在清宜死社稷，在南宜北伐，無議和理；余頗是之；然政府不任變伐，假手袁世凱氏，勢自然也。故持論頗同精衛。」

(二四三)居覺先生全集下冊第五四八頁。

(二四四)胡漢民自傳第六四、六五頁。

(二四五)章炳麟素留心邊疆問題，一九九八年十月上海昌言報即載有章所撰「蒙古盛衰論」，章氏叢書檢論卷七第二〇—二二頁「相宅」編謂早在一九〇二年章與中山先生即曾在東京討論建都問題。

(二四六)中華民國開國史第八〇、八一頁。

(二四七)胡漢民自傳第三九頁。民立報一九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刊有劉揆一撰「組織中央政府意見書」有

云：「美國各州由分而合……法則以民主國體行中央集權政治……我中國自鄂省倡議以來各省乘時反正，凡百政治任意更張，使非採取法國制度以謀統一，恐各省政俗日趨歧異，轉有四分五裂之虞，況今日對外情勢尤利於合而不利於分……苟民國政府強而有力何患不能統一耶。」按劉宋均華與會舊侶，此一意見要可謂代表宋之意見，北一輝支那革命外史第一一九、一二〇頁（中譯本第六五、六六頁）亦曾論及此。

（二四）章炳麟有致南京參議院書載當時各報，見革命文牘類編第十冊，自定年譜與「相宅」亦曾及之，其他各省都督及人民反對建都南京文電，黎副總統政書卷六輯錄甚詳。居覺生全集下冊第五四四、五四六頁。

（二五）黎副總統政書卷六第二四—二八頁。

（二六）民立報民國元年三月八日，三月十日。

（二七）居覺生全集下冊第五四六、五四七頁。胡漢民自傳第六四、六五頁。民國四十八年四月二十日，王雲五先生面告筆者：宋馬衝突予其極深刻印象，王時任總統府秘書。

（二八）如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第二三九頁，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第三五一頁，英譯本二七〇頁，因之。

（二九）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第二六頁。

(二五)日本外交文書上冊第三五三—三五七、三六七—三七五頁。

(二五)臨時公報發刊於辛亥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即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1912—1928 by Franklin W. Houn P.216 提及此公報作 December 1911，誤，蓋就舊曆月份未換算西曆也。此為袁氏就任大總統後最重要資料，初稱「全權袁」，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日臨時公報改稱「新舉臨時大總統袁」，是期刊有「武衛左軍直隸提督姜桂題謹率同闔軍將領官佐兵士等公共承認袁大總統」。又張作霖電云：「頃由次帥傳知：大總統已公選全權，為天下之人賀。惟蒞寧一節，軍界不甚允協，仍以北京為妥，如必蒞寧，恐有他變，奉天軍界張作霖等叩。」可見當時北方軍人之態度。

(二六)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冊第三三九、三四〇頁記武昌事起後，梁進行方針有云：「用北軍倒政府，立開國會……數月來，惟務多布吾黨入禁衛軍……茲事之關鍵，則吾儕對於禁衛軍及第六鎮之心腹軍士，不能無所以結其歡心。」可見康梁活動亦在鼓動兵變。

(二七)武昌起義後，北京正宗愛國報「演說」欄（即今之社論欄）頗多煽動軍心文字。如：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賞罰」：「我們中國件件事無不壞在賞罰不明上……最苦不過的是前敵的兵士，每月幾塊錢，穿不暖，吃不飽，不豁出命去打仗亦是死，豁出命去打，打勝了，出力在前，列名在後。」

②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日「營制」：「常備補兵即或不折不扣，還比不上拉人力車，平日待兵毫無恩義，遇有戰爭，當兵的能不越想越傷心。」

③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北京市面之可慮」：「現在駐紮北京軍隊很多，各處人全有，從先各軍雖不免常起衝突，在太平時時候原不要緊，現在這個時候可不成，一有衝突，心裏全存着意見，彼此各不相下。」

④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當兵苦」：「最可憐不過的就是我們中國當兵的老哥兒，性命輕於鴻毛，操作如牛馬，享受同於乞丐。」

（二六）北京兵變始末記第四—六頁。

（二五）同上書第一元頁。申報民國元年二月二日三日刊載兵變電訊甚多，並發表「北京兵隊變亂感言」，首以暴動或在貪財好貨，次云：「況今日者，清帝倉卒退位，而北方各軍隊均聚集於北京，禁軍練軍，紛然雜糅。項城（袁）以一身鎮處其間，馮段各統將雖在在形格勢禁，以力泯其猜疑，然集各方面之軍隊而會合於一城，維持秩序之間要不無百密一疏之虞。加以宗社黨之蟠據禁城，歷有年所，今因五族共和之故，掘數百年之城狐社鼠，一旦摧陷而廓清之，此其中諒亦不無竄身軍隊以爲患於共和，據清帝爲孤注，奉代表爲衆的，幸袁項城之尚未南行，而貿然師法於博浪之一擊，以微倖其成功，觀亂兵當日不攻擊他處，惟注意南方各代表，登屋逃避，倖而獲免，此又當日暴動

之一因。」又陳布雷等主編之天鐸報（民國元年七月一、二日）專欄「川鄂大事綱目」第二四六，於此兵變有綜述，惟未提及袁指使說。故指使說始於何時何書尙待考。至外人對此兵變之反應，則遠東通信社叢錄第三編第三卷譯載外報外電甚詳，如路透社電稱：「此二日內事件，殆示列強以中國亂尙未已，萬無可以調停之理。」「自此兵變之後，中國情勢全改，南人本不喜袁，其舉之者，因其有北軍也，今北軍變，袁將失所恃矣。」民國二年二月十九日宋教仁在上海國民黨大會演講，認爲自兵變發生，外人以中國局勢未定，對借款條件轉增苛劇（宋漁父第一集前編），均可支持本文之論點。

（二六）北京兵變始末記第二五頁。馮玉祥我的生活第一本第十四章「正月十二日」即記親歷兵變事，第十章「左路備補軍」述其投軍經過。

（二六）北京兵變始末記第五六、一〇八、一〇九、一一一、一一二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毅軍函札」中段芝貴致姜桂題手函有關係兵變及善後者。如有云：「傳聞九標於今晚將與貴軍衝突，已知照曹統制預防矣，乞密查防範爲盼，此請宮保鄉長晚安，芝貴頓首初二。」又函云：「翰丈宮保大人鑒：頃奉大總統面諭以前門外東西車站處所須派員弁兵士在站梭巡，遇有鬧事之兵即可扭送執法處。」並云：「貴部下殷統領所統之兵聲譽極好，囑函請派往等語奉此，現擬請即飭知殷統領派兵六十名長官二員，分東車站官長一員兵三十名，西車站亦如之，務望速爲知照殷統領爲盼，至官

長兵丁每日飯食，由敝處酌給可也。大總統又云：由此處加文武官弁四員分站查察，並司報告等事實，恐有報告不確之處致有誤會也。一俟派定後再令其赴股統領處接洽。專此敬請夜安並候賜覆。鄉晚段芝貴頓首，三月五號。」

(二二)北京兵變始末記第三二頁書作美人阿爾阿爾，未附英文，原名待考。

(二三)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冊第四五一—四五七頁。

(二四)申報民國元年三月九日載：七日孫大總統提出議案：參議院及內閣全部遷北京時用重兵護送，以鞏固政府彈壓地方。北京兵變始末記第九七頁載趙秉鈞覆京師總董事會函有云：「調兵北來實係南來專使之議，唐（紹儀）君主之，鄙人甚不謂然，早間見總統（袁）之意見相同，必須竭力磋商，以不來爲度。」

(二五)黃留守書牘卷上第三八頁李書城致熊希齡電有云：「公謂克公于政治少所經驗：第一次主持建都南京而北方兵變，第二次主持國務員擁兵北上，而蘇州又兵變，……夫克公之政治經驗如何，鄙人不能盡知，至國務員帶衛兵北上，係當時唐總理在南京與衆擬之辭，最後乃由克公毅然取消，當時鄙人亦有所贊助。公所言適與相反。」錄之以見當時真相。

第五章 政黨政治之嘗試

一九一一年中國大革命，在世界歷史上之具有特別意義，不僅因其從此推翻世界最古老最悠久之君主專制，更重要者，中華民國之建國理想與制度，乃力求融會儒家人文主義傳統與歐美人文主義之國家觀念政治思想；民主政黨政治之推行，其最顯著而具體之表現也。

二千餘年來，孔聖之言行，中國人恒奉之爲立身處世之最高標準，例如論語所載：「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尤爲士人所注意，更被國君所利用，蓋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有所歸，故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自東漢黨錮以迄明季東林復社，歷代相傳，因果皆同。司馬光曰：「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慨乎其言，不足怪矣。而號稱通西學西政之洪仁玕於一八五九年上資政新編於洪秀全，開宗明義亦以防結盟聯

黨之弊爲言。是則黨之一字，固含不祥之意義，士大夫明哲保身趨吉避凶，所以力求遠之者也。

雖然，一八九五年第一次中日戰爭以後，維新變法之聲洋溢神州大陸，歐美各國政黨之觀念與制度，經時務報介紹（一），國內士子即有良好之反應，如一八九七年湖南生童課藝中即有論及中西「黨」見之不同與英國兩黨制者。其言有曰：

「方今邊患頻仍，痛深創鉅，正中國同志戮力舍舊求新之時。」

「爲持平之計，則英人公（求新黨）保（守舊黨）二黨，中國皆宜有之。特不必如英之互爲勝負耳，濟之以和衷，各泯其意見，新法之宜變者，保黨不得掣其肘，舊章之宜守者，公黨不得議其後，由是開民間學會之禁……諸學有會，分而爲衆小黨，合而爲一大黨，不黨之黨，黨而不黨，以培國脈，以持國運……是在當事者之師其長補其偏，而一新其氣象也。」（三）由是可見：①當時中國若干知識份子已有模倣英國兩黨制度之意向。②然而黨之不祥涵義以及中國儒家中庸大道之傳統，又使作此主張者不得不持調和中西之論。此一趨勢乃極值得注意者。蓋傳統影響之重大比較一八九八年十月（戊戌）政變更有過之。觀乎一九一一年清廷早已宣佈預備立憲，而其時正式公開出現之政黨特以「會」名（如憲友會、帝國憲政實進會），而避免采用黨字，可見一般。

名稱如此。至於國人對政黨之實質缺乏認識，宋教仁之批評（見第三章）更已反映無遺。

一九一一年大革命前夕，中國政黨之實際如是。明瞭此一背景，對於武昌起義以後，中華民國成立之初，國內政黨活動之成敗，可以知其梗概矣。

一 同盟會之團結與改造

武昌起義，各省響應，革命大勢已見分曉，同盟會會員劉揆一首倡「取消從前黨會之議」：「敬謹告我國中諸友，自今以後，務皆以提倡共和國政體，組織中華民國政黨爲共同純一之宗旨。凡從前所設立，如同盟會、憲政公會、憲友會、辛亥俱樂部以及一切黨會諸名義應請一律取消，化除畛域，共建新猷。」（三）旋章炳麟自日本歸國，又與張謇、程德全、陳三立等聯名發起組織中華民國聯合會，公布章程有云：

①本會以聯合全國，扶助完全共和政府之成立爲宗旨。

②本會對於各獨立團體如有妨碍共和進行者，應聯絡各團體設法糾正之。

③本會對於中央政府及各都督府凡關於充實兵力之要求應盡力協助之。

④本會設大共和報爲發表言論機關。

⑤本會俟完全共和政府成立後即改爲政黨。唯大共和報仍繼續爲言論機關。（四）

今按劉、章之所主張，表面觀之，似均在加速促進革命之成功與共和政府之建立，實則對於

革命進行之主力——同盟會發生莫大之分化與破壞作用。蓋劉、章原屬同盟會基本會員，均擔負重要職務。然一九〇六年劉既首倡組織共進會，一九一一年三月又在民立報發表聯合漢、滿、蒙、回、藏組織民黨，申明「吾之所言，非革命主義而爲變政主義。」（五）今茲復以同盟會會員倡言化除畛域，對同盟會、憲友會相提並論，等量齊觀，自難逃不忠實之譏，因此增加同盟會內之離心力，更不言可喻。至章炳麟則一九〇八年以後對中山先生攻擊不遺餘力，同盟會東京本部因此名存實散，今次歸國即與當時政治社會上具有重要影響而非同盟會之人物倡組斯會，就其所佈章程涉及兵力之協助，論者或訝其神通何其廣大？實則此即張謇、程德全政治資本之反映。抑以此涉及兵力之條文比照當時章等唱和之「革命軍興，革命黨消」言論，更可想見彼輩用心乃在企圖進一步解除同盟會之武裝。由是以言，章氏此一舉動對於同盟會之分化及破壞力量，比較劉實更有過之。當臨時政府組織之際，其禍乃大著。

面對此一情勢，同盟會自不能不力求應付——按實際言之，吾人應謂宋教仁不能不力籌對策。蓋自一九〇八年以後，同盟會本部即名存實散，而其後從事活動者乃中部總會。武昌起義後宋氏即運用此一中部總會力量以奔走聯絡於長江下游。臨時政府之組織，尤其首要工作。不意竟由於章炳麟對黃、黎之有所輕重致以頓挫。是則受章氏言行直接影響與實際除打擊者乃中部總會亦即宋氏本身也。宋氏在日即頗喜政黨縱橫之術，運用現實觀點控制局勢把握機會固所優爲。章之言

行既已背馳，孫氏聲望則如日方中，輕重權衡，舍章就孫，始能加強同盟會與宋之地位，事理極爲顯明。因之，中山先生歸國後，宋即商請孫氏並約集同盟會各省職員，舉行臨時會議，相與討論以求改造，當時發布改造意見書有云：「本會之改造，與吾黨之聯合，因逼於利害，鑒而不舍者。」（六）實完全表露宋之真實心理。其所謂「本會」實指中部總會。「吾黨」則含東京本會以及南方支部中華革命黨員之泛稱。蓋爲一九〇八年以後同盟會一大團結運動也。因之，會議以後，特發佈意見書號召同志加強團結。並宣佈一俟民國成立，全局大定，再訂期舉行大會改組爲最闊大之政黨。同時對於外間謠誑，謂同盟會將以天下爲己私者，更佈宣言以匡其謬（七）。

由於上海臨時會議奠定大團結之基礎，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同盟會乃於臨時政府所在地南京舉行正式大會，到會者內地十八省會員約二千餘人。蓋與一九〇五年八月東京大會具有同等重要之意義，而規模盛況則後勝於前，兩會之舉行時間相距約六年，最初誓詞四語，今已將實現其三，故是日大會中，中山先生代表胡漢民正式提議修正誓詞爲：「顛覆滿清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當經一致通過。惟討論今後改組政黨問題，則會衆意見顯分左右兩派：右派以爲武裝革命已告終了，應改爲公開之政黨，從事於憲法國會之運動，立於代表國民監督政府之地位，不宜復帶秘密之性質；左派則以革命之目的，並未達到，讓權袁氏，前途尤多危險，黨中宜保存從來秘密工作，而更推廣之，不宜傾重合法之政治競爭而公開一切。討

論結果，右派佔多數。旋每省各選評議一員，並公舉汪兆銘爲總理（八），蓋有以孫先生方綜國政不宜兼攝黨事也。胡漢民深詫會員之無識，起與衆爭，不得當，惟有太息退席，而因此頓悟同盟會所以分化之原因（九）。蓋同盟會之構成，以知識階級（留學生與內地學生）爲主體，次則無產業階級（會黨與失業農民）與華僑之小資產階級、工人階級，爲多數之成分，而群集於知識階級旗幟之下，在當時爲達到國民革命之戰略，則政策亦無勝於此者。顧中國距歐洲資本國家遠，其得歐洲各國革命歷史之教訓，又不如所受日本倒幕維新之影響爲多，黨人既不悟革命不徹底之必無所得（不以革命階級爲主治階級，任反動勢力之坐大，即同於革命之中道自殺。）而由其階級素性（知識階級——小資產階級）一旦稍免於壓迫之形式，即離開革命而別有傾向，殆無足深怪。同盟會爲其時中國唯一之革命政黨，而其組織實非完善，黨於黨員，不能收以身使臂臂使指之效，即亦不能深入羣衆而領導之，黨員之賢者，篤於所信，其犧牲獻身之精神，足令聞者興起，而不可磨滅，然亦往往出於自動，而非黨的行動。知識階級以自由平等爲一般倫理的要求，惟同盟會之疎闊簡易，能與適合，然猶不免於「機械」之疑，「專制」之謗，則所謂「鐵的紀律」，更難言之；故革命之形勢變更，而黨之弱點種種遂不可掩，此亦可爲後來之鑑戒矣（一〇）。同盟會大會舉行後兩旬，清帝正式宣布遜位。「全局大定，再訂期開全體大會，改爲最闊大之政黨」，此正其時。三月三日，同盟會因再集會於南京，通過總章，以鞏固中華民國實行民生

主義爲宗旨，既爲公開之政黨，故制定政綱九項：①完成行政統一，促進地方自治。②實行種族同化。③採用國家社會政策。④普及義務教育。⑤主張男女平權。⑥厲行徵兵制度。⑦整理財政釐定稅制。⑧力謀國際平等。⑨注重移民墾殖事業。旋選舉中山先生爲總理，黃興、黎元洪爲協理，汪兆銘爲總務部主任幹事，宋教仁爲政事部主任幹事。

按同盟會新訂總章：「政事部，研究政治上一切問題，草創政見，聯絡在議院及政府任職各會員，以謀黨見之統一。」（二）其職掌如此，宋氏膺選主持，蓋可謂已達到行其素志之初步。

先是，當同盟會一月大會時，臨時政府實業總長張謇曾致函黃興建議取消黨名：「軍事非亟統一不可，而統一最要之前提，則章太炎（炳麟）所主張銷去黨名爲第一。此須公（黃）與中山先生早計之。由孫先生與公正式宣布，一則可融章太炎之見，一則可示天下以公誠，一則可免海陸軍行政上無數之障礙。願公熟思之，此爲民國前途計，絕無他意也。」（三）感慨其言，欲以具有光榮歷史之革命團體供一人意氣成見之犧牲，蓋不免私且誣者朋黨之譏。南京諸人士自不能輕易接受其建議。三月十日黃興覆函江北第二軍參謀長袁祖成，申述不能取消同盟會名稱之理由，迺錄於左，以見同盟會重要幹部采取之立場。

「同盟會初爲秘密結社，原帶政治性質，無非爲聯合民黨推翻帝制起見。成立之初，其會員人數即達數百人以上。嗣後支部遍設，會員愈多，盈千累萬，不可殫紀。方今帝政雖倒，

民國未固，本黨尙多遺憾，必期克竟全功。既無解散之理由，復無取消之辦法，自應改造政黨，發闡政治，惟宜仍沿本黨名稱，留爲國人紀念。昨經宣布政綱，刊登報紙，願執事留意披覽，無待贅述。蓋政黨活動以國利民福爲目的。現在雙方和解，南北一律，兄弟一家，彼此豈復猜忌。所有黨員自當各盡其職，各據其誠，以盡忠於本黨，而盡忠於民國。將來政治競爭，但能以政見相折衝，不願以武力相角逐，各國政黨大抵如此。至黨員之行動視乎個人之道德。少年血氣用事，咄咄逼人，間或不免，即非全體意思，亦非本黨宗旨，即他黨亦多此病，祛斯弊在嚴黨規，或能稍望補救，執事謂宜取消名稱，因噎廢食，似非根本之解決。蓋黨員賢否，黨魁或應負責，從而糾正，黨名何能任咎？不必加誣。此次民軍起義，同盟黨員雖効微勞，而全國同情成功乃速，結果乃良，如何論功分賞，出於國家之激勵，社會之報酬則可，亦不過表示人心之未泯，公道之昭彰，與黨員何多榮譽。若藉此貪天之功，爲主張張個人權利地步，吾黨領袖固已現身說法，力闢其非，執事何庸過慮。至鄙人志望前電袁大總統解職電文早經表白，蓋束髮讀書以來，即知立志自愛，凡一切謀利祿爭權勢與夫寡廉鮮恥卑鄙陰賊之念不待禁革，早能自絕於心，奔馳內外固非一日，似已生平略有公論，亦無須斤斤辯白于執事之前。」（三）

按同盟會之正式改組政黨，上距中山先生辭職薦袁已有兩旬，黃興此函作於參議院允袁在北

京就職以後。是同盟會領袖固已光明俊偉準身作則，專爲公衆謀幸福不爲一己便私圖矣，然而國人喻斯意者尠。而同盟會未改組以前，規定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以前入會者始能登記，會外各個人思所以爲進身之階者不可得，或心慕同盟會之得勢而不敢附者，亟思轉向發展。中華民國聯合會改組爲統一黨，孫武創立民社，以政黨之名號召國中，均爲把握此一機會。民國元年五月八日，統一黨民社與其他四政團正式合併爲共和黨，公舉黎元洪爲理事長（二四），力求順應袁世凱意旨以對抗同盟會之主張。同時蔡鍔、王芝祥、孫毓筠亦組統一共和黨（二五）。譚人鳳復被公推爲中華進步黨正主裁（二六）。同盟舊侶，分道揚鑣，甚至反戟相向。然而結果徒使旁觀者竊笑，所謂：「統一黨分子既不純，民社尤可慮」，「勿以爲有副總統爲首領，其黨即可大可久，若以政黨言之，今日之副總統尙無此信用與價值。而黎公又實不足爲政黨之指導者」也（二七）。後此之事實證明，其言平正且深切事理。則其他風起雲湧之小黨，標示光怪陸離（二八），更無論已。

於此有值得注意者則梁啓超與憲友會諸人之言行，蓋彼輩固以通曉政黨原理並具實際經驗自命者。溯武昌起義之初，梁曾潛行回國至東三省：持「和袁（世凱）慰革（命黨）」，逼滿服漢」大方針，並策動京畿軍隊有所圖謀。嗣因吳祿貞被刺殺，影響全盤計劃，所倡「虛君共和」主張，更不獲國內各方之同情。只得鍛羽返日本重作計謀（二九）。民國建立，同盟會、北洋軍閥、黎元洪鼎立之勢初步形成，以立憲派與同盟會敵立歷史之久遠，自無合作之可能，於是聯袁或聯

黎，抑依違於黎袁之間？遂成爲梁與立憲派人士熱烈討論之主題。徐佛蘇等以爲加入黎黨最相宜，其主要理由在「黎係軍隊要人，吾國將來毫無階級，純係平民政治，然同平民，各黨相持又無可判其勝負，於是不得不挾其軍隊以衛其主義，故吾國之政治可名之曰平民的軍隊政治。有軍隊要人爲黨之中樞，則軍隊加入者必多故也」(三〇)。蓋完全基於國內實際政治之積習而毫無推進理想政治之懷抱也。惟張君勳則以爲今後方略惟在聯袁，藉結一大政黨：「袁氏爲人詭譎多術，頗不易合。惟聯合之目的，並非在爭政權，藉其勢力以發展吾黨支部於各省，數年之後，雖欲不聽命於我，安可得焉。持此術以與袁合，爲道當亦非難。且北方官僚中表同情於吾輩者頗不乏人，藉此吸收才智之士，則黨勢愈厚，今後之中國非造成一大黨以爲改革事業之中堅，則建設必不能完備，而危象且隨而發現」。蓋實際與理論兼籌並顧，事實上，張氏此種主張已經昔日憲友會同仁初步付諸實施，與梁之言行固不謀而合(三一)。

先是，袁世凱復起之初，即任梁啓超爲內閣法部副大臣，欲藉以收羅人才挽回輿論並聯絡華僑整理財政；梁辭未就，然函電往返，或託人致意：「兵事項城任之，言論自任」(三二)，即已有聯袁傾向。民國元年一月，張君勳、湯化龍等發起組織共和討論會於上海。二月十三日，袁當選大總統。梁即日長函袁討論今後爲政之道。其言有曰：

「善爲政者，必暗中爲輿論之主，而表面自居輿論之僕，夫是以能有成。今後之中國，

非參用開明專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齊嚴肅之治。夫開明專制與服從輿論，爲道若大相反。然在共和國非居服從輿論之名，不能舉開明專制之實，以公之明於此中消息，當已參之極熟，無俟啓超詞費。

「然則欲表面爲僕而暗中爲主，其道何由？亦曰訪集團中有政治常識之人，而好爲政治上之活動者禮羅之，以爲己黨而已。」

「舊革命派自今以往，當分爲二，其純屬感情用事者，殆始終不能與我公合併……終不能結成有秩序之政黨。政府所以對待彼輩者，不可威壓之……又不可阿順之……惟有利用健全之大黨，使爲公正之黨爭，彼自歸於劣敗，不足爲梗也。健全之大黨，則必求之舊立憲黨與舊革命黨中之有政治思想者。」

「政黨道貴廣大，豈能限以奇節，先後疏附，端賴此輩，多多益辦，何嫌何疑，然欲植固黨基，則必以熱誠之士爲中堅。若使此輩心悅誠服，則盡瘁禦侮，其勢莫之與抗。」（三）此梁所謂政黨運畫問題者如此。袁覆函謂：「所策皆至確不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四）可見兩人心意之相通，蓋假藉政黨之名，以達成開明專制之目的，固袁、梁一貫之主張也。四月十三日，共和討論會在上海集會正式發佈梁手草之中國立國大方針商榷書，謂中國不可不有兩大政黨，一急一緩，互相頡頏，此即其中取穩健進步主義政黨之預備（五）。於是梁之策畫從此

見諸行事。此其主旨與同盟會宋教仁之抱持政黨政治以貫徹民主憲政之理想者大相逕庭，明眼人當可見其分野。然則當此現實，同盟會與宋如何秉其理想而奮鬥，更值得世人之注意矣。

二 不戀權位 只重政見

唐紹儀內閣國務員既經臨時參議院同意通過，並經臨時大總統正式任命，唐乃與農林總長宋教仁、教育總長蔡元培等連袂北上，四月二十日到北京就職，同時臨時參議院亦已自南京移設北京。四月二十九日舉行開院禮，袁世凱親臨演說，發表大政方針。五月一日，參議院改選正副議長，統一共和黨之吳景濂及共和討論會之湯化龍分別膺選（二六）。而唐紹儀則同盟會會員也，立法、行政機關黨見、政見大異旨趣，唐內閣壽命之不能久，蓋自此即見其端倪。

五月初，統一黨章炳麟首倡異論，謂唐爲人一味以圓熟周到出之，大非正當辦法，同時對宋則謂其才局開展，惟關於農林事業非其素習，將來效果如何，須視整頓何如以爲斷（二七）。實則宋當此急則治標之時而爲此迂緩之任，已非中心所願，然猶以爲既列閣員之群，亦參贊大政方針之一人，則主持所信之政見以期見諸施行，或亦易事，故姑且承乏其間，以圖展佈有日耳（二八）。

自唐紹儀苦心毅力經無數曲折促成共和統一之局，更欲以一九〇〇年前後所以助袁者繼續輔袁，以致力於國，爲大局圖久安之策，故最大宗旨即爲圖孫、袁之合作，唐意乘幹旋全局之後，

雙方對彼均有情感與歷史，當能達此目的，故身受重任而不辭，頗有意舉責任內閣之實，以避袁與各方之衝突，但袁竟不之諒，於唐南行返京後即疑唐挾同盟會以自重，有獨樹一幟之意（三九）。而唐每有要議，必就商於宋，且有謂宋教唐掣肘公府，京師號爲唐宋內閣者（四〇）。實則國務院中之主要人物，除紹儀本人外，即內務趙（秉鈞）、財政熊（希齡）、教育蔡（元培）、農林宋四總長，熊爲共和黨大將，爲袁所垂青，既錚錚有以自信；趙又力言內務獨立主義，且不到國務院出席會議，故紹儀乃不得不與宋及蔡氏多所接近。然宋居恒穩健持正論，蔡則文雅有哲思，三人似非能相合者。故論者謂國務院之不能和同一致以進行，組織之始，即已種其因（四一）。

抑國務院創立伊始，每月規定二、五、八日舉行之國務會議中，多屬討論各部組織章程及有關法令，或爲裁汰舊員調用新人而紛紛擾擾，其他大政措施，尙未暇計及。故論者有謂，自政府成立後，除借款外一事不能辦也；而借款事各國務員之意見，亦且不一致（四二）。

蓋自革命軍興，迄北京政府之成立，南北政費軍費支出浩繁，國庫空虛如洗，加以結束南京政府諸政務事務及遣散軍隊又亟需鉅款，而當時財政除向外國借款外別無他法。三月十六日，唐紹儀因與比國華比銀行訂借一百萬鎊合同，以資應付。然自清末以來，英、美、法、德、日、俄即有所謂六國銀行團之組織，企圖共同用有計劃行動壟斷中國借款以控制中國政府。今紹儀竟擬衝破其藩籬，另向他國借貸，因之觸怒列國。國務院在北京初成立，外交團即施種種抗議干涉，

提出借款條件，要求監督我預算開支及外國武官會同遣散軍隊辦法。蓋半關於大局上之不肯放心，半由於對唐之惡感，而唐於此種條件力予駁斥，交涉遂以決裂，此五月三日事也。

決裂之後，即舉行國務會議，於是唐氏主張強迫公債，謂人出萬元之資本家，中國尚不爲少，得千人便是千萬，且欲強行不兌換紙幣。蔡元培則主張革命之兵多明大義，曉以大義，不難無款而遣散之，若其不肯，則人給募捐委任狀，令其自募。惟宋則力陳理勢之不可行，借款之不可不委曲求全，深爲多數國務員所認許。熊希齡且願自行擔任從頭直接磋商。五日，國務院因致函六國銀行團聲明唐總理無暇折衝，以後由熊財長直接磋商，於是借款之任由希齡擔負，袁世凱且爲居間調和人矣（三）。

初，熊原不主借比國款，到京後即自願與六國銀團直接交涉，而唐數次面言恐其無效而不授以全權，至是雖不得已從之，然仍露恐其無效之意，熊因之心慊，兩人爲此時起齟齬，而參議院議員及報館又分黨派各有偏袒。同盟會疑共和黨排唐以扶熊，共和黨疑同盟會排熊以扶唐，雙方旗鼓相當，參議院中又多主對唐不信任。五月二十日，唐遂不得不率同全體國務員向總統提出辭職書，嗣經慰留而照常任事（四）。然一切政務益少推動，大政方針更復束之高閣。

先是，宋氏素堅信，中國處二十世紀競爭激烈之世界，非統一國家集權政府不足以圖存，而當此喪亂之後，秩序敗壞，生計凋敝，干戈滿地，庫帑如洗，外則列國未之承認，內則各省儼成

封建，尤非速行軍民分治，集中行政權力，整理軍隊，厲行救急財政計劃，不足以救目前之危亡。而國務院同僚於此種種大政方針，迄未見有議及。加以黨見紛歧，人自爲戰，互相掣肘，有系統有秩序之政見幾已不可卒得，欲求成立集權政府，建設統一國家，更屬緣木求魚；宋憂心如焚不能復息，國務院會議時因痛切陳詞，要求同僚速圖挽救；各人皆感動，囑宋擬一大政方針草案，並約即日開特別會決定以便提交參議院，宋得命後以爲自此政府或當大有轉機，遂澈夜不眠，埋頭趕撰，草成大綱(三)略如左列：

(甲)方針：實行軍民分治，集中軍政於中央政府。

(乙)計劃：

①都督改爲專管軍隊之官，直隸於總統，其任免及軍餉均由中央政府主之。

②另設地方行政長官隸於內務總長，其任免由總統，其行政費由地方稅支辦。

③以清政府時代原有兵額爲度，裁汰軍隊。

④每省設一稅務局，直隸財政部，掌徵收新稅，其舊稅中如地丁、漕糧、鹽稅、契稅，亦改歸該局徵收，海關稅亦速由中央政府派專員監督，新稅如煙烟稅、印花稅等。

⑤設立中央銀行，定資本五千萬元，立爲股分公司，官股三千萬元，民股二千萬元，籌集五分之一之資本，即行開辦，官股按照其數先繳六百萬元，該銀行有發行鈔票權，並得

貸款於政府，政府定鈔票發行律，並規定該銀行得以國庫券、公債票及其他有價證券作準備金，發行鈔票可至二萬萬元。

⑥此次所得墊款三千五百萬元，只以二千九百萬元作中央及各省行政裁兵費，餘六百萬元作銀行股本第一次繳股金。

⑦自七月十五日以後，每月可得墊款一千萬元，亦提一百萬元，作銀行官股第二次以後繳股金。

⑧此數月間行政費不足者，政府以國庫券作抵，由銀行借款支給。

⑨此數月間速定裁兵及清理財政之法，必期十月以後政府得有收入，可不至再仰藉外債充行政費。

⑩裁兵時軍人可分別給以官銜並年金。

⑪各省造幣廠均提歸中央直轄。

⑫發行加彩公債。

綱舉目張，於當時國政治標方策實已把握重點，裁減軍隊，增加稅收，節流開源，同時並進；力求財政上不再受列國借款之束縛，解決困難舍此莫由。然而不幸者，此一草案於五月二十九日提出國務院時，突接熊希齡請辭財政總長之信，群往挽留慰留，政見遂未決定。而次日爲國

務員出席參議院發表政見之期。屆時唐紹儀及各國務員雖均出席，但以政見未經正式決定，不敢提出，僅報告借款情況。統一黨議員乘機藉端攻詰，集矢於唐，熊反置身事外。唐知熊巧詐，遂決心請辭，讓熊專任，以免李代桃僵之誤；嗣經慰留，猶擬俟借款事定也；而袁、唐關係已不能維持，袁遂藉任命各省人事強唐副署，唐因事涉約法，無法忍讓，遂於六月十五日離京野遊，旋遞辭表（三六）。

唐紹儀之辭職，綜其主因蓋袁世凱利用參議院中共和黨與統一共和黨聯合攻唐之機會而故意以約法問題難之，更有謂袁與英人有計劃之行動者（三七）。然不論如何，此種混合而非純政黨內閣之弱點，亦即總統與國務院及國務院與參議院相互關係不調和之流弊已充分暴露。六月二十一日，同盟會、共和黨、統一共和黨黨員因舉行聯合會交換意見。同盟會堅持政黨內閣之政策，共和黨則提出超然內閣之主張，統一共和黨雖贊成超然內閣而反對共和黨「國務總理必舉總統信任者」之說。論者因此認為三黨聯合雖屬徒勞，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握手則已微露徵兆（三八）。

當三黨聯合會之舉行也，同盟會同時又推派代表晉謁袁世凱，申述同盟會對於新內閣之意見，以為只有政黨內閣或超然內閣而不能仍採混合內閣，並表示同盟會決定不再參加混合內閣。袁之答語，民國元年六月二十三日民立報刊載甚詳，迺錄於左，以見其立場與態度焉：

袁總統言：

「日前（唐）總理出京後，余派梁秘書長、段總長、梁孟亭君前後赴津挽留速來，日前唐遞請假呈，現在假期尚未滿，如唐仍肯回任，自無問題發生；如必要辭職則總理改派自不容緩。諸君所說超然內閣及政黨內閣余均不能贊成。余意現吾國情形兩種內閣均不適用，第一人才缺乏，如今專取共和黨、同盟會或超然無黨之人組織內閣，無論何方面均不能得許多人才，故余之意見非連合數黨及無黨之人共同組織，斷不能成一美滿之內閣。諸君以為組織內閣係從政黨上着眼，余則純從人才上着眼，如宋遜初（教仁）天姿才調逸越儕輩；蔡鶴卿（元培）學問道德一時敬服；王亮疇（寵惠）法學專家，當世寡儔；劉子英（冠雄）於海軍學有專門，才具亦可佩服；余薦舉此數人為國務員並非以其為某黨之關係，乃以為當世人材而薦舉之也。我國現今黨派雖多，而於一黨之中求其人才與國務員地位相當者一時恐難求全。故余不注意黨派，而專注重人材，其人為余深服者無論甲黨、乙黨或並無黨，但熱心國事，余必引為輔助。」

「諸君深知吾國今日政黨方始萌芽，純粹政黨內閣尚難完全成立，若再越數年，民國基礎鞏固，政黨亦皆發達，人才輩出，彼時余已退老山林，聽諸君組織政黨內閣可也。今余意實不能贊同諸君之說，余主意在得人才，但問其才與不才，不問其黨與不黨。吾國今日國勢

危急，舉國共知，而政黨幼稚亦吾人所不能諱，余提此主意亦屬不得已之故。

「余嘗與二三國務員談及，余前此退居林下，何等安閑；此次出山冒茲艱險，擔茲重任，實爲國民一分子不能不盡之義務。余宗旨在於建設民國，諸君如熱心建設者余皆引爲同志，否則余亦不能強人所難。至此次總理及二三國務員或有辭職之意，余以爲全非黨派關係，不過因個人意見未能十分浹洽。故如唐決計辭職，則第二次內閣，余以爲可一切仍舊，惟總理及一二國務員必不肯留者略爲更動可耳。」

「此外余尚有一言，今人多謂民國成立矣，南北統一矣；自余觀之，半年以來外則各國尚未承認，內則各省秩序尚未恢復，再論眼前一切制度毫無頭緒，如此之民國，但能謂有其名耳，何得謂之完全成立？譬之建屋，地址雖定，而圖式未成，棟樑未樹，以云落成，相去尚遠。不寧惟是，數月以來，我國改造共和，一舉一動繫人觀聽，如內部自行紛亂，人將謂我何。故余以爲此次內閣在形式上斷不能爲全部之更動也。」

「總之，余奉告諸君當放大眼光從中國全局着眼，從世界大勢着眼，斷不可沾沾於一黨關係，亦不能硬以平和時代政黨更迭消長成例適用於今日危急存亡之中國。總須大家破除成見協力同心共同建設：爲國務員者以熱心任事爲主，須有自信力，萬不可輕聽局外褒貶，以爲進退；爲議員、爲國民者當體當局者之苦衷，力與維持，不宜以黨派意見拘束而牽制之，

使其無發展之餘地。如是則中華民國庶有完全之日乎。

「此外尚有爲諸君告者：須知組織內閣大非易事，約法上定明大總統任免國務員，須得參議員同意，然一經參議院不同意，則名譽喪失，人亦何苦輕於嘗試！前次余約梁如浩爲交通總長，南京參議院不同意。梁之爲人輿論如何，余姑不問，自余觀之，則外交極爲熟悉，辦事亦至周密。其後余雖以個人名義請其到京輔助，而梁均不肯，後經余數次電催，始於日前到京，然對余宣言，萬不能再任國務。當世賢才，原自不乏，然概怵於危局無措，或又均以梁氏爲戒，不任國務；或並北京亦視爲畏途。故予深願參議院諸君能知此中爲難情形，斷不可使人人短氣也。」

「臨時約法特設總理，大總統不負責任，然以予觀之，不負責任者亦有大小區別，譬之商店，國民如東家，大總統如領東，國務員如掌櫃，商業之計畫布置，銀錢貨物之經理出入，固掌櫃責任，然苟掌櫃不得其人，馴至商業失敗，瀕於破產，則領東不能不負責，東家亦不能爲領東寬。現在國務員當行政之衝要，一國政務罔不賴其籌畫，政務得失自屬國務員之責成。然苟國務員失職，馴至國隨以亡，或雖不亡，而至於不可救藥，則大總統究能不負責任否？國民能不責備大總統否？」

綜袁所言主旨，不外下列四點：①在位一日，即不容許政黨內閣之出現。②所謂「只問才不

用，不問黨不黨」；即仍採混合內閣。蓋正如時人指陳，此種形式，互相牽制維持，最便操縱，爲袁所樂見也(三)。③對約法中國務員須經參議院同意之規定，深致非議。④對約法規定總統之權力，尤所不滿。總之，袁反對政黨內閣(責任內閣)之堅決，此一談話已完全表露無遺。

面對此一情勢，六月二十八日，同盟會因復舉行職員會討論組織內閣問題，蔡元培提議：同盟會各國務員應全行退職，以示本會主張純粹政黨內閣之意見。劉揆一首表反對，以爲本會在北京已屬勢力薄弱，若國務員退出則將來內閣消息亦難聞問，前途殊多滯碍。宋教仁當申言：「此次國務院改組，本人向主張純粹政黨內閣；至他黨組織，本會各員退出，本人早已發表，刻即他不欲退出，本人一人亦決辭職；即本會同志必不贊成，則余即出黨亦可，決不使自己主張之宗旨致相矛盾也。」旋經熱烈討論，最後卒依宋之提議，決定同意陸徵祥出任國務總理，惟同盟會會員加入內閣者即開去黨籍(四)。旗幟鮮明立場堅定，要爲中國政黨政治樹立初基，然而世俗論者竟誤以宋負氣心灰者，宋不得不寄書孫武申述其懷抱曰：

「弟所提議之大政方針案遂無有人論及者，厥後弟又提議一二次，亦無有響應者，弟自是乃確知此政府之不足有爲，辭職之心不可遏矣。然猶以爲須俟借款事定始可發，故遲遲以迄於今也。今者唐總理業已辭職，則是政府動搖之端已開，弟於是正得告退之一好機會矣。今後任命新總理，其爲何人，雖不可知；然弟敢爲預下一斷語：其必非能行弟所主張之大政

方針之人物則彰彰也。若猶復遊移不決，忸忸倪倪以伴食其間，人縱不議其後，其如自己良心之責備何哉？！（有謂弟爲唐總理負連帶責任而退者，更皮相之論）夫合則留，不合則去，原爲政治家之常軌，弟雖不足與於政治家之列，然亦竊嘗聞其義矣。今弟之所抱既不能合於以往或將來之當局，則掛冠而行，亦當然之事，又何所容其顧慮也。至於辭職之後，擬一歸省十年久別之慈幃，然後盡力黨務，苦戰奮鬪，伸張所信之政見，以求間接收效異日，天假之緣，或有實行之一日。其結果與戀戀目下之國務院中，當勝數倍。大隈重信云：『政治爲吾人之生命，吾人一日未死，一日不忘政治。』弟昔頗私淑其說，負氣灰心之事，固斷斷乎無有也。」（四二）

由是以觀，宋氏告退之原由及今後努力之方向均可一目了然。而有生之日終將實行政黨內閣之主張與袁氏在位一日絕不容政黨內閣之出現者，蓋遙遙相對焉。

宋氏主張堅決如此，而唐內閣傾倒之初，北京上海報紙即傳宋將繼起組閣，輿論頗致好評（四三）。共和黨因復發動其有關報紙大肆誣謗，謂唐之辭乃宋排擠，蔡、王、王三總長之同時請辭亦宋迫挾，且牽及章炳麟宣言宋有總理之才前事。蓋彼黨既以擁熊排唐爲目的，自不容宋出而攫去此席也。七月十二日，宋乃藉民立報發表公開信，說明本身立場（四四）：

「即同盟會間有主張政黨內閣者，又何嘗即指鄙人爲總理耶？」

「至主張采用法國制，雖確有之；然中國究竟應置總理與否，識者當知之，弟之主張豈即自爲謀耶？」

「以攻擊個人爲黨爭之唯一利器，則有失言論機關之價值。」

凡此種種，充分反映民國初立，一般國人只重對人不重法治以及朋黨私誣積習之深切，因之，宋氏益感鑄造新黨撥亂反正之重要。

於此有應指陳者，宋氏擔任農林部爲期不足三月，其所設施已有可觀：如設立農藝、林藝、畜牧試驗場(四)，農政講習所(五)，特派專家前往奉天、吉林實地調查林產(六)，制定各級林務、墾殖漁政機關官制(七)，均已見諸行事。其在計劃中者，尙不與焉(八)。是其對章炳麟之預期有事實答復矣。而最值得大書特書者，即其樹立清廉儉樸之政風，觀乎政府公報六月八日第三十九號刊載：「農林部咨財政部五月份決算清冊」，殆爲民國初年北京政府唯一之特例，權位金錢不能淫，政見則不可犧牲，政治家之風骨，宋氏有之矣，因此召致袁氏之嫉忌，亦益復加甚焉(九)。

第五章 附註

(一)時務報一八九七年一月九日第十七冊譯載大日本雜誌「政黨論」，介紹英、美國內兩大政黨相互監

督轉相執政情形，力言：「天下政黨，必分爲二」。……是以政壇唯有赤白二旗耳，苟欲驅馳政壇者，必須擇居其一。」並謂：「雖然國家未行政黨內閣之制（原註：以政黨一進一退聯成內閣也），獨君主把持立法之大權，則議會止有協贊權而已，蓋亦非有真政黨也。」於兩大政黨對峙及責任內閣反覆申言可謂扼要。同時對於政黨與革命黨之分別亦有云：「偶有民人結作一黨，而反抗君主之權，以強逼君主，是革命黨耳，非我所謂政黨也；革命黨本以顛覆政府爲志，其意蓋謂自非出於此途，必不能握得政權，如俄國虛無黨是也。」

（二）沅湘通藝錄卷四第三八—四四頁。

（三）民國軍文牘第六集第七頁。

（四）民立報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及民國報同年同月十一日均載有中華民國聯合會章程。齊魯公報民國元年一月二—一五日連載章炳麟於此會第一次大會演說全文，彙錄於左，以見民國初建章之政見。

「本會性質對於政府監督輔助地位也，其應主張之事如何，請爲諸君言之：中國本因舊之國，非新闢之國，其良法美俗應保存者則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張也。蓋中國與美、法不同：美爲新建之國，其設施皆可意造，較中國易，無習慣爲之拘束也；與法亦懸殊，法係破敗之國，推翻一切；而中國則不然，如悉與習慣相反，必不能行。至美之聯邦制尤與中國格不相入，蓋美之各州本殖民

地，各有特權，與我各省之爲行政區統一已久者不同，故絕不能破壞統一而效美之分離。至所謂獨立者對滿廷而言，非對於新建之民國也。將來祇依山川劃分如三十六郡之例已耳。惟置大總統限制其權，以防民主專制之弊，宜與法之制度稍近。至行政官除大總統外，不由人民選舉，行政部應對議院負完全責任，不宜如美之極端分權，對於外藩仍應行統屬主義，俟言語生業同化後，得與本部同。政權平等三權分立之說現已頗成爲各國定制，然吾國於三權而外並應將教育糾察二權獨立，蓋教育與其他之行政關係甚少，且教育宗旨定後不宜常變，而任教授者又須專門學識，故不應隨內閣爲進退，糾察院自大總統、議院以至其齊民皆能彈劾，故不宜任大總統隨意更換。至考選考績前此臨時大總統曾主張獨立，然就法理上言之，究屬一部分之事，無可獨立之理由，故仍宜於內閣之內設立專局以管轄之。

「近來對於民生問題頗有主張，然社會主義者在歐洲程度已高之國尙不適用，何況中國？惟國家社會主義乃應仿行，其法如何：①限制田產，然不能虛設定數，俟查明現有田產之最高額者即舉此爲限。②行累進稅對於農工商業皆然。③限制財產相續，凡家主沒後所遺財產以足資教養子弟及其終身衣食爲限，餘則收歸國家，至若土地國有，奪富者之田，以與貧民，則恃乎公理，照田價而悉由國家買收則又無此款，故絕對難行。如共產主義之限制軍備，祇可就兵力充足國言之，而非適應於今日之中國也。財政問題現時祇宜整理不應增加，釐正陋規而搜剔中飽，改正稅則而平均負

擔，國家收入自必倍增於前日，然富民經濟應爲發展，金融機關宜求整理，則統一幣制設立國家銀行，實爲今日不可緩之事也。

「以上就內政立言者也，至於對外則主張國際平和，不執侵略政策，此事洵爲吾國特有之國家道德，高出於各國者也。但亦不受他國之侵略，爲自衛計自當以適應之法維持國權，此外關於中國舊有之美俗良法，宜斟酌保存者請更爲諸君言之：①婚姻制度宜仍舊，惟早婚則應禁。其納妾一事於國民經濟個人行爲諸多妨害，如家產之不發達、行爲之多乖謬，由此事耗費爲之者十居七八焉。昔日官吏猶然，故將來應懸爲禁令，如官吏、議員今已有妾者應即免職撤銷。②家族制度宜仍舊，如均分支子，懲治惡逆，嚴科內亂，均不可改，死後繼嗣似宜禁斷，生前養子者不禁。③中國教不應認何教爲國教，雖許信教自由，然如白蓮、無爲等教應由學部檢定教理，方予公行，政教分離，中國舊俗，其僧侶及宣教師不許入官，不得有選舉權。④本國人在本國境內入外國籍者雖不必照舊律謀叛懲治，仍應禁斷，惟自來流寓在外者不在此例，仍須削除國籍，如後華僑再有入外籍者，非先由政府允許不可。⑤承認公民不依財產納稅多額而以識字爲標準，庶免文盲與選，而有智識之寡酸，反至向隅。⑥速謀語言統一，文字不得用拼音，妄效西文，而使人昧於其義也。⑦賭博啓人僥倖心而妨害恒業，應嚴禁，其競馬鬪牛等亦然。⑧在公共場所效外人接吻踏舞者，男女雜沓大壞風紀，應由警察禁止，此僕對於中國前途所應保存、提倡與夫禁止之概略也。」

(五)民立報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劉揆一「聯合漢滿蒙回藏組織民黨見書。」

(六)天鐸報民國元年一月二日「同盟會本部改定暫行章程並意見書」。鄒魯黨史稿第六一七頁。總理全書之六「宣言」第三六頁均載其全文。惟「宣言」繫此文於民國紀元前一年九月。誤。蓋按之此文內云：「今者總理歸來，本會因地之便，集居滬各省職員，開臨時會議。」按中山先生自歐回國到達上海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赴南京就職。是此一會議舉行必在此一周內。惟因當時仍屬秘密活動時期，故今所得見之資料，均未有確記其時日者。日本佐藤俊三支那近世政黨史第五五頁將此意見書作中山先生對同盟會中部總會之演說，列於中部同盟會成立宣言之前，蓋未細讀全文，嚮壁虛造也。

(七)總理全書之六「宣言」第一三〇——一三四頁。

(八)天鐸報民國元年一月二十三日第一頁。胡漢民自傳第六三頁。

(九)胡漢民自傳第六三頁。

(一〇)胡漢民自傳第六三、六四頁。

(一一)居覺生先生全集下冊第五四九、五五〇頁。同盟會新訂總章見鄒魯黨史稿第七八—八二頁。

(一二)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第一七二頁。

(一三)民立報民國元年三月十四日第七頁。

(二四) 民立報民國元年四月二十七日第四頁廣告「共和黨啓事」：「本黨係由統一黨、民社、國民協進會、國民公會、國民黨、國民共進會六政團組成。其黨義如下：①保持全國統一，取國家主義。②以國家權力扶持國民進步。③應世界大勢以平和實利立國。訂期五月八日於上海張園開成立大會」。又民立報同年五月十二日專電。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年譜下第七三、七四頁。

按「共和黨啓事」中之國民黨與民國元年八月由同盟會改組擴大合併他黨之國民黨毫無淵源及關係。蓋自民國建立，國人多喜用「國民」兩字。申報民國元年三月一日第三頁要件欄刊載國民黨暫定簡章有云：

①本黨定名曰國民黨，未經成立以前，暫稱國民黨同志會。

②本黨宗旨於全國統一政治之下，以人民爲國家主體，完全保護其固有之權利，以搗共和之精神。

③本黨同志集合至五百人以上時即開成立大會，公舉黨首及各職員。

其發起人有朱壽朋（光朝朝：東華續錄之編纂人）等。至五月八日遂以合併共和黨。

然同時康、梁領導之帝國憲政會亦改名爲國民黨。天鐸報民國元年四月二十七日第四頁載檀香山來函云：康電華僑改名稱，謂袁亦是黨中人。會員欣喜。已捐款數千滙回云。又梁任公年譜初稿第三八六頁載：民國元年六月二十五日徐君勉函稱：康、梁爲會長，更定章程云云。按「國民」兩

字亦梁氏所首倡應用者。

(一五)天鐸報民國元年四月十六日第四頁。

(一六)天鐸報民國元年四月十八日第四頁。

(一七)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冊第三九頁

(一八)當時小黨林立，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下冊第三六二—三六五頁（英譯本第二七六—二七八頁）

所述及者外，就筆者所見原始資料及書報所載，合計不下百數。例如所謂中華民國國民社會黨、中華民國同盟改進黨、民黨協進會等當時均曾展開活動，今仍有各該黨會修訂章程、文件、黨員證書等件存世。其中如中華民國同盟改進黨章程規定之黨律有云：

「第九條：凡入本黨者不准吃紙烟，不准飲酒（但有病須用藥酒者不在此列），不准納妾，不准嫖，不准賭，不准買使女。如犯以上各件，由黨內開特別大會當眾議罰後登報宣布除名。」

「第十二條：本黨同盟人凡對於政府劣惡有害於同胞之政策不竭力規正者，對於社會上一切不平之事不捨命維持者，對於滿清積習過深之人不絕對排除者，有關於本黨事件受人暗托隱而不報者，其罰亦與第九條同。」

此與中國仁黨以實行博愛主義、人道主義、平等主義、大同主義為宗旨者（見民國元年五月三日社會黨日刊），蓋均不明政黨本質者烏合之衆。而所謂「萬國統一天民黨」者尤光怪陸離，錄其

文件，以見一般：

總綱：以扶持人道，增長道義。提倡民生，合謀社會上之最大福利爲目的。不分國界、不分種族、一視同仁，以博愛爲起點，以五洲統一爲最後目的。

盟約：①以道德爲君主。②人人以天民自待。③不作消極之種種行爲。④對於本黨表懇摯之愛情。⑤對於黨則表精神上之同意。⑥入黨後終身以之。

宣誓：入黨時須對同黨對天自誓守以上六條公約（天鐸報民國元年四月二十七日第五版）。

（一九）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三四二—三四九頁。

（二〇）梁譜第三六五—三七一頁。

（二一）梁譜第三七二—三七三頁。

（二二）梁譜第三四七、三四九頁。

（二三）梁譜二七九—三八二頁。

（二四）梁任公先生年譜第三八四頁。

（二五）梁譜第三八四頁載：（民國元年）四月著中國立國大方針商榷書成。該書由共和討論會印刷兩萬冊。

今按是書初印本，書首序（飲冰室合集文集卷之二十八載有「中國立國大方針」無序）言有云，「同人等以國體更新萬事草創，乃謀結合一部份之團體，以爲政黨之預備，此討論會之所以立

也。」「本會緣起實基於各省數年來之諮議局聯合會。」「近於穩健爲進步一派，則吾黨所抱鑄黨主義不外乎穩健進步主義。以此主義對外取和平政策，對內取實利政策。」「吾國改革共和，人心爲之一振，一時奮發之氣，急進黨易於成立，而穩進漸進之黨或稍後。故近日民國公會、國民協進會、民社、統一共和黨、國民協會各政團咸欲併合一氣成一大黨，屢來本黨商榷，本會雖未成爲政黨，而宗旨在集合主義相同之人，爲將來政黨之預備。故從種種方面推測：此種併合當亦本會同人所贊同。因請公決。決定由幹事會舉數人與議。」是爲其後演變爲民主黨再合併爲進步黨之張本。又據天鐸報民國元年四月十六日第四版：該會在上海開成立會時簽名入會者三百人。討論政綱時劉崇佑語及社會主義與女子參政權之利害，與吳敬恒（稚暉）、饒孟任互有辯論云。又梁任公年譜第三九二頁言：章太炎張謇極思結納此會，而未成。

（三六）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上册第一一六頁載：此一演說乃梁手定。遠生遺著卷一第一三四頁謂原稿多經唐紹儀改竄乃行發表。民立報民國元年五月二日專電欄及十四日通訊載：參議院議員屬同盟會籍者三十三人、共和黨籍者二十六人、統一共和黨十三人、共和討論會一人、無所屬者十一人。是日選舉結果：吳景濂得四十六票，湯化龍得二十七票，係共和黨，統一共和黨相互提携，致同盟會員張耀曾以二十六票落選。

（三七）天鐸報民國元年五月九日，十一日第二頁「中外大事」。

(六) 民立報民國元年七月四日第二版「宋教仁致孫武書」。

(二) 梁燕孫年譜上冊第一一五、一二二頁。遠生遺著卷一第一三四頁。

(三) 章炳麟自定年譜民國元年條。

(三) 遠生遺著卷一第一三五頁。

(三) 遠生遺著卷一第一三七、一四三頁。

(三) 遠生遺著卷一第一三一、一三三頁。梁燕孫年譜上冊第一一五頁。

(四) 遠生遺著卷一第一三五、一三六頁。

(五) 民立報民國元年六月二日北京電報，七月四日宋致孫武書。

(六) 民立報民國元年五月二十三日、二十七日、六月二日、二十四日「專電」欄及七月四日宋致孫武書。唐紹儀辭職後，同盟會本部自北京電告各支部詳加說明，後錄於左，略見真相：

① 北京中國同盟會本部六月二十三日致各支分部電：

「唐總理於(六月)十五日微行至津，此間人士不識真相，謠言繁興，人心頗為搖動。實則唐自就職後因所抱政策多不能行，鬱鬱不得志，屢欲求去，其最近原因則因為王芝祥都督一事。王被舉時，唐在南方荐於總統，請加任命，總統允其請，招王來京，王至而總統又以他故派王赴寧整理軍隊，唐以王既被公舉，又係南產任為直督可藉以融洽南北感情，消除統一之障礙。且在南方與本

黨要約在先，更難失信，堅拒不肯副署。適王君（六月）十四日出京，唐見事不可挽回遂浩然有去志。唐之此舉不徒擁護共和，尊重信義，服從黨見之點爲晚近政客所難能，而就法律政治上觀之，尤有莫大之關係。民國約法采法國制，參議院爲最高之機關，而國務院爲責任之主體，總統所發布之法律命令及一切公文，皆須國務院副署，總統雖有任免文武官吏之權，而主張此項權力必待國務院之副署，始能發生效力，其實權握於國務員之手。蓋總統之地位至鞏固至尊嚴，除非常之事件外，對於參議院不負責任，惟國務員則常立於被指斥彈劾之地位，約法既予以重大之責任，則其所以監督之者不可不嚴也。副署之權若可放棄，則國務院不過總統之器械，責任內閣之大義湮矣。唐以主張約法上之特權之故，不惜以國務員之地位爲保障之代價。吾人聞之當如何崇仰效法。至其始則委曲求全，繼見事不可爲，內斷於衷，決然舍去，斷絕葛藤，態度之嚴正果決，方之東西大政治家實無愧色。或以其身爲總理，不告而行，似嫌手續有關，不知唐之行在星期六，已將一切事務部署就緒，次日爲星期，例得休息，總理雖爲國民公僕非比囚徒，不能奪其行動之自由。星期一爲國務例會，恐不能到會有碍政務，即電公府呈請假，於手續並無不合。反對黨吹毛求疵，百計中傷，倘吾黨不察從而和之，適墮奸計不得不詳爲報告。」（民立報民國元年六月二十四日）

②同盟會本部七月一日爲揭出唐總理野遊原因致駐滬機關部電：

「唐總理自上禮拜六日出京後，禮拜一由津來電，請假五日，不知輒以爲過，且謠言紛興，迄

未能已。考此次實因唐總理以種種之障礙，莫能實行其所抱之政策，而又不欲悻悻然以去就決絕，故不得已循各國大臣野遊通例，於十五、十六出遊天津，借請假以爲平和之退去，所處得體，無可訾者，今將種種原因揭出，以釋當世之疑。唐總理自身任懌和以來，首以南北統一不分畛域爲目的，次以整理現今之財政爲最要策，故其結果南軍著著退讓，而孫總統之解職，參議院之北移，黃留守之撤兵銷職，蓋無一不出於開誠布公，而所約以柏文蔚督山東，王芝祥督直隸者，亦爲調和之苦衷，袁總統皆臨時異議，謂南軍曾北伐，不可與相近，乃別思位置，欲強唐總理副署，唐數言之終不之聽，竟將失約法上之副署權，唐爲保持民國計，爲保持約法計，不能不退者此其原因一。財政總長熊希齡罔識外交，喜弄騙計，驕謾不才，稽核條件八款幾陷民國危亡之地，獨斷獨行目無總理，致唐之政策非特不得實行，而反受連帶之累，此其原因二。此次內閣本非政黨，政見既不無猜疑嫌忌，難以和衷共濟。而奸狡者且肆其傾軋排擠，此種弊端實非民國幸福。責任內閣遂致徒托空言，此其原因三。外間不察，助以反對者之巧詆，致令是非顛倒黑白不詳，且有捏造外人書函以誣譏唐者，喪心病狂莫此爲甚。如此行爲非污唐氏一人，直辱及民國全體，吾黨愛中華民國，只求不愧對國民，至於無價值者可不必多與較量也。」（民立報民國元年七月一日）

（三七）張謇傳記第二〇二、二〇三頁。

（三六）民立報民國元年六月二十四日、三十日。

(三)遠生遺著卷一第一四八頁。

(四)天鐸報民國元年七月五日「中央變局記」。同盟會當時曾有公電致各分支部，茲錄於左，以見真相：

同盟會本部七月一日致各支部機關部轉各分部電：「本會於唐總理去職後開第一次全體職員會，鑑於混合內閣之弊，而超然內閣其害亦與之相等，即絕對主張政黨內閣，蓋非是則無以祛政治進行之障礙，此次陸徵祥君爲總理，陸君碩材，中外同仰，惟義取超然，不合於本黨之主張，吾黨國務員蔡元培、宋教仁、王寵惠、陳其美、王正廷諸公已遵本會多數同志之決議，悉行引退，然非有慊於陸君也。吾黨在野之士，丁茲危局須捐除意見，同德一心，以助當途之不逮，使國人共曉然於吾黨樂爲政治之犧牲，無所愛於權利，而表其誠潔專一之精神。又本日職會員決議：此次既係超然內閣，凡本會員皆不得自由加入，務使本會主張先後一致。」（民立報民國元年七月三日）

同盟會左派主辦之民權報刊載戴天仇（季陶）「共和政治與政黨內閣」社論，於唐去陸來以及同盟會堅持政黨內閣之情理論述甚詳。見戴天仇文集（文星書店影印本）。

(四)民立報民國元年七月四日宋教仁致孫武書。

(四)遠生遺著卷一第一五頁。

(四)民立報民國元年七月十二日。袁世凱以人才缺乏及消弭黨見爲組織混合內閣之理由，其言甚辯，頗

聳聽聞。實則全爲反對政黨內閣之托辭。民立報主筆章行嚴曾撰社論闢之，與袁語合而觀之，適針鋒相對。

(四)政府公報民國元年七月五日第六十六號。

(五)政府公報民國元年七月十五日第七十五號。

(六)政府公報民國元年七月八日第六十九號。

(七)政府公報民國元年七月二十四日第八十五號。

(八)宋漁父第一集後篇「遺事」第九頁載：「其對於農村一部之計劃：今檢先生遺稿，其手寫之條目，猶有存者，設施未竟，遽戕其生……其大概於下：

- ① 變賣官有土地。
- ② 變賣政府所有之股票。
- ③ 徵烟草稅。
- ④ 測量田地。
- ⑤ 改鹽法爲專賣制。
- ⑥ 設中央銀行並使兼管國庫發行鈔票。
- ⑦ 設出口貨商業銀行。

⑧ 設拓殖銀行。

⑨ 治黃河有三法：

① 由甘省河開一河道直達涇水。

② 北放入於蒙古。

③ 由山西寧武之河開一河道直達於桑乾滹沱。

⑩ 治長江有五法：

① 開荊州境內諸支流。

② 開武昌南之河由金口直達樊口。

③ 開黃河以東諸湖爲北江。

④ 開蕪湖以東諸湖爲中江。

⑤ 開河口以北諸湖使漢水東流至黃州入江。

⑪ 徵配稅。

⑫ 設勸農使於各內省。

⑬ 設督辦屯墾事務官於滿蒙新。

⑭ 調各省勸業道實業司報告至部。

⑤、以各省積谷常平倉谷爲農業銀行資本。

⑥、徵山湖有可墾地萬餘頃，淮海間葦蕩營有可墾地二處：一處五千餘頃，一處七千餘頃。

⑦、設蒙古興業公司，請願政府許以行政權。

⑧、接辦安圖縣木植局，並請願許以收捐權。

（四）袁世凱素喜以國家之公產，供個人之籠絡，遠生遺著時評第三節中有特寫「大總統與審計處」有云：「大總統內令：沈秉堃開辦浦口費三萬，胡瑛赴日本調查費二萬。以國家之公產供個人之牢籠，此即吾人根本上不能贊同袁總統者也，財政部不稱其職，唯唯不敢可否，審計處乃一一駁斥之，可謂賢矣，然今日之審計處人員，吾人實不能傾心推許，即此一事，甚望其始終不渝矣。」又同卷另一時評「袁總統之師父」云：「昔滿人良弼留學東京士官學校，親見革命風潮之烈，歸而語其大老曰：勿憂！此輩月給數百金，賞一頂戴便閉口矣。良弼之言驗耶不驗耶？同盟會在東京最寂寥之時，與會者不過二十人耳，天厭滿清，民國載建，袁總統不思竭心力以息內難而禦外侮，以鞏固民國，乃日憂二次革命，盡取今日之元勛巨子及其徒卒而牢籠之。數百金之不足，而助位焉，上將中將少將焉，鐵路督辦焉，鐵路全權焉；然則袁總統者，放大之良弼也，良弼者袁總統之師父也。」又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載：革命黨人中途變節爲袁以金錢收買者頗不乏人，袁亦曾以某銀行支票簿贈宋教仁，請其自由支用，然宋只略支少許表示謝意後，即以原簿還之。袁生平最喜

使貪使詐，最忌有能力又有操守者，於此尤異常憤嫉，宋殺身之禍此爲重要原因。

第六章 爲民主憲法犧牲

自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建立，四千餘年之君主專制政體一旦推翻，國人驟得政治上之自由，遂相競言黨，以爲中國將非黨莫治也。實則極大多數人於民主政治之真諦、政黨之組織與功能均茫然無所知。政黨與徒黨之分別安在？政黨與普通政治結社之區分如何？政黨之結集何以必須以政綱爲前提？各政黨何以必須有相異之政綱？一國之內何以須藉實力相當之兩政黨以制衡？種種問題均毫無了解與認識，至於政黨貴有「傾聽反對者意見」之黨德，更無人稍一計及。大小政黨林立，仗馬齊鳴。各地報紙復如雨後春筍，目的既殊，言論龐雜：有爲個人爭取權利者，有尙謾罵以博銷場者，有以黨見爲前提而置國家安危於不顧者。相激相盪，如虎添翼。同盟會共和黨互訐「帝政復活」、「二次革命」等蛇影杯弓之談洋洋盈耳充塞簡端（二）。視前代朋黨之爭尤

有加甚。於是國人中之謹愿者畏黨如蛇蝎，方正者惡黨如溷渠，甫正萌芽之政黨政治蓋未半年即已面臨存廢之歧路。

當是時也，民立報主筆章行嚴，宋氏舊侶且倡導政黨政治與宋氏同其觀念與熱心者（三），堅決認定此非政黨政治不適合於中國，乃吾人未具有此種學養與經驗。蓋按之實行政黨政治最早之英國歷史，十七世紀時仍不脫以暴力壓服反對黨之積習，十八世紀時始有政黨之定義及其正當作用發展之途徑，至十九世紀中葉乃完成政黨政治之規範，漸爲歐陸各國之楷模。是英人之得此成就乃自無窮之經驗與奮鬥而來，其所耗之時日與精力幾達二百年。中國今日獲覩他人之成績從而效之，固不須耗同等或大部份之時日與精力，而結果可同焉。現學步不過半年，未見成效，尙不足爲病，惟今後必須善取他人之良好經驗，吐棄他人詬病之陳蹟，再接再厲，繼續推行，始可觀厥成。因之，章氏不厭求詳日在民立報著論鼓吹，徵引英美前事，針對國內政象，剖析譬解，勸善規過，時或提示具體主張（三），所謂毀黨造黨說，蓋尤引人注意，與宋氏行事收唱和之效。

先是，早在南京參議院舉袁世凱爲大總統之初，臨時約法正在擬議，章氏即於民立報指陳，責任內閣政治之精髓不在內閣總理之有無，而在立法行政兩部門之能打成一片，並以南京臨時政府累爲參議院所阨之實例說明，若不注意及此，立法行政兩部之衝突必起，而政無由行（四）。不幸當時參議員人品複雜背景不同，未有一黨派可控制多數者。目的各異，百家雜陳，因之於製訂

臨時約法時規定之行政主體，總統與國務院責任及權限均未明晰劃清，既非內閣制，亦非總統制，特形成一種二重行政(Dual Executive)(五)。遂使袁世凱得乘間操縱其間，唐紹儀內閣即因之不能維持。至同盟會堅持政黨內閣之主張，亦因參議院中同盟會籍之議員不占多數，仍不能達成目的。同時共和黨情勢亦然。故唐紹儀去職後，陸徵祥內閣之不能通過於參議院者以此，全國惶惶於北京無政府狀態在一月餘者(六)，根本原因在此。論者輒咎同盟會之倡政黨內閣，不過歸罪之詞，並未得問題之癥結。因之，章氏以爲同盟會欲求組織政黨內閣，其惟一之下手法，則求參議院之多數一黨之議員，不足則謀與第三黨相提携，苟多數確定則本黨之首領當然爲總理(七)，故「如統一共和黨可倚，則同盟會與之提携，組織政黨內閣」爲目前治標之法(八)，而根本之圖「舍謀於第一期國會中多得(議員席位)票無他法也」(九)。

雖然，此就同盟會而言也。至就全局言之則吾國之新黨方興而未有艾，將來得占議院一部以爲基本營者必且不少，吾國果決采內閣政治者其結果之惡或更甚於法蘭西。因之，章氏以爲惟有將國中所有黨派悉舉而破壞之，然後舉全國之聰明才力在理想之政見商榷會中，多則一年，少亦六月，就研究結果之正負兩面之政策立爲兩黨(一〇)。

章氏此議發表後，旋即引起各方之辯難(一一)。章氏因更再三說明，毀黨乃舉所謂黨者而盡毀之，毀又毀其實，非僅毀其名也。至所計劃之政見商榷會特造黨之廣場，非即黨也。其方式與章

炳麟合併各黨爲共和黨者大異其趣。而於各黨領袖人物是否肯犧牲黨見從事於根本改造之疑問，更取證於同盟會近事以說明之。其言曰：

「同盟會者號稱與共和黨異其黨綱者也，共和黨之黨綱何在？記者無從知之。同盟會黨綱之可知者有實行民生主義與男女平權二項爲人指目。此誠政見矣。而得謂爲一黨之政見與否未可知也。記者嘗從孫中山先生問民生主義，偶談及土地單一稅，記者詢以今日是否可行？先生曰：否，是猶有待。夫黨綱以現在能實行者爲範圍。今日有待，是豈實際政爭之武器，聞所謂民生主義者將改爲國家社會主義，是民生主義非黨綱也。而國家社會主義亦不得謂之黨綱，何也？黨綱者，一黨所獨，而國家社會主義，吾未見共和黨不采用之也。至男女平權在同盟會確已不能保其意見之一致，昨參議員楊君廷棟南旋，爲言女子要求選舉請願書，同盟會議員相戒不爲介紹，而允介紹者轉屬共和黨人（二三），如同盟會必實行此條，其黨且見破裂，此與英倫自由黨對於女子參政權之態度略同，是男女平權亦非黨綱也。」

因此章氏指出當時國內各政黨即號稱嚴整如同盟會者亦並未有堅持其特有政綱之決心，若欲毀黨新造固無何犧牲黨見之可言，必曰犧牲亦私見耳，非政見也（二三）。

於此應指陳者，即章氏此論提出後，各方附和之反應實多於責難，其中統一共和黨總幹事雲南都督蔡鍔通電請同盟會、共和黨、統一共和黨「首倡解散之議」，「此時以討論爲重，而不必

強於主張；以培養爲先，而無庸急於號召」(二四)。同時，民立報亦刊出同盟會將併合他黨及各政治結社爲一純粹大政黨之消息，並謂「黨名或將從公意而有所變更」(二五)，則宋氏實際行動將屆成熟之先聲也。

一 國民黨之組織

自民國元年三月，同盟會改組，會員人數增多，聲勢擴大，隱然執國內政壇之牛耳；實則極大多數之會員於政黨政治及本身義務權利毫無認識，不過乘機倖進以滿足個人升官發財之慾望已耳。時因政治上之激變，因應周旋，備極繁忙，放同盟會職員於內部之整頓甚少着手，團體散漫，既無實際設施，又乏有機體之活動。而一般社會人士則以同盟會原爲秘密結社，現民國既成立，復行加入，亦屬無謂，志行高尚者更以爲斯會既占勢力，此時加入近於附勢趨炎，致使該會久擁破壞份子集團之名譽而建設人才則裹足不前(二六)。是年六月十四日，黃興辭卸南京留守，唐紹儀旋又離國務總理職，同盟會在國內政壇實權爲之頓挫(二七)。至於不能控制參議院多數議席實現責任內閣之主張更爲彰著之事實。而共和黨則與袁世凱狼狽爲奸，務求適合大多數國人之情性以取容。共和討論會復有乘梁啟超回國以擴充爲一大政黨之活動(二八)。同盟會面對此種情勢，顯然必須改弦更張，宋教仁任政事部主任幹事，知彼知己，體認深切，於此主張蓋尤多致力。

七月十六日，同盟會本部舉行全體職員大會，討論會務進行方法。代理總務部主任幹事魏宸組提出擬改定名稱組織完全政黨案，嗣多數意見僉以現值各黨競爭劇烈，本會若稍有動搖，恐他人利我改名而分勢力，其危險有不堪設想者，因決定舉行全體會員大會再行表決（一九）。逮二十一日全體會員大會揭幕，魏宸組即席宣佈，目下爲預備國會選舉，亟須著意各方面工作以期發展，但同盟會名義於歷史上關係頗爲深遠，遽行改名，似亦不必，惟名稱不改則又易召社會上之嫉視，不能擴張；故如何因應，以期兩全？應請公決。蔡元培繼起表示不能舍己從人，名稱萬不能改，會衆報以熱烈掌聲。

一般之意見如此，宋氏雖被大會選舉爲總務部主任幹事，總攬會務，默察情勢，於此亦只能作原則性之說明：「現在內政外交諸多危險，欲圖補救全恃政黨，必使同盟會日趨強固，方能收效。至強固之法：①在對於他黨之贊助本會者極力聯絡之。②國會選舉亟須注意，必使會員能於國會占多數席位，彼時無論政府如何，可以會員力量改良之，是皆擴張勢力之最要者也。」

宋氏所謂「他黨之贊助本會者」，蓋指統一共和黨而言，緣是黨黨員多有曾隸同盟會者，既自樹一幟分庭抗禮，在參議院中初頗右袒共和黨，嗣因陸徵祥組閣不能滿足其要求，立場乃見動搖。然七月十六日三黨舉行政治討論會，彼輩對於宋教仁要求不加入陸閣之提議仍持異議（二〇）。故當時同盟會擴大改組之說甚囂塵上，實則內外情勢固未完全醞釀成熟也。

七月二十六日，袁世凱既假軍警武力威嚇參議院通過陸徵祥出任國務總理（三），政壇情勢急轉直下，袁及共和黨計謀獲售躊躇滿志，統一共和黨則不滿陸內閣並擬推翻之初計不成，又受共和黨及軍警界之攻擊，多數黨員異常憤激，遂欲與同盟會一致進行爲正式國會競爭選舉地步，於是醞釀甚久之兩黨合併議乃水到渠成。

抑統一共和黨早經提出兩黨合併之條件：①變更同盟會名義。②廢除民生主義。③改良內部組織。此三條件在未發佈前，曾由宋氏函告中山先生及黃興，並由民立報非正式洩漏以試探反應。同盟會兩次集會雖多主保存具有歷史榮譽之名稱，然政務部主任幹事張耀曾，則仍按對方希望將黨名、黨綱、組織另擬一草案，逮時機成熟，宋教仁乃立予把握於八月五日正式與統一共和黨進行談判。同時國民公黨亦願加入，特派代表北來參加。

討論名稱時，協定原案係用「民主黨」三字，嗣因反對者多，遂改用「國民黨」，蓋共和之制，國民爲國主體，欲使人不忘其義也故顏其名云（三）。

至於黨綱，原曰係用鞏固共和保育民生八字，後因國民公黨代表反對民生二字用意太狹，與同盟會所持之民生主義相混；統一共和黨亦贊成此議，遂改爲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治；而同盟會代表李肇甫力持民生二字萬不可去，恐一般激烈份子出而反對，與合併之事有碍。經張繼設一調停之法：將政綱列舉之第四條所標「採用社會政策」六字改爲「採用民生政策」，各黨諒其苦

衷，皆表贊成。於是續議列舉之黨綱，共計五條：①保持政治統一。②發展地方自治。③厲行種族同化。④採用民生政策。⑤維持國際和平。均無異議通過。

其次議及機關之組織，原案採用理事會議制，設理事七人；各黨大致贊成。惟於會議制內應設理事長一人究竟係常設機關抑臨時機關一節稍有辯論，結果贊成常設者多數。並決議理事長由七理事互推不由大會公選，以免權力有高下之殊。

其時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聞三黨合併消息，深感本身勢力更形薄弱，難久自立，亦派代表分別表示願意加入合併，於是國民黨之組織益形擴大。

八月十一日，舉行正式籌備會議，宋教仁被推擔任臨時主席，宋並代表同盟會、谷鍾秀代表統一共和黨、徐謙代表國民共進會、許廉代表共和實進會、虞熙正代表國民公黨分別報告各該黨均經集會一致議決贊成合併。旋復討論內部組織分爲五部：①總務部。②文事部。③政事部。④交際部。⑤會計部。宋氏於此曾提議：政黨以選舉爲要務，美國民主黨曾將選舉事務獨列一科，本黨可否仿行？惟谷鍾秀以爲政黨固以選舉爲重，但我國社會對於政黨之選舉運動視爲鄙陋，故不宜另設一科，乃決定歸入政事部中分爲執行與選舉兩科。而於政事部職掌則以「掌理關於政治運動事項」概括之（三）。由是可見，宋氏當時組黨注意重點之所在以及不得不遷就環境之實情。

八月十三日，五黨聯名正式發佈國民黨成立宣言：「相與合併爲一，舍其舊而新是謀，以從

事於民國建設之事，以漸漸進於爲共和立憲國之政治中心勢力，且以求符於政黨原則，成爲大群，藉以引起一國二大黨對峙之觀念，俾其見諸實行。」(二四)同日，同盟會總務部亦寄函各地支分部說明經過：「自斯而後，民國政黨唯我獨大，共和黨雖橫，其能與我爭乎。」(二五)蓋均出自宋氏手筆，其完成傑作，得意自豪之心情可謂活躍簡端。

其時，中山先生已訂期北上(見下節)，國民黨成立大會因俟其抵達北京後之翌日，即八月二十五日隆重舉行，會衆二千餘人，孫氏演說並通過規約後，即票選理事九人，結果宋氏以僅次於孫及黃興之票數膺選(二六)。爲當時全黨之領導中心，即素立於同盟會反對地位之時報記者黃遠庸亦以爲「宋君此次主持國民黨改組之功，於中華民國歷史上必有不可磨滅者」(二七)。

至於各部主幹亦多一時之選，如總務部主任幹事魏宸組、殷汝驪，幹事任鴻雋等。交際主任幹事李肇甫，幹事覃振、顧維鈞。政事部主任幹事谷鍾秀、湯漪。選舉科主管幹事楊永泰。幹事張東蓀、沈鈞儒、徐傳霖、羅文幹、劉盥訓、張耀曾、伍光建、文羣、仇鰲等。文事部主任幹事楊光湛。政務研究委員會主任幹事張耀曾、劉彥，幹事馮自由、石志泉、吳鐵城、張東蓀等(二八)，均學有專長，熟習歐、美、日本政治及學術，不僅在當時爲佼佼出衆者，即五十餘年來中國之民主政黨政治亦始終與此輩有重要關繫。此大可注意者。

於此有一亦莊亦諧之插曲值得指出者，即當同盟會進行大化合時，爲適應社會積習，減少不

必要之阻力，特將舊日政綱中提倡男女平權一案刪除。不意八月十三日同盟會舉行職員會議時，即有女會員前來哭鬧質問，並扭打宋氏，經張繼勸解暫告解散。然二十五日舉行成立大會時女會員又再度提出抗議，並再毆打宋氏。當經主席正式提付表決，以贊成增列男女平權於政綱中者居少數，中山先生蒞會致詞亦謂：「現在國勢危急，當先設法鞏固政府；蓋有國家，不患無平權之一日，若有平權而無國家，雖平權將無所用。」（三九）群情翕服，風潮始息。孫先生德望與其對國民黨之調護周至由此可見。

抑不特此，中山先生於國民黨成立大會中既詳細解釋民生主義，復謂「今本黨亦有採用民生政策一條」，而未作進一步之剖析（四〇），其委曲求全之苦心，殆在「體察大局情形，從穩健上相機行事」（四一）；故同盟會之急進份子如戴天仇（季陶）等加入國民黨亦著論鼓吹此政綱之真理，謂「全體黨員皆信崇此政綱而爲主義上、政見上之結合」（四二）。其立論與其後時過境遷之責難固大有不同也（見下第四節）。

至中山先生於國民黨之工作固亦曾作有限度之參與者，蓋彼自辭卸臨時大總統即認識內力日竭外患日逼斷非一時所能解決，若只從政治方面下藥，勢將日弄日紛每況愈下，故必須先從根本着手：發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國勢不搖，政治乃能活動（四三）。因之，對國民黨推舉爲理事長一職，亦未堅辭，惟集中大部時間精力於孫、袁同意之全國鐵路事業建設耳。

欲明孫、袁同意諒解之內容，當先了解孫先生解職後言行及與黃興先後北遊之經過。

二 孫黃北遊之前後

自晚清以來，中國政壇即有所謂南派北派，其區分之標準，地理位置以外，各種觀念之新舊亦居重要因素，蓋西人挾新學東來，南中感觸最先，風氣開通自亦較早，論者以維新派與南省人相提並論。而守舊者又以北人居多，非偶然也。民國初建，號稱統一，調和新舊糅合南北之聲響澈全國，實則時移勢易，如其謂南北對峙，不如謂北京、南京、武昌之鼎足而三，或袁、黎聯合以抗同盟會之爲符合事實也。中山先生解職以後，即抱周遊各省宣傳三民主義發展實業及教育之宏願。四月九日，首以武漢爲其第一目的地，雖謂震於鄂人之義聲，實則有種種政治問題待其解決，彌縫軍人與黨人以及黨人間相互之衝突要爲最主要者（三），而消弭南京、武昌間之歧見亦爲意中事。其非尋常酬酢，不待煩言。因之，袁世凱聞訊急遣范源濂、王賡（揖唐）接踵南下赴鄂向孫致意，「並呈小影，一如世凱躬陪盛譙，親挹雄談」（三）。蓋世凱深刻體認武昌在南京、北京間舉足輕重之地位，黎元洪雖已願爲己之工具，以首義元勳與副總統之威望爲袁作傳聲筒，袁所不敢公言於當時者，黎輒爲通電各方痛哭陳詞，建都問題發生，黎大倡移駐武昌之說，實間接以助移駐北京之成，其顯例也。然而黎究係軍人不諳政治，或恐見異思遷，有所動搖。袁致孫書謂：

「兩賢相聚，傾談國事，」「世凱羈滯幽燕，不獲飫聞政論，伊人秋水，寤寐交縈」，足以反映袁於孫先生武漢之行異常關切，而孫於鄂、粵之行後，必踐北遊之約，正所以消袁氏之疑忌也。

孫先生天下爲公敞屣尊榮，袁對之疑忌如此，故其對乎握兵權之黃興更有臥榻側不容他人鼾睡之概。

蓋自南北和議告成，革命軍北伐之議中止，兩江一帶結集近百萬之軍隊，如何處理？乃當時一大問題。遣散歸農原爲理論上解決之法，亦當時時勢所必需，然財政困難各軍經常經費久已拖欠甚巨，何來巨款清理欠餉及發給遣散費？袁世凱不欲擔此重責，乃於三月三十日任命黃興爲參謀總長統轄布置一切（三六），翌日又改任黃爲南京留守負維持整理南方各軍之責（三七）。同盟會中若干人士以孫總統雖解職，而有黃留守保持此一勢力，假以時日，整理就緒，則袁氏雖狡，終有所忌憚，而不敢別有異圖（三八），且即令袁心存猜忌，一時亦未必遽敢動搖及此也（三九）。

雖然，袁氏固一代梟雄有其狡計，故其對南軍首採分化挑撥之策略，利用黃興、徐紹楨之積弊（四〇）而故意挑發之。三月三十日既任黃爲參謀總長矣，翌日，又改調黃爲南京留守，另任徐爲參謀總長。堂堂政令，前後紛出，致引起南京軍界大不滿，四月四日集會討論，擁黃、擁徐者雙方幾致開鎗互射，從此各部官兵各有分野互相對立，粵軍、浙軍、贛軍時有衝突。徐惟有數電請辭（四一），而黃則財源困阨外又增加此煩惱，支持更形棘手，既反對袁向外國借款，自不便向中央

要求撥款，而所倡國民捐以救危困辦法，京、滬報紙又多反對(四二)，參議院對此請願亦決定不理，無法實行。袁之黨羽更乘勢推波助瀾於各地報紙揚言此一特設機關形同樹敵破壞統一者。參議員汪榮寶既在院倡議修改南京留守章程縮小權力(四三)，參謀次長陳宜復宣言：留守機關裁撤，民國即告完全統一(四四)。處此困境，幸各軍官兵深明大義，自願減薪助捐，並有自請解甲歸農以輕國家負擔者；故兩月之間南京軍隊裁撤二分之一，其餘亦經商定辦法按期分別裁併。此一事實充分證明「男兒愛國心理所同，起義光復之人斷無擁兵自衛之舉」(四五)。黃因不顧譚人鳳「保障共和者君一人而已」之勸阻(四六)，一再電袁請辭：「非敢自圖暇逸，實爲國家制度計」，蓋「統一政府既經成立，斷不可於南京一隅，長留此特立之機關，以破國家統一之制度，致令南北人士，互相猜疑，外患內憂，因以乘隙而起，甚非興愛國之本心也」(四七)。針對袁之心理，義正詞嚴；而袁面對譚人鳳初猶故意作態慰留(四八)，終於六月四日下令南京留守准予裁撤，旋派陸軍部次長蔣作賓持袁手函及近照南下慰問，並約黃即晉京「共籌大計」(四九)。十四日，黃將一切手續交代清楚即離甯赴滬。

其時，中山先生已完成廣東之行，經香港北上，袁世凱特派長子克定至滬迎迓，盼孫即踐「粵事大定」「屈臨指教」之前約，並請黃氏同行。孫、黃欣然應諾，訂期啓程，民立報因此著論指陳，孫、黃此行將使北京黨見與政爭逐漸正確與消化。蓋半年來國內各方爲達成本身利益非

構孫、袁，即間黎、黃。實則此四人乃當時民國缺一不可者。「四君合，則國民不可得而分也；四君分則國民不可得而合也」，「四君者一旦把臂於都下，吾人將以此爲完全統一之大和會，蓋形式上之統一不可知，精神上之統一乃大可恃」(五〇)。其言蓋可代表極多大數國民之意見。

八月十三日，孫、黃聯名通電各支部報告同盟會擴大改組爲國民黨，同時並謂已應袁邀訂期北上。十七日，孫、黃並已同登海輪矣，忽接北京同仁來電以張振武案發生，暫緩啓行，黃即舍舟登岸並電話真相，惟孫決心踐約，仍鼓輪北行(五一)。

當孫氏北行在途也，津、滬報紙屢傳暗殺孫、黃陰謀，舊金山少年中國報且電民立報詢問美人傳孫被害真相(五二)，孫仍不之顧。二十四日行抵北京，英國路透社因力讚其度量超人萬萬，中國黨爭自能無形消弭(五三)，而論者對黃之欲行則止頗致不滿焉(五四)。

抑自孫讓袁繼，各地報紙對國是觀點殊形龐雜，即同屬同盟會份子主辦之報紙步調亦極紛歧，其中激烈與緩進者且多互訐自亂陣營：如民權報即力攻袁與黎者，民立報則較持重；張振武案發生，民權報持論因益激昂，力倡武力解決，民立報則以正值孫氏北上，務爲調和之論，以爲責任應由陸軍總長擔負，不涉及袁、黎，吳敬恒因此寄書質問。民黨內部言論之錯雜如此，與孫之北行意義已大不調和，而北省報紙爲抵制計，亦捏發黃興與張振武勾結倒黎之嫌。黃一再電袁詰問，不得確證。幸孫、袁接談兩次，孫認定袁「絕無可疑之餘地」，此行已「大消北方之意

見」。因之，急電黃興促其即日北上，「則南方風潮亦止息，統一當有圓滿之結果」(五)。江蘇都督程德全亦勸黃北行以釋群疑，黃審度時勢爲貫徹和平建國初衷，乃於九月五日與陳其美同乘海輪北上(五)。

孫、黃北遊與袁懇談之結果，最重要者在建立相互間之直接認識，如孫認定袁可與爲善，絕無不忠民國之意，國民對袁萬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訐，使彼此誠意不孚，一事不可辦，轉至激迫袁爲惡(五)。袁亦認孫學識高明，黃誠篤爲公(五)。黃則在京隨時隨地以培養「聽反對者意見」之黨德爲言(五)。基此瞭解乃有八大政綱之宣佈，作爲當時建國之南針(六)。而趙秉鈞內閣之出現，尤爲孫、黃北遊南北交歡之一具體表徵。

蓋自唐內閣解職，北京政府即因之不寧者數月。陸內閣勉強組成，然陸因不得參議院之信任而灰心進取，又爲病纏，致國務多阻滯不前。逮國民黨成立，參議院形勢爲之改變，陸益無意問政，八月二十日遂正式向袁請辭。

陸氏辭呈提出之日，袁初以內務總長趙秉鈞代理。同時即遣教育總長范源濂，工商總長劉揆一訪宋，勉以國事爲重，尤勸其出任國務總理。宋當以組織內閣必與各國務員負連帶責任，若僅更換總理，不能與各國務員一致進行，必不能成一強固之政府；且與國民黨政黨內閣之主張大相刺謬，故堅辭不允，謂俟孫、黃到京再議，蓋孫氏正北行在途也。嗣孫氏到京，袁、孫討論及內

閣人選，孫以宋對，黃亦自滬電宋勸勉，然宋仍堅決謝絕。蓋以①正式國會選舉已將進行，臨時政府爲期已促，不能多所展佈，不如俟之異日。②爲調和南北感情，須有威望素著者始能得舉國之信仰，故向孫力薦黃出任艱鉅。黃、陳（其美）北上時，宋迎之於天津，並與同訪唐紹儀會商，唐初勸宋勉爲其難，宋仍以當前局勢如裁兵、借款、外交各重要問題非威望素著如黃者出肩大任，恐不能無掣肘，故仍堅持前議請唐力薦黃。唐、陳終以爲然。其後，黃、袁晤對，袁以是相煩，但黃堅決謝絕，蓋決心與孫注重實業盡力於社會事業，不願問政故也（六二）。

雖然，袁固不以黃、宋爲恆心者，真意實在段祺瑞或趙秉鈞承乏，俾可收指臂之效。但參議院中國民黨籍議員占大多數，能否順利通過殊無把握，且恐反貽人口實。因之決改提名沈秉堃，以沈名隸國民黨或能調劑新舊國務員及參議院，且袁、沈關係不深，以之擔任可免任用私人之譏也。然宋及國民黨多數人於此均不贊成，其所持理由非反對沈個人才能之高下，實以有違黨議，蓋沈若任國務總理，國民黨之政黨內閣主張必因之破壞，抑沈之毅力、經驗在參議院已經考驗，如再勉強出任，萬一再爲短命內閣，於國民黨名譽及正式國會選舉均有影響，故孫、黃、宋及國民黨幹部幾度集議，僉以今後對政府宜取穩健態度與袁提携，迎合袁之意趣而利導之，南北猜疑自然消滅，外人觀瞻當然一變，承認民國及借債問題自易著手；故決定不如採取放任政策，贊成趙秉鈞爲國務總理，俾其組織一純粹之袁派內閣（六三），並推黃以此議代達袁；九月十六日袁錢

別孫之晚宴席上，黃因以告袁，袁當欣然接受（六三）。二十四日，正式提出參議院，獲同意票六十九，不同意者僅二票，於是趙內閣遂告成立。

先是，中山先生到京翌日既參加國民黨成立大會，民國政黨於斯爲大，聲勢頓盛，唐紹儀爲求樹立政黨政治之基礎與環境，乃提議邀請袁世凱加入國民黨，趙秉鈞、梁士詒均表贊成，中山先生且毅然以介紹人自任，劉揆一、黃興等亦函電往返力贊其成。民立報北京記者因特撰長文論述其事之重要性，適申報亦稱共和黨有奉袁爲黨首訊，因之民立報於發表其記者長文時特加按語說明：「國民黨之發達並不在袁總統之加入與否也」（六四），民權報於此亦持相同論調（六五）。是國民黨員南北遙隔，見解亦有甚大距離。

其後袁加入國民黨終未成事實，而趙秉鈞內閣全體國務員入黨則爲當時政壇一「佳話」。緣自黃興到達北京，與袁晤對，即再三表示：現在臨時政府期限已迫，內政、外交諸多棘手，將欲組織強有力之政府，必賴強有力之政黨，然後足彰政府威信，鞏固國基，隱銷外患；國民黨惟一宗旨原在扶助政府，然使政府與政黨不相聯屬，扶助之責容有未盡，故擬邀請全體國務員加入國民黨。袁極以爲然（六六），孫亦與聞其議（六七）。十月四日，黃、陳（其美）離北京南下前夕，特張盛筵公開宣佈（六八）。翌日，孫復於上海國民黨歡迎會中演講贊揚斯舉，謂：「今日內閣已爲國民黨內閣，民黨與政府之調和可謂躋於成功，嗣後國民黨同志當以全力贊助政府及袁總統，袁總統

既贊成吾黨黨綱及主義，則吾黨出全力贊助之也。」（六）

值得注意者，即素持政黨內閣主張之宋氏於此仍目之爲「袁派內閣」（七），論者因之謂其「頗能講究嚴格的政治理論」，甚有謂國民黨內之所以有孫系、黃系、宋系者亦以此（七）。然以今論之，則此不足爲國民黨分歧之根據，政敵挑撥之辭，宋早已駁斥（七），且其素主兼容並包，惟「寬大」限度與黃容有距離，固無基本觀念之不同也。

抑自表面觀之，趙內閣之出現，當爲國民黨對袁之讓步。然而誠如陳少白所指陳：「國民黨非徒以退讓爲志，而漫然表同情於趙氏者也。」蓋國會總選舉爲時已迫，而臨時政府之職務尙多未盡，非速得一熟練機敏之人則過渡時代之任務將無由解決，大局或竟陷於危境。國民黨之讓步蓋以救國之熱誠表現多數黨之度量耳（七）。質言之，其目標蓋注在國會總選舉矣。

趙內閣成立後，袁曾表示希望於此數月內辦到①取消外蒙古獨立，②清還賠款收回關稅，③消納軍隊。並曾與黃會商對蒙問題，黃亟願擔負責任（七）；並鄭重推薦宋爲駐日本代表，交歡其朝野，緩和其侵略，勸說其承認民國，袁頗首肯，擬即提參議院徵求同意（七）；宋亦躍躍欲試（七）；祇以流亡近十載，老母倚閭望切，十月十五日，國民黨參議員會正式成立，十八日，宋乃與王寵惠乘京漢車南下（七），冀早親慈顏並以佈置總選焉。

三 國會議員選舉與大政見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五十三條規定：「本約法施行後，限十個月內由臨時大總統召集國會，其國會之組織及選舉法，由參議院定之。」因之，參議院北遷後即積極從事有關法規之製訂，經完成立法手續後，八月十一日由袁大總統明令公佈國會組織法及參議院、衆議院選舉法，規定民國會議由參議院、衆議院構成之。參議院由①各省省議會，②蒙古選舉會，③西藏，④青海選舉會，⑤中央學會，⑥華僑選出之議員組織之。衆議院以各地人民所選舉之議員組織之，依人口之多寡每滿八十萬人選出議員一人。並規定十一月一日舉行國會議員之初選，十五日，確定初選當選人名額，三十日，舉行複選，十二月十日，確定複選當選人名額，三十日以前將複選當選姓名履歷冊呈報京師。翌年（民國二年）二月召集國會（七）。國民黨組織之大前提，既着重於國會，故自九月以後，各地支分部即積極展開競選運動，參議員亦有回原籍作重張旗鼓之計者。宋之南行，蓋亦公私兼顧焉。

方宋氏於一九〇四年離湘遁走日本，兒生才三歲，母猶強健，今流亡歸來，兒長十二齡矣，不相識，母以貧故老病，妻亦悽悴，相見之際悲喜交集，母摩撫其肩泣謂：「汝幸得生回，毋去矣。」蓋亡命海外近十年，得衣錦榮歸固亦不易也。於是故人爭爲母壽，日飲酒道故舊爲笑樂，

欲事親終老以盡天倫，京中屢電促駕，亦未能出山。至民國二年一月初，以各方再三將國內各種危象相告，始勉強別母就道，東下長沙出武漢。

欲明各種危象之實情，當先知宋鄉居二月，國內政壇之變化，最重要者即亡命海外十五年之梁啟超回抵北京。

按自武昌首義以來，梁即曾回國有所活動，民國元年初夏，復曾遣人回國佈置，終以同志反對，時機未臻成熟未敢輕行。八月初，滇督蔡鍔受意通電各省歡迎梁回國，黎元洪亦電附和（七）；然胡漢民即爲文駁斥（八），而其先張繼、劉揆一固早有電迎梁（九）；是則同盟會人於此意見亦不一致也。國民黨成立前，共和黨屢欲與共和討論會議商合併，逮國民黨成立，梁之同志乃決計發起第三黨主張最公平之言論，不競爭政權，專注全力以普及政治知識傳播政治信條。八月二十五日，民主黨宣告成立，即共和討論會、國民協會等政團份子合併而成也（一〇）。九月杪，梁乘輪離日本神戶，十月二十日，行抵北京，共和、民立兩黨聲勢頓盛，因即決定合併，舉黎元洪爲總理，梁爲協理。國民黨亦欲邀梁出任理事，其爲時人所重如此，梁亦自言「所受歡迎，視孫、黃過數倍」，對於國會選舉，梁且謂「吾則必須身先士卒」（一一）。觀其公開講演，對共和黨之贊譽逾恒（一二），對國民黨邀約之堅決拒絕，蓋誠有「無日不與大敵相見於馬上」之概（一三）。其後共和、民立兩黨合併未成，梁終加入共和黨。

先是，共和黨爲運動總選，乃利用機關報對於國民黨橫肆挑撥離間，其所采方法爲①離間袁與國民黨關係，對袁則謂國民黨有野心，若國會選舉得勝，袁、黎勢力皆爲所侵。又向國民黨謂，袁虛與孫、黃委蛇以漸收政權，實則協濟某黨抵制國民黨。②離間國民黨內部，如對同時各政團則謂重要職務爲同盟會把持，對同盟會又謂有粵、湘兩派，對湘派又謂有黃、宋兩派，其手段敏妙，因人因地變化不測（八六）。覆按當時報刊，可見一般（八七）。蓋均利用宋鄉居不能完全有效控制局勢，故意傳佈流言，擴大矛盾，以搖撼甫經結合之國民黨黨員意志，打擊其競選國會議員之信心。

雖然，宋氏於此固有堅強之信心與決心者，觀其致友人有云：「政黨形勢，聞本黨有內鬩，前日兄來電警告弟以危象。然弟總料其未必有如是之甚，縱小有波瀾，當不至於成大風潮，放眼觀察人才之高下，有此能力者固不多也。且目下之形勢未必能於將來亦可包括，吾人既不爭目下，則將來自將有將來之局面，又何足憂。請兄不必懷杞人之念也。」（八八）其胸懷樂觀以及對國民黨員之信任由此可見。

抑不僅宋氏爲然也，中山先生當時於國民黨工作推進維護尤不遺餘力，例如國民黨貴州特派員于德坤奉派返省組織黨部時被暗殺案發生，孫即電袁、趙（秉鈞）、段（祺瑞）與貴州都督唐繼堯責問：「似此野蠻舉動爲全世界對於異黨人所無」，「鄙人忝爲國民黨理事長不能含默

漠視」(八九)。而於國民黨北京本部經費竭蹶，更力爲籌維，一再電商黃興、梁士詒撥助(九〇)。各機關報且特闢「國會選舉」專欄按日報導孫、黃、陳(其美)四處奔忙及各地選訊，粵督胡漢民亦匯款支助報館(九一)，是國民黨之於選舉，蓋全黨上下舉全力以赴。

於此應指出者，即當全國注意國會選舉之際，俄人與外蒙古簽訂協約及商務專條消息外傳，國人憤激萬分，僉以惟有與俄人干戈相見(九二)。中山先生亦通電全國主張錢幣革命解決財政問題以敵暴俄，「如其俯而聽人之瓜分，何如發奮一戰以勝強俄，而固我國基於萬代」(九三)。同時以地處日俄之間萬勿兩面樹敵作戰之理，中山先生因又同時密電袁建議中日聯盟，並願親往扶桑力促其成；袁復電不以爲然，謂只宜用個人名義作試探之舉動(九四)。時宋正鄉居，聞俄蒙協約事亦重提舊議擬挺身赴日本與彼邦人士提携，蓋是年秋間，宋居北京時，聞日本桂太郎將赴俄，即忽有所觸，往見國務總理趙秉鈞謂恐有第三次日俄協約發生，若然，其內容必不關滿洲事，恐內外蒙古將有瓜分之憂，宜即時與日本提携，除去日人向來對袁之惡感，免除日人與俄合從協以謀我，則庫倫獨立事或易解決；趙甚然其言。未幾宋又見袁談及外交事，亦以此爲言，並謂宜速解決庫倫事，即俄人代要求之三款，萬不得已時可讓步者亦宜忍痛讓之，否則延之既久，另生枝節，將來雖欲忍痛讓步以求解決亦恐不得；袁亦以爲然。其後竟未見政府有何進行(九五)。如今俄蒙協約果發生，不僅北邊益急，國際均勢亦恐從此完全破壞。宋痛心疾首之餘，除擬往日本以分俄勢外

，對袁政府之無能益感非常失望。觀其寄友人書云：「政局之事，弟意目下總無善法，可以翻身，正如中風之病人，不愈亦不即死，如是而已。想政府亦無善法，最良之結果亦必至於承認俄人要求之三條，然此猶必須政府從速妥結，弟意或不能如此，大約仍歸拖延敷衍爲多也。欲救此種政局，仍不外乎改組一負責任之政府，而目下既不能辦到，則惟有俟諸開國會而已。」（九六）其時時不忘責任內閣政黨政治以及寄望於國會選舉之心情，蓋亦活躍簡端，此其毅然含淚忍痛移孝作忠別母就道東下也。

民國二年二月十五日，宋經長沙、武漢行抵上海（九七）。其時全國總選已經揭曉，國民黨大獲全勝，而中山先生則於五日前率戴天仇等赴日本。宋氏遂與黃興、王寵惠等留滬爲國民黨領導中心（九八），肩負大任迎接國內政治之新形勢。

蓋自國會組織法公佈，民權報即以袁用武力壓迫參議院事例之出現，乃由於參院在南京時不能確伸其立法權堅持其建都南京之過，「既不輕諾其北都之請，又何有今日噬臍之禍」？因著「正式國會之殷鑑」，倡言正式國會應自行集會於其他地點，庶得盡立法之職權而組織最堅固之憲法，否則「縱使將來國會議員人人皆比肩盧梭，而駕孟德斯鳩，一入袁氏之武力世界中皆成無數木偶」（九九）。自是國會所在地乃成爲時論辯爭之一問題，且建都問題亦由此牽引而舊事重提。逮總選揭曉後，民權報記者何海鳴即於上海組織歡迎國會團，倡言國會自行集會先開預備會於上

海，隨即舉行成立會於南京。安徽都督孫毓筠因通電各方請力維大局，「勿爲此種非法之言論所愚」(108)。國民黨籍議員鄒魯等亦不贊同是議(109)。然而紛紛攘攘，則已加增政局之擾動(110)。

與國會集會地問題同時發生者尙有如何草訂憲法問題，按之臨時約法(第五十四條)及袁氏公佈之國會組織法(第二十條)由參衆兩院各選同數委員起草議定，原爲不容爭議者，乃江蘇都督程德全竟一再通電各省力倡先行設會起草以爲國會討論張本之說，建議修改國會組織法第二十條，改由各省都督聯合呈請大總統向參議院提議，仿美國各州推舉代表之例由各省都督各舉學高行修識宏才俊之士二人集爲憲法起草委員會；贛督李烈鈞、粵督胡漢民旋覆電贊成；湘督譚延闓、浙督朱瑞則主張改設憲法起草研究會。而倡反對之議者則副總統領鄂督黎元洪，以爲行政長官公舉之委員參預立法，「無稱事實，徒啓紛爭」(111)；同時國內報紙持反對意見者亦衆。然而李、胡、譚固均隸籍國民黨者也；持反對論最烈之民權報又國民黨之機關報也。國內政論之紛歧龐雜，由此可見。

抑不僅此也，憲法內容，各方爭議更多，袁本人意見尤堅決。當俄蒙協約成立，袁即曾面對國民黨等政黨政團代表申言：俄蒙事件早經料及，特大總統不負責任，無以自由執行，能否達到廢約目的，惟視將來憲法，則事皆易理，若爲弱國亡國憲法，雖勝余十倍之人亦無能爲役；此後

當爲全國制定憲法，不當爲防閑一人制定憲法；當思爲總統政府辦事地步，不當思爲防制一人防制政府而爲制定憲法宗旨。故制定憲法必取消防禦主義（二〇四）。其反對責任內閣制之意向顯明易見，而中央集權地方分權與各省軍民分治等問題各方爭論尤烈。江西軍民反對袁任命之民政長，國務院認爲此係反對總統任免特權（二〇五），論者又牽強謂此爲國家統一存敗之問題，中央政府威信存墜之問題（二〇六），因益增時局之緊張（二〇七）。

先是，當俄蒙協約發生，國人即有化除黨爭聯合對外之呼籲，國民、統一兩黨極表贊同，乃民立黨竟擬乘此機會以傾覆現政府，數政府十大罪以聲討之，一部份共和黨人亦隨聲附和。國民黨報曾盡力維護臨時政府（二〇八），乃袁氏更變本加厲，輒以命令代法律，專制面目日益暴露，而於整理財政毫無計劃，惟恃外國借款度日，且不惜以影響及於每一國民之鹽稅作擔保以求借款。於外交上尤步步失機，致俄侵蒙古、英侵西藏接踵發生，日本更虎視眈眈，內外危機重重，而袁恒以維持現狀敷衍了事。宋目擊心傷忍無可忍，民國二年二月十日在武漢歡迎會中乃開始公開指斥袁政府因循苟且「不惜以萬難收拾之局貽之後人，此其罪無可逭之處也」，而扶危濟傾端在國民黨矣（二〇九），其後在上海、杭州等地演講益復發揮此旨，三月九日在南京更對各種紛爭問題表達意見：①總統當爲不負責任，由國務院負責。內閣制之精神實爲共和國之良好制度，國務院宜以完全政黨組織之。混合、超然諸內閣之弊既已發露，無庸贅述。②憲法問題當然屬於國會自

訂，毋庸紛擾。③至於先定憲法後舉總統，本光明正大之主張，不能因對人問題以法遷就之，亦不能因對人問題以法束縛之。吾人祇求制定真正之民主共和憲法，產生純粹之政黨內閣。此後政治進行先問諸法，然後再問諸人。凡共和國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國民黨現今應有之黨略亦當依此方針以謀穩健之進行。④地方問題則分其權之種類而為中央地方之區別，大綱既定，地方問題自迎刃而解，惟道府制即觀察使等官制實為最腐敗者，萬不能聽其存在（二〇）。蓋與袁系主張針鋒相對焉。

按歐、美各國每屆總選，各政黨為爭取國人擁護輒自消極上指責對方之錯誤與弱點，在積極上敷陳本黨之政見，宋氏既以推行政黨政治於中國自任，故以身作則現身說法，說詞滔滔萬言皆一本於事理，毫無叫囂謾罵，論者皆謂不失在野黨監督政府之真面目。然數千年專制之積習，加以予智予雄迷信武力之袁世凱固不慊於此者，故袁系報紙旋即刊出所謂「某當局之時事談」及「匿名氏駁詞」，復有所謂救國團者通電各省橫肆駁擊，欲以恫嚇以制宋之口，然宋本威武不能屈之精神復為文答辯（二二），且積極草擬國民黨大政見，蓋各省國會議員先後來滬均欲一聞大政方針也（二三）。

綜合宋手草大政見及中央行政與地方行政分劃之大政見（二三）觀之，其所主張可得而言者約有下列數端：

一、甲對於政體之主張：①單一國制，②責任內閣制，③國務總理由衆議院推出，以促責任內閣之成立，其他國務員由總理組織之，不須國會同意。④主張省、縣並爲自治團體（二四）有列舉立法權，惟不得與中央立法相牴觸，至於自治行政之範圍則以地方財政、地方實業、地方交通、地方工程、地方學校、慈善公益事業爲限。

二、對於政策之主張：

①整理軍政：①劃分軍區，②統一軍制，③裁汰冗兵，④興辦軍事教育，⑤擴充兵工廠。

②劃分中央地方行政：①縮小省域實行二級制，省下即直承以縣，皆設地方官，掌官治行政並同時設爲自治團體。②地方自治團體與聯邦國之各邦不同。③中央集權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制之地方分權亦不宜。謂宜折衷，以對外的消極的各政務歸之中央，以對內的積極的各政務歸之地方，其地方制中則尤注重於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參與施行以重民權（二五）。

③整理財政：①厲行會計制度，②統一國庫，③設立中央銀行，集中紙幣發行權，④整理公債，⑤劃定國費地方費及國稅地方稅，⑥改良幣制行虛金本位。

④整理行政：①劃分中央與地方官之權限，②裁汰冗員，③厲行官吏登庸考試，④實行

懲戒官吏失職。

⑤開發產業：①興辦國有山林，②治水，③放墾荒地，④振興鑛業。⑤獎勵仿造洋貨工業，⑥獎勵輸出品商業。

⑥振興民政：①整頓警察，②厲行衛生，③釐正禮俗，④調查戶口，⑤厲行地方自治。

⑦興辦國有交通業：①急辦國有鐵道，②整理電信，③擴充郵信，④興辦海外航業，⑤整理鐵道會計。

⑧振興教育：①法政教育，②工商教育，③中學教育，④中小學師範教育，⑤女子教育。

⑨統一司法：①劃一司法制度，②養成法官律師，③改良監獄。

⑩運用外交：①聯絡素日親厚之與國，②維持列國對我素持之主義。

內政外交，綱舉目張，中央地方，鉅細靡遺，有此草案，國民黨籍議員會集上海乃得據爲討論基礎，詢謀僉同，而以一切佈畫付宋赴北京主之，步驟計劃井然有序爲他黨所未有（二六）宋方冀從此有所展佈，乃不幸爲袁遣人暗殺，實志以歿，大可傷已。

四 蓋棺論不定

自國民黨重要人士群集滬濱，商討應付國會之黨略，大綱既定，宋氏即擬挾以至北京黨本部決議施行，適袁世凱亦電促赴京，宋因訂期三月二十日與若干國會議員同行北上，不幸是晚甫步入上海車站，即遭預伏奸徒狙擊，腰際中彈，急救罔效，二十二日遂以不治身死，噩耗傳去，全國人心鼎沸，密雲不雨之時局至是大風暴來臨。

溯自宋由湘赴滬途經武漢時，譚人鳳即曾勸其稍加戒備以防不測，然宋堅持不肯。滬、甯各地演講更毫無忌憚，時滬上已傳說有人將不利於彼，宋本人亦所親聞，友人多勸其自珍，而宋仍夷然處之，以爲光天化日之政治競爭，不容有此種卑鄙殘忍之手段，異黨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謠言耳；且即使非謠言，吾豈以此懈吾責任心哉！友朋聞此方深服其淵量，而不意暗殺之事居然實現（二七）。方宋被刺消息初傳，國民黨北京人士即認定必與宋在滬、甯演說有關，似有人希承意旨專與宋爲難者，更有謂梁士詒南下時已承某某密囑暗携刺客謀去所忌者（二八）。而滬濱謠言則誣指爲陳其美之陰謀，陳聞訊即囑其親信上海電報局局長吳佩璜詳查各方來往電報，遂迅即發現線索（二九），三月二十三日將主謀兇手應夔丞、武士英先後逮捕，並在應寓搜獲各方文電甚夥，經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閔派員會同租界法庭詳勘。四月二十五日，程、應聯銜通

電公佈重要文證，霹靂一聲，陰霾盡揭，至此袁世凱、趙秉鈞授意殺宋已成鐵案（二三），蓋爲素喜應用暗殺手段之袁氏一空前傑作也（二三）。

自來論袁必欲置宋於死地者，以宋「只肯把正式總統讓給代表舊勢力的袁世凱，而內閣必操諸代表新勢力的政黨」（二三）。然今日綜合各種史料觀之，此說實皮相之談，而未把握事實真相。質言之，如宋若有意「只肯把正式總統讓給袁世凱」，尙不致死！惟其不然也，故袁乃出此毒手。蓋當時謠傳宋、黃活動舉黎元洪爲正式總統，宋以國會多數黨之推選出任國務總理把握實權，袁將被排斥於政府之外。

以下史料即爲支持此一論點者：

民國二年三月宋自撰「答匿名氏駁詞」有云：「近日以來，造謠生事，捏詞誣人，使民心惶惑，國事敗壞，實爲不鮮——如謂黃、宋運動黎元洪爲正式總統，贛、皖、閩、粵聯絡獨立等之謠皆是。」

今按宋氏雖謂「造謠生事」，然正如時報記者黃遠庸所指陳：「今日北京則專以街談巷議處置國家大事，此真吾國民之不幸也。」（二三）況所謂黃、宋運動舉黎云云，又有若干蛛絲馬跡可尋乎？

宋氏摯友日人北一輝之言曰：「彼（宋）組織國民黨自爲實權總理，占上下兩院三分之二

的絕對多數，將行將選舉之正式大總統人選放於心中……彼不推南孫，不想北袁，而默想第三者——最爲愚呆脆弱之黎元洪。」（二三）此一證也。

文章炳麟自定年譜民國二年有云：「袁既就職歲餘，漸恣肆，克強甚畏惡之。因正式國會改選總統，余謂宜推黎公。上書問其去就？會遜初（宋）亦與黎公成言，或言其有所要挾，機事不密。三月，盜殺遜初於上海……黎公以遜初死，懼及己，益慄慄。」（三五）。

證之以民國二年四月六日黎元洪之通電有云：「總統一席豈惟五洲耳目所關，抑亦全國身命所寄……乃遠道不察，頗有馳書垂問欲相推舉者，雖不虞之譽出自衆情，而無因之投，彌增隱痛。」是章氏之言，固可信也。而黎電續云：「嘗與海內人僞妄自比附，沈機默運智深勇沈，洪不如袁項城（世凱）。明測事機襟懷恬曠，洪不如孫中山；堅苦卓絕一意孤行，洪不如黃善化（興），」——「果使總統得人，國基鞏固，洪雖無狀，猶當率江漢子弟維持南服，擁護中央……倘或有少數議員垂愛個人貽誤全局，在元洪爲損友，在民國爲罪人。」（三六）是其表明謙退之餘並未堅主必推袁也。

抑時報記者黃遠庸於同年四月七日北京通信中指陳：「國民黨多數人，似已不主張舉袁爲總統，其中有擬舉黎者……傳言上海國民黨交通事務所已以此意與上海民主黨人接洽。」（三七）證之以國民黨籍議員鄒魯之記述，則黃遠庸之言固不誤。鄒魯之言曰：「國會開會……國民黨其時

正欲與他黨更爲攜手……尤希與民主黨及共和黨之民社派提攜，因宋遜初先生所遺之黨略也。」
(三六)

故綜合上述舉黎之說，實非造謠生事之流言。

意宋之所以擬舉黎以代表袁者，袁之專制野心自是一因，而黎之才幹正如北一輝所謂「愚呆脆弱」恰適合責任內閣主張者之要求，又以「首義元勛」，既得章炳麟擁護於前，復蒙梁啟超贊揚於後，以之代表袁坐擁總統虛名當可得國人之同情。且黎早已於國會組織法公佈後即曾派員分赴各地有所活動(三六)，今如順應其心意，既可滿足其慾望，使其離開武漢老巢。故如此計劃成功，則既去袁又收黎於掌握，一舉兩得，爲計上上者，而所謂全國統一強固之中央政府當可望實現矣。

抑綜觀民立報所載宋氏在湘、鄂、蘇各省行踪及演詞，則攻擊袁政府之言實始於武漢之歡迎會中，逮行抵上海演辭更指斥袁政府之因循失機不遺餘力，而國民黨籍之國會議員集居滬濱者亦慷慨激昂揭袁之野心，以爲非推倒袁無以奠定共和，蓋當時南方對於總統固無舉袁之主張也(三七)。而時局已極緊張(三三)，擁黎之謠遍傳，袁系與國民黨兩方猜忌益甚，三月九日宋在南京演說與袁意旨針鋒相對(三三)。民立報又發表社論，對於袁系報紙刊佈非舉袁則中國必亡之言論力予駁斥(三三)，於是袁、趙非迅速立即拔除此眼中釘不可矣(三三)。

方宋受傷至醫院也，猶授意黃興代擬致袁世凱電文殷切期望袁「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會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二三）。因之，宋以身殉國後，國民黨籍國會議員仍按原訂計劃北上，民國二年四月八日，中華民國第一屆民選國會正式揭幕，巴西國即於是日正式承認中華民國，其他各國繼之。同月二十五日參議院選舉國民黨籍議員張繼爲正議長，王正廷爲副議長。同日，程德全、應德閔聯名通電公布宋案文證，於是國民黨與袁勢不兩立矣。然而袁爲達成利用國會選舉其爲總統之目的，不亟亟於採取解散國會及國民黨之手段，而用金錢賄買手段以分化國民黨，蓋六國大借款已秘密簽字可供其揮霍也。同時經梁啟超等之積極策動，民立、共和、統一三黨於五月二十九日正式合併成進步黨（二三），供袁驅使，於是國民黨勢漸殺，非國民黨之勢日張。

誠如國民黨籍議員鄒魯所指陳：此一形勢之演變，袁世凱種種手段——尤以金錢賄買——固爲大原因，而國民黨內部亦有以助之者。蓋①自宋氏遇害，黨內其餘領袖不能北上主持一切，大有群龍無首之概。非特不能聯絡他黨，即統一內部亦難有其人，黨中非無卓絕一時之才，特非黨魁，指揮滋困，而黨魁在上海之主張又往往與本部相左，更令人靡所適從。②國民黨合各派而成，但同盟會一派手創民國，實比他派主張爲激，如是所謂穩健者，心常快快，離心力遂日增強。③此日國民黨謀叛，彼日國民黨暴烈，是非之辨難明，利害之心遂生。於是國民黨員紛紛脫

黨（二三）。

今按鄒氏所謂黨魁主張紛歧云云，殆指孫、黃而言也。孫文學說及陳（英士）其美致黃興書述說甚詳。此不贅。惟譚人鳳之回憶饒有價值，錄之以見真相。牌詞有云：

「余往與克強商，適中山、英士均在座，詢其主張。中山曰：此我錯認袁世凱之過也。若有兩師兵，當親率問罪。克強曰：此事證據已獲，當可由法律解決。余駁之曰：孫先生之說空論也，兩師兵從何處來？黃先生之說迂談也，法律安有此效力？愚見以爲宜遣一使促湘、粵、滇三省獨立，再檄各省同興問罪之師，以至仁伐至不仁，必有起而應之者。克強曰：宣告獨立，袁將藉口破壞統一，用武力壓迫。余曰：公道在人心，如真是非已大白於天下，袁欲出兵不特兵出無名，且借款未成，每月政費尙無着，兵費從何而來？滇、粵遠在邊陲，中央鞭長莫及，湘省即當衝要，有贛、皖可以邀擊，亦可無虞；夫何懼之有？克強曰：先生議論雖豪爽，但民國元氣未復，仍不如以法律解決之爲愈，證據確鑿，俟國民開大會發表後可組織特別法庭缺席裁判，何患效力不復生？再四駁之，固執已見，余於是專以宋之葬事爲己任。彼等之籌劃遂不復問矣。」

以今論之：所謂「真是非已大白於天下」以及「國民開大會」云云，在當時固均不易言之也。蓋如李劍農教授所指陳：「其時袒袁的心理，純粹爲『非袁不可』四字所籠蓋，而『非去袁

不可』的心理，一時尙不能發現，因爲尙不相信袁氏果然要作皇帝；「袁氏得此輩人的援助，所以着着制勝。」（二六）質言之，其時人心厭亂，而不知亂源即在袁。此所以二次革命終於失敗，國民黨及國會終被袁強迫解散，宋氏竭力反對之對俄妥協，以鹽稅作抵押之大借款，先選總統後訂憲法均在袁魔掌控制下一一實現，北洋軍閥勢力且南及長江流域，魚肉人民十餘年（二七）。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宋氏之死蓋有重於泰山。

於此有應特予指陳者，即宋氏殉國將近四十年，幾經戰亂，上海墓園木石早圯（二八），然蓋棺而論不定，例如馮自由民國二年任稽勛局長極力爲宋死事表彰者。乃民國九年編著「社會主義與中國」一書竟以國民黨改組時黨綱列民生政策，謂爲宋「熱中利祿」之「忘本的舉動」（二九）。再如民國二年著「民國政治論」讚揚國民黨黨綱之戴季陶，民國四十四年五月著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書又反斥宋爲「革命黨的第一個罪人」，亦以其用「民生政策」也。

然以今論之，此不能歸罪於宋氏也。蓋宋氏原爲注意國家社會主義並以爲不如稱之爲國家社會政策者（見第三章第三節）。而民國元、二年中山先生固亦再三公開宣稱：民生主義即國家社會主義（三〇）：「我國今日而言社會主義，主張土地公有，則規定地價及徵收地價稅之二法，實爲社會主義之政策。」（三一）——社會主義之應稱作民生主義，原爲馮自由所津津樂道首創者，然則民生政策云云要即民生主義之政策，固不能謂宋揚棄民生主義也。

然則馮、戴兩人之言論何以前後歧異，一言以蔽之，則均爲適應變化之政治環境而云然，前此之贊揚宋，乃因民國初年國內反對社會主義者衆，其後之咒罵宋，則爲迎合民國八、九年間國內青年對共產主義之時尙而已，非篤論也。觀乎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八日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監委員在北京西山舉行第四次全體會議（反共之西山會議）第十次會議決議：戴季陶書中「歸咎宋鈍初及諸先烈爲盲從兩點應通知戴同志刪改，並不必用本黨名義發行。」（二四）可謂是非自在。如今赤流橫溢神州大陸，吾人覆按宋氏「社會主義商榷」（見第三章第三節）文中指陳冒然推行共產主義於中國之惡果：「亡國滅種之禍因是促成，乃至欲求政治與財產制度時代之不自由不平等而不可得。吾人試想像此悲慘之狀況其亦不能不生恐怖之心者矣。」誠不勝涕泣以悲悼哲人其萎。

抑論者每以宋氏主持改組國民黨爲非者，或有訾其中份子複雜者。然而誠如張繼所指陳，斯論不確，蓋既頒佈約法，當然要有國會，既有國會，自必須有大黨運用其間，當時賄選之風尙不曾有，國民黨能獲大勝，謂非宋氏組織之功得乎（二五）？且至民國五年袁殂後，黎元洪繼任，恢復國會，中山先生即徇衆議規復國民黨（二六），其後經改組，而始終沿用其名稱，足見此其重要。即如進步黨人黃遠庸亦謂「宋君此次主持國民黨改組之功，於中華民國歷史上必有不可磨滅者（二七）」，五十餘年之歷史證明其爲篤論也。

第六章 附註

(一) 民立報民國元年六月十日第二頁「斥第二次革命說之荒謬」「二次革命即爲自殺之代名詞」。

(二) 民立報民國元年七月十二日第二頁「解惑論」(行嚴)有云：

「記者年來稍習政事即深信非有絕強之中央政府不足圖存，而此種政府惟在內閣政治之下可以得之，久懷挾此意，欲以就正於國中賢達，歸國之日首晤宋君漁父，所見即與記者絕合，可見同盟會本此製爲政策，淵源甚深，與記者執筆了無關係，今某報謂同盟會之政見爲記者所影響，何其厚誣同盟會之甚也。」

又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第三五頁有云：

「章士釗歸自英倫，晤桃源宋教仁遜初於(南京)游府西街，教仁以能文善辯說，有造於共和，而爲孫總統所倚重者也；則坦然相告曰：『子歸乎，吾幸集子所言，以時考覈，藉明憲政梗概。』士釗問其故，教仁出示一帙，蓋士釗投寄北京帝國日報英憲各論，教仁次第裁取已褻然成一冊也。於是士釗乃以明憲法，通政情爲革命黨所欲禮羅。」

綜此可見章、宋兩人於民主立憲制度研討有素，持論絕相合，宋似受章之啓示爲多也。

(三) 民立報「內閣果非對於議會而負責任乎」(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吾國政治現象之怪特」

(民國元年六月五日)，「政黨政治與新聞」(民國元年七月九日)，「政黨內閣談」(民國元年七月七日)，「論國務院官制與內閣制」(民國元年六月三十日)，「論參議院與行政部之關係」(民國元年六月二十五日)，「論吾國責任內閣制之難速成」(民國元年六月十九日)，「政治之新經驗」(民國元年六月二十一日)，「總統與總理權限問題」(民國元年六月二十四日)，「組織內閣談」(民國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政黨政治之唯一條件」(民國元年七月一日)，「黨爭中憲法問題」(民國元年七月二十二日)，「論議會與表決國務員之關係」(民國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其毀黨造黨說首見於民國元年七月十五、十七、十九日連載之「政黨組織案」。

(四) 民立報民國元年二月二十一日「新總統與內閣政治」。

(五) 鮑明鈐中國民治論第六一、六二頁。

(六)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第三七五—三七九頁於此記述甚詳，可參閱。

(七) 民立報民國元年六月二十三日「時事雜評——政黨內閣從何發生」。

(八) 民立報民國元年七月二十一日「北京政局之大波動」。

(九) 民立報民國元年七月十八日「論同盟會員堅不入閣事」。

(一〇) 民立報「政黨組織案」，「毀黨造黨說」(民國元年七月二十九日)，「發問」(同年八月一日)，「毀黨造黨之意見」(同年八月四日、七日)。

(二)例如民立報民國元年七月二十七、二十九日「政黨問題」(吳敬恒)。

(三)民立報民國元年八月五日「與友人論黨派書」(參議員楊廷棟)。

(三)民立報民國元年八月七日「毀黨造黨之意見二」。

(四)民立報民國元年八月十六日第六頁「蔡鍔毀黨脫黨通電」。

(五)民立報民國元年七月十七日第三頁「時局百論」(徐血兒)。

(六)民誼第四號(民國二年二月十五日)楊永泰在同盟會粵支部演說：「當日南京會議同盟會開放主義不能通過，及宋教仁君等既到北京，始知我同盟會有萬不能不開放之理由。緣一般人心或疑同盟會尚持秘密主義，不肯加入。」遠生遺著卷一「對於三大勢力之警告」有云：「同盟會於革命事業之有功無功，讓之後世公論，不待繁言。吾蓋深惜同盟會以絕好之基礎，可得全國之信仰者，而乃以種種自殺之政策墜喪之：第一墜喪之於南京政府。第二墜喪之於南京政府取消之後，不能確定消納新舊調和南北之政策。惟是日為勢力相持之爭。第三墜喪之於不能先時改組，及改組為國民黨時，又不能盡如宋遜初之志，行大改革，惟是為一時之勢力計，委曲彌縫，以裝飾外觀……向令南京政府初成立時，同盟會奮然改組，廣納社會各方面有品望之人，斟酌國情，齊一趨向……。」綜合正反兩面記載蓋均深以同盟會遲未擴大為憾也。

(七)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四〇〇頁。

(一八)同上第四〇一—四〇四頁。

(一九)民立報民國元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國同盟會粵支部雜誌第七期(民國元年九月十一日刊行「夏季大會紀事」演詞)。

(二〇)民立報民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第六頁「同盟會大會紀事」。

(二一)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第三七六—三七八頁於此記述甚詳，可參閱。

(二二)民立報民國元年八月十八日第六頁「五大黨合併詳誌」。又民誼第四號楊永泰演說：初擬改爲民主黨，後因美國民主黨數十年來不能一握政權，於是國民黨之名始定。

(二三)同上「五大黨合併詳誌」。

(二四)中國國民黨黨史稿第一三二—一三五頁。

(二五)同上第一三一—一三二頁。

(二六)民立報民國元年八月三十一日第六頁。

(二七)遠生遺著卷一「政談竊聽錄」。

(二八)國民黨黨史會會藏油印職員錄原件。鄒魯黨史稿第一四一、一四四頁只列理事參議，於幹部均未列名。而謂「龍魚雜處真偽不分」，未免武斷不實。

(二九)民立報：民國元年八月十八日第七頁「女子大鬧同盟會」。同年八月三十一日「孫中山先生入京後

之第一會」。總理全書函札上册第三二三頁「覆同盟會女同志論男女平權函」有云：

「黨綱刪去男女平權之條，乃多數男人之公意，非少數可能挽回，君等專以一二理事人爲難無益也。」

(三〇)民立報同年八月卅一日，總理全書「演講」上册第一〇六頁。

(三一)總理全書「函札」上册第三二六、三二七頁「覆南洋同志述國內政情函」。

(三二)民誼第五號（中國同盟會粵支部發行，民國二年三月五日刊）天仇：民國政治論。

(三三)民立報民國元年八月二十二日第七頁孫中山致宋遯初書，亦見總理全書函札上册第三七頁。

(三四)居覺生先生全集下册第五五五頁「總理遊鄂」。

(三五)同上書第五五九頁民國元年四月十一日在漢口行轅，「接見袁世凱派來范源濂、張大昕代表，出袁氏手函稱歡迎總理北上誠意」。今按袁氏手函原件，其文云：

「中山仁兄先生閣下：大業告成，高飛激舉，鴻冥天羣，蟬脫塵埃，企慕私忱，匪言可喻，頃得滬上消息：知大駕將赴鄂中與黎君、宋卿傾談國事，兩賢相聚，天炳德星，世凱羈滯幽燕，不獲飫聞政論，伊人秋水，寤寐交縈，本擬歡迎旌節，示我周行，因前承電復須先回粵一行，粵事勢如亂絲，非先生才望不足以轉危爲安，世凱何敢以一人之私，孤粵中父老雲霓之望，惟數月後，粵事大定，務請屈臨指教，俾紓輞飢，茲遣范君靜生、張君眞吾兩員蒞鄂上候起居，並呈小影，一如世

宋教仁：中國民主憲政的先驅

二三六

凱躬陪盛譙，親挹雄談，臨穎神馳，無任延跂，惟爲自重不宜。」

紅色八行箋楷書，末親署「袁世凱叩上」五字無月日。又一函云：

「逸仙先生鑒：頃上寸楮交由唐君在禮、范君源濂賁呈，並面致區區，茲復加派張君大昕、王君賡偕同前往，所有鄙意統囑由四君代達一切，幸垂教焉，手此再問起居，袁世凱再叩。（親筆）」

（三六）臨時公報民國元年三月三十一日命令：「兩江一帶軍隊衆多，事體繁重，參謀總長黃興威望卓著，情形熟悉，特任命統轄布置，現值建設伊始，時艱孔殷，該總長素顧大局，務當力任其難，爲國民謀幸福，本大總統有厚望焉。」

（三七）臨時公報民國元年四月一日，任黃興爲南京留守仍統轄南洋各軍，又同書四月十五日命令欄公佈南京留守府條例，錄之以見其職掌範圍：

南京留守府條例

- 第一條 南京留守直隸大總統有維持整理南方各軍及南京地面之責。
- 第二條 凡南方陸軍水師要塞，均歸留守處理，隨時通報陸、海軍部及參謀部。
- 第三條 南方如有事變，不及申請大總統時留守得先調遣軍隊、軍艦相機處置，隨即申報大總統，並通報陸、海軍部及參謀部。

第四條 關於南京府知事交涉巡警所管事務，均歸留守統轄。

第五條 南方各軍及南京地方各官廳之人員，統由留守會同江蘇都督任免申報大總統。

第六條 關於留守管轄範圍內所需款項由留守咨商理財部籌解。

第七條 南京留守府，俟南方軍隊整理就緒，即行裁撤。

(三)居覺生先生全集下冊第卅四頁「留守裁兵及辭職」。

(三)譚人鳳牌詞。

(四)錢基博辛亥江南光復實錄及辛亥南北議和別紀兩文記黃、徐各以湘、粵籍貫及漢陽、南京戰事互有不慊事甚詳。

(四)天鐸報民國元年四月五日、七日、十四日專電欄。

(四)民立報民國元年五月九日第十頁「異哉新聞記者」。

(四)天鐸報民國元年五月十日、十二日專電欄。

(四)民權報民國元年六月二日「留守去留問題」。

(四)民立報民國元年六月十七日第三頁黃興解職通電。

(四)譚人鳳牌詞。

(四)同(四)。

(四)譚人鳳牌詞。

(五)民立報民國元年七月十九日黃克強致總統函，有云：

「慰公先生大總統鈞鑒：日昨由蔣雨巖（作賓）次長交到手書尊照，既見禮蔑之心，如觀葉公之面，私衷欽仰未可言喻。念自南北統一，先生獨排衆議，竭力主持，進福國民，誠非淺鮮，方今建設伊始，經緯萬端，財政日陷於危機，輿論未衷於一致，潮流所至，國本堪虞，尤賴展布鴻猷，以匡大局，興歷年奔走，學殖久荒，才智不及中人，精力亦漸忡憊，臨時政府成立以來，迭次忝膺重任，勉竭駑鈍；實無寸長，退職之餘，方思補過，而賜示乃獎勵逾量，策以方來，命速至京，共籌大計，再三祇誦，媿悚彌深，惟是國事關懷，肝膽尚存，深念我公獨當衝要，勞怨不辭，興也何人，豈敢惜此一行，苟安旦夕，雖管蠡之見無可貢獻，而得見君子，藉聆名言，實所欣願，前因風扇傷手，瘡痕未愈，近復腳氣發痛，跬步艱難，俟稍就痊可，即當遵命北行，攝衣進謁，茲因蔣次長還京之便，附呈相片，先表企慕之忱，伏維垂鑒，敬頌鈞安！黃興頓首。」

(六)民立報民國元年七月二十三日「孫黃北上之關繫」。

(七)民立報民國元年八月十九日第十頁有云：「十八日午後孫中山先生乘安平商輪北上，有以張振武案，多勸勿往者，孫甚決心，謂無論如何不失信於袁總統，且我極以袁總統爲可靠。故必欲一試目光。黃克強則偶患喉疾，重將行李運岸，並電京詰問張案。」茲就民立報刊載袁黃來往電擇錄於左：

◎袁大總統復黃克強先生電

「黃克強先生鑒：巧電悉，張振武一案，黎副總統原電有懸惑軍士勾結土匪破壞共和昌謀不軌，乞立予正法等語，黎副總統爲鄂軍督帥，對其所部宣佈罪狀請正典刑，自應即予照辦，至原案顛末已電黎副總統明白宣布矣，中山先生北上無任歡躍，執事因事稍緩，望眼欲穿，仍祈即日啓行，得罄肝鬲，大局幸甚，鄙人幸甚，袁世凱皓。」（民立報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第六頁）

◎黃克強先生再致袁總統電

北京袁大總統鑒：皓電敬悉，黎副總統原電述張、方罪狀，語極含混，凡有法律之國，無論何級長官均不能於法外擅爲生殺，今不經裁判，竟將創造共和有功之人立予槍斃，人權國法，破壞俱盡，興前在留守任內辦理常州軍政分府趙樂羣一案，輿論均謂可殺，興猶迭開軍法會審，由王師長芝祥率同會審各師長，法官調齊人證，悉心研判，業經取具確供，復彙案呈請大總統飭交陸軍部覆核，原期詳慎議定使成信讞，以示尊重法律，擁護人權，爲各省都督開一先例，庶幾共和開幕國民不至有死於非法之懼，而張、方案乃如此，兩事相距爲期甚邇，張、方獨因一面告訐者擅定極刑，未訊供證而死，國民生命財產權專恃法律爲保護，即共和國精神所託，且在前清專制時汪精衛謀炸攝政一案訊供確鑿，尙能出以詳審，僅予監禁，縱使張、方對於都督個人有不軌之嫌疑，亦豈能不據法律上手續，率請立予正法，以快私心，現在外患日迫，政府信用未固，益以此事，致羣情激

宋教仁：中國民主憲政的先驅

二四〇

動，外人輕視，民國基礎益形危險，顧瞻前途，良用滋感，旁皇終夜不知所措，洒涕陳言，伏維諒察，黃興弔。」（民立報民國元年八月二十一日）

③黃克強先生致袁大總統電

北京袁大總統鑒：興前因病赴西湖療養，今晚返滬始見孫中山先生自津來電謂：頃見一總統府秘書云：張振武被執時在張處搜得一書係與興者，內容有云託殺黎元洪事已佈置周妥等語。今日又閱滬報譯載文滙報北京電云此間謠傳張振武之謀第二次革命，黃興實與同謀，故不來京云云。閱此兩電不勝駭異，張案鄂、京尚未盡情宣布，讀漾電亦云案情重大，牽涉尤多，今京、滬忽擬議及興，若不將張案所牽涉者明白宣佈，則此案終屬暗昧，無以釋中外之疑，務請大總統勿循勿隱澈底查辦，如興果與張案有涉，甘受法庭裁判，如或由小人從中誣捏人罪，亦請按反坐律究辦，庶幾全國人民皆得受治於法律之下，鄙人幸甚，大局幸甚，立盼電覆，黃興叩。」（民立報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④黃興啓事

張君昉十年前與興同學，且係舊同盟會員，此次受袁總統之託來滬接孫中山先生及興赴京，其睦念大焉熱誠可感，興本擬與孫先生同行，因事稍緩，且有孫先生與袁總統携手，諸事必能商酌，興之北行與否何關重輕，承張君過愛，覺興一人不往於大局頗多關礙，故敦促之情甚為急迫，乃報

紙所載不知內容，致與張君本意相左，與對此極為歉仄，特此布告以明事實，黃興謹啓。（民立報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吳敬恒「致胡漢民書」（「吳稚暉先生選集」下冊第三一九頁，民國五十三年臺北版）有關孫先生先行，黃先生後去之詳細憶述。

（三）民立報民國元年八月二十一日第三頁，同月二十四日專電。

（四）民立報同年八月二十五日。

（五）譚人鳳牌詞

（六）總理全集「文電」第二五頁。

（七）民立報一九一二年九月六日第十頁。

（八）民立報民國元年八月二十七日專電欄。

（九）民立報民國元年九月十九日第七頁「黃克強入京記」。又二十一日北京電報有云：

二十一日晚八時袁總統正式宴黃克強及其隨來諸君，同座者有參議院正副議長、秘書長、各部總次長及各高級軍官約七八十人，酒酣，袁總統起立致歡迎詞曰：

現在世界專制國斷不能存立，非建設共和不可，蓋專制國爲家天下，僅以少數人負國家責任，故國事愈頹廢，共和國爲公天下，以全國人負國家責任，故國事可振興，時至今日我國非采用共和

國體不足以鞏固國基，克強先生有見於此慘淡經營，苦心創設共和，其豐功偉烈彰彰在人耳目，無俟贅述，在南京留守府時軍隊林立，鄙人未能時時接濟餉項，先生於軍餉缺乏之餘，不僅能鎮懾軍心，並能首倡退伍，此先生至誠感人，是謂武備的精神，望我軍界諸君均以先生武備的精神為模範，然後可維持於不敗，曾滌生云真心愛國百折不回，先生艱苦卓絕成此大業，乃所謂真愛國苦心百折不回者，鄙人極為欽佩，就一班人觀之，皆謂克強先生為磊落英雄，據鄙人所見不僅是磊落英雄，更是誠篤君子，鄙人對於先生敬之愛之，莫可言喻，此次先生北來，各界極歡迎，我兩人相見所談政見均屬相同，先生所籌畫各事皆出於真摯愛國之心，由慘淡經營而來切實可行，令人言以國家為前提者甚多，大率口頭禪，惟先生真是以國家為前提云，言畢舉酒致敬。

克強先生答詞曰：今謬蒙大總統獎飾逾恒，愧不敢當，共和成立，實賴大總統救國之決心及國務員與各軍長、師長各位一致贊助，始能收此效果，興極為感佩，現在國基初立，建設之事甚多，大總統代表中華民國人民，當此艱鉅困難之時局，一方面要維持破壞秩序，一方面要建立共和國家基礎，其困難情形可以想見，興此次來京，親見大總統為國宣勞之苦心，及一切規畫，尤為感佩，以後國家困難之事，或較今日為尤甚，凡中華民國之人民無論在政界、在社會須出真實愛國心，以贊助大總統建設之偉業，使中華民國與各國立於平等之地位，維持世界之真正和平，此興之所希望於在座諸君，並用以自勉者，言畢舉杯致謝。

(五)民立報民國元年九月十六日專電，九月二十四日第七頁「孫黃二公旅京記」。

(六)民立報民國元年十月一日。

民國政府與政黨首領之協定政策

總統府秘書廳通電云：民國統一，寒暑一更，庶政進行，每多濡緩，欲為根本之解決，必先有確定之方針，大總統勞心焦思，幾廢寢食，久欲聯合各政黨魁傑，捐人我之見，商量救濟之方，適孫中山、黃克強兩先生先後蒞京，連從驪洽，從容討論，殆無虛日，因協定內政大綱八條，質諸國務院諸公，亦翕然無間，乃以電商武昌黎副總統徵同意，旋得復電深表贊成，其大綱八條如左：

①立國取統一制度，②主持是非善惡之真公道，以正民裕，③暫時收束武備，先儲備海陸軍人才，④開放門戶輸入外資，興辦鐵路礦山，建置鋼鐵工廠，以厚民生。⑤提倡資助國民實業，先著手於農林工商，⑥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權主義，其餘斟酌各省情形兼採地方分權主義，⑦迅速整理財政，⑧竭力調和黨見，維持秩序，為承認之根本，此八條者作為國民、共和兩黨與總攬政務之大總統之協定政策可也，各國元首與各政黨首領互相提携商定政見本有先例，從此進行標準，如車有軌，如舟有舵，無旁撓，無中阻，以專取於國利民福之一途，中華民國庶有進步，特此通告宣布。（據袁大總統書牘彙編卷五第三頁載：此八條目均袁提議者）。

(六)民立報民國元年十月七日第六頁「追記政局之變遷——漁父談話」。

(三) 民立報民國元年九月二十三日第六頁「政局變遷之真相」。

(三) 民立報民國元年九月十九日第三頁北京電報。

(四) 民立報民國元年九月九、十日第二頁「袁總統加入國民黨之關係如何」。

(五) 民權報民國元年九月五日「袁氏入黨與政見之關係」，九月六日「袁世凱之總統觀」。

(六) 民立報民國元年十月七日第三頁「北京電報」。

(六) 總理全書「演講」第一七二頁。

(六) 民立報民國元年十月六日。

(六) 同(六)。

(七) 同(六)。

(七) 遠生遺著卷二。

(七) 民立報民國元年九月十六日第七頁宋教仁致各報書有云。

連日各報載，國民黨事諸多失實，甚且如民視報等謂孫中山先生辭理事職，出於鄙人之排斥，新紀元報等謂孫、黃有衝突，皆不勝駭異，此次國民黨之合併成立，全出於孫、黃二公之發意，鄙人等不過執行之故，黨員無論新舊，對於孫、黃二公皆非常愛戴，此次選舉理事，孫先生得票最多，惟孫先生以此後欲脫離政界專從事於社會事業，故不欲任事，曾經辭職，已由鄙人與各理事再

三挽留，始允不辭，現已推爲理事長，鄙人與孫先生從事革命幾及十年，何至有意見之爭，且國民黨新立正賴有功高望重如孫先生者爲之主持，亦何至有內訌之原因耶？至於黃克強先生與孫中山先生同爲吾黨泰斗，關係之親切，天下皆知，此次北來調和南北意見，主持大計，兩公無絲毫之異，更何至有衝突之事，如各報所云云乎，方今時事艱難非有強大真正之政黨作中流之砥柱，何能挽回危局，而強大真正之政黨，尤非社會扶持，各黨互相獎勵不能成立，關於政見，各黨即互有不同，然總不宜猜忌離間，日望敵黨之不發達，吾人改組國民黨時宣言政黨宜二大對峙，希望自黨發達，同時並希望反對黨亦發達，能至旗鼓相當而後已，誠以政黨須有道德，其態度固應如是也。作此等謠言之各報，屬於何黨固不必辨，鄙人總深盼其守政黨道德不再事無謂之猜忌與離間，平心靜氣以評論國家政事扶持各黨，使漸臻於健全之發達，庶幾各黨乃得日即穩固，從容研究，其在議院有正當之主張，不事喧囂，其對政府有適當之監督方法，以促成強固有政策負責任之內閣，是豈非國家之大幸事乎，區區之心乞鑒諒之，宋教仁頓首。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第三八〇頁有云：所謂新舊合作的精神，在國民黨中孫與宋與黃各不相同：中山的新舊合作是朝野合作，宋的新舊合作是總統與政黨入閣的合作，黃的理想則是化舊爲新，然當時言論激烈之民權報於黃則頗有怨詞。（民國元年十月二日社論「黃克強之正誼明道」）。

（七）民立報：民國元年九月二十七日第二頁。

(七四)民立報民國元年十月六日第三頁北京電報。

(七五)民立報民國元年十月四日北京電報。大共和日報民國元年十月十日緊要新聞。

(七六)南社第十六集第五、六頁，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宋致友人書。

(七七)民立報民國元年十月十九日。

(七八)政府公報民國元年八月份。據文獻叢編二十六年第四輯載：有關國會籌備檔案已經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購藏，惟迄未見公開發表。

(七九)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四〇一、四〇二頁。

(八〇)民權報民國元年。

(八一)同(七九)。

(八二)時報民國元年十月三十一日第六頁，民立黨係共和討論會、國民協會、共和促進會、共和俱進會、共和建設討論會、民國新政社六團體合併而成，湯化龍於成立會演說有云：「國民黨、共和黨對立，今爲第三黨，特質在不爭政權，而注意於普及政治教育，與競爭政權本亦政黨所應有之事，然既競爭政權，每不注意於一般之國民，此在政黨初發生時代往往有此現象，吾黨則當補此不足。」

(八三)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四〇五—四〇九頁。

(八四)飲冰室文集第十一冊第八頁「蒞共和黨歡迎會演說詞」有云：「共和黨爲國中最有歷史最有價值之

大政黨。」「去年八月，其蹶起以摧破二千年君主專制政治使無復痕跡者，共和黨黨首及黨員之力也。」「去年八月十九以前，其間接鼓吹奔走思摧專制之骸者誠不乏人，若夫直接實行一蹴而倒彼魔王者謂非共和黨黨首及黨員之功得乎？八月十九以後，其被動響應協力以集事者尤不乏人，若夫主動首義樹旗幟以爲天下先者，謂非共和黨黨首及黨員之功得乎，是故人人所痛恨之君主專制政治實假手於共和黨鋤而去之。」其於黎元洪及民社諸人贊揚逾恒，而於同盟會倡導革命則輕描淡寫而已。

(八五)同(八三)。

(八六)民立報民國元年十月十五日第三頁北京專電，遠生遺著。

(八七)大共和日報民國元年十一月九日第二頁北京電報有云：

「某政客擬聯合梁任公、宋漁父、胡經武、楊哲子(度)等立一新政黨，組織未就，擬改爲憲法研究會。」

時報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八日第二頁北京電報云：

「據漢口來信謂：黃興電宋請到鄂新組進步黨與孫文分離，其言一時難以盡信，然最近各黨內部極形紛亂，各種方面人提議組織新黨，不久政黨分野必有大變動。」

「參議院於十一月一日議事典試委員會編制法令二讀會，因高等典試會有專主設中央者，有主

分設地方者爭議各十人以上。將亂秩序，卒延期再議，按兩派皆國民黨人，足見該黨之不統一。」時報民國元年十一月八日：「沈秉堃、胡瑛、楊度欲聯合三黨重要人物另組進步黨。並聞已得黎、黃許可此即袁所發起救國社之變相，或能有成。」

(八八)同(七六)。

(八九)總理全書「文電」第一七四、一七五頁。

(九〇)總理電稿有云：

①漢口黃克強先生鑒：縑密，聞兄接辦粵漢，喜慰無已。弟所籌路策現已訂立條例派人往京呈總統交參議院，俟通過後再定行止，近得北京本部消息；存款將盡。弟處尙無從爲力，望兄設法接濟，從速進行，爲荷。孫文（親筆簽名）（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②上海孫中山先生鑒：漾電敬悉。漢粵川鐵路擬暫承乏，俟銀行借款成，窺各省意見調和，開工有期即行退職，先生所訂鐵路條例諒參議院必可通過。現滬籌辦情形如何，尙望隨時賜示。北京本部款盡，弟處亦無法籌措，仍請密電梁燕孫（士詒）再撥前款數萬兩接濟並希電復，興叩（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③漢口黃克強先生鑒：有電敬悉。已由燕孫請向財政部轉撥港款五萬兩交國民黨本部，請兄另電催之，孫文感（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④北京總統府梁燕孫先生鑒：新密。前克強先生商撥香港借款轉借黨用，請向財政部竭力設法轉撥五萬兩交國民黨本部收用爲荷。孫文感（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按由此可見孫先生於國民黨事務之積極態度。

民誼（同盟會粵支部發行民國二年三月十五日刊）「國民黨歡迎梁（士詒）、胡（惟德）兩君紀事」梁演說謂：「士詒因置身國事，故於黨中事務未能助理，然而時時與孫中山、黃克強諸君遇事商酌妥善辦法，以求輔本黨政綱。」

綜此可知梁士詒於國民黨固非僅掛名著籍而已也，按此不見於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

（九二）電稿簿「孫中山先生鑒：由花旗銀行滙來銀三千元，接濟同志報館請裁酌分配，漢民。感。」

（九三）即康有爲當時亦通電主戰，見不忍雜誌。

（九三）總理全書「文電」第一六三頁。

（九四）總理電稿（以下各電文均不見於總理全書，見於萱野長知「中華民國革命秘笈」篇首照片）

①北京大總統鑒：新密。今日弭患要圖非速行遷都，則急宜聯日。二者必行其一，方能轉危爲安，遷都既屬困難，則聯日不容或緩，文深維此事速欲親行一試，如有意外之好，其聯交之度當至若何，請先示程式，以便文於月底一往東洋游說彼邦執政，想不致虛行也（下略）。

②孫中山先生鑒：頃與國務院商議，僉謂日人忌我共和，恐受影響，我公往說，似應申明我之

改革係民族問題。與日本萬世一系者迥別，除國體外所有行政計劃多向彼國取法，盼其贊助，庶可免其猜忌，至聯日一節，目前尚未承認，如以公家名義前往必不能正式接待，若以私人名義探試日政府意向如何，恃公德威較易爲力，體察現在國勢只可以情誼相感，若與聯盟，時期尙早，至攻守同盟強弱相形尙難啓口，仍候卓裁，袁世凱寒。（民國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③北京大總統鑒：新密。華日聯盟大有可望，假以半年至一年之時，當可辦到，故俄蒙之約萬不可承認，當出以最強硬之抗議，使此問題延長時日，則必有良善之結果，目下儘可以不理理之，以觀俄政府之行動，再俄蒙之舉，不過一二好大喜功之徒。欲乘我之不備以博功勛。實非俄政府之本意，故對此事以牽延爲第一辦法。孫文銑。（民國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五）民立報民國二年二月十五、十六、十七日宋「答匿名氏駁詞」，按此文各書多轉載如「宋漁父」民國經世文編等（文星書店影印本）。

（六）同（七六）。

（七）民立報民國二年二月十七日。

（八）民立報民國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第十頁，鄒魯澄廬文集第三集第一六四、一六五頁。

（九）民權報民國元年九月十一日。

（一〇）澄廬文集第三集第一六三頁。民國彙報第一期第一八一—三一頁「國會地點變更問題」。

(二二)澄廬文集第三集一六四頁。

(二三)如直隸都督馮國璋通電，措詞嚴厲劍拔弩張，可見袁又利用北洋軍爲其威嚇之工具矣。錄其文於左以見一般。

大總統、國務院、參議院、各政黨、各省都督、民政長、省議會、各報館鈞鑒：頃接柏都督代轉孫君小侯來電，闢惑世之謠詞，鑄保邦之偉論，維共和之危局，保立法之精神，遠慮危言，曷勝欽佩，國璋關懷民國，蒿目時艱，險象環生，情難緘口，略陳固陋，聊當蕝蕝，從來法律爲國家之體幹，國民之準繩，而尤以人民之守法毋違，維持國本，實爲共和國之盛軌，治國之先河，民國國會組織各法由參議院制定，由國務院頒行，將來各省選政告成，國會議員當然由中央召集以成立正式國會，至於集會地點當然在中央政府所在地無疑，而上海歡迎國會團以第一屆正式國會應自行召集，自行指定地點，並擬開預備會於上海，開成立會於南京，是以南北統一之前組織參議院之慣例以推之於正式國會，其爲顯然違背約法第三十條大總統公布之法律可知，國體雖改，定律基嚴，不法行爲在刑律原有相當之科罰，該團員寧不知之，然其所持變更國會地點之理由，則在保持立法機關，預防北京軍警之干涉，豈知立法、行政皆爲獨立之機關，法令各有範圍，彼此不容侵越，前者北京軍警會議小有意見衝突，旋經大總統諄諄誥訓，禁令頻頒，數月以來秩然不紊，是固海內所共聞共見，非國璋一人之私言也，如逆臆國會成立，北京軍警必將出而干涉，至欲變更國會地點以避

之，豈南京遂無軍警而必無行政干涉立法之事乎，抑以開國會於南京，而議員等遂有講張國政之自由，且可箝制行政部使不敢少動乎，吾有以知其必不然也，推該團之私衷謂欲以變更國會地點藉立法機關之勢力牽制行政，掣中央政府之肘，迫之使出於遷都之途，夫遷都問題全國輿論之研究，多數政治家之討論，以北京爲政府所在地已成鐵案，不可再生異議，外憂內患紛至沓來，復何容自啓釁爭，貽後日無涯之禍，乃國會選舉期內，該團員竟肆其無意識之謬論，冀破壞我民國初基，其罪既不容誅，其心尤不可問，國璋嫉惡如仇，愛國若命，凡有敢簧鼓其僻辭邪說，冀以動搖國本蠱惑人心者，惟有執國法以隨其後，而冀消巨患於無形，所望於政府及各省行政長官者，宜按照臨時約法第十五條設法限制，以維持社會之治安，使邪說不至日張，至危共和之初步，所望於當選各議員者，宜知大局日亟，政務急待進行，依限齊集北京毋爲違法畔道之言所惑，則民國前途之萬幸矣，安危所繫一髮千鈞，懇懇微忱，統希亮察，直都督馮國璋真印。（民立報民國二年一月二十二日）

(103) 民國彙報第一期「憲法起草問題之討論」，第二期「專說憲法起草機關問題」。

按自南京程都督發起憲法起草委員會，通電各省徵集意見後，各省多有贊成，然未有如直、豫督之措詞荒謬者，該電謂議員來自田間，政見不一，必至互相駁詰，日久無成云云，直於根本上否認代議政體之存在，原電本係密碼，經漢口某報設法探錄，並著論痛斥之，茲將原電錄下，以見程之提議即令非仰窺袁之意旨，但已爲袁系充分把握利用矣。

「各都督鈞鑒。秘密，憲法爲立國根本，強弱治亂安危存亡胥繫乎此，明年國會成立，制定憲法爲開會後第一大事，各議員來自田間，政見不一，必至互相駁詰，日久無成，即從速通過，亦無良美結果，聞南省某都督發起先行設會起草，以爲預備，倣美國各州推舉代表特開憲法會議，由各省都督各舉學問才識兼備之士組織起草委員會，電請大總統務望一律贊成，至應派之員各省均無專門合格人才，且恐遲誤時日，國璋等已就近委託北京法制局、法學會、憲法研究會諸君，精選指定，電請本省認允，代表所有用費薪津已請由中央接濟，諸公如表同情，俟某都督請定後可電告法制局援照辦理，以省手續，而便進行，目前請暫守秘密，並望電復，鎮芳因公在京並陳，馮國璋、張鎮芳謹印」（民立報民國二年一月六日第八頁）。

其時各省都督紛紛嗷嗷每喜自作主張，蓋亦沿清末各省督撫尾大不掉之積習，而不知國體新更，地方長官固不能擅自提議變更根本大法也。幸副總統領鄂督黎元洪尙能識大體，通電各方不以程等建議爲然，錄之以見其慎重：

程都督養電悉，嗣得川、湘、黔、桂、直、奉、滇、汴、魯、浙、閩、贛、廣各都督電，於慎重立法原均贊成，惟辦法則各有商榷，元洪等竊維此舉係圖事實與法文之調和，尤注意寬籌時間，延集衆議，諸公薰籌遠慮深所服膺，惟國會組織法第二條根本於臨時約法第五十四條，約法不能變更，憲典固需詳慎，既定約法尤須擁護，臨時約法五十六條在臨時政府期內明定其效力與憲法等，

若有政官提議可以變更，恐釀成弁髦憲法之習，至設立憲法起草委員會原爲合經驗之人才，假寬閒之時日，集思廣益，藉利推行，然共和憲法定諸國民，若以中央政府及地方行政長官公舉之委員主持草案，而僅責國會以議決，揆諸憲法原理已決相違，若一省議會議員加入公舉，則參議院議員多數舉於省議會，何不信所舉之議員而獨信所舉之委員？何不信所舉之十人而獨信所舉之一人？若以兩院議員加入則仍俟國會成立始得實行，不過有臨時討論之效而究無事前預備之方，揆諸寬籌時間原旨亦無所當，方今言論自由載在憲法，豈於行政官吏而有所吝，惟溝通立法、行政兩方之意思，各國先例皆由政黨，若以立法、行政、政黨、政府混爲一團，以法律定爲機關與國會爭其權限，名爲救濟兩院龐雜，而更以龐雜益之，治絲而棼無乃類是，且所欲委員起草者爲前期征集從容討論也，無論此議之與參議院能否同意尙不可知，即同意矣，一面改政府國會組織法，一面定憲法委員起草會組織法，再延兩月，未必能成，而國會已如期成立，況此時議院尙不足法定人數乎？匪直此也，民國成立以來歲月已周，根基未固，雖挾於外鄰之窺伺，實啓於內部之猜嫌，曩者南北統一，嘖有煩言，國民往往以逆順之心不信政府，遂使秩序凌亂，意見紛歧，幸得上下相安，方冀開誠布公，始終維繫，乃當選舉國會之初，復欲以行政長官公舉之委員參預立法，是又以政府逆順之心不信國民也，縱令無他，誰復能推心相諒？設使感情一傷，爭端幾烈，國會議員終致意氣用事，縱有良法，能強其必議決乎？因築室之謀啓閭牆之釁，循環辯駁，輾轉遷延，外患之乘何堪設想？元洪

等鑒浙督四難，以爲委員起草會固無成立之必要，即委員研究會亦不必標此名目，無稱事實徒啓紛爭，若慮國會事件紛繁，大才缺乏，僅可由全國政黨本部公同舉員聯合研究，結果即由政黨議員提入國會，以供採擇，至地方行政長官原可隨時按切事勢陳述意見，較之以全省關係委托諸一二人者尤爲穩便，國會議員不乏行政經驗之才，果能相見以誠，亦何至深閉固拒，似以此辦法既得溝通行政之利，亦無侵害立法之嫌，而一切交議院籌會費諸問題皆可無煩解決，天步艱難，人心未定，各省都督老成謀國，當能籌畫萬全，倘必欲免政界偏枯之慮，爲先期慎重之方，諸說相權，毋寧參照湘督電旨改爲憲法研究會，尙無窒碍，區區之愚，是否有當，伏乞規示，總之憲法起草關係甚重，必須審慎周詳，元洪等雖有疑慮，究無成心，倘能示我周行，仍當服從公論，至滇督政策以建造強固政府，適合中國現情爲憲法精神，起痼開朦，發人深省，危言讜論，實獲我心，尙望諸公視此良箴，懸爲圭臬，願瞻前路，籲與禱俱。」

今按其所持論，可謂似尙能識立憲政治之基本，其中指陳「可由全國政黨公同舉員聯合研究，結果即由政黨議員提入國會」，尤爲當時碌碌諸公所未曾言及者，而各省都督不之顧仍分途舉薦所謂人才，幸被舉薦者亦有不願爲「各都督之儲言器」者，如章行嚴即其顯例，錄其通電，以見真相：

雲南蔡都督及各省都督鑒：蔡都督陽電，主張將憲法重要問題由各都督商定提出委員會以爲編擬張本，意匪不盛，惟程都督發起委員會意在搜集國中才智之士以不偏不倚之論調爲根本法造一間

架，此中有不可不守之條件，即其人物心無偏黨之心，而會員言論之獨立又得充分保障是也，蓋非此不足表示各都督之無成見及團體之尊嚴，不足使深識自好之徒銳身自進，且不足使正負各論盡量呈露，有一於此即非發起斯會之本意，今無論諸公之意見精富奚似，維以各都督之名義制爲原則提出於所推舉之團體，令其准此編擬，如馮、陳、張諸都督所云，則各委員無異都督之儲音器，全自失其位置，不肖如釗未敢與聞此事，茲會發起既久，外間輿論亦至不齊，而行政人員干涉立法一層，乃其唯一口實，今所舉各員如釗不學亦與其列，才智二字已不必盡人而然，總統府及國務院之秘書亦或被推，偏黨之嫌尤難盡泯，諸公又復製成條件，強會中准此擬訂，毋得畔越，諸公其爲會員者果均何以自解，鄙意委員既經舉定，即有自由發論之全權，無承受他人意旨之義務，各都督聯名電告委員會一層爲之與否釗亦何敢干與，惟如此機關似嫌贅設，不如罷斥所舉各員，由各都督電商一切重要問題自行編擬，反爲便捷，狂瞽之言，即希鑒諒，浙江憲法研究委員會章士釗敬叩。（民立報民國二年二十五日）

（一〇四）民立報民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三頁北京電報「續電二」袁與各政團代表姚雨平、徐紹楨等談話記錄。

（一〇五）民國彙報第一期「軍民分治之政海潮」。

按軍民分治本無反對之理，惟當時政局以此紛擾者則因別有問題：①軍民分治中之民政長，別

含有簡任與民選之爭，而總統簡任之人又往往不副衆望。⊙當時各省情形，已可行分治之制與否尙屬疑問。而自稱分治模範省之湖北即有名無實，又如江蘇省已實行分治，而程德全都督並不願將財政權交出，且又請總統核准：凡縣知事皆兼軍銜，土匪准按軍法從事。則根本上已不承認分治問題之成立矣。至江西省之反對袁派民政長，則純因其人品德問題，乃因共和黨人競選國會議員失敗乘機挑撥，於是事態複雜且擴大。錄國民黨浙支部通電以見一斑：

民立報轉湖南譚都督、廣東胡都督、安徽柏都督、福建孫都督、暨各省議會均鑒：自江西人民反對汪瑞閻任民政長事發，中央疑及贛督，誤爲軍警干涉，更誤以購械徵兵，移兵拒汪爲一事，貿然遣派軍艦多艘耀威潯陽，扣留槍彈，以致民憤軍怒，農畏市驚，視民如仇，以己爲敵，抑何謬甚，夫中央爲行政中樞，政府負全國責任，中央失政，責在人民，當今監督機關未曾完備，吾人民若秦、越相視，安能鞏固共和，國內兵爭謂之內亂，方今外患日迫，國基未固，內亂一起，適召土崩，如有甘爲戎首，即爲全國之敵，況護照經軍部認可，與私運不同，拒汪乃人民公意，非李（烈鈞）能爲惡，中央不依法理不徵事實，不顧利害，挾國民公有之中央政府，而犧牲於一汪瑞閻之任命，背政體，反民意，間軍心，至此已極，是以瀝忱邀請鄰贛各省通電中央力爲糾正，計維收回任命，發還槍彈，退軍艦以慰民心，而保國本，在今萬方多難，吳越一家，得荷同意，不獨國民之幸，亦即中央之幸也，據忱相請，切盼裁答，國民黨浙支部，公民急進黨浙分部，咸。（民立報民

國二年二月十七日)

(一〇六)民國彙報第三期「言論」。

(一〇七)自民國二年一月總選揭曉，加以江西風潮，全國各地展開電報前哨戰。

雲南、廣西、貴州、四川四省都督致電北京政團聯合會轉大總統、副總統、各省都督民政長、國民、統一、民主、共和黨各支部鑒：「自統一政府成立以來，南北水乳，秩序漸就恢復，凡在國人均應同心戮力，一致進行，內鞏國基，外禦敵侮，乃近聞有奸孽之徒，陰謀竊割，乘機思逞，大江以南恣情鼓煽，事雖無據，語出有因，締造艱難，豈堪再經破壞，如係傳聞失實，固如天之福，萬一見諸事實，則擾亂治安即為民國公敵，吾輩職責所在，惟有盡力所能，聲罪致討，必不令奸謀得逞，致陷危亡，諸公手創國家，為國柱石，諒表同情，迫切呈詞，伏乞鑒查，祇聽後命，蔡鍔、胡景伊、陸榮廷、唐繼堯叩，麻。」

此電到後，當由袁總統復一長電與四都督並各行省長官略云：「余以衰病餘生，伏處已久，稍有田園之樂，自問已無事可為，此次出山，實緣事機危迫，不忍見人民陷於牛馬奴隸之域，故甘冒萬險，膺茲艱鉅，受事以來，始終以尊重人道主義及適合世界大勢為主旨，苟可和平維持，決不肯輕事破裂，並非兵力有所不足，實緣民困已極，不堪再受戰禍，一年以來彌縫遷就之苦衷，當為國民所共諒，現在財政、外交觸處荆棘，國家運命且夕可危，凡有血氣之倫，自應以同舟共濟之心

爲被髮纓冠之計，決不肯再言破壞，自取覆亡，乃若有之，則亦二三不逞之徒生性好亂，必不能得多數國民之同情，本大總統若再由予優容，便與此輩同爲亡國禍首，非惟辜負衆望，實亦矛盾初衷，惟有犧牲一身，保全大局，竭我棉力，殄此么麼，諸君各膺疆寄，必有同心，願共勉之。」云云。

按自孫黃、入都之後，南北感情久已融洽，乃近忽有一種好事之徒逞意造謠，而中央左右復有一二小人媒孽其間，遂使猜疑不已，此電即自猜疑中來也，度造謠者之心無非藉此播起一種風潮，從中取利，個人以外目光並無所及，此種敗類實不足責，惟杯蛇市虎易惑觀聽，一旦禍變復作，受其害者惟鄉里無辜之良民耳，竊願負社會之重望者，有以維持其間，毋使奸回之志得逞，則保全者多矣。（民立報民國二年二月十六日第七頁）

李烈鈞因亦通電以反擊袁之威嚇：

北京大總統、國務院、參議院、新聞團體，國民、共和黨並轉各政黨本部、武昌副總統、各省都督、民政長、省議會、上海民立報轉孫中山、黃克強先生均鑒，讀滇、蜀、邕、黔四都督歌電，仗義執言，力維大局，無任欽佩，竊竊爲大江以南一隅，烈鈞亦國民公僕之一，風言譌語初無所聞，患氣宵謀竟未之覺，遠承挾剔，獲所弭防，翹首章門，慚慙無地，方今國基新奠，民志未固，謂非大愚，寧忍孤注，惟遞嬗之際，或涉旁販，風尚所蒸，宜標正義，睹茲龐雜，慨喟興焉，敢貢

素懷，以質左右。

吾國專制垂五千年，而牧民者好惡從同，談政者教授式訓，貌襲帝政，義赫民靈，積潰所傾，浮醫爲掃，此次共和肇造，職是之由，詎批政方除，變本加厲，此微論樹幟自雄足召分析，抑或滔威復肆有背共和，要爲約法所不容，即皆國民之公敵，誰爲戎首，誓効前驅，同屬邦人，能無悔禍，正不必是丹而非素，亦未可掠影而囂聲，此願掬誠相告者一也。

民國初立歲星已週，粵自南北統一以來，大政方針日見統一，而溯孫、黃兩公入都以後，國民情意日見融和，雖庶議或因黨派而紛歧，然政論要以國家爲歸宿，近者移鼎遷都之議尙待研求，歡迎國會之團亦經解決，方幸合鑪一冶，息此囂塵，夫誰聚鐵九州，鑄將纒鼎，昔美以南北猜嫌卒興戰禍，德於南北聯結畢造雄邦，取鑒前車道在善擇，若或以已化畦町隱分畛域，室人交謫，自啓分崩，反之初心，竊所未喻，此願掬誠相告者二也。

編練軍隊，原爲對外問題，政治競爭不越和平之量，明斯二義，方足言治，烈鈞不敏，素以此旨詔勉將校，忠告政團，幸經年以來政界無激越之潮，人民有安居之樂，而各將校尤能深明大義，共固國基，因念武裝時代，列強方以武力維世界之和平，我豈宜以戎威召內部之分裂，即謂綠林嘯聚，或逞逆謀，現時軍旅嚴明，儘容剪芟，重以大總統威信，自無不戢之狂夫，何慮竊號自娛，甘冒不韙，而監督執政改造樞廷，是又視民氣爲尾閭，更無倡武力之餘地，方今國會成立在邇，舉凡

制定憲法問題，組織正式政府問題，皆國民應盡之天職，爲政治競爭之漩渦，詎可不注意於茲而舉政爭於和平之外，惟口興戎，傳垂明訓，其亦不可以已乎，此願掬誠相告者三也。

國步方艱，隱憂未艾，大總統、副總統開物建業，必能擁護共和，各都督、各執政亮達公忠，亦必同扶國本，曠觀世局，聊貢芻言，伏維察裁，不勝大願，贛都督李烈鈞叩謝。（民立報民國二年二月十八日）

國民黨亦通電表明他黨誣捏情形：

上海國民黨交通部及各省國民黨支部鑒：頃本黨接蜀支部來電，據稱共和黨報載京電，誣本黨密議擁戴孫、黃發難，以蘇、浙、皖、贛土地抵借日款，購備槍械，割據東南云云，不勝駭異，按政黨競爭應以政見異同爲範圍，今該黨無故捏造種種謠言，誣誣本黨，淆亂聽聞，此種卑劣行爲，實已逸出政爭範圍以外，本無申辯之價值，特以構陷本黨其事尙小，而殆及國家其禍實大，前途遼遠曷勝杞憂，爲此通電表明該黨誣捏情由，庶此後全國同胞不致再受其迷惑也，國民黨本部，叩。

（民立報民國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政局之危機重重，王芝祥等爲消弭隱患乃在北京組織國事維持會，發表宣言書如下：

欲建強固有力之國家，非先建強固有力政府不可，欲建強固有力之政府，非國民與政府相信任不可，滿清之季政治萎靡，武漢豪俊首塞義旗，全國響應曾不半載，清社爲墟，何則？人心所向，

天命難回故也。民國肇建，五族共和，政體國體煥然俱改，臨時政府成立以來，雖俄庫、英藏邊患日亟，國際承認悠渺無期，然果使內政先修，威信漸立，外交問題尚可徐圖解決，至若各處軍隊譁變時致，梟傑橫行，伏莽盈野，閭閻憔悴，民不聊生，此則革命後不可免之階級，亦不足重爲詬病，況正式國會及政府成立在即，凡百政治方將實行興革，吾人處此，亦唯有忍目前須臾之苦痛，以冀享將來無涯之幸福，新造之共和國家欲其一躍而幾法、美之郅治，此事實上萬不可能者也。

臨時政府成立距今已及一年，自孫、黃入都，南北感情漸臻融洽，二次、三次革命之風說久已消滅無聞，就表面觀之，宜若太平不難徐致矣，然而頃月以來，庫藏主權之喪失，六國大借款之破裂，外交、財政上之危險，爲有目共見者，姑置不論，但就近日各省新發生之事實略爲審察，知絕大之危機已潛伏於蕭牆之內，有足令吾人怵目齟心者，如河東之於閻錫山，贛人之於汪瑞闓，閩人之於張元奇，黔人之於唐繼堯，川人之於胡景翼，而歡迎國會團又適於斯時發生於上海，近且于皖、贛、粵、桂及南洋各島組總支部矣，更觀川、桂、滇、黔四督之通電，知謠言紛傳，且遠及於邊省，以上數事皆全國分裂之兆端，若聽其滋生不亟設法消弭，數月以內必有絕大變動，禍患之來有非吾人所忍言者，嗚呼，以正式國會及政府成立在即之日，而有此種種惡現象演出，此吾人所椎心泣血寢不安枕也。

夫時局危急至於如此，其具有維持匡救之能力足以奠國家於磐石之安者，宜莫如政黨，而一觀

吾國之內，其號稱富有勢力之諸大政黨，則大率以一黨權利爲前提，而置國家大局於不顧，甲黨之所是，乙黨之所非，甲黨必以爲是，其於國家前途利害如何非所計也，其黨員之據要津者雖明知其行爲非法，亦羣起而擁護之，反是雖舉動並無不合，亦多方攻訐不留餘地，甚且包藏禍心，造爲蜚語，挑惡感使不安於其位而後快，近數月來此類事實發見於參議院及各省議會者亦已書不勝書，政黨黨員爲代表國中一部分輿論之人，而乃顛倒是非，淆亂黑白若此，欲得政府國民之信用，冀其發生效力，庸有幸乎，今禍機之發即在目前，非挈國內公正明達熱誠愛國爲中外所信仰之人，同心協力組織一特別機關，發伸公論，維持大局，則民國分裂之禍殆無可免，國事維持會之發起誠須臾不容緩矣，本會發起之宗旨其大綱有三：

第一、維持立法與行政之衝突，凡議會與行政有意見隔閡之處，當由本會設法疏通。

第二、維持中央與地方之衝突，凡各省與中央有誤會牴觸之處，當由本會委曲解釋。

第三、維持政黨與政黨之衝突，凡甲黨與乙黨有激生惡感之處，當由本會居間調和。

以上三者爲本會最大之前提，應盡之責任，其屬於立法、行政權者，本會但可陳述意見，決不絲毫干預，入會之人不論隸何黨籍，但在會中發言持論必須一秉至公，不得稍執黨見，會中訂有規約，亦當一律遵守，違則立即除名，總之本會之設，志在於維持國家匡扶時局，以至誠惻怛之心爲排難解紛之舉，苟利於國，身家可棄，名譽可捐，所望政府與國民各方面能從此化除意見，共矢忠

誠，俾由強固有力之政府以建設強固有力之國家，而吾人今日所預料之危險，胥歸消滅，勿使不幸而言中，此則本會同人所鑒香以祝禱祀以求者也。

發起人：王芝祥、楊曾蔚、孫毓筠、庾恩賜、李書成、孫榮、于右任、胡萬泰、耿觀文、黃瑞霖、程克、溫壽泉、陸建章、王人文、李經羲、林述慶、孫多森、章士釗、冷遹。（民立報民國二年二月十七日）

（二〇八）民立報民國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國民今日當以全力對外爲唯一職志」。

（二〇九）民立報民國二年三月十三日第七頁「宋遜初之危言」。

（二一〇）民立報民國三年三月十一日第七頁，三月二十三日第十一頁。

（二一一）民立報民國二年三月十二日第二頁「宋教仁君之時局談——駁某當局者」（宋漁父第一集前編第十四頁）。同年三月十五、六、七日第二頁宋「答匿名氏駁詞」（宋漁父第一集前編）。

（二一二）澄廬文集第三集第二四頁。

（二一三）同上書。宋漁父第一集前編徐血兒撰「傳略」有云：「時國會議員多連袂來滬，先生與以商榷政見，復多相合。乃約予爲之起草國民黨大政見。先生口述而予則筆錄之。三日始成，僅及大綱，先生略加修改，擬至京時與本部議決後公布天下。」不幸即及於難。同年四月民立報始刊載此大綱。並另印單行本，惟就徐血兒之言則其筆錄經宋修改者，非宋手筆，故刊載時用排印，另將宋手草之

「中央行政與地方行政之分劃」用照相版刊載民立報，宋漁父第一集後編即有此手稿影印（同書前編有此稿排印本，全同）故研究其政見應以此手稿為準。

（二四）上述手稿據影印第二頁顯明著錄「省縣皆設地方官掌官治行政，並同時設爲自治團體，置議會，參事會，掌自治行政。縣之外大都市設府，當外國之市，直接於省縣之下設鎮鄉即直接於縣皆爲純然之自治團體。」至於宋漁父第一集前編排印「大政見」第四頁作「主張省爲自治團體」，而未提及「縣」者，以其爲政體主張，就單一國或聯邦制何所選擇而云然。且續云：吾人不重在地方分權而重在地方自治。而其手稿「中央地方行政之分劃」一文中有「省縣並設爲自治團體」語，其所主張極爲顯然，論者不能謂其只以省爲自治團體，而不注意其強調之縣鄉鎮純然爲自治團體也。參見第一章第五節。

（二五）上述手稿寫真第三頁。

（二六）澄廬文集第三集第二六頁。

（二七）譚人鳳牌詞。宋漁父第一集後編「被害後十日記」。楊世驥辛亥革命前後湖南史事第三三頁謂宋在湖南即有人勸其戒備，其言不確。蓋錯讀牌詞，不知宋係於民國二年一月下旬由湘而赴武漢，非回湖南也。

（二八）民立報民國二年三月二十二日第三頁北京電報。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上册第二二八—二三一頁載是

年二月，梁南旋廣東故里。宋噩耗南傳，梁撫然曰：天下從此多事矣。即電港探赴滬船期。旋接江少荃（孔殷）復電云：「遜初竟及難，以黨死，殆無疑。此何時？有愛於項城者不爲，共和與統一必無是，殺遜初者可以弱國民、危總統，必有尸之者，險矣哉！公向日調停心苦，遭此得無大沮喪。」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稿第四一五頁載梁啓超寄其女書謂國民黨指刺宋兇手第一爲袁、第二爲梁啓超。梁曾於庸言雜誌第一卷第九號發表「暗殺之罪惡」一文。

（二九）陳果夫演講詞「陳英士先生與二次革命」。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十二日在重慶中山學社講。其詞有云：

「宋教仁被殺，這是袁世凱最毒的陰謀，他想挑撥我們同志的感情，故意說是陳某（英士）派人刺殺的。原先宋先生對交出上海這一師兵很不高興。記得英士先生辭職時有一篇宣言，大意說從前單槍匹馬打製造局，現在把軍隊交出來不能得同志諒解，如果同志肯團結，他是可以再起的。這篇宣言是一位湯先生擬稿的。後來許多同志勸着不要發表，所以沒有發表，英士先生聽得外面謠言說是他刺殺宋先生的話以後，便找到了吳佩孚來，吳是替英士先生做情報工作的，在上海當電報局局長。袁和上海方面往來電報，我們都能拿得到，就完全靠吳佩孚的功，宋案能在三小時內破案，也就因在電報往來中找出線索：那幾個人有電報，那些人有關係，所以一索即得，否則是不易破案的。」按何仲簫陳英士先生年譜第四〇頁亦述及之，但無此文之詳明。

據北京國務院檔案知袁方對宋案發表之聲明，即多方羅織陳英士者：其文有云：

「宋在南方主張袁爲總統，而已任內閣，陳其美一派深忌之，黃亦惡其不舉己爲總統，且疑其爲親袁派也，亦欲排而去之。陳於是乘其隙，日嗾其徒，唱爲舉黃之說，以離間黃、宋之交，而使日內閣總理之席歸之於己，宋、陳之間暗潮已極激烈，應本陳舊部，武又黃之私人，適洪述祖因宋爭內閣，恐趙不能安於其位，欲敗宋之名譽，以全趙之位置，託應求宋之劣蹟，應以之告陳，陳乃利用此時機，假應、武之手以殺宋，而歸其罪於中央，其用心之狠毒，實爲意料所不及，其破案之速，亦由於陳者，蓋應、武初不料主使之人忽爲反陷之舉，遂毫不設備，亦不遁逃，而陳事前既爲間接唆使之人，故一索即得也。既獲之後，武士英在法公堂已經供出，陳以廿餘萬之巨款賄通法公堂，將供詞全數抽改，復以威嚇應謂詎趙、洪則其罪決不至死，且能以巨資相贈，若直供不諱必置之死地而後已，及移交檢察廳後，陳慮武仍如前供乃毒殺之以滅口，而以巨金賄西醫剖驗以爲病死。於是應益有所憚而不敢言，此皆應親告其所延之律師，且謂非轉移他處不在若輩範圍以內，則此案真象，必不可得，渠在監內日夜防護，以巨金賂典獄者，每食必與人共座，俟人先嘗，然後下箸，否則不食，其危險之狀已可想見，黃克強前此主張組織特別法庭，實欲以一手掩盡天下目也。既爲法部所扼，計不得逞，則以暗殺之說要挾廳長，必欲其入趙以罪，日前竟有要求審判官下缺席裁判，宣布趙、洪死刑之請，幸廳長尙未允諾，然聞若輩之意，非辦到此層不可，裁判所移轉

之事，不知是否爲法律所許，若能辦到，但移至湖北，則此案不難水落石出矣。」

支那革命史第二七七頁（中譯本第一五二頁）亦述及宋爲陳英士所殺謠言，然有程德全通電公佈文證足見非真相矣。

（三）程應通電宣佈文證，各書均有刊載。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第三八四—三八九頁。胡適留學日記卷三第二〇〇—二二二頁。

（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袁世凱在朝鮮時期之電稿簿，多有涉及袁遣使赴日本暗殺金玉均者，其光緒十二年份有云：

①「韓人輕懦，刺客絕少，赴外洋行刺，尤難其人，國王前派宋秉俊十數人往返經年，詐騙謀刺，糜費甚多，終難濟事，如凱赴日時密帶韓壯士往刺之，韓人有恃，必可行。若日廷有碍難，慮各國疑議譏笑，即派妥員帶韓人往，或亦可辦。」（光緒十二年正月十一日——一八八六年二月十四日）

②「韓人赴倭刺金，倭廷外面必故作捕訊，以杜衆議，擬密囑去員妥爲教串韓人只以私仇爲辭，倭必送交韓自辦，華員暗中指揮不可出頭。」（光緒十二年正月十三日——一八八六年二月十六日）

③「昨有主事池運永自請赴倭殺玉均，韓人堅信之。凱嫌其文往，囑求壯士往。池言一人足

用，不須二人，去必成功，再四堅請。凱未深信，未敢派員同往，若不成反生枝節，已詳細指示辦法。並囑其至倭密謁徐星使求授機宜。」（光緒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即一八八六年二月十八日）以上三電均寄天津李鴻章者。由是可見袁發跡之初即喜弄此道矣。

（三三）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三八二—三八九頁。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一冊第一五〇—一五六頁。陶書第一五二頁謂：從宋教仁開始政治活動的時期起到宋案發生止，所有材料均聞自宋之同學國民黨右派議員歐陽振聲，然以今按之所述多誤，如謂「宋早年參加過萍醴起義」（陶書第一四三頁），實則當時宋在日本（見本書第二章第四章）。又謂「經常用『桃源漁父』的筆名在報上發表政見」（第一四四頁）亦誤。蓋宋僅用「漁父」兩字也。

（三三）遠生遺著卷二第八五、八六頁「悶葫蘆之政局」。

（三四）支那革命外史第二七七—二七八頁（中譯本第二三三頁）。

（三五）無錫國學講習會初印本，重慶國民公報轉載。

（三六）民立報民國二年四月十一日第三頁。黎副總統政書卷十九第二頁所載此電文字，刪去下列一段：「（元洪）嘗與海內人傑妄自比附：沈機默運智深勇沈，洪不如袁項城，明測事機襟懷恬曠，洪不如孫中山，堅苦卓絕一意孤行，洪不如黃善化。」應夔臣當時有電致趙秉鈞報告「孫、黃、黎、宋連動極烈」，「黎使田姓來滬籌款」云。（程電文證第十件）

(三七)遠生遺著卷二「悶葫蘆之政局」。

(三八)澄廬文集第三集一六四—一六五頁。劉厚生張謇傳記第二〇六—二〇七頁稱：聞之陳陶遺云：宋教仁體認，依照清代財政歷史，北京中央政府支出，全靠長江流域及大庾嶺山脈各省所接濟之京餉，現在袁之勢力只能達到黃河流域及太行山脈之各省，此各省之生產數量極微，決不能供給袁政府之軍政費，如向五國銀團借款必須以全國鹽稅作抵，鹽稅之收數以人口多寡爲比例，設如國民黨勢力控制之各省對袁不侵不叛，使彼無所藉口不能用兵統一，則銀團借款決不能成，不出兩年，袁將以財政困阨不能支持而自動倒台，不煩國民黨之討伐也。此宋當時之所以極力反對大借款以鹽稅作擔保也。

(三九)民權報民國元年九月一日第二版「最近之黎元洪——尙作大總統想耶」。

(四〇)澄廬文集第三集第二五頁。

(四一)參見(二七)。

(四二)據程德全通電公佈宋案文證，應夔臣曾將宋在甯演詞剪呈洪述祖轉趙秉鈞，謂「讀之即知其近來之勢力及趨向所在矣」。

(四三)民立報民國二年三月十二日「關選舉總統之謠言」，謂滬上數報載北京專電：選舉總統在即，人心惶恐，紛紛遷避，各國使館亦日日增置軍械防備。民立報因連續發表社論，其一有云：

余之正式總統觀（宗良）

一年來之臨時政府，其措置之失策，皆足興起吾人之悲觀，言內政則官治之不澄清如故也，民生之凋弊如故也，財政之紊亂如故也，言外交則列強之承認遲遲不至，大借債之商議久未解決，中俄之交涉延宕停頓，種種失敗視前清爲尤甚，推原禍始，國民放棄責任固不能辭其咎，而政府之敷衍塞責，實有以致之焉，夫吾國民之責任要亦監督政府而已，然吾民縱極監督之能事，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其奈政府之不之顧乎？政府而不服從輿論，則政府之失職，非人民之罪也，然政府固何以腐敗一至於此乎？則責任內閣之不能實現，舉凡國務人員無一非仰總統一人之鼻息，偵其意旨以服務故也，吾人固盛稱袁總統之雄才大略爲不可一世之人物，以之居行政首長之職，於政治必有振肢擢魄之效，而今固如何也？庶政繽紛，千端萬緒，叢於一身，雖其人爲萬能，亦有莫能勝任之慨，故總統府之顧問雖多至數十，而人才萃薈亦已極一時之盛，顧終不足以輔助袁總統產出良好之政治者，因若輩不負政治上之責任，俱承總統之意旨以唯唯否否而已。夫以我國幅員之廣，人口之衆，政治之繁，時局之危，欲實行極端之中央集權政策，識者固早知其非，況不集權於國務院而集權於總統一人，尤大乖平民政治之精神乎？時至今日，臨時政府已日暮途窮，益倒行逆施，而無所懼，內治之頹樸，外交之失敗，皆當歸咎於政府，顧今日處士橫議，謂正式大總統非某某莫屬，記者誠不知其何所見而云然也，今日社會心理其尊視總統，殆目爲國中至尊無上之人物，其思想不

免夾雜幾分專制時之影像，此大誤也。

蓋總統之地位不過一國之元首，若太重視，則爲總統者必以吾民可欺，不妨攘一切大權而遽爲己有，雖反共和專制可也，故吾人之視總統其身分止宜等於一國之元首，萬不可抬之過高，而授總統以可乘之機也，又吾人當知總統爲有總統資格者皆得應選，絕非一人所得而私，一人而得私總統，則與世襲之皇帝何異？人人心目中雖各有屬目之正式總統，然不能明目張膽呼號於國人之前曰：某某必爲正式總統，否則吾國必亡，若是充其流弊將來必以私議或武力脅制公選，非民國前途之幸也，夫選舉總統其權全在國會（吾國現行制度），今之爲總統運動者祇可爲其鼓吹預選，不可竟以其地位已確定而不可搖動，而極端詆斥他人之有候補資格也，故無論正式總統當屬何人，使國民有此種心理，實大足爲共和國民羞矣，抑有進者，他國之選舉總統，候補者必宣示其政見於全國，使人民知所取擇，苟能行使正當之運動，則無論目的之達與不達，皆爲國民所許可，從未聞吾國之選舉總統，候補者竟無其人，有之亦不先以政見相宣示，致任一人鬼鬼祟祟從中播弄也，夫總統有有實權與無實權之分，有實權者總統即行政首長，如美國是也，美國憲法上之機關凡三：曰總統、曰國會、曰法院，內閣除閣長皆爲隸屬於總統之事務員，故政黨之競爭其目的物在總統。無實權者總統僅爲國家之元首，如法國是也，法國憲法上之機關凡四：曰總統，曰內閣，曰國會，曰法院，法國總統，超然於其他三機關之外，其職在調和節制，故政治上之實權在內閣總理，而政黨之

的物遂在內閣總理而不在總統，吾國憲法采美國式乎？抑采法國式乎？吾知政黨內閣既爲多數人民主張，必采法國式而無疑也，夫既采法國式則總統非行政首長，奚必視爲奇貨可居？羣起而逐鹿乎？而爲正式總統運動者又何得謂正式總統非舉某某則中國必亡乎？總之選舉正式總統之權全在國會，某某能任正式總統與否又在國會之擇別力，言論界先事鼓吹本無不可，惟當具充足之理由，不應妄以危詞相恫嚇也，今日之預測正式總統者多矣，而所言皆不中程，因拉雜書之以告國人。（民立報一九一三年三月十九日）

（二四）程通電文證第十八件應變臣致洪述祖電：「梁山（宋）匪魁頃又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勦捕乞轉呈候示，鑒。」「二十四分鐘所發急令已達到，請先呈報。鑒。」

（二五）宋漁父第一集後編「被害後十日記」第四頁。

（二六）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稿第四一八—四一九頁。澄廬文集第三集第一六九頁。

（二七）澄廬文集第三集第一六七—一七三頁。

（二八）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第三九頁。

（二九）關於宋案發生以至二次革命失敗情形，可參閱李劍農書第三八九—四〇一頁。

（三〇）宋氏墓地在上海閘北，名曰宋園。建銅像作支坐側思狀，鑿石爲座。座之陽篆「漁父」二字，章太炎書。陰則刻銘，于右任撰書：「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紀，爲直筆

乎？直筆人戮。爲曲筆乎？曲筆天誅。嗟嗟九泉之淚，天下之血，老友之筆，賊人之鐵。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銘諸心肝，質諸天地，嗚呼！」不幸歷經內戰及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日軍侵滬之役，木石早圯，故民國二十四年五月黃振亞君擬編宋氏傳紀，即不知其安葬時日地點矣。

(二四)社會主義與中國(民國九年四月香港發行)第六頁。

(二五)總理全書「演講」第六三一六六頁民生主義之真義，民國元年四月在上海同盟會機關演講。

(二六)同上書第二三三頁「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批評」。師復文存民國十六年八月廣州刊行第一三四頁載：

民國二年師復即以孫中山先生倡導之社會主義均社會政策，非社會主義。其後諸青來等亦著文論及究竟是社會主義抑社會政策問題。甘乃光曾爲文駁辯「評民生主義訂誤」(孫文主義叢刊，民國十五年四月廣州刊行)。

(二七)居正清黨實錄第五〇—五二頁。

(二八)張溥泉先生全集第三二頁。

(二九)總理全書函札第四九四—四九六。

(三〇)遠生遺著卷一對於三大勢力之警告。

引用史源及重要參考資料

甲 宋氏本人著述

(一) 我之歷史 六冊 一九二〇年湖南石印本

此爲宋氏自述其在華興會與同盟會時代種種活動之最重要史料，亦爲同盟會成立時惟一存留之直接史料。

(二) 二十世紀之支那 一冊 一九〇五年五月東京鉛印本

此爲宋氏到東京之初與友人合辦之刊物，其中宋氏撰文最多，篇目有「漢族侵略史」，「西方第二之滿洲問題」，「黑龍江尙添設民官耶」，「嗚呼湖南與端方」，「中立國之防

務僅如斯而已乎」，「雖設學部亦何益耶」，「二十世紀之梁山泊」。

(三) 醒獅 四冊 一九〇五年九月東京創刊

版權頁署編輯兼發行李曇，但據我之歷史第二冊第五頁。知爲高天梅所創辦，我之歷史並記宋按期撰文篇目有：「清太后之憲政談」，「俄人運動蒙古礦產」，「袁世凱乃敢與國民宣戰耶」，「學生自治亦有罪耶」。

(四) 民報 二十六冊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東京創刊

宋氏用勢齋筆名撰文篇目「陳星台先生絕命書跋」，「既設警部復改置巡警道果何爲耶」，「南洋華人求入日本籍」，「尼夫阿利亞之獨立」，「一千九百〇五年露國之革命」，「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

(五) 間島問題 一九〇八年上海初刊本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地學雜誌重印本 建國月刊複印本此爲宋氏最早刊行之系統著述，用宋鍊名刊行，並有孟森題記，對於當時中日交涉殊有影響，宋氏之名因此大著。

(六) 民立報 一九一〇年十月十一日創刊 上海印行

自一九一一年二月八日宋氏以漁父筆名撰述「東亞最近二十年時局論」長文見於民立報端，其後續出篇目有：①二百年之俄患篇，②蒙古之禍源篇，③滇西之禍源篇，④承化寺

說，⑤討俄橫議，⑥憲政夢可醒矣，⑦外債感言，⑧論南滿鐵路屬地行政權混雜之害，⑨政府借日本債款十兆圓論，⑩再論政府借日本債十兆圓，⑪論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⑫近日各政黨之政綱評，⑬東南各省水患論，⑭希望立憲者其失望矣，⑮後四國借款之紛議，⑯論日英同盟條約之修改，⑰摩洛哥問題之紛議，⑱日俄同盟之將成，⑲極東政策之轉變，⑳四國借款之用途，㉑曆法平議，㉒今後中國之命運，㉓論都察院宜改爲懲戒裁判所，㉔社會主義之商榷，㉕論美英公斷條約，㉖英國之國會革命，㉗土意之的利波里紛爭，㉘日人之密窺蒙古，㉙日本內閣更迭感言，㉚中葡澳門劃界問題，㉛新疆又大借款矣，㉜葡國改革之大成功，㉝東三省之借款問題，㉞四川之歷史，㉟論川人爭路事，㊱果爲干涉內亂耶，㊲交戰時之中立論，㊳湖北形勢地理說，㊴上海市面無意識之恐慌，㊵敬告日本人，㊶最後之勝負如何。

以上各篇文字可見宋之學識及其對國是之見解，爲研究宋氏言行之重要資料。

(七) 程家樞革命大事略 民國二年一月油印本，有張繼跋。又國史館館刊第一卷第二、三期馮自由補注本。研究同盟會組成之初的重要資料。

(八) 比較財政學 一九一一年上海印行
日本小林丑三郎原著，宋教仁譯。

乙 同時人著述

(一) 時務報 一八九六年創刊 上海印行

其中梁啟超文字多已見於飲冰室文集，惟章炳麟之「論亞洲宜自爲唇齒」，「論學會有大益於黃人亟宜保護」等篇均不見於章氏叢書，可考見章氏早期思想，報紙紀事亦可見當時湖南情形。

(二) 昌言報 一八九八年創刊 上海印行

其中有章炳麟與曾廣銓譯述之「斯賓塞爾文集」及「書漢以來革政之獄」諸篇均不見章氏叢書，可考見章氏早期思想。

(三) 湖湘通藝錄 一八九七年十二月 湖南木刻本

江標編輯，當時湖南各學堂學生對外國史地政法之文字，可考見宋氏青年時環境思潮。

(四) 湖南時務學堂初集 一八九八年湖南木刻本

內容分學約、界說答問等有梁啟超與諸生問答，可考見當時湖湘青年思想。

(五) 湖南時務學堂遺編 一九二二年印行

此爲熊希齡爲慶祝梁啟超五十生日而輯印當時遺文遺事，亦可考見三湘士子之趨向。

(六) 仁學 一九〇一年發行一九〇二年再版 東京民國報社印行

譚嗣同著，其思想推動湘人革命行動極大。

(七) 遊學譯編 一九〇二年九月創刊 日本印行

此係湖南留日學生楊度、黃軫（興）等所創辦，提倡軍國民教育及民族主義，對湖南青年影響極大，其第十冊有「湖南同鄉留學日本題名」可考見當時湘籍學生留日時期及革命淵源。

(八) 中國日報 一八九九年香港印行

此為革命黨首創之日報，鼓吹革命極具影響，並有旬報，彙載一句大事，尤便讀者，例如庚子拳亂吳永在懷來接待后帝事，旬報載吳永在漢口談話，比較吳永庚子西狩叢談即近真相，其他類此事例不勝枚舉。

(九) 蘇報 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份 上海印行

蘇報主人陳範係湘人，故對故鄉改革極注意，該報於此記載甚多，一九〇三年五月刊出之陳天華撰「敬告湖南人」，「論湖南官報之腐敗」及「論中國學生同盟會之發起」，「覆湘南同學諸君書」，對華興會之起義與同盟會之組織均有重大影響，陳天華集（一九二八年上海民智書局刊本及一九四六年上海重印本）及蘇報案紀事與其他各書均未著錄。

(十) 新湖南 楊篤生 一九〇三年東京鉛印本

號召湖南獨立，對華興會行動有直接影響，此爲一宣傳小冊，革命逸史諸書均誤作期刊雜誌。

(十一) 湖北學生界 一九〇三年二月創刊 東京印行 七冊

湖北留日學生創辦，以輸入東西學說喚起國民精神爲宗旨，流傳鄂境，各學堂影響甚大，端方曾札禁閱讀，第四期載有「留學生組織義勇隊抗俄事件」等文件，此刊出版年月原按滿清紀元，第五期改作黃帝紀元，並刊有「大湖南北同盟會啓」廣告，要可謂同盟會之先聲，第六期改名「漢聲」。

(十二) 浙江潮 一九〇三年二月創刊 東京印行 十冊

浙江留日學生創辦，第一期即有中國大患在俄之說，第三期刊「非省界」一文，力言各省同鄉會之不當，主張全國聯合。

(十三) 江蘇 一九〇三年五月創刊 東京印行 八期

江蘇留日學生創辦，第三期起載反對變法立憲論，刊載孫中山先生文字。

(十四) 新世界學報 一九〇二年九月上海印行

發行人作「有恥民」，內容有馬敘倫、湯爾和、陳懷等人著述，反對君主立憲提倡民族主

義。

(十五) 競業旬報 一九〇六年創刊 上海鉛印本

胡適及湘人傅熊湘等主編，不贊成君主立憲。

(十六) 俄事警聞 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創刊

反對和平變法，贊成革命抗俄之論，至第七十三期起改名警鐘。

(十七) 國民報彙編 一九〇四年七月 上海刊行

國民報原係一九〇一年五月創刊於東京，此爲分類彙編本，內容倡民族、民權之說，秦力山、王寵惠、章炳麟均有撰述。

(十八) 國民日日報彙編 一九〇四年十月 上海刊行

是報乃章士釗、陳獨秀、連橫等主筆，分社說、外論、中國警聞，政海諸欄，於蘇報案及沈蘆案紀述特詳。

(十九) 民報 二十六冊 一九〇五年創刊 東京印行

同盟會機關報，其內容之充實爲以前各種留學生刊物所不及，可見一九〇五年前後留日學生思想之演變（參見甲四）。

(二十) 復報 十冊 一九〇六年五月創刊 東京印行

劉師培（光漢）編輯，民報廣告謂此刊爲其姊妹刊，但兩者比較，復報之氣勢、理論均遠不如民報。

（三）天義 何震（劉師培妻）編輯 一九〇七年東京印行

以破壞固有社會，提倡女界革命及種族政治經濟革命相標榜，但內容平平。

（三）薄幟 一九〇七年一月 東京發行

編輯兼發行人黃一鑄。據我之歷史：其發刊詞原請宋作；嗣因事忙，改請章炳麟代撰，倡中央革命說。

（三）洞庭波 一九〇六年九月 東京出版

爲鼓動湖南革命之又一刊物。

（四）中國新報 一九〇七年東京印行 總編撰員楊度

楊度之政治主張調和緩進、急進二者之間，以和平手段達到早日召開國會融化滿、漢界限之目的。此刊爲其喉舌，所倡金鐵主義即發表於此，復報曾批評其主張。

（五）大同報 一九〇八年東京刊行

此爲留日滿洲學生出版對抗革命宣傳之刊物，創刊號有楊度祝辭。

（六）大江雜誌 一九〇七年 東京印行

爲專以駁斥楊度主張之刊物。

(三七) 東亞月報 一九〇八年四月創刊 東京印行

日本黑龍會研究東方時務之華文雜誌，頭山滿、犬養毅等均有撰述。

(三八) 民呼報 一九〇九年五月十五日創刊 上海印行

于右任創辦鼓吹革命之日報，因言論激烈，被迫於同年八月十四日停刊。

(三九) 民吁報 一九〇九年十月三日創刊

「民不敢聲故僅吁耳」仍繼續民呼精神鼓吹革命。

(四〇) 民立報 一九一〇年十月十一日創刊

以上三種報紙除宋氏本人著述見民立報者已於前揭外，尚有甚多關於宋氏言行及湖南革命活動之記載。至民立報記述辛亥革命、民國成立、宋氏被刺、二次革命等大事尤詳盡。

(四一) 熱誠(旬刊) 一九一〇年十月創刊 東京印行

藍公武編輯，力倡「欲防強鄰速開國會」之論，君主立憲派刊物。

(四二) 中國白話報 一九〇三年創刊 上海印行

白話道人(林白水)主辦，力倡「弄學問的除新學以外講國學、講民族、主激烈，更是要緊。」其內容多本此三原則撰文。

(三) 南風報 一九一一年二月創刊 廣西桂林印行

編輯兼發行人廖璋，以注意華南問題為主，係君主立憲派刊物，但其時論有轉載民立報者，宋氏之「滇西禍源篇」，「蒙古禍源篇」均被轉載。其第四、五期有關廣州三二九之役文電，多爲他書所未見。

(四) 新世紀 一九〇七年創刊 巴黎印行 一九四八年上海影印本

吳敬恒等主辦，倡破壞主義、無政府主義，同時刊載同盟會消息頗多，如宋氏間島問題影響、同盟會內訌等。

(五) 政治官報 一九〇七年十月廿六日創刊印行第一號 嗣又自是年十月七日補印「補第一號」 北京印行

此爲清廷在實行立憲相標榜下之官方刊物，按日采錄有關憲政論摺並刊載各國憲法提要，可考見當時官僚派對憲政之認識。

(六) 考察政治日記 一九〇八年北京鉛印本 一冊

載澤撰，其中有云「楊守仁（篤生）爲派駐日本考察編譯之隨員」可與宋氏我之歷史參證。

(七) 歐美政治要義 一九〇七年北京石印本 四冊

端方戴鴻慈進呈，可考見彼等兼搜並采各國之國會與責任內閣制、中央地方權限等內容。

(三) 北洋公牘類纂 一九〇七年十月 北京鉛印本

(三) 北洋公牘類纂續編 一九一〇年 北洋官報兼印刷局鉛印本

此二書有關當時實行憲政及地方自治之文件甚多，附錄楊度等文字亦關重要。

(四) 大共和日報 一九一二年創刊 上海印行

此為章炳麟等發起之中華民國聯合會機關報，擁黎、袁，對孫、黃、宋甚多譏刺。

(四) 時報 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三年上海刊行

介紹新知對於國內學界甚具影響，其政治立場乃與同盟會國民黨對立者，反面文章可見事實之另一面。

(四) 申報 一九一一——一九一三年份 上海印行

此為中國近代歷史最久之民營報紙，原為大張上下相向橫幅印刷，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一月十五日（第一三九七九號）為慶祝民國紀元，開始改用大張直行直排格式，為研究辛亥革命采取此獨立性報紙中有關記載要為必需者。

(四) 正宗愛國報 一九一一年份 北京印行

是報創刊於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乃君主立憲派之回教人士主辦，今為明瞭辛亥革命時期北

京及袁世凱（是報擁袁）動態特采錄其有關記載。

（四）新漢報（日報）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創刊 上海印行

是報於上海光復之次日問世，經陳其美批准將每日各方來往文電刊載該報，記載南京光復情形甚詳，其社論「定新漢策」主張中央政府宜定於南京，尤足反映宋氏及江南革黨人士意見。

（五）民國報（旬刊）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創刊 上海印行

是報以蒐集文告、撰錄傳記及紀事本末以爲他日之史料爲宗旨，大多係李劍農氏執筆。

（六）臨時政府公報 一九一二年一月創刊 南京印行 五十八冊

爲孫中山氏任臨時大總統時之公報，其中文電多有可采。

（七）臨時公報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創刊 北京印行

此爲清帝退位後之翌日袁世凱刊行之官報，自稱「全權袁」，一周後改用陽曆，亦改稱「新舉臨時大總統袁」，其中文電、通告均關重要。袁之盤踞北方，利用軍人甚至有稱帝野心，此類文件均有反映，是年四月二十六日唐內閣成立，此公報始停刊。

（八）政府公報 一九一二年五月創刊 北京印行

此報有每日刊及每月分類彙編兩種，內容分命令、呈批、公文通告、附錄各類，爲袁世凱

就大總統後所刊行，文件均可用，尤以附錄之參議院會議紀錄（速記錄）足資參考。

（四）**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新法令** 一九一二年三月創刊 上海印行十七冊

上海自由社出版，寄售處商務印書館，內容有法制、令示、咨告、附錄，文件均可用。

（五）**革命文牘類編**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創刊 十冊

時事新報館編輯發行，第八冊起改題上海自由社出版，寄售處商務印書館，內容采錄當時各種電文甚夥。

（六）**新國民** 一九一二年七月創刊

有孫文序，鄧家彥、柏文蔚祝詞及論文，其時評對當時各政黨無政見、政綱，大加非議。

（七）**生活** 一九一二年八月創刊 上海印行四冊

上海生活雜誌社編輯，平民共濟會本部發行，其宗旨主張社會改革應從啓迪勞動者知識，籌畫勞動者生計，增進勞動者道德着手，對極端社會主義不以爲然，提倡平民教育、平民醫院。

（八）**民權報** 一九一二年創刊 上海發行

發行人周浩（原民立報主筆），編輯人戴天仇（季陶）自始即態度激烈指斥袁世凱、黎元洪不遺餘力，與民立報之穩健言論不同，兩報時有辯爭。

(五) 共和言論報 一九一二年四月創刊 上海發行

徐楣梁輯編，選擇海內外著名日報論說及名家言論。

(五) 獨立周報 一九一二年九月創刊 上海發行

章行嚴(士釗)編輯，章爲民立報主筆，倡「毀黨造黨說」，後因張振武案與民權報辯難，乃自創此旬刊不願囿於黨見「欲稍稍以不偏不倚之說進」。

(五) 民國彙報(半月刊) 一九一三年創刊 上海發行

徐血兒(天復)、邵力子編輯兼發行，其宗旨在「選全國報章之精華，仿月報體，編纂系統之記載，庶幾養成國民抉擇輿論之能力而使言論日揆於正。」

(五) 國民雜誌 一九一三年創刊 日本印行

國民黨日本各支分部之共同機關雜誌，用以比較同盟會時代留學生之刊物遜色多矣。

(五) 黎副總統政書 一九一四年八月武昌官印刷局印行 十六冊

易國幹、陳邦鎮就黎之電稿編輯，以號召改革維持統一時期爲主，較坊間私人輯印者爲詳。

(五) 黃留守書牘 一九一三年八月 上海印行一冊錄黃興文告

(六) 袁大總統書牘彙編 一九一三年七月 上海印行

(六二) 中華民國開國史 一九一四年八月 上海初版

谷鍾秀著，就其親歷及各種文件撰成，李劍農之最近卅年政治史多采其說，初刊於正誼雜誌，嗣後行單行本。

(六三) 天鐸報 一九一〇年創刊

戴天仇、陳布雷主編，每日附送江亢虎之社會黨日刊，言論激烈，同於民權報。

(六四) 公民急進黨叢報 一九一二年九月創刊 上海發行四冊

沈劍侯發行，否認其合併共和黨之立場，而調和政府與民間。

(六五) 庸言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 天津發行

梁啓超主幹，吳貫因編輯，爲梁氏回國後首創之刊物。

(六六) 正誼 一九一四年一月創刊 上海發行

內容有谷鍾秀、張東蓀、楊永泰、鄒海濱（魯）、陳安仁等文字，自稱清流，保持正誼爲社會之中堅。

(六七) 武漢陽秋 一九一六年二月 武昌印本

暴露並指斥孫武假武昌首義之功。

(六八) 南社 一九一一年四月 上海國學社印行

引用史源及重要參考資料

南社首倡革命文學，宋氏詩文均有著錄。

(六) 乙戌集 一九二八年六月 上海印行

其中有「黃花崗與中部同盟會」一文述事甚詳，日人萱野長知之中華民國革命秘笈曾譯載。

(充) 緬甸中國同盟會開國革命史 一九二九年初版一九三三年再版 仰光鼎新書局發行

思明徐市隱編，其中革命思想編采錄秦力山之「說革命」（革命箴言）六萬餘言極重要，爲他書所未見者（秦氏爲湘籍革命健者，太炎文錄續編有其傳）。

(七) 章炳麟自定年譜 一九四三年六月 重慶國民公報刊

是編述事自一八六八——一九二二年，於同盟會行動記載甚詳，初刊於蘇州國學講習會，一九四三年六月五日至九月十九日之重慶國民公報文苑欄重刊。

(七) 黃興傳記 一九二九年北平鉛印本 一九五二年臺北重印本

劉揆一述，有周震麟後序及圖片，劉、黃同時同志，爲研究華興會及黃、宋重要史料。

(七) 蔣雨岩先生自傳 一九四三年 重慶鉛印本

蔣作賓與宋氏在武昌同學，敘述當時情景有可采者。

(七) 遠生遺著 一九二〇年初版四冊 一九三八年再版二冊

黃遠庸爲民初名記者對宋氏極佩服，於其言行記述甚詳。再版較初版增加文字六篇，並增加張君勳等序文。

(七) 陳英士先生革命小史 一九二八年 上海民智書局印本

邵元冲著 有陳氏照片及手書影印本，記述中部同盟會事甚詳，惟史實繫時頗有錯誤。

(八) 江左用兵記 一九二八年鎮江印本

林述慶著，江蘇革命博物館月刊第九期至第十四期刊載，其中述宋氏策劃攻南京事甚詳。

(九) 辛亥南北議和別記 一九二八年 鎮江印本

錢基博著，江蘇革命博物館月刊第十七期刊載，與上海近刊辛亥革命資料叢刊同題內容互有詳略。

(十) 共和關鍵錄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上海刊行

編輯者觀渡廬（伍廷芳）輯錄伍與唐紹儀進行和議之會議錄與各種文件。

(十一) 新中國武裝解決和平記 一九一七年 北京印本

廖宇春著，記述其本人承命與黃克強代表顧忠琛試圖進行和議情形。

(十二) 武昌革命真史 一九三〇年三月發行 上海鉛印本三冊

曹亞伯著，上冊所述華興會情形可與我之歷史參閱，中下冊采錄文件甚多並記載親身見

聞，自此書發行後楊鐸曾撰武昌革命真史之商榷刊於江蘇革命博物館月刊第十三期，指譬甚多，汪兆銘主政時以其中對汪譏刺過甚，藉詞禁止發行。今以其中所載與原始文件比對，確有若干異同，然仍不能完全抹煞其史料價值。

- (八十) 梅楞章京筆記 一九四二年十月滿鐵大連圖書館鉛印本一冊（非賣品）
丁士源筆述，丁氏自武昌起義先後奉袁世凱命赴武漢，是編所記軍中秘錄，袁氏密謀有爲他書所未見者。

- (八十一) 辛壬春秋 一九二四年 北京木刻本 十六冊
尙秉和著，此爲袁系人士撰有關一九一一——二年間大事之系統著述，可資比證他書。

- (八十二) 革命逸史 五冊

- (八十三)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上下兩冊

- (八十四)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續編 上卷一冊 一九四六年八月上海鉛印本
以上三書均馮自由著，今以原始史料比對，有可證補其記述。

- (八十五) 中國國民黨史稿 上海民智書局版，長沙、重慶商務印書館版

- (八十六) 澄廬文集 一九三四年廣州中山大學印行。

- (八十七) 澄廬文選 一九四七年正中書局印行。

以上三書均鄒魯著，其中可采者爲其親身參與一九一三年國會情形。

(八) 南北惡感新文牘 一九一三年 上海石印本四冊

鋒鏑餘生編，收集宋被刺後南北戰爭各方文件而成，其中有現今難得之資料。

(九) 中華民國新文牘 一九一四年 上海鉛印本十冊

收集各種文件甚多，頗資參考採用。

(十) 宋遜初被刺始末記 一九一三年 上海石印本二冊 沈翰編

(十一) 宋漁父遇刺記 一九一三年 上海鉛印本一冊

(十二) 桃源痛史 一九一三年 上海鉛印本一冊

(十三) 漁父痛史 一九一三年 湖南木刻本一冊

(十四) 宋教仁流血紀念章 一九一三年 上海

三公分直徑圓形，中爲一十字嵌印宋裸體受傷相片，下注「爲我等死」四字。

以上五種均宋被刺死後印行之單行本，與上海民立報、民權報連續兩月餘之巨幅記載，可以推見當時人對宋之景仰與其死事之重要性。

(十五) 公論(日刊) 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七日創刊 上海鉛印單頁

汪兆銘、蔡元培、吳敬恒、張繼編撰，此爲宋被刺後引起南北戰爭，國民黨名流在上海發

行之刊物，流傳甚稀。

(九六) 憲法新聞 一九一三年四月北京刊行

爲衆議院議員李慶芳等（進步黨員）主辦，其中有可採史料。

(九七) 洪水集 一九二二年鉛印本

江亢虎著，其中對宋在民立報發表「社會主義之商榷」有反應，亦可見民元江組中國社會黨之言行。

(九八) 社會主義與中國 一九二〇年九月 香港刊行

馮自由著，對於宋倡組國民黨頗多批評。

(九九) 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 一九二六年 上海印本

戴季陶著，書中批判宋爲「革命黨的第一個罪人」。

(一〇〇) 清黨實錄

居正編，其中載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國民黨中執會在西山會議時決議上述戴書批評宋之文字應刪改。

(一〇一) 張溥泉先生全集及補編 一九五一年十月 臺北鉛印本二冊

張繼遺著，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輯。其中「五十年歷史的回顧」，「革命大事記」

與其「自定年譜」「日記」於宋之言行及在革命史上地位有與戴季陶不同之紀述與見解。

(二〇二) 居覺生先生全集 一九五四年 臺北鉛印本二冊

居正遺著 其中「辛亥筭記」，「梅川日記」等於中部同盟會及宋之言行紀載均其親歷目睹，足資採錄。

(二〇三) 曾慕韓先生遺著 一九五四年 臺北鉛印本 一冊

曾琦（慕韓）非國民黨員，乃青年黨之創始者，其中對宋與黃興論述可考見他黨人士之見解。

(二〇四) 吳稚暉先生文粹 一九二九年七月 上海鉛印本 四冊

陶樂勤編訂，其中「我亦一講中山先生」，「中山先生的革命兩基礎」於同盟會之歷史地位論述甚詳。

(二〇五) 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 一九三一年五月 上海訂正再版本

張孝若著，對於其父張謇在民國成立前後之言行記述甚詳，可資採用。

(二〇六) 張謇傳記 劉厚生著 一九五八年印行

(二〇七) 黃克強先生書翰墨蹟 一九五六年 臺北印本

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就檔案庫藏及私人收藏原件影印，多為重要史料。

(二〇八) 革命文獻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就檔案庫庋藏史料彙印，其中胡漢民自傳等於同盟會活動記述甚翔實，可與章炳麟自定年譜及我之歷史相比證。

(二〇九) 四十年來之中國與我 一九五七年 臺北鉛印本 一冊

吳鐵城遺著，於辛亥革命民國成立初期事實記述甚詳。

(二一〇) 辛亥革命 一九五七年 上海鉛印本 八冊

此書采輯資料多習見者，惟錄印清故宮檔案頗值注意，但就相湘經驗比對是書編者按語（如第一冊第一三三頁謂孫中山先生之名見於清方檔案始於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十八日華輝摺，即不符事實，蓋羅家倫之孫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史料考訂即采錄較此爲早之檔案）。是編者於檔案之搜求並不完備，第八冊書目解題亦多失考不實。

(二一一) 辛亥革命前後湖南史事 楊世驥 一九五八年印行

(二一二) 辛亥革命史料 張國淦 一九五八年印行

(二一三) 大清德宗實錄

(二一四) 宣統政紀

以上兩書有關防制革命，采取德日學說以壓制法美思想之論摺，均可資採用。

(二五) 張文襄公全集

其中有關湖北學堂情形，可了解宋氏求學環境，禁止革命黨宣傳品之文件更可見當時革命宣傳情形。

(二六) 湖北學報 一九〇三年 武昌木刻旬刊

介紹國外新知於中原士子，如一九〇四年五月十日第七冊刊「研究社會主義之必要」，對於宋負笈武昌時殆具有影響。

(二七) 辛亥武昌首義記 一九四七年八月刊

李廉方編，湖北通志館編印，李氏自最初秘密策動迄起義均躬與其事，爲同類著述中較有系統者。

(二八) 支那革命外史 一九二一年初版 一九四一年增訂本 日本東京鉛印

北一輝著，由於著者乃宋之密友，故此書記載宋之言行甚多可采，一九四五年六月漢口大楚報社有中譯本印行。

(二九) 支那革命軍談 一九一二年 日本印行

宮崎滔天演，高瀨魁介編輯，其中有孫黃宋結識經過，爲他書所不及者，蓋宮崎爲介紹人也。

(二二〇) 支那革命實見記 一九一一年印行

斷水樓主人(池亨吉)著，其中有若干紀述爲他書所未見者，有中譯本。

(二二一) 肅親王 日本印本

石川半山著，其中所述肅親王掩護革命黨人事有可與宋撰程家樞事略相印證者。

(二二二) 中國國民黨史 一九四一年 東京印行

山內喜代美著。

(二二三) 中國國民黨通史 一九四三年 東京印行

波多野乾一著。

以上兩書爲日人有關此類之較新較佳著述。同盟會成立與活動多假日境行之，然就此兩書觀之，則日人固不免只緣身在此山中不見廬山真面目之譏。

(二二四) 東亞先覺志士記傳 東京鉛印本 三冊

日本黑龍會編纂，其上、中卷頗多有關宋言行之資料。

(二二五) 中國革命的秘話

頭山滿撰，一九四一年六月八日至十九日廣州迅報譯載，其中有孫、黃、宋初次晤談情形等。

(三六) 康有爲寄徐勤親筆函

一九一二年一月上海民立報神州日報影印原函，可見康對辛亥革命之最早反應。

(三七)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編 一九五八年 臺北印三冊

丁文江編，其中收錄各方函件近萬件，於一八九八——一九二八年中國政情有新透露。

(三八) 清末革命史料之新發現 一九三四年 天津大公報史地周刊第七期

此爲劉師培與端方書全文，揭露同盟會內情，洪煨蓮據抄本加標點送刊史地周刊，甚有史料價值。

(三九) 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 一九三九年 上海印行二冊

鳳岡及門弟子（岑學呂）編，梁士詒（燕孫）爲袁系要人，其書紀事文電與宋有關係者均可採用。

(四〇) 總理全書 一九五二年 中央黨史會印

此爲孫中山先生文件較完備之輯錄，但仍不免有遺珠之憾，後改名國父全集，略有增訂。

(四一) 國父全書 一九六〇年 臺北國防研究院印本

比較上述書多出百餘文件

丙 手寫本及檔卷

(一) 牌詞 手寫本 中央黨史會議

譚人鳳手撰，記其本人與同盟會活動甚詳，多有爲他書所不及者。

(二) 中部同盟會宣言 中央黨史會藏

譚人鳳撰。

(三) 中部同盟會議事錄 中央黨史會藏

(四) 孫文袁世凱往來函電 中央黨史會藏 原件

(五) 宋教仁手函 中央黨史料會藏

(六) 北京政府對宋被刺案之聲明文件 油印原本 中央黨史會藏

(七) 電稟稿 一八八六年份 中央研究院藏

此爲袁世凱在朝鮮時上李鴻章之電稟稿簿原件，其中於行刺金玉均計劃，袁再三自告奮勇，可爲袁對暗殺手段感覺興趣之重要文證，不見於李文忠公全書及養壽園電稿等書。

(八) 毅軍函札 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份 中央研究院藏

此爲姜桂題毅軍總部收到各方來函原件之粘存簿，其中有段芝貴、馮國璋、袁克定諸人手

札，均關重要。

(九) 梁啟超家藏各方函件 中央圖書館藏

其中有羅嬰公，張君勸諸人函件，極關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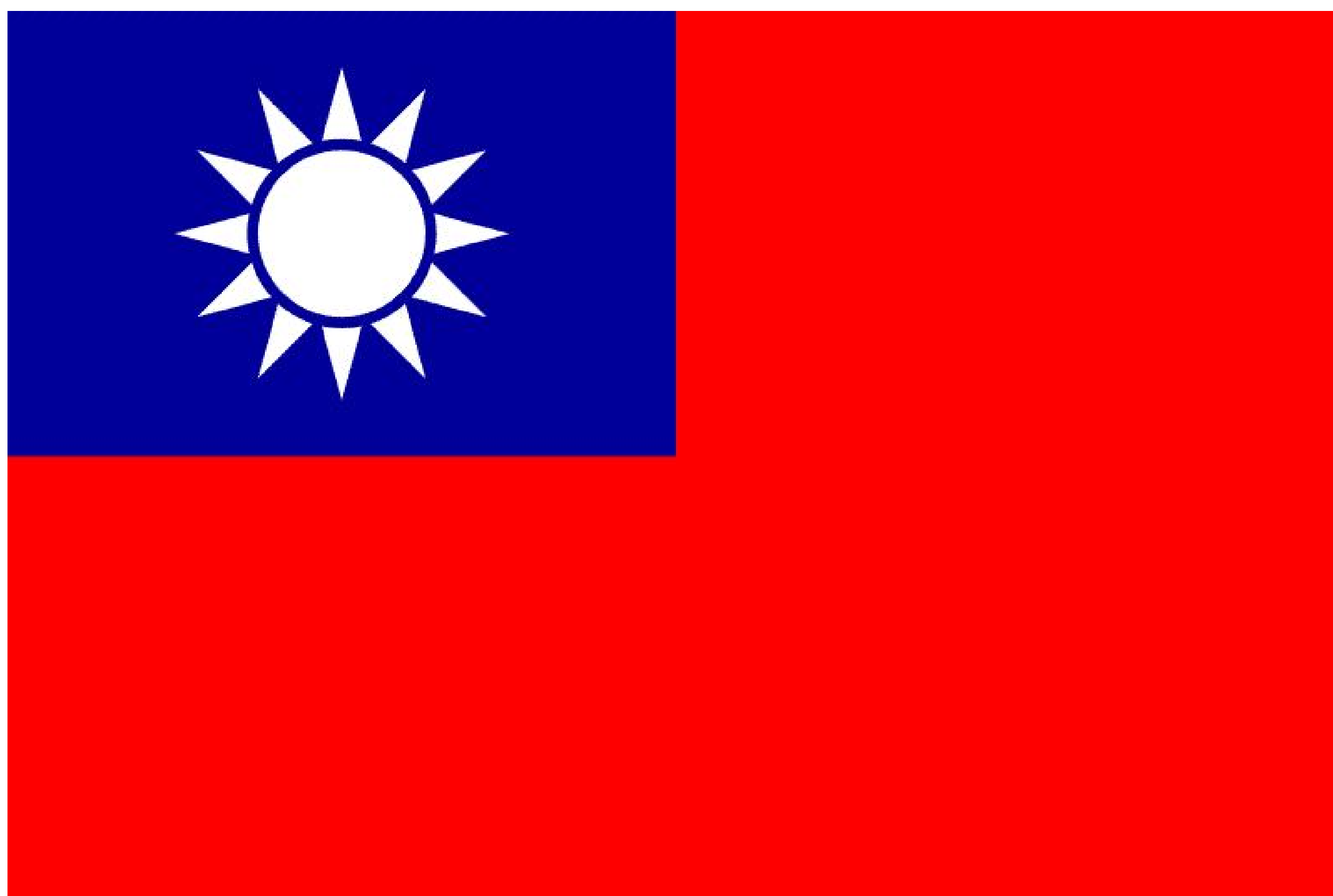
(十) 吳稚暉家藏文件 中央黨史會藏

其中有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吳氏剪貼各種中外報紙雜誌有關文字及各方函件。

(二) 日本政府檔案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底片

Microfilm Reproductions of Selected Archives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Roll No. 45—69均有關辛亥革命者。

又日本外交文書第四、五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